

# 红军长征全史

杨成武

第四卷

## 转战千里

——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战史

●王作坤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红军长征全史

第四卷

## 转战千里

——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战史

本卷主编：王作坤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名题写** 杨成武

**顾问** 叶 飞

**总主编** 柏福临 刘喜发

**本卷主编** 王作坤

**本卷编著** 朱俊瑞 董振堂

紅軍長征

千古流芳

魏





长征路上的吴焕先





任二十五军军长时的程子华



郑位三

勝利勿忘烈士功請將遺  
志記心中終極目標共產  
制大家努力莫放鬆

鄭位三敬題

鄭位三 1950年9月写，1955年自书于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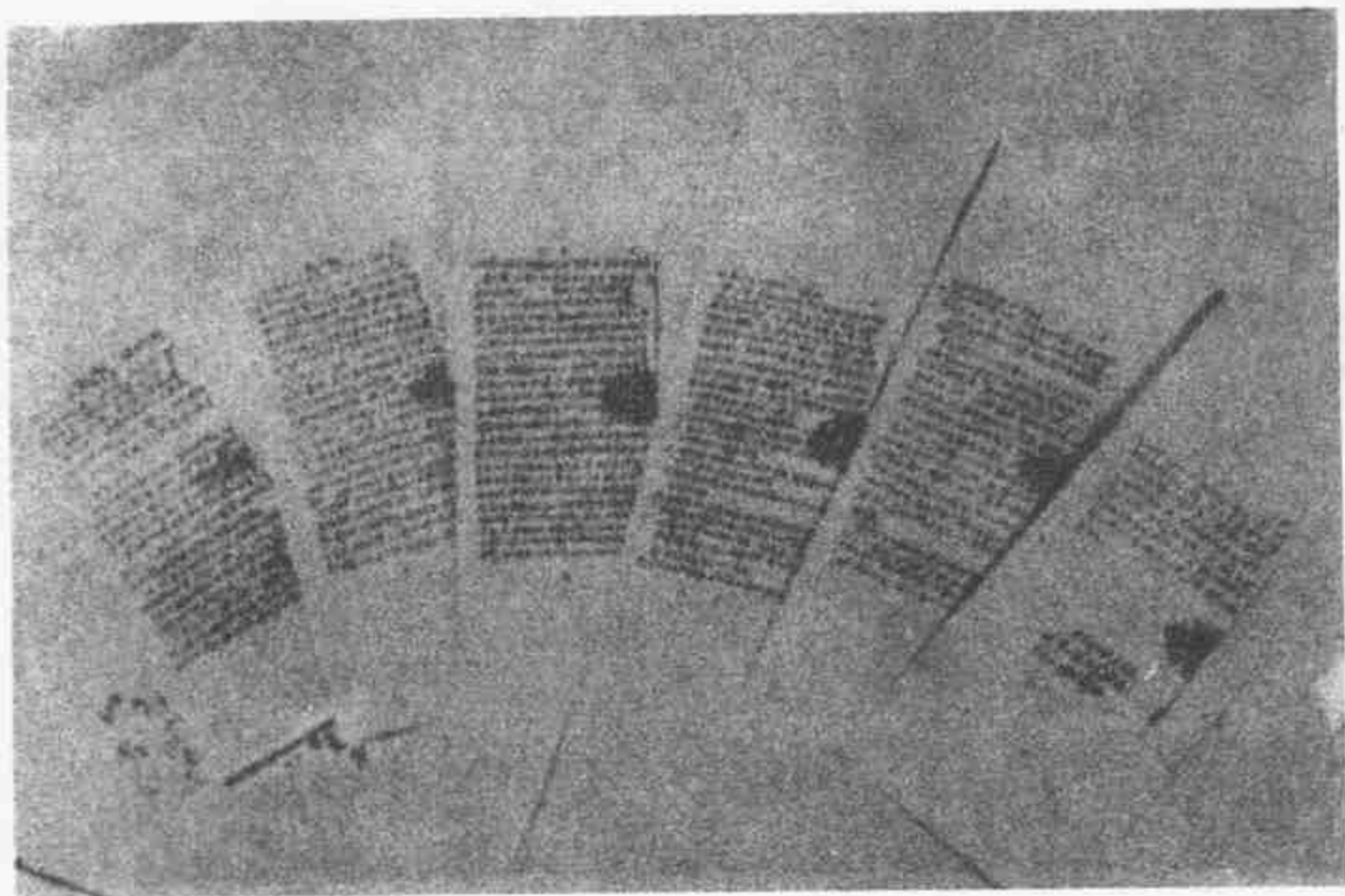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渡过渭河的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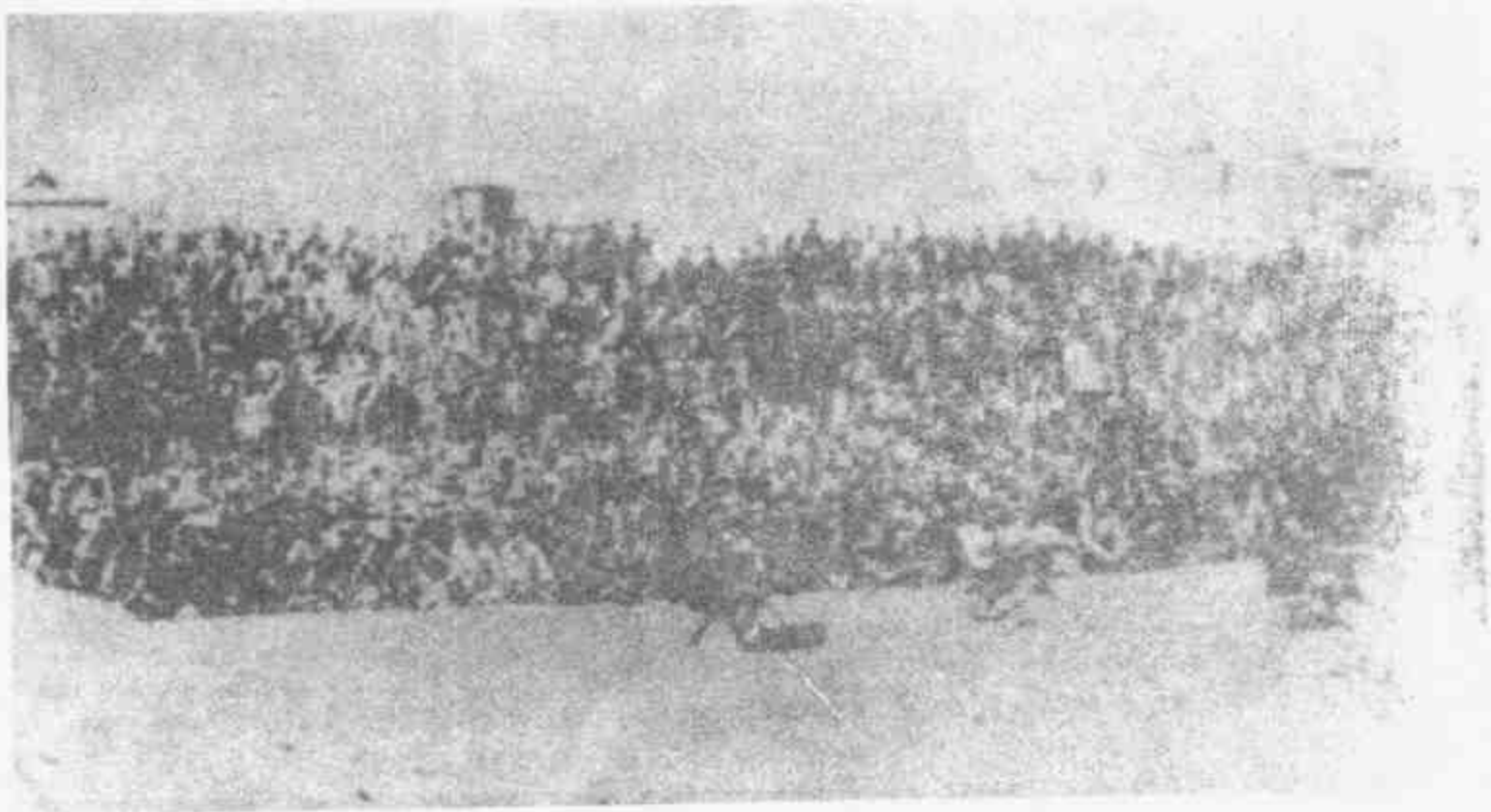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部分领导同志与警卫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吴焕先写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及中共川陕省委的书信手稿



1935年8月初，吴焕先（左）与徐海东合影于甘肃两当县城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永坪镇举行会师大会。图为会场一角



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是红一方面军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毛主席题词石刻



刘志丹像



谢子长



---

---

## 目 录

前 言	(1)
-----	-----

### 第一章 “大别山里出好汉”

一 黑云压城	(1)
二 重建军威	(13)
三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34)
四 大别山上红旗飘	(45)

### 第二章 祸起萧墙

一 七里坪之围	(60)
二 “老三”便是“第三党”	(73)
三 死亡档案	(86)
四 逼上老君山	(97)

### 第三章 决胜千里

一 沈泽民抱病检讨	(112)
二 豹子岩会师	(127)
三 灵活的“八会”	(145)
四 奔袭太湖县城	(158)

### 第四章 转 移

一 程子华来到鄂豫皖	(174)
二 初上征途	(185)
三 恶战独树镇	(200)

四 伏牛山中..... (212)

**第五章 立足一个“边”**

一 火种撒下了..... (226)  
二 战地情话..... (245)  
三 奔袭荆紫关..... (264)  
四 威逼西安..... (278)

**第六章 见面礼**

一 神秘的“石先生”..... (291)  
二 血沃原上草..... (303)  
三 永坪会师..... (321)  
四 活捉高福源..... (335)

主要参考文献..... (351)

---

---

## 第一章 “大别山里出好汉”

### 一 黑云压城

提起大别山，人们会自然地说到她的巍峨、壮观，熟悉历史的人们还会联想到著名的黄麻起义，英雄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他们会津津乐道：

假如把井冈山比喻为中央红军的摇篮，把洪湖说成是红二方面军的故乡，那么，大别山就是红四方面军“安家”的地方。这些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儿女，本世纪30年代在这里开辟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让红旗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历史的记忆是不会错的。

位于大别山区及其四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形象地指出了这块根据地的基本方位的重要性：“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中央，在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山川交错，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sup>①</sup>

本世纪30年代，这里又成为国共双方逐鹿之地。

---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1页。

## 2 转战千里

徐向前在这里扎下了根，蒋介石也在这里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步步“围剿”。

1932年4月7日，一艘军舰从南京开出，沿着长江快速地逆流而上。船里有一位特殊人物。此时的他，无心浏览长江两岸的春光，独自闷在船舱里忧心地想着那一份份“匪势猖獗”的告急电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共匪”越剿越多，真有点“星火燎原”之势。现在看来是自己亲自出马的时候了。

这位“特殊人物”，就是即将到武汉上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他曾这样形容所谓的“匪势猖獗”：“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20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武汉东西扼制长江，南北控制平汉、粤汉铁路，军事家们都懂得武汉这个长江重镇的地位，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预感到问题的严重。这次出山，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组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设在武汉。

司令部组建完毕，4月17日，蒋介石远离武汉，同司令部数十人来到庐山。

4月的庐山，风景秀丽，乳白色的雾像一团团洁净的棉絮在拭擦着岚影波光。只是酷暑未到，这里还隐隐透出几分凉意。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等军事要员从南京匆匆赶来，又使这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庐山被一种森严的杀气所笼罩。

蒋介石在这里召开了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

家寨为中心之皖西革命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

蒋介石与红军交手多回，对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在“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中曾概括为“射击命中，侦探敏灵，行动轻捷，伏兵要击”，擅长的是“隘路战，山地战，夜间战”。在这次五省“剿匪”会上，蒋介石特意拟定了本次“剿匪”的要诀：

以众击少，以实击虚，  
以整击零，以正击奇。<sup>①</sup>

为确保“剿匪”的成功，蒋介石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地主土豪的作用。返回武汉后，蒋介石专门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指示：“（一）注重守土责任。（二）县长应具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sup>②</sup> 7月12日，他又把湖北省所属各县县长召集在一起，作了篇训话，要大家“不要注重到军队，完全注重人民；要拿地方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来维持地方，剿灭赤匪”。在训话中他引经据典大肆吹嘘了曾国藩、胡林翼如何“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要县长们效法曾胡精神。总之，“集合湖北的县长于一堂，就是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做一个模范省。”<sup>③</sup>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活动。

史学家从蒋介石的“剿匪”历史档案中发现：他在连续发动了对中央红军的三次“围剿”失败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术则有了许多变化：

① 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② 《蒋介石传》，第223页。

③ 《蒋介石传》第223~224页。



第一，蒋介石亲自出马，成立了豫鄂皖三省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加强统一指挥。

第二，投入的兵力数量大，比第三次“围剿”的军队多一倍以上，总兵力为9个纵队，2个总预备队，共26个师又5个旅，30余万人。且有三分之一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另有4个航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徐向前说：这像“泰山压顶”<sup>①</sup>。

第三，改变了“分别进剿，长驱直入”的战术，特别注重并列推进，稳扎稳打，而不使其被红军各个击破。

第四，改变单纯军事“围剿”的办法，采取军事、政治手段并用的战略。

在大军压境面前，中共中央分局张国焘等人对这种严重的形势估计不足。徐向前在回忆中气愤地说：“我军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分局领导人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对面临的第四次‘围剿’的严重形势，毫无戒备，一直在贯彻‘不停顿进攻’的方针。他们既说敌人的四次‘围剿’一定到来，又说国民党正在‘大崩溃’（原来的‘偏师’说因受到中央的批评，不再提了）；既要说准备反‘围剿’，又不采取积极措施。虽提出‘动员三万新兵，屯集三万担粮’的任务，实际上并未认真实行，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八月九日，敌总攻开始，中央分局获得急报后，仍未引起重视，真是到了麻木不仁、雷打不动的地步！直至敌军向根据地中心七里坪一带突进，才如梦初醒，转过弯来，改变原来的‘进攻’部署，急起应战。因此，无论从战略上或战役战斗上来说，我军都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sup>②</sup>

第四次反“围剿”刚开始就挂了彩，差一点“光荣”了的陈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8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9页。

再道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这时候，张国焘从后方来到夏店，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在会上，徐向前同志认为，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当务之急是休整、训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然而，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了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当时提出的动员的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又开始了异常艰苦的急行军，向麻城地区开进。”<sup>①</sup>

麻城之敌，很快便陷于红军重重包围之中，艰苦的攻击与反攻，来援与打援的战斗激烈地展开了。

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所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拉开了第四次“围剿”的战幕。形势顿时急转直下，徐向前回忆说：“我军正在麻城与南线敌人呈相持状态，敌从东线、北线、西线大举进攻，如人无人之境……”<sup>②</sup>

红军被迫撤离麻城，寻找战机，突破敌人的防线。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三战，我军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共歼敌8000余人，打乱了敌人聚歼红军的部署，但红军始终未能击破敌之一路，部队且战且退，最后不得不向皖西根据地转移。

9月中旬，红军在向皖西转移途中，致电党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红军转战情况：“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八、八十

<sup>①</sup> 《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0页。

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烂脚病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我军正处在激烈战斗中，当（按）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央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sup>①</sup>

这无疑是一份“告急”文书。

去电后不久便收到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等的复电：“（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的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平汉路西行动。”<sup>②</sup>

“在运动中歼敌！”中央的电文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之一振。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5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5～206页。

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已陷于极端被动境地，失去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时机和条件，现在只能从皖西方向想办法了。

红四方面军总部于9月10日率领4个主力师转移到皖西金家寨地区，与红二十五军会合。

但是，皖西的“进剿”之敌徐庭瑶纵队早有准备，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也尾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而来，会合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对红军进行夹击。

红军主力顽强地与敌周旋、作战，但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仅存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在与敌人的遭遇战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牺牲，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牺牲。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形势已岌岌可危。

四面临敌的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是继续留在根据地打，还是跳到根据地外面打？”<sup>①</sup>10月10日晚，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分散游击。徐向前在发言中指出：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面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sup>②</sup>

看来不管是哪种意见，都不想丢弃这块几经曲折才开辟出的根据地。

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留下二十五军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09～210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0～211页。

的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团，由沈泽民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二十五军的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打回根据地！”这是当时的决策，更是留守在根据地上的红二十五军和广大群众的心愿。然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的拼命围追堵截，打破了红军主力转回根据地的预想，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次转移，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来越远，离等待他们的红二十五军越来越远。徐向前说这次转移是“西行转战三千里”。

陈再道后来也深沉地回忆说：“当时谁能想得到，从此就告别了鄂豫皖根据地，告别了养育红军的父老乡亲，迈了三战三千里的征程。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我才重踏上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英雄土地……”<sup>①</sup>

主力红军走了，留守者往往要冒很大风险，以至生死难卜。

说到留守者总让人伤心地想到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何叔衡和瞿秋白。前者在突围中与敌人搏斗时壮烈牺牲；后者遭国民党逮捕后英勇就义。

红四方面军中也有这样一位命运相似的人物。他叫刘英，原姓马，名崇显，因工作需要曾先后名为张英，马尔赛夫，刘英。1902年出生在山东潍县马家庄一贫民的家庭。青年时代的刘英，机灵、刚强，敬慕民族英雄岳飞，立志从军习武，报效国家。20岁那年毅然离家出走，投奔冯玉祥部队当兵。两年后晋升为中尉骑兵排长。1924年，冯玉祥部派一批青年军官去苏联红军学校深造，刘英应征入选。毕业分配时，被共产国际推荐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报保卫工作。1929年12月，被任命为豫东南红三十二师师长。从此，他驰骋沙场，屡建奇功，成了“很会打仗”的战将，历

<sup>①</sup> 《陈再道回忆录》（上），第219页。



任红一师师长、红十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等职。

1932年2月，刘英在指挥战斗中被一发流弹击中了头部。10月，与红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时，刘英伤重未愈，组织上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途经武汉时，不幸遭敌逮捕，不久被杀害。那年，他才30岁。

他成为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念念不忘的人物。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红一军、红四军时期，像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过硬的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如果他随军转移，或许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他会惊奇地发现红一方面军中也有—名叫刘英的。她是一位出色的女将。

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的悲伤！

红四方面军转移后，20万国民党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留守的红二十五军猛扑过来。

第四次“围剿”开始后不久的9月间，蒋介石设在汉口的“剿匪”总司令部就气势汹汹地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红四方面军西去后，蒋介石除派遣一部分追击外，把主要兵力留在根据地进行“围剿”。

“民尽匪尽”、“铲除干净，绝尽根苗”，敌人终于有机会按照既定的方针和政策对大别山进行血洗，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蒋介石更是杀气腾腾地限令要在12月15日前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的红军，摧毁鄂豫皖根据地。

据说，蒋介石在自己官邸的案头所备的是《曾文正公全集》。所以蒋介石得到了曾国藩的真传：既可以讲一口漂亮的礼义仁爱的说辞，又可以作一篇杀人如麻的文章，刽子手和道学家一身面

二任。

历史不会忘记这支“血洗大别山”的蒋家队伍，主要有：

李玉堂第三师

万耀煌第十三师

彭振山第三十师

张印相第三十一师

陈耀汉第五十八师

李思恕第八十师

汤恩伯第八十九师

王均第七师

曾万钟第十二师

梁冠英第三十二师

戴民权第四十五师

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

郝梦龄第五十四师

宋天才第七十五师

张钫第七十六师

马宝琳骑兵第二旅

郑廷珍独立第五旅

宋世科独立第四十旅

还有民团、保安队等地方反动武装……

历史也不会忘记这支队伍的“赫赫战绩”：

敌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 3 500 余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 200 多人。而且竟然令人发指到割下死难群众的耳朵，用铁丝穿成串儿，挑了七大担向其上司邀功请赏。

敌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县平头岭，一次即屠杀群众 2 000 多人。仅在黄安县境内，就有近 10 万群众被敌人所屠杀，到处是尸骨累

累的“千人坑”、“万人冢”。

据光山县中部根据地 29 个乡的完全统计，全村被烧光的有 439 个，全家被杀绝的有 203 户，烧毁房屋 12 325 间，杀死地方干部和群众 12 433 人，下落不明的有 1 073 人。

当时任中央鄂豫皖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苏区被敌人糟蹋得太惨了。有一天晚上，我和位三在红安五区一个山头上四处一望，周围 200 多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对苏区完全采取了“三光”政策。”<sup>①</sup>

匪军所到之处，人民被财物抢劫一空，村落成墟，田野荒芜，尸骨遍野，惨不忍睹。大批青年妇女遭敌蹂躏，或被敌所掳走，运往汉口等地贩卖。敌人每占一村，还逼着群众用白布或白纸糊一面小旗，插在门上。要是谁家没有白旗，他们就以“红党”论处。这时，地主、豪绅也纷纷乘机拼凑保安队、民团和“铲共义勇队”，还乡倒算，推行保甲制度，灭绝人性地摧残、屠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匪军发誓要“驻剿山只杀尽猪牛，见黑就打（即见人影就打枪），鸡犬不留”。凡是他们扫荡过的地区都遭到空前的浩劫。金家寨以西，挥旗山、长岭关以东，松子关以北，狗迹岭以南的百余里地区，到处是一片焦土，成了“无人区”……

为了实现其摧毁鄂豫皖根据地的目的，国民党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用卡脖子的办法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国民党驻汉口白区总司令部于 1932 年 11 月制定了《匪区封锁条例》，规定对以下物资实行严格的封锁：

- （一）食物类：谷、米、麦、盐、包谷、豆、甘薯、家畜等；
- （二）军用原料类：铜、铁、白铅、硝磺、煤炭、汽油、棉花、

<sup>①</sup> 成仿吾 1962 年 5 月的一次谈话记录。《郑位三传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电料等；

(三) 卫生材料类：诊疗所需之中西药品等。

敌人还在其统治区县设立“民众日用品公卖局”，对米、面、食盐、煤油等物资限量出售，以防有人多购这些物品偷运到根据地。

昔日大好的苏区，眼看变成一块血染的土地，荒凉的土地。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也曾这样报道过经过“清剿”后的鄂豫皖地区的农村：“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sup>①</sup>

几个“尽”字，不失是对“民尽匪尽”方针的注脚；一个“绝”字，似乎又是对“绝尽根苗”政策的诠释和总结。

古书讲：功大莫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是“绝粮计”。

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要胜过“绝粮计”。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的摧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尚存的也被敌人分割为鄂东北和皖西北互相隔绝的两个地区。在鄂东北地区，只剩下黄安的紫云区、七里区和仙居区的一部分，麻城的乘马区、顺河区，罗庄的宣化区和陂孝北、陂安南等县的一小部分；在皖西北地区，只剩下六安的六区（金家寨）和三区（龙门冲）的一部分；豫东南区的赤城、赤南，光山的东区、南区、八里区等。

这年的冬天，大雪封山。寒风呼叫着刮过山顶，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在山里的红军又冻又饿，只好等夜幕降临时爬下山去。好不容易摸进村子，但到处是断墙残壁。人，有的被杀、被抓了，没被杀被抓的也跑了，只剩下一些不能走动的老人。饭是弄不到了，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只能拣点干菜等填填肚子。有时庆幸的是，村里还残留不少柴禾，大家便燃起火堆暖暖身子。谁知一烤，却常常招来祸患——冻僵冻肿了的手脚，再烤也感觉不到暖和，挨着火烤也不觉得痛，结果烤到最后，有不少战士的手指、脚趾竟烤伤或烤掉了。加之过度的饥饿疲劳，有的战士瘫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正当大家心急火燎的时候，更为险恶的情况又发生了：敌人向这里包抄过来……

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这场掠山而过的北风，吹得山坡上的片片杂草左摇右摆，瑟瑟发抖。但山顶上那棵棵挺拔松柏仍傲然而立，顽强抵御着这场扑面而来的寒流。

## 二 重建军威

“革命完了吗？”

红军主力走了，苏区被敌人占了，今后部队怎么生存、怎么斗争？每个干部都在想，有的战士还把疑问挂在脸上，甚至说：“革命完了。”

“红二十五军完了吗？”

红二十五军的3个师，除七十三师随同方而军总部行动外，七十四师在方面军9月间到达皖西之时，分别补充加强了其他几个主力师；剩下七十五师的两个团，这时却又分散在皖西北、鄂东北两地，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红二十五军真的“完了”。

是的，红军主力一走，大家似乎少了主心骨。盼啊盼，等啊等，眼巴巴地瞄着西方，盼望红军主力早日归来，好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盼望方而军主力早日归来，好恢复失地重整旗鼓，尽快拔去插在群众家门口“白旗子”，把红色政权早日建立起来，许多就地休养的伤病员们，也在期待着自己所



在的部队，好及时归队重返前线；那些妇女群众，仍躲在深山老林里打草鞋、纳袜底、缝烟包，而且还做好了糯米糍粑，等待自己的亲人归来好去安慰他们。

现实是残酷、无情的。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方面军的行动消息，连个影子也捕捉不着，……转战到哪里去了？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该有所传闻啊！留下来的干部、战士、群众，都在关注着红军主力的行动消息。

当时，留在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中共鄂豫皖省委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也认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不久就会返回。他们哪里晓得方面军主力转出外线之后已无法转回根据地。随之而来的“不满”也就产生了。1933年1月5日，省委领导人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联名作了“鄂豫皖省委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在报告中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等领导人：

临行时国焘同志犹说，今后红军总不放弃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在苏区及苏区四周与敌军兜圈子，那时使我们还不曾料到红四方面军终于脱离苏区，但从此一别，红军主力在河口打了一仗，即往京汉路一去不回，直到现在竟远在陕西，且更进一步的向甘肃去了。反动报纸上甚至说，红四方面军甚至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要由内外蒙古开到苏联去。这个，我们认为是反动报纸造谣，不去相信的。但无论如何，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我们承认往日在他的领导之下，对于他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复活，不曾加以充分的斗争，然现在则不能停止复活，现在红四方面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虽然想尽方法，至今还没有找

到能走这条路的人才去信给他，去阻止他的行动，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sup>①</sup>

等待，请求。但不是消极地等待，也没有把恢复鄂豫皖的希望一味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归来上。因为，他们是大山的儿女，他们有大山般的性格。“革命没完！”“红二十五军也没有完！”烧杀、掠夺、围困、封锁，吓不倒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血泊和火海里，他们英勇不屈地战斗着。许多伤病员，宁愿饿死在深山，也决不下山投降敌人。在一座山崖的石壁上，红军战士用刺刀刻下这样几行字：

树枝吹不完，  
根也挖不尽。  
留得青山在，  
到处有红军！

黄安县县城监狱里，关押着一名当地的革命干部。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最后终于越狱而出。逃离之时，他在关押自己监狱的墙上留下了一首诗以作纪念：

大别山里出好汉  
生就骨头似铁坚；  
今日逃出虎狼口，  
明日回来报仇冤。

---

<sup>①</sup>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大学党史建政工教研室印本，第347～348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曲折和失败，但没有一次是失望和绝望的结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分析了红色区域存在的五项条件，其中两条便是：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能不能继续率领广大军民坚持革命斗争，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留在根据地的鄂豫皖省委的主要成员，在关键的时刻旗帜鲜明地坚持根据地反“围剿”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消除疑虑起了重要作用。11月12日，在沈泽民主持下，省委于黄安长冲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徐宝珊、成仿吾、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等。会议作出了《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的决议。会议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对根据地进行严重的破坏和摧残，然而，它不仅不能消灭苏区，反而更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团结，今后“必须经过残酷斗争，反‘包剿’才能完全胜利”。为此，会议提出了坚持斗争的中心任务：

“训练广大工农群众来做长期战斗的准备……”

“继续扩大红军，扩大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锻炼新的红军主力，……”

“迅速地把鄂东北、豫东南与皖西北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加强对豫东南、皖西北根据地游击战争的领导，打破根据地游击战争不平衡的状态，逐步恢复整个鄂豫皖根据地，……”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鄂豫皖省委领导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以及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围剿”之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在被敌人分割为鄂东北和皖西北的两个地区，又重新形成了新的“燎原之火”。

鄂东北地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它可控制武汉、信阳、潢川，威胁平汉铁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也是敌人“围剿”的重点地区。

它还是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的发源地。在共产党领导下，1927年11月13日，黄安、麻城四乡3万多民众，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豪绅！”的口号，像潮水般地涌向黄安城，活捉了县长贺守忠。

中国现代史书上便留下了“黄麻起义”。

黄安这座古城从此又开始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历史。黄麻起义失败后，红军被迫从城内撤出。红四方面军成立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发起的黄安战投，将守敌六十九师的5000余人全部歼灭。历史悠久的黄安县城再次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随即迁入城内。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遂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一字之改，可圈可点，这是无数红军战士和群众用鲜血染成的“红”字。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座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红安县城，经历过8个月的曙光初照，转眼之间又被血雨腥风所笼罩；又有多少人在期盼着它能够尽早回到党和人民的手中，获得永久性的新生。

黄安县城失陷，但在鄂东北仍保存着红色政权和根据地，鄂豫皖省委机关在这里领导、指挥着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红军主力走了，但这里仍然有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军部特务营和红七十四师八十、八十一两个团，这支军队成为这里反“围剿”的主力军。

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西进后，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之后，于10月上旬即和军特务营活动于黄安县以南地区。这一带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他们寻找机会主动出击：

10月下旬，在邓家桥歼第十三师一个连。

10月24日，在高桥河给敌第十三师七十三团以很大杀伤。

10月26日，仅隔两天，他们在宫懋塘痛击敌保安第四团和湖

北省第四区保安队，毙伤敌百余名，敌保安第四团团长李树荣被打伤，差一点命丧宫懋塘……

10月底，在八里湾狠狠打击了反动民团，毙伤俘敌300余名。

在黄安县以南的敌人连吃败仗、惊魂未定之时，这支红军部队转移到县城以北的七里坪、檀树岗和麻城县以北的地区，并在七里坪附近歼敌第八十一师一部。

人们喜欢用“金秋十月”来形容丰收的喜悦。历史又总是会出现许多巧合。

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在收获，二十七师的八十、八十一团也在“开花结果”。它们在完成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的任务后，就开展了打击敌人、镇压反动土豪劣绅的斗争：

10月14日，在黄陂站歼敌第十三师百余人。

10月下旬，在九龙岭附近与敌第十三师一个团激战中，毙伤敌数百名。

10月26日，在乘马岗、张店地区与敌第八十九师二六七旅激战一天。冤家路窄，第二天在杨泗寨地区两军又相遇，激战数小时。连续两战共歼敌数百名。

进入11月后，他们又进一步扩大战果。11月22日，又在羊角山歼敌第八十师一部。

活跃在鄂东北地区的另一支武装便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这支队伍在编制上开始接近“正规军”。

早在1932年8月底，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为统一领导地方武装斗争，成立了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

“道”是一个行政区划名。北洋军阀时期，曾分一省为数道（道下设县），隶属于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所设的委，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派出机构，系这一地区党的地区委员会。

地方武装曾多次使前来“围剿”的敌人吃到了苦头。红四方

面军在鄂豫转战期间，鄂东北地方武装在道委和总司令部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敌进我退。”敌人开进根据地后，鄂东北地方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帮助群众转移，避入深山，实行空室清野。

“敌驻我扰。”敌军在根据地内，白天显得安全、放心，入夜则总是提心吊胆，冷不防脑袋就会搬家。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枪声，也常常使龟缩在据点里的敌人打个冷战；有时枪声四起，他们认为又遭到地方武装的夜袭，更是惊恐万状。电话线、交通线时常被破坏。地方武装充分发挥了目标小、行动方便等优点，往来穿梭于敌人据点之间，四处袭扰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反“围剿”斗争，逐步形成了敌占城镇、我占乡村的格局。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9月20日，两支地方武装——罗山独立团和仙居赤卫队埋伏包山，借助有利的地形，等待着由宣化店开赴七里坪的敌十三师。敌人进入伏击区后，就被突然面来的枪击吓慌作一团。激战一日，敌死伤甚多，不得不绕道面行。这次阻击战最终以地方革命武装的胜利面告终。另外一支活跃在禹王城一带的赤卫军战斗连，先后在翻叉岭、坞子铺等地伏击敌军，缴获机枪6挺、步枪数十支。敌人一时间又弄不清地方武装的方位、人数，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对付的好办法。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在1928年5月正式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对开展游击战的鄂东北地方武装实在太实用了。

地方武装在斗争中有时还要担负重要的使命。刘震在回忆录中讲：他是1932年春从陂孝北县独立营调鄂东北道委特务四大队一分队一班，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跟他分在同一个班的还有黄安县独立师来的韩先楚。班长是陈先瑞。他们所在的四大队人员精干（共120人左右），都是从各区、县游击队作战勇敢的干部中选调出来的，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其

使命是：“主要在于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赤白交界的地区活动，负责收集情况，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根据地之间的领导干部、交通联络人员。根据任务的不同，分别以大队、分队有时也以班为单位外出活动。在活动中，强调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切实保护群众利益。

“为了筹集经费，当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武装潜入敌占区，强令大地主、大资本家出钱，叫做‘抓案子’。我们执行任务时，昼间在敌占区地下党员家隐蔽，夜间按计划行动，天明以前赶回边沿地区。一次，不巧白天让孝感民团发觉，被他们包围起来。我们利用房屋和围墙组织抵抗，坚持到天黑，大队长、政委组织多路突围，到指定地点集合，集合后继续完成任务。后来又有几次遇到类似情况，也同样完成了任务。

“我们还上过鸡公山抓‘洋人’的案子。鸡公山在河南信阳南45公里，豫鄂两省交界处的大别山中。主峰报晓峰西侧有灵华山和长岭，宛如雄鸡的两翼；峰的左右，峭壁幽谷，很似鸡爪。整个山形如雄鸡引颈报晓，矗立于群山之中。山上云雾缭绕，泉水清澈，又有茂密的林冠覆盖，盛夏气温一般在23摄氏度左右。古人有这样的赞美诗句：‘三伏炎热人欲死，到此清凉顿疑仙。’每当雨后初晴，红霞掩映，苍松翠柏，奇峰幽谷，点缀得光彩斑斓的楼台别墅，显得分外妖娆。可是我们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红军战士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雅兴去欣赏，而是直奔‘洋人’的别墅，去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sup>①</sup>

红军主力转移后，为反对敌人的“清乡”，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还先后合编和扩编了7个独立师和游击师。这样，地方武装也有点像“正规军”的样子了。这7个师是：

以黄安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独立第七师，师长夏如银，下

<sup>①</sup>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1~32页。

辖两个团，约1 500人。

以罗山独立团和光山西部地区的游击队合编为独立第六师，师长叶启文，下辖两个团，约1 200人。

以麻城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一路游击师，师长邱江浦，政治委员了少卿，下辖三个大队，约1 000人。

以陂孝北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路游击师，师长郭顺全，约700人。

以光山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九路游击师，约1000人。

以陂安南（包括黄冈部分地区）游击武装组建为第四路游击师，师长金传鉴，约800人。

以河口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八路游击师，师长郭顺全，约800人。

以光山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九路游击师，约1000人。

这已经是一支7 000余人的队伍，一支足以使“清剿”、“清乡”之敌感到棘手的队伍。

还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又传出了游击师的捷报：

河口第八路游击师在小冲、杨家冲一带，毙伤敌军第十三师300余人。

光山第九路游击师在夜间神出鬼没，奇迹般地攻占了白雀园、沙窝、砖桥，端掉了这几个敌据点后，胃口大开，进逼新集、浍皮河等地，酝酿着如何拔掉这几个较大的据点。守城之敌已如惊弓之鸟，赶紧加修工事，加强戒备，以防飞来的“横祸”。

陂安南第四路游击师经过多次侦察，发现了敌人的“耳朵”——电话排。他们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终于“咬”下了这只“耳朵”，缴获一批电话机和其他军用物资。

.....

遭到打击和袭扰的敌人，终于承认了“清剿”计划难以如期实现。敌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在1932年9月19日的战斗详报中也



不得不承认：“近来自大军节节进展后，匪之红军主力均已东窜，其散伏于各处者有伪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等，枪械甚多。

“所谓地方武装，各县各区均有，每县有县区军事指挥部指挥之，此种匪军在裹胁民众，维持其原有组织，并扰害我后方交通。连日派队清剿，此剿彼窜，兵去匪来，兵来匪去，剿抚兼施，未获成效。”<sup>①</sup>

无论是“此剿彼窜”，还是“兵去匪来，兵来匪去”，如果站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释，很容易使人想起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在这“十六字方针”面前，国民党军队除了表白“未获成效”的无可奈何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是的，除了烧杀抢掠之外再没有什么作为了。他们的“功绩”是使许多根据地没有了，庄稼院没有了，居民跑反了，就是一头猪崽也看不见了，和平的村庄变成了无人烟、无表情的焦土。但这群愚蠢的强盗忽视了，在他们脚底下的是沉默中满怀愤怒的土地！这片土地早已被“赤化”，他们无法想象，与红军融为一体的民众是多么雄伟的血肉长城。

鄂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快从慌乱、恐惧中清醒过来。他们在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领导下，汇聚成一支坚强的力量。或者踊跃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或者纷纷组织游击队和赤卫队。有的积极为红军侦察敌情、带路送信、筹集运送粮食、收容掩护伤病员，有的直接奔赴第一线，配合红军打击敌人。黄安七里区的群众组织掩护队，用四面摇红旗、满山放鞭炮、声东击西的办法，在老君山打退敌人一个营的进攻。现在是“围剿”之敌慌乱、恐惧的时候了。还是敌十三师比较“实事求是”，在几个月的“围剿”和“清乡”后不得不承认：“盖黄麻为鄂东赤匪之策

<sup>①</sup> 《国民党革命军第三十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源地，匪化最深，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具有匪性。大军进剿过后，地方匪军蜂涌而起，动辄啸众千万人，匪之组织毫未打破，匪军行动到处自由，实非仅以军事力量所能完全消灭也。”<sup>①</sup>

不要把“动辄啸众千万人”看作是万耀煌部有意夸大“敌情”，借以推卸“清剿”不利的责任。其实，早在黄麻起义后不久就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锣鼓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首至今还使鄂东老区人民激动不已的歌谣，与当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倒是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相比之下，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皖西北地区形势更加严峻。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有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和10月初组建的红二十七军。他们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十月”。

红二十七军又称红军东路军。早在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英山向黄安地区转移中，张国焘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义致信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第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这一决定，在前线担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任务的徐海东并不知晓，他回忆说：“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

<sup>①</sup> 《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到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打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sup>①</sup>

郭述申是1929年从上海派到鄂豫皖来的。他这几年一直是做地方政府党的工作。1921年的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负了重伤。两颗“不吃素”的机枪子弹,一颗穿透他的大腿,一颗卡在小腿中间。徐海东养伤时所在的县是陂安南县,该县县委书记就是郭述申。那时他俩就见过面。如今再次相遇,两人都分外高兴,似乎都有了依靠。只是在赶往司令部的路上,两人的心情很沉重。路上有许多伤病员、妇女、娃娃向他们呼喊,有的拦着马头,要求带上走。郭述申、徐海东跳下马来,一路劝解,一路向前走。他们走到一个村庄,看见许多人挤在一口井边打水喝。有些认识郭述申和徐海东,就跑上来围住他俩,询问敌人的动向,请求解决吃的问题。两人既不了解敌情,又拿不出什么东西填他们的肚子,只好劝慰几句,匆匆向东路游击司令部所在地走去……

当时,在皖西北地区有敌人8个师又2个独立旅。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皖西北道委于10月1日在英山土门潭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议根据中央分局指示,成立了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书记郭述申,委员有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会议还决定改编部队,把聚集在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七军。会上,还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突出敌人的包围,从内线转向外线行动。

部队要马上突围,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在金家铺地区,还聚集着跟随红四方面军转移而被敌堵截留下的2万多名各地地方干部、群众和4000多名红军伤病员。最棘手的是伤病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页。

员，这无疑给突围增添了难度，究竟怎么办好呢？有的主张把伤病员带上一同走；有人认为那样走不脱，打不了，最后要一块被敌人消灭，主攻部队先走。伤员分散，医院的女同志统统回家去。

领导间意见不一，讨论不休。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敌人的五十四师和四十七师步步紧逼追过来了。大家这才停止了争论，统一了意见：凡是能走动的伤员，一律动员归队，走不动的，派人抬着。三个团当中留一个团负责伤病员，另两个团由徐海东带领去迎击敌人。

重担落到了徐海东的肩上。对他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在大家争论时，他就坚定地说，“我们决不能丢一个伤员，不能丢一个妇女”，“我带七十九团掩护，你们快走！”

军队领导人威信的建立往往要取决于危急关头他所持的态度和行为。在生死存亡地战争年代更是如此。

10月2日，部队到金家铺的河滩上召开大会，正式宣告红二十七军成立。成立后的红二十七军，一面积极箝制和抗击敌人，以配合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一面掩护两万多名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随军转移。

向何处转移？在英山土门潭召开的会议上，只是确定了“向东”行动的方针，没有规定具体的行动路线。当时，围追堵截红二十七军的敌人有梁冠英的第二十五路军、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曾万钟第十二师、陈调元第四十六师、宋天才第七十五师及反动地方武装顾敬之部。为避敌锋芒，中共鄂皖工委决定，红二十七军向太湖、宿松方向前进，在突围的同时，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战术上，红二十七军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整编后的广大战士也充满了信心。但是，红二十七军不过下辖3个师（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八十一师）共4500余人，要率领两万多名随军队伍突破敌6个多师的围追堵截谈何容易。

我动敌亦动。红二十七军经太湖弥陀寺、蕲春张家旁、宿松陈汉沟，于10月9日到达宿松趾风河，这一路还算顺利。但在趾风河以东栗树嘴、昔家垄，遭到敌第四十六师两个团的堵击。经过几天的转移，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早想痛痛快快地和敌人干一仗。旺盛的斗志，是战斗胜利的重要砝码。军领导充分抓住了这一点，同时考虑到对手战斗力较弱、地形对我有利等因素，决定用“四面包抄”的办法，集中红军兵力，把对手全“包下来”。

战斗打响后，能征善战的徐海东率第七十九师一团迂回至敌人侧后，其他各团从正面攻击。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率部迅速攻占小石门制高点，切断了敌人退路。敌人两面受击，认为遇到了红军的大部队，顿时乱作一团。经过激烈战斗，毙伤俘敌约1个团，俘敌副团长1名，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8挺、步枪500多支、子弹4万余发。当敌军逐渐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后，红军已撤至趾风河南北一线，控制叫雨尖、白崖寨等制高点，防敌反扑。

战局突变。第二天，敌第三十二师及宿松反动地方武装陈金旺“猎虎队”从陈汉沟方向追来，占领了趾风河西南的云天岭等制高点，凭借猛烈火力向我军阵地攻击。敌第四十六师的两个团残部，也像受伤的狼一样从趾风河以东向红军攻击。红军腹背受敌，处境危险，顽强战斗到黄昏，主动撤出战斗。借着黑夜的掩护，向东进时路过的地方——太湖弥陀寺方向转移。

危机四伏。10月中旬，红二十七军转移至潜山衙前镇（现岳西县城）。为避免暴露目标，部队悄悄地在城东的一条山沟艰难地前进，突然，枪声大作，敌五十四师早已等候在这里。随行的群众和伤病员在慌乱中也拥到沟里。人多沟窄，行走困难，敌人居高临下向我军猛攻，情况万分紧急。红二十七军迅速抢占了衙前东侧几个山头，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进行了10多次的反复冲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毙敌俘敌数

百名。但是，我军付出了很大牺牲；伤亡 300 多人，第一团一营政委、二营营长和政委、3 名连长和 6 名指导员均壮烈牺牲。

险象环生。部队刚刚摆脱了敌第五十四师的堵截，又和敌第三十二师遭遇了。

衙前战斗后，红二十七军认识到向东行进困难重重，不得不向北转移，拟渡过渭河返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当行至头陀即遭敌第三十二师堵击。部队又折转向东，到达官庄地区又与敌人发生激战。为甩掉敌人，红二十七军星夜兼程，向桐城土岭方向转移，但在土岭再次遭到敌第三十二师堵击。经过激烈战斗后，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破敌人的围堵，直插大沙河。

“马上渡河，抢占有利地形！”军领导一声令下，部队迅速渡河，而紧追不舍的敌第三十二师跟踪了 20 多公里后也来到了河边。双方又隔河展开激战。敌人依仗数量的优势，狂叫着抢渡大沙河。担任阻击敌人任务的第一团冒着枪林弹雨，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许多归队不久的伤员，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有些人伤口还化着脓，又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掩护部队的转移。在这场战斗中，红二十七军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团伤亡 200 多人，但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渡河企图。

这已经是 10 月底了。大别山已是寒气袭人。

一个多月的东线转战，红二十七军远离根据地，缺衣少食，部队天天行军作战，兵员补充和伤病员安置却有困难。11 月初，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领导干部召开会议，决定当务之急是返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横穿安徽境内的淝河是红军返回皖西北根据地的必经之路。磨子潭坐落在河东岸。这里水浅流缓河道窄，是个理想的过河处。如果想从淝河的中央渡过，恐怕只能望“河”兴叹了。

静静的淝河等待着红军。一场恶战也在等待着红军。

11 月 6 日晨，红二十七军到达磨子潭附近。河西岸的大小山

头上人头攒动，各处的制高点已有人把持——敌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已经抢先一步，堵住红二十七军的去路。另一支敌军——敌第四十七师也跟踪而至，占领了红二十七军来路上的两侧山头，切断了红二十七军的退路。显然，敌人的意图就是让红军欲进不能、欲退不行。

红二十七军被压在河川峡谷中，情况异常危急，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唯一的希望就是杀过河去，冲破对岸的封锁，别无选择。形势不容许他们长时间商定作战计划。军长刘士奇决定立即突围。谁承担突围的先锋呢？大家把目光又落到徐海东身上。……

在徐海东的率领下，第七十九师一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湍河，向敌的制高点——黑虎尖阵地发起攻击，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由于敌人火力凶猛，刚打开的突破口很快又被封锁，徐海东带领突击队再次攻击。这时，第三团团长程启波率领突击队，从敌侧设防薄弱的几丈高的陡壁攀登上去，如神兵从天而降，向敌人突然袭击。敌人猝不及防，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红军从背后杀来，顿时乱了阵势。军首长乘势率领后续部队及随行的群众和伤病员突出包围……

突围后的红二十七军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经过大化坪、漫水河、西界岭、前后畈、罗田县的僧塔寺，于11月14日到达根据地的边缘吴家店地区。根据地人民群情振奋，红军指战员也如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返回根据地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大家真想庆贺一番。但是，阴魂不散的敌第三十二师和第四十七师又尾追而来，企图把战场引到根据地，再次蹂躏根据地人民。于是，红二十七军选择了吴家店以东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敌人出动了飞机38架次，狂轰滥炸，掩护其地面部队进攻。经过3昼夜激战，红军打退了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冲击，毙伤俘敌近千人。吃了苦头的敌人暂时

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红军胜利地进入赤南根据地。11月16日，红二十七军到达金家寨附近的大埠口，与坚持在这一地区斗争的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会合，并在此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一个多月的奔波，夜夜行军，天天苦战，广大指战员已经拖得精疲力竭，很少能放心地松弛一下，美美地睡上一觉。有时，枪声一停，许多战士便一侧身睡着了。作为红二十七军的指挥官，这支队伍的安危存亡都系在他们身上。就是没有枪响，他们也不敢睡觉。要搜集、研究敌情，了解地形、民情，安排下一步行动，预防意外的遭遇……几十天下来，眼睛熬得又红又肿，这些铁一样的硬汉子，在这一段东路游击战中，确实累垮了。徐海东连续20多天没有上床睡过一个安稳觉，困了便在马背上打个盹。返回根据地后，徐海东才长松了一口气，倒头睡下，一觉就是三天两夜，真把他身边的人吓蒙了。他后来回忆说：“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sup>①</sup>

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艰难的“长征”。自红二十七军组建以来，采取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动方针，转战英山、罗田、蕲春、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商城、光山等10余县，一个月里行程约1500公里，柑制了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多次打垮了敌人的追堵，歼敌近3000人，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仍保存数千人的武装力量。红二十七军还多次从危局中掩护着一大批地方干部、群众和红军伤病员，并使之安全转移，随着返回根据地……

这是一支与群众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队伍，一支经得起战斗考验的打不散、拖不垮的部队。它保护了人民，人民捍卫着它。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70页。



当红二十七军转战的时候，皖西北根据地的广大人民，不顾敌人的严重摧残，纷纷组织游击战、赤卫队，同敌人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由六安县六区游击队和部队红军伤病员组成的洪家山战斗营，给予当地民团沉重打击，活捉了外号叫“杨结巴子”的民团头子，袭击了伪莲花区公所。六安县于家冲区妇女委员、共产党员沈忠华，不顾敌人的残酷镇压，组织妇女筹粮、做鞋、搜集情况，设法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送给山上的游击队。当她不幸被捕后，英勇不屈，用剪刀刺死敌军的一个副官，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中共六霍县委委员汪孝芝，到井上庄发动起义时，由于坏人告密被敌人包围。为了保护群众，她挺身而出，英勇就义。……

一位伟人说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也可以无愧地如是说。

部队在大埠口休整，中共鄂皖工委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静下心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决定兵分两路：留下红二十七军第二团，由副军长吴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率领，坚持并逐步恢复皖西北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军第一、三团及二二四团由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和中共鄂皖工委率领，开往鄂东北地区找中共鄂豫皖省委汇报工作，争取与其他主力团会合。

在赶赴鄂东北途中，红二十七军于商城新店子夜袭盘踞在这里的顾敬之部，狠狠打击了这支反动民团，毙伤其300多人。部队到达光山沙窝集，在这里进行筹粮工作中，敌第七十五师1个旅从商城县西余集闻风追来。经过休整后的红二十七军斗志倍增，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消灭该敌，决不让敌人踏进鄂东北根据地。经过激烈战斗，将敌人一举击溃，歼敌人1个营，并乘胜追击敌人10余里，敌人落荒而逃。

11月24日，部队顺利地到达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附近，与省委及红军三个主力团胜利会合。

5天后，一个重要的决策诞生了。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

与会代表分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根据地的形势，总结了一个多月来分散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有深切体会：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出生入死，虽然多次打破敌人的围堵，但始终未能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原因之一便是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力量过于分散。红军会合后郭家河一战的阴影深深印在将领的脑海里：激战终日，未能全歼该敌，双方伤亡人数相差无几。战斗中，看到的是一种敲响锣不齐的混乱局面，大家急得火燎油煎一般，但又无可奈何。因此，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的问题，更加迫切地提了出来。

会议确定，重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将根据地各主力团统一组织起来。

会议决定了军领导的领导成员为：

军长吴焕先 政治委员王平章

下辖的两个师的领导为：

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 政治委员戴季英

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 政治委员高敬亭

另外，原红二十七师政治部改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黄安原独立第一师二团一部编为该师特务营；原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仍为新建红二十五军部特务营。

11月30日，在檀树岗村南的河滩召开大会，宣布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组成，全军约7 000人。

史学家把“檀树岗军事会议”看成是“红二十五军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一任军长旷继勋。1932年的崔邱保卫战中，他手持大刀，与

指战员一起奋勇拼杀，身边4名警卫员均壮烈牺牲，他身负重伤……

霍邱保卫战后，蔡申熙接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他任职还不到3个月，就率部在黄安以西河口地区与敌胡宗南部展开激战。战斗中，蔡申熙身负重伤，负伤之后，还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击，直到牺牲在担架上。负伤以后他在疼痛难忍之时，口口声声要人“补”他一枪，革命到底好了！就在他浴血疆场之时，蔡申熙的妻子忽然抱着女儿，千里迢迢地寻夫来了。远道而来的母女俩，正好赶在蔡军长的灵前，……血和火的战地上，多么催人泪下的“夫妻相会”啊！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前的几个战斗画面。

这也是一种里程碑。

檀树岗会议后，终于再度高举红二十五军的大旗，让它飘扬在鄂豫皖，飘扬在大别山，开始了新的征途。以区区7000人之众，恢复、捍卫红四方面军开创的事业，这同样是一种艰难的创业。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历年来许多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革命史、中共党史的讲义和著作中，关于1932年11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的组成及其领导人，有如下几种说法：

(1) 1959年1月，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写道：“在原鄂豫皖区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2) 198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史》第二册中写道：“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徐海东、吴焕先等集合地方武装，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此外，1980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讲义》；1980年7月，上海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以及1980年10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稿》（上）等都沿用此说，其要点有二：一是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是由地方武装组成的；二是主要领导人的排列次序为徐海东、吴焕先。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最早对这种说法提出更正的是徐海东。关于这一点，徐海东之子徐文伯回忆说：“1960年，为了编写《辞海》中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把送审稿送给我父亲徐海东修改定稿。送审稿是由我念给父亲听的。他说：‘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应把吴焕先同志放在前面，他当时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主要是负责军事工作，这才是符合历史情况的。’我父亲回忆说：‘红四方面军西去，鄂豫皖留下的部队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便于作战，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七军。1932年10月中旬（阴历）于红安檀树岗组成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原九军二十七师改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七十九团改为二二〇团，八十团改为二二一团，八十一团改为二二二团，补充后全师5200余人。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一个特务营，补充后全师5800余人。军直机关800余人，全军共11000余人。’”<sup>①</sup>

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第3256页，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介，正是经徐海东生前审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一支工农红军。始建于1931年10月，原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制。第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即以留下的第二十五军军部一部和第七十五师、第九军二十七师及部分地

<sup>①</sup> 《党史研究资料》（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470页。

方武装，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了第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为吴焕先、徐海东等。组建后，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1月开始长征，经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击破了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于12月胜利到达陕西南部。随后，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皖游击根据地。1935年7月配合红军主力北上，挺进甘肃。9月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10月，第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同到达陕北的第一方面军会合，11月3日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

### 三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在武汉行营，谛听着来自鄂豫皖的最新消息。

红四方面军的被迫转移着实让他高兴了一阵子，满认为再来一次“清乡”就可能把大别山荡平，然后好腾出手来对付使自己连栽了几个跟头的中央红军。

事与愿违，鄂东北和皖西北传来的战报让他十分难堪。尤其是那个不争气的万耀煌在战报中竟言“赤匪犹如春笋怒火”，这岂不是“长共匪志气”。蒋介石余怒未消，忽然又有消息：鄂豫皖又冒出一个红二十五军……

蒋介石赶紧重新“洗牌”，调兵遣将，部署新的战线。

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选择了这个“吉利”的日子下达了新的“清剿”令。这次“清剿”令显示了蒋介石的“两手”：

两种手段：“进剿”与“驻剿”相结合。要求“进剿部队不论匪向何处逃窜，协同努力追剿”，“驻剿部队应于驻地各要点构筑工事，严密堵剿，并须酌派部队协助进剿”。“进剿驻剿各部队，互通情况，时时不失联络。”

兵分两路：由北向南，将根据地划分为东、西两个“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东为“商（城）罗（田）清剿

区”。以光山、豆腐店、杨桃岭、余黄寺、骑龙寺、双庙关、三河山、周家冲、南太村一线为界。

蒋介石把“进剿”、“驻剿”将领的名字反复琢磨了几遍，权衡再三，作了以下分工：

“经（扶）黄（安）清剿区”指挥官是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指挥部设在黄安河口镇。兵力为7个师。其中，以李玉堂第三师、彭振山第三十师两个旅、汤恩伯第八十九师1个旅，共10个团为“进剿”部队；以万耀煌第十三师、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张印相第三十一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第三十师1个旅、第八十九师1个旅，共24个团为“驻剿”部队。

“商（城）罗（田）清剿区”指挥官为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部设在潢川县城，兵为6个师。以郝梦龄第五十四师、李思恕第八十师，共10个团为“进剿”部队；以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唐淮源第十二师、宋天才第七十五师、戴民权第四十五师，共22个团为“进剿”部队。

另外，在皖西北霍山、六安、霍邱等地区的王均第七师、梁冠英第三十二师、宋世科独立第四十旅则策应“商（城）罗（田）清剿区”行动。

布置停当，蒋介石踌躇满志。以15个师又1个旅，共约80个团，加上罗山丁应坤、光山易本应、商城顾敬之等可以利用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地方武装，扫除在鄂豫皖捣乱的“共匪”指日可待。于是限令各部团结合作，在1933年1月底以前，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完全肃清”。

期限只有1个月零18天。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战场上厮杀的双方更是处心积虑地防止被别人算计，又总是想方设法去了解对方、算计对方。

蒋介石盘算着自己的“清剿”令是否会灵验。中共鄂豫皖省委从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敌人的“划区”清剿计划，从敌人的文

件中还获知红四方面军已到陕西南部。

情报，被军事家视作是生命，是拳击场上拳手的眼睛。<sup>①</sup>

根据敌人文件提供的珍贵信息，鄂豫皖省委于12月30日在大别山麓的麻城大畈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针对国民党的“清剿”部署，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既然敌人以“驻剿”为主，机动兵力相对减少，于是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一面寻机歼敌，筹备给养，整补部队，积蓄力量；一面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恢复政权组织。会议还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恢复皖西北根据地。

将计就计，蒋介石的“清剿”兼“驻剿”的部署又先输一着。

大畈紧急会议后，按照省委的决定，红军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分别活动在麻城和黄安北地区。这一带有自己的地方武装、游击队的积极支援红军的革命群众。在他们的配合下，先后给敌第十三、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师以打击，歼灭正规军数百人，消灭了大量的反动地方民团。各路独立师（游击师）在陂安南、河口、黄安西南等地区不断袭扰敌人。敌人以小股兵力进乡“清剿”，经常会遭到游击队和红军正规军的“暗算”，不得不集中兵力进驻较大的据点。红军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根据大畈会议精神，一支新军——红二十八军在血与火洗礼中诞生了！廖荣坤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程启波任政治部主任。

红二十八军经过紧张的准备后，于1933年1月召开誓师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田野里白茫茫一片，部队整齐地集合在军部门前。廖荣坤穿着一件灰色的军大衣，站在集合场中央。尽管寒风刺骨，大家精神抖擞，等待着军长的命令。“同志们，红二十八军已经组建起来了！咱们就要向皖西进军了！现

<sup>①</sup> 戴维·肖普：《大战略》，转引自《战争的智慧》，八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在敌人占领着我们苏区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那么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战嘛，这叫做和敌人‘换防’吧？你们说好不好啊？”

战士们应声喝彩。

廖荣坤、王平章率领红二十八军日夜兼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皖西进军。13日部队进到麻城县四道河，正在做饭时，敌第七十五师赶上来，妄图拦截红军前进。廖荣坤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山头阵地，并率领军交通队插小道，翻山越岭，赶到二四六团和二四四团阵地，观察敌情，部署战斗任务。战士们见军长来到阵地，个个斗志昂扬，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经过两天的对峙、激战，毙伤敌数百名，敌第四四六团团团长焦克功负伤，差一点送了命。

接着，部队以大踏步的进退，与敌人展开了斗争。1月20日在胭脂坳、23日在白沙河，接连予敌第五十四师以很大杀伤。

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为支援皖西“清剿”，新近从安徽蚌埠运来大批粮食和物资，全部屯积在霍丘的叶家集和开顺街等重要据点。红二十八军当即决定“虎口夺粮”。

为了速战速决，部队顶风冒雪向东北挺进200余里，将叶家集、开顺街突然包围起来。1月29日，经过一场激战，终于大获全胜。

叶家集、开顺街等据点打开了，成千上面的群众闻讯而来，同红军战士一起，用口袋、箩筐把雪白的大米，崭新的军装，各式各样的罐头食品，一袋、一捆捆、一箱箱运往苏区。120万斤粮食和各种物资用了两昼夜才运完。

叶家集、开顺街被攻克，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们还认为这里又冒出了一支红军队伍。他们急忙调动军队前来救援时，红二十八军早已转移到他处开花结果：

30日、31日，在小南京重创敌第十二师。2月5日、6日，在双河山歼敌第七十五师近1个团；



之后，在窑沟、银沙畷等地予敌第四十五、第七十五师以沉重打击。

开市大吉。红二十五、红二十八军两支主力军队，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经过2个月的积极斗争，打破了蒋介石的划区“清剿”计划。鄂东北和皖西北又红了一片。

1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的期限已到，蒋介石只好厚着脸皮承认“限令”无效，决定延期。这次，他有点泄气，不好意思再来一个“限令”，只不过又微调了一下部署：

令第八十九师为“进剿”部队，把原驻信阳以北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第三十五师（代理师长马腾蛟）调至新集，另调萧之楚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接替调出的第三、第八十三师的防务。

红二十五军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两个月的分兵活动虽然给予敌人以一定打击，但战斗不大，不能彻底粉碎敌人大规模的划区“清剿”。中共鄂豫皖省委在3月初大胆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寻歼孤立薄弱或突出冒进之敌。

红二十五军在新集以南野鸡楼一带刚集合起来，就得到情况：3月4日，马鸿逵的第三十五师一〇三旅二〇五团、第一〇四旅二〇七团进占郭家河，接替第八十九师的防务。

经侦察，这路敌人装备较差，战斗力也较弱，又是新接防，人生地疏，孤军深入。而我方将士士气高昂，求战心切，早盼望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打个胜仗，振振军威。

省委当机立断：集中兵力吃掉它！

初战的声威，往往是一支新建部队的试金石，也是起跑线上的里程碑！红二十五军第一次集中兵力作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对部队的战斗力，还是今后的作战行动，关系都很大。3个月前，就在这个郭家河，红军集中5个团的优势兵力，竟然没有攻下敌人第八十九师的2个团……每念及此，军领导干部心里

难以平静。为了慎重起见，军领导干部召开作战会议，认真研究了战斗部署。经过反复议论，最后决定：以第七十四师和军特务营进攻郭家河的敌人；第七十五师占领郭家河东北的摸云山（又称磨儿山）一带，阻击可能由新集方向的增援之敌，必要时可向摸云山方向增援，确保郭家河战斗的胜利。同时，军部和省委要求罗山、光山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不断袭扰敌人，以共同打败敌人。

3月5日，部队在野鸡楼进行战前政治动员。军长吴焕先在讲话中指出了这场战斗的意义和胜利的条件。最后，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团结一致，英勇战斗，一定要彻底歼灭这两个团，打响全军集中兵力作战的第一炮！当天晚上，部队从野鸡楼出发，披星戴月，迅速开往指定作战地点。

6日拂晓，部队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待命。根据敌人的部署，吴军长下达了进攻命令：红七十四军以二二〇团以及军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对郭家河的敌人进行主攻；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及西南对郭家河的敌人进行攻击。

攻击令下，部队像离弦之箭，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击。

二二二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郭家河东南羊儿岩高地的1个营大部歼灭。紧接着二二二团由西南，二二〇团和军特务营从东北，同时向郭家河之敌迅猛夹击。

这一带是红军鄂东根据地的中心区，群众基础好。各处地方革命武装、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见红军打上来了，也在四周山上打着“嗬嗬”，呐喊助威。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官兵各自不能相顾，四下抱头鼠窜。逃窜之敌被红军追击部队围困于二道河西南洼地，经短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少数溃散之敌企图逃跑，又被地方革命武装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全部截获。

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两个团就彻底完蛋了。红军这一仗，打得够漂亮，仅以30余人的伤亡代价，就毙敌二〇七团团

以下百余名，俘敌第二〇五团团以下2 000余名，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 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骡马百余匹，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郭家河首战告捷！这次出色的歼灭战，已作为成功的战斗范例，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战斗史册！

可怜马鸿逵，一年前的6月，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出击的时候，陈赓带领的红二十五师在信阳以南的鸡公山就曾歼灭过他的1个团。这次来郭家河没弄清怎么回事又丢掉了两个团。

这支“马家军”太背运了。

战斗结束以后，郭家河街头顿时沸腾起来。这个地处新集、七里坪与宣化店之间的山中小镇，很早就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一条沿河而聚的南北街道，几十家大小杂货店铺，数十户居民住宅，栉比相连，错落其间，向有“拐弯店”之称。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还于1931年在此创办过一所“列宁高等学校”，以政治、国语、算术为主要课程，集中培训军队和在职干部。然而，这个山青水秀的河湾小镇，自从被敌人占领以后，完全被抢劫一空，许多店铺的门窗都被扒掉，居民院落也变成敌军的骡马大圈，街面上到处都是骡马粪便、鸡毛鸡爪、啃吃过的肉骨头。河边上，敌人宰剩的牛犄角、牛蹄子及下水，也是狼藉满地，污秽不堪。

听说红军收复了郭家河，老百姓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街道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受欺侮的乡亲们冲向俘虏群，要他们赔偿房屋、粮食和耕牛……

在农民眼中，耕牛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春耕眼看就要开始了，许多农民的耕牛，都被敌人宰杀了。尤其是敌三十五师每到一处如狼似虎一般，大量宰食老百姓的耕牛，农民兄弟无不咬牙切齿，恨之人骨。男人们多少都了解一些俘虏政策，不便动手动脚，却又气愤不过，只好唆使“娘子军”们冲锋在前，大打出手。吴焕先动员了两个连的红军才制止了妇女们的复仇举动，晓

以政策纪律的重要性，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俘虏们很感激地注视着这位年轻的军长，同时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发落。

吴焕先虽然当时只有26岁，但已经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1927年黄麻起义的老战士。黄麻起义失败后，他仍然坚持打游击。有一回，他走到罗山叶家湾附近的山上，肚子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怎么能搞点吃的东西，他和几个放牛娃闲聊了一会儿，无意中计上心头。他独自下山来到一个地主家的大门口，口中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

新盖的高楼逆水流，  
栽秧的时候死耕牛；  
小儿媳妇难产死，  
看家的黄狗肿了头。

反复吆喝了几遍，地主家走出一人，问他从哪里来，为啥说出这句话。吴焕先指指地主的门楼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我是张天师道下的门生，你家的灾难，瞒不过我的眼睛。”说着，又把他家死牛和儿媳妇难产过世说了说。老地主听他这一说，真认为是张天师下凡了，便把他请入家门，用丰盛的饭菜招待他，央求他给看看风水，破破晦气。吴焕先借此机会打听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情况，还答应给地主家破灾。地主老财心满意足，居然送给他50块大洋作了谢礼。

现在的这位军长不再需要扮演什么“张天师”了。他让部队把敌人宰下的耕牛犄角、蹄子，全部从河边拣了回来，对2000多名俘虏官兵，当场进行了一番教育：“三十五师的官兵们，你们都睁开眼睛看看，数一数杀了多少耕牛？你们才开来两天，就杀掉二三十头耕牛，长此下去，还有老百姓的活路？老百姓痛恨你们，

打骂你们一伙当官的，都是因为你们没有一点人性，造孽太深，天理不容！百姓叫你们赔偿损失，完全是应当的，就是把你们几个当官的千刀万剐，也解不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今天，若不是红军纪律严明，老百姓会把你们砸成肉泥……

“听说你们这个三十五师，是从西北宁夏一带开过来的，路程很远很远……是啊，你们能够开出潼关，为什么不去山海关攻打日本？你们出了潼关，偏又开到大别山攻打红军，红军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都捂着胸口想想，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哎？你们说说。

“老实告诉你们，红军对待你们还是有所区别的，首先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能够优待的尽量优待！你们的去留问题，我们也将很快作出决定。可是，我也要警告你们：从今往后，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哪个敢继续作恶，与红军为敌，绝没有好下场！”<sup>①</sup>

在这铿锵有力的言辞面前，战俘群里鸦雀无声，瞠目结舌的、垂头丧气的、默默祈祷的、擤鼻子抹眼泪的……

2 000多名俘虏怎样处理？战斗后的善后工作又把几位省委领导人召集在一起。

沈泽民首先表态说：“对于营职以上军官，该杀的就杀，该放的就放。连以下官兵可发给盘费，全部释放……”

吴焕先讲，营以上的军官除了死亡以外，剩下也不过七八个，其中最大的官是马鸣池（二〇五团团团长），还是个回教信徒，一再哀求说家有老母，指望红军饶个活命。因此，与其杀掉几个营以上的军官，倒不如全部予以释放，日后也许会起点瓦解敌人内部的作用。

大家都同意一个不杀，全部予以释放。为了防止他们跑回新集，放虎归山，决定把他们打发到铁路沿线去。

<sup>①</sup> 《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凑够了300块大洋，发给俘虏官兵作盘费。马鸣池等七八个营以上军官，每人发给两块大洋，还发给了三天干粮，交由地方武装押送给铁路沿线，遣散而去，其他2000名连以下官兵，随后又补了两次政治课，一个不留地打发走了。

有谁知道，就在这2000名俘虏群里，还有一条“大鱼”，敌二〇七团团团长李汉园蒙混其中，让他溜了。打扫战场时，都认为李汉园已被击毙（祝捷战报上也是这样写的），过后也未加仔细清查；这家伙在被俘之前改换了服装，诡称是伙夫班长，被当作一般士兵释放。当然，他也得到了两枚银元、三天干粮的优惠待遇。

郭家河战斗震慑了敌人。战斗刚结束，敌二十五师告急新集被围，要求增援；敌第十三师急报黄安受攻，忙将周围的3个团调回城内……

出师不利，这是兵家之大忌。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马鸿逵会败得这样快，输得这么惨！3月10日蒋介石急电卫立煌，调集驻商城地区的敌第八十五师二三八旅、第三十师八十八旅、第三十一师4个团，迅速赶往新集增援。

你来我往。敌增援部队气喘吁吁赶到新集，却没有发现红军一兵一卒。这时的红军却出现在黄安东北的袁英河地区，并包围了打鼓岭，向守敌第十三师七十六团展开进攻，并派出少数部队佯攻宋埠，吸引敌人南顾。

卫立煌果然中计，3月12日，他一面命令远在寿感东新店一带的第八十九师急速开回河口，一面命令第三十、第三十一师等部急返袁英河地区，同时命令驻黄安的第十三师向袁英河进攻。

红二十五军对敌人的动向经过分析认为，敌十三师向袁英河进攻，与月初敌三十五师两个团孤军深入郭家河地区有相似之处，又是一个打击敌人的良机。为此，军部立即发出命令，要求部队连夜做好攻击准备。

机遇稍纵即逝。战场上的机遇不仅意味着成功和失败，而且

是生与死的吻别。

12日夜，红二十五军在袁英河以南的九龙长岭布下阵势，静候敌第十三团到来。13日拂晓，我军突然发起猛攻，予敌先头第三十八旅七十七团以歼灭性打击。激战一个半小时后，红二十五军撤出战斗，向麻城北部的杨泗寨地区转移。

卫立煌发现红军东去，又重新调兵遣将。组织了12个团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追击红军，限令三路大军务必于19日“会剿”于杨泗寨地区，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这里。

红二十五军已在杨泗寨、万字山、李家寨地区占据了有利地形，等候着远道来的“客人”。18日、19日两天与敌第十三、第三十、第三十一师各一部展开了战斗，杀伤敌人700余名。随后，红二十五军又北上光山南部地区，伺机歼敌。

这时，卫立煌又得到消息，在福田河地区也冒出了一支红军，正在向东移动。

这支红军便是廖荣坤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奉命向鄂东北转移，与那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以集中兵力作战，但由于敌人第八十九师的阻隔，两军未能联系上。于是，红二十五军北上，红二十七军则东返皖西北。

一支北上，一支东行，哪一支是红军主力二十五军？卫立煌一时乱了方寸。

3月28日，红二十八军东返行至商城县门坎山（今属安徽省金寨县）时，与敌第七十五师二二四旅遭遇，发生激战。敌人占据门坎山的大小山头，以密集的火力封锁红军前进道路。情况十分危急，廖荣坤、王平章指挥部队向敌军攻击，打开通路。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整个山谷硝烟弥漫，杀声四起，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

但在战斗中，王平章头部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王政委、王政委……”阵地上长时间回荡着战士们的喊声和

哭声。

这位被群众亲切地称呼“王胖子”的王平章，这位能文能武，曾与红二十五军秘书长程坦合作写过一首《红军三大任务歌》的王政委，从此便永远离开了那片热土。

王平章的老家湖北省汉川县庙头的南边，有几幢雪白的校舍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琅琅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春季来临校舍前的活动场绿草如茵，花圃里的鲜花盛开，整个校园显得宁静而又充满朝气。这就是早年有名的“全人小学”。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纪念王平章烈士，于1952年将这所小学改名为“平章小学”。

或许是由于东线战场上的激烈拼杀，竟使卫立煌认为东去的这支红军必定是红二十五军。连日来的“围剿”失利，自己也感到脸面无光。为挽回点面子，他亲自率领各路进攻部队越出“经(扶)黄(安)清剿区”，紧紧追击，痛下决心“全歼红二十五军”。

越追，离红二十五军越远。越赶，卫立煌越觉得心里不安。当追至南溪以西的九歌山、关王庙一带时，不想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自己穷追不舍的是一股红军“小分队”。

拖着疲惫的身子，领着这支浩浩荡荡的远征军，卫立煌垂头丧气地返回原防地。

卫立煌又失算了。

蒋介石的延期“围剿”的算盘也只好继续打下去。

#### 四 大别山上红旗飘

山歌越唱越开怀呀，  
东山唱到西山来。  
大别山里闹革命哟，  
工农大众都起来。  
打倒豪绅和地主，



工农政权建起来。  
英雄好汉当红军呀，  
红旗滚滚过山来。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几经曲折和失败，又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就像歌里唱得那样越闹越红火。

卫立煌急于找到红二十五军主力，好痛痛快快干一场。但20多天的时间里总是跟在红二十五军的屁股后面跑，冷不丁还会遇到伏击。最后竟然把组建后不久的红二十八军作为主力恋恋不舍地追来追去。

红二十五军乘此机会，在光山南部的南向店地区进行休整。春天的脚步已经走来，光山上的草木经过了严冬的考验开始吐绿。战士们深深地享受着这春的信息，准备迎接新的反“清剿”斗争。

1933年4月初，休整后的红二十五军以新的姿态由南向店转回麻城北部的大畈地区。红二十八军也由皖西北到达该地。两军会合后，领导、战士们像失散了多年的老朋友那样，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偶尔有谁说起开心事，引来一阵阵笑声；当听到自己的战友牺牲的消息又会引出大家的痛心和悲伤……

郭家河战役的凯旋使大家尝到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甜头。为了更有效地对付敌人，4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兼第七十四师政治委员），副军长由廖荣坤担任，同时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全军共1.2万余人。

会合后的红二十五军战士精神抖擞，斗志高昂。按照部署，部队迅速向郭家河进发，准备歼灭罗山卡房之敌，恢复黄安以北地区。

卫立煌终于探明了红二十五军的位置，立即决定由“进剿”改为“追剿”。又将两个月来疲于奔命、一无所获的第八十九师的

“进剿”任务解除，改由第十三师专任全区的“追剿队”。经营不景气的老板总希望换一个字号以去掉过去的晦气。

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曾为“匪军蜂起”而头痛过，卫立煌选中了担任“追剿”任务或许真会出现什么“辉煌”。

卫立煌、万耀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双簧”戏。“双簧”戏的魅力往往要取决于扮演者那副滑稽的面孔和动作。

“进剿”与“追剿”到底有多大区别，恐怕卫立煌也难说得清。“不都是跟在红军后面跑吗？”万耀煌扪心自问，越琢磨越糊涂。

时不我待。卫立煌于4月10日命令万耀煌率部由华家河、七里坪北上，并由第五十八师由黄陂店、禹王城向东策应，第三十、第三十五师由中途店、泼皮河向西策应，全力“清剿”光山以南区。

卫立煌的作战意图就是东西两路包围、夹击、全力消灭红军，摧毁光山县南区根据地。

4月13日，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披挂上阵，亲率第三十八旅和第三十七旅七十八团为右纵队，向马鸿逵裁过的地方——郭家河进犯，报前此惨败的一箭之仇；敌第三十七旅（欠七十八团）为左纵队，向根据地老君山一带进犯。

“敌第五十八师及第十三师左纵队在天台山以西，敌第三十、第三十五师尚未行动，只有万耀煌的右纵队前来抢头功，这一次的孤军深入，又赐给我们一次良机！”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根据敌人的动向，当即决定放弃进攻卡房计划，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力量攻击突出之敌。

敌第十三师从七里坪出发，沿倒水河西岸向北行进。14日下午，部队行进到上潘家河及以北地区便早早地扎下了营寨。河西、河东各有两处制高点，这就是海拔1000多米的鸡公寨和海拔近900米的黄石岩。为防万一，敌第七十五团和第七十八团三营分别占据了这两处高地。第七十八团一、二营在河西岸低洼平坦的白

果树店露营。万耀煌的师部及第七十六团则选择了上潘家河宿营。这里离红军根据地较远，在先锋线上又有重兵把持住了制高点，万耀煌放心地美美沉睡过去。

入夜，万籁俱静。

猫头鹰却睁大了眼睛。

根据敌人配置和地形条件，红二十五军迅速作出了部署：命令罗山独立第六师在鸡公寨一带牵制与迷惑敌人，并保障右翼红军的安全；第七十三师从正面向黄石岩敌人进攻，歼灭该敌后，以一部控制黄石岩，其余配合军主力歼灭敌后续部队；第七十五师迂回到黄石岩敌人的右侧，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力量歼灭敌后续部队；第七十四师为预备队。

行动部署就绪之后，军部向各师下达了政治动员令，要求务必利用夜间秘密行动，于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指战员听说要狠狠打击敌人的主力第十三师，无不欢欣鼓舞，内部先“战”了起来——“挑战”和“应战”，决心多捉俘虏、多缴枪。

入夜，红二十五军秘密向指定地点靠近。夜行，对他们来说又熟悉又刺激。当试图把对手消灭在不知不觉中的时候，胜利者总会有一种快感。

15日拂晓，透过漫天大雾，红军发现在白果树店宿营的敌人开始渡河，意与黄石岩的敌人会合后，配合河西纵队主力向郭家河推动。

红军第七十三师根据命令，在弥漫的晨雾的掩护下，静静地向黄石岩的敌人靠近。

“打！”一声令下，红军如同神兵天将出现在敌人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黄石岩制高点，歼敌七十八团三营一部。

随后，第七十三师回头配合第七十五师将敌第七十八团全部压在河边狭窄的地段上。经过反复冲杀和激烈战斗，将敌大部

歼灭。

万耀煌率师部和第七十六团慌忙来到前线，眼见第七十八团即将覆灭，一面急令左路纵队驰援，一面指挥第七十六团两个营渡河投入战斗。

渡河增援，万耀煌想败中取胜，但这是一步死棋。

红军立即决定用少数部队继续在河边地带歼敌，把主力瞄向了敌第七十六团渡河部队，趁其立足未稳，予以迎头痛击。敌第七十六团在红军严密的火力攻击下，仓皇回窜。正在这时，狂风暴雨大作，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来不及退回河岸的便成为水中冤鬼。

老百姓说：报应啊，老天爷睁开眼了！

惊魂未定的万耀煌正在焦急之际，从鸡公寨又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爆炸声。一直担任牵制鸡公寨之敌任务的罗山独立第六师，向该敌发动猛攻。万耀煌误认为红军主力由上游渡河发动攻击，慌忙下令全军退至钟家岗。

“下一步怎么办？”万耀煌及其将领们一筹莫展。向前走，怕中红军主力埋伏，向后退，又会受到军法制裁。不知不觉，天又黑下来。惊魂未定的万耀煌唯恐红军会突然夜袭，越想越害怕，干脆率部向南退至5公里以外的香炉山。

这一夜，万耀煌想了许许多多：为什么第十三师左路纵队不来增援？说什么“天雨路险，无线电失灵”，这岂不是借口？第五十八师为什么滞留在老君山一带不敢前进？第三十、第三十五师为什么出发后当天即返回原防地？这就是“追剿”？

7天后，敌“清剿”总指挥卫立煌于4月22日撤销了第十三师的“追剿”任务，改由第八十九师接替。

万耀煌的“追剿”功绩“黄”了。或许他始终在琢磨：“进剿”与“追剿”到底有什么区别？

倒水河这个连湖北人都陌生的河却会自豪地讲述着自己的过

去：当年的马鸿逵和万耀煌曾栽在我的手上。只不过，前者是在郭家河段，后者是在潘家河段，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倒水河。

潘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麻城北部，寻找机会打击敌第三十、第三十一师。4月18至20日，红二十五军在杨泗寨附近与敌三十一师、三十师进行两次激战，共歼敌数百名，予敌以重创，激战之后，敌第三十一师在其战报上供称：伤亡团长2名，营长6名，连排长30余名，士兵300余名。

红二十五军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后形成了战术上的优势，战役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广大群众。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掩饰不住的喜悦：“潘家河一战，红军无粮，群众家家造饭挑至火线，送给红军吃。有许多群众宁愿自己不吃米，受饿几顿饭，把所有的米造饭给红军吃。在开始反攻以前，群众中有一部分人认为红二十五军不能巩固苏区，一心只望红四方面军回来，现在经过这两次战争的胜利，群众情绪大为转变，二十五军在他们心中已开始获得鄂豫皖苏区主力的地位了。”<sup>①</sup>

近3个月的反“围剿”斗争虽然不能过早地画个句号，但前来“进剿”或“追剿”之敌在红二十五军的声威震慑下，不敢再贸然行动。被敌人分割的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包括黄安县的七里坪、紫云、桃花、仙居、二程等区的大部，麻城县的乘马和顺河区，光山县的东、西、南3个区，以及罗山县的宣化区。陂安南和陂孝北地区也得到相当恢复。皖西北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和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反“清剿”斗争出现了新局面。红二十五军经过连续的战斗，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部队也得到加强和扩大，发展到万余人。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报告》1933年4月。

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大规模划区“清剿”即被打破，卫立煌的“进剿”与“追剿”方案也一一宣告失败。虽然蒋介石于4月19日又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但5月初刘镇华又出任“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这无疑是对卫立煌“剿共”任务的另一种总结。

从孙中山的卫士，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的卫立煌，一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被视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美国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词典》，说他是“常胜将军”。

当年在鄂豫皖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老人，永远忘不了这位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卫立煌。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8月，十四军军长奉命策应黄安七里坪和红军血战7昼夜的陈继承部，挽救陈继承的危局。徐向前回顾说：“如果再向前进，接近陈继承纵队的司令部，敌便有全线崩溃的局面。可惜我们兵力不足，四个主力师和黄安独立师均已投入战斗，手头缺乏后续力量。敌依托山地坚守，我军反复冲杀，攻不上去，心里着急也没办法。我看天色微明，相持下去不利，遂令部队停止进攻，撤回河东。听说，在我夜间突进时，陈继承本已慌忙，准备撤退，但卫立煌赶到，要他坚持，才顶了下来。看来，卫立煌这人，比陈继承强些。”<sup>①</sup>

这里的“强”，是指卫立煌够个军人。

地跨豫皖两省的大别山中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当年曾经是捻军和白朗军的要地，现在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政中心。蒋介石严厉催促向金家寨进军，后军皆畏葸不前。卫立煌精心策应，率领1个师从后山小路翻山越岭，直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3页。

未遇抵抗，穿城而过。镇内搭有戏台，像要演戏的样子，数量较少的守军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不作无谓的牺牲，主动撤出，追随主力红军向西去了。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催促各军进兵，没想到忽然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说他已经占领金家寨。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劳，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除奖卫立煌本人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政府颁布明令，在金家寨建立一个新县治，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原先只有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中山县。

这是第二次以人名为县名，卫立煌声名大噪，为别的国民党军官所忌妒，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1948年12月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卫立煌名列13。

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天在变，地在变，人也在变。

如今卫立煌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盖棺论定，他以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活动的爱国人士，受到人民的尊敬与怀念。在公墓里，他的灵位紧紧挨着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灵位，这大概是卫立煌从前所完全意料不到的吧！

1960年卫立煌去世的时候，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停灵公祭的地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总理亲往主祭，备极哀荣。这岂是当年在广东替孙中山站过岗当过卫士的卫立煌所能企望的。

再往前追溯，毛泽东1956年在其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说过：“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这位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红极一时的卫立煌，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么被提出，可以不朽矣。

蒋介石期望担任“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的卫立煌能再度“辉煌”。但始终只是一厢情愿。

红二十五军在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同时，各级党组织还抓紧时机，加强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把建立根据地建设视为革命队伍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徐向前也深有体会地说：“有根据地时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到了没有根据地的地方，才晓得那种苦处。在根据地里，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游击队，有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送几次情报；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穿衣、吃饭问题也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记得张国焘搞‘大肃反’时，黄安仙居区的群众和干部极为不满，逃进山里‘避难’。临走前派人给区政府送来五百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还写了封信，说是给红军的。群众和红军真是鱼水情深，难离难分呵！而我们到了远离根据地的地方作战，情形则大不一样。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敌威胁下跑得远远的。红军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况没情况，困难要大得多。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往往被敌人堵到门上才知道，不突围没有办法。至于吃啦，穿啦，供应啦，更难以提起，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异常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基地。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基地，是绝对不行的。”<sup>①</sup>

争胜利，求生存，就应该有巩固的根据地。在敌人不断“清剿”下，鄂豫皖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有不少红色区域成了白区和根据地的边沿地区；不少根据地政权组织遭破坏；根据地的经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1～222页。



济和民众的生活也成为能否稳定群众情绪的重要因素。

战争、政治、经济总是分不开的。

鄂豫皖省委开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

——抓组织建设，恢复被敌人破坏或因分散等原因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在恢复组织和发展党员工作中，要求严格进行审查，坚决淘汰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犹豫畏缩不做工作的分子”，“永远开除向敌自首分子的党籍”；把各级“苏维埃中间不忠实于革命的犹豫的动摇的官僚化以及一切不做工作的分子无情淘汰”。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总使人想到毛泽东给徐特立先生的那封信：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同样，在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清剿”下，既涌现出了无数革命先烈，也出现了许多动摇变节分子。大浪淘沙，经过反“围剿”胜利后的政权建设和组织建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了巩固的政治基础。

——抓生产，抓经济。在敌人的“围剿”政策下，根据地人民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缺耕牛，少农具，甚至连日常用具都十分缺乏。在严峻的“饥饿”面前，各级党组织动员红军和各地武装实行“边生产、边战斗”的方针，利用一切战斗空隙参加生产，减少群众负担。并采取了发动群众开荒种地及政府发放贷款等措施，共度难关。

——抓地方武装建设。如果说红二十五军以自己的牺牲掩护了红四方面军的转移，那么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自己灵活多变的斗争有效地配合了这支留下来的红军主力。中共鄂豫皖省委充分认识到发展地方武装的重要性。提出合编和扩编10个独立师（鄂东北地区7个、皖西北地区3个）的雄伟计划，根据地中心区的各个区、乡都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这些地方武装，既

不断地补充红军主力部队，又积极地配合了主力部队。1933年3月召开的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不仅要扩大主力红军，而且还要扩大游击武装，据现在的形势看，扩大主力红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扩大游击武装同样的丝毫不能放松，而且更要加紧，因为红军多是从游击队锻炼出来的。”<sup>①</sup>

在这个报告中还专门讲到了地方武装在当时的作用，这就是：其一是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报告说，红军只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之一点，不能同时消灭几部分，所以，红军的行动必须要有游击队的配合，牵制敌人；其二是保障春耕。目前春耕非常重要，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要有游击队作为“春耕掩护队”，保护“农民好好耕作”；其三是担任打粮的任务。我们目前粮食很困难，要组织打粮队伍，去夺取豪绅地主的粮食，这就要组织游击队。

当时任鄂东北道委秘书科长的刘华清，在谈到游击队的作用时深有感触地说：“在各路游击师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主力部队在破安南、河口、黄安西南等地区，歼灭成连成营的敌军和大量的地方民团，迫使敌人不敢分散用小股兵力（连、营）进行‘清乡’、‘扫荡’，只能集中兵力驻在较大的据点或城镇里，使我们有了较大的回旋地区，部分地区的群众已可以下山回家了。”

——抓边沿地区和白区的群众工作。如何对待敌占区的群众，消除赤白区群众的对立是苏区边沿区的一个老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解决好。一些党组织、游击队的同志，对“反水”农民不讲政策，采取抓到就杀的办法。这种作法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敌人趁此机会进行反动宣传，组织保甲联防来对付游击队和红军，敌占区的群众也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人就围打。对立、冲突、流血……

<sup>①</sup> 郑位三：《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3年3月29日。

红军来了，一批“反水”农民被杀掉。

白匪来了，一批“赤化”农民被处死。

报复不已，流血不止。

鄂豫皖省委采取了紧急措施：

其一，克服“左”倾思想，认识到“反水”是被迫的，不能把“反水”农民当敌人看待。敌人占领了我们根据地后，群众就只好跟着红军跑反，到深山老林中躲藏起来。但跑反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留在外地或山上，因为长期在外不回家搞生产就没有饭吃。在红军不能很快地把敌人赶走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跑反的群众只好下山回家。一回家，敌人就逼着他们扯白旗“反水”，对不愿意“反水”当“顺民”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所以，鄂豫皖省委强调说，有些农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被迫“反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了解插白旗的群众，并不是反动了，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群众只要有人好好的领导是不会插白旗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土地革命利益”<sup>①</sup>。

其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要教育党和干部，绝对不允许毁坏白区群众的房屋，坚决反对打骂白区的群众，严禁杀害“反水”农民。

其三，做好争取群众的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插了白旗后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像黄安五区的群众插了白旗后，“豪绅地主回来了，向农民要三年租、三年棵，还要抽捐抽税，直至杀头”，“五区群众连话也不敢大声说，路也不敢随便走，哪里还敢笑？连哭也不敢！因为笑了若被敌人知道就会说你‘通共’，那就要杀头。”<sup>②</sup>省委还要求编写一些传单、布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感化白区的群众。鄂豫皖省委郑位三曾写了一首《赤白区群众联合起来》的歌谣。

<sup>①②</sup> 郑位三：《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赤区白区工农们，  
原来都是一家人，  
不应该再闹纠纷。

只恨军阀、国民党，  
奸淫烧杀又放枪，  
赤白区穷人都遭殃。

土豪劣绅好狠心，  
催租逼债又抓兵，  
修碉堡又筑土城。

压迫穷人插白旗，  
插上白旗受连累，  
动不动砍头问罪。

赤区收成本来好，  
可恨匪军抢走了，  
弄得我粮食缺少。

过去情况来弄清，  
打粮有时打穷人，  
这责任全在我们。

如今打粮改分粮，  
转变政策理应当，  
为的是穷人解放。

莫听谣言莫上当，  
帮助红军筹粮饷，  
消灭那反动武装。

反动民团清乡队，  
不是人人都有罪，  
首恶必办胁从争取。

保长甲长可自新，  
以后不做坏事情，  
若不听处以重刑。

赤白区群众一条心，  
联合起来打敌人，  
开展那游击战争。

联合红军去杀敌，  
赤白区群众齐努力，  
推翻那统治阶级。

到处肃清反动派，  
发展工农苏维埃，  
那才是太平世界。<sup>①</sup>

话是开心锁，白区群众听了这发自肺腑的动人的歌谣能不联

---

① 《红军革命歌谣选》，第235～236页。

袂而兴？春风化雨，白区的群众接受了苏区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拥抱着从白区而来的群众。赤色区域一天天在扩大，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在巩固。

大别山春暖了，遍地桐梓树开花了。山下油菜花黄，山坡上迎春花怒放，山上山下一片金黄。那高高树立在大别山巅的红旗，显得分外夺目、鲜艳。

---

## 第二章 祸起萧墙

### 一 七里坪之围

历史老人硬说历史有车轮，它从来就没有沿着一条笔直的大道行驶，总要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地点拐上一个弯。这不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重压，就是因为内部的矛盾所致。

文学家则浪漫地把历史比作一条长河。它从深谷大川中走出，沿途汇集了众多的山涧溪流，浩浩荡荡飞流直下。在它的拐弯处，稍稍放松，稍稍停歇，然后又化作滚滚浪涛呼啸而去。

刚刚红火起来的红二十五军又拐了一个弯。

这个“弯”主要来自内部的“左”倾和肃反。

矫枉容易过正。对于共产党历史上否定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后连连出台的“左”倾错误，李维汉晚年写下的《回忆与研究》中很深刻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sup>①</sup>

王明在瞿秋白、李立三之后，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倾冒险主义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被称为纲领性的小册

---

<sup>①</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名是《两条路线》。

接受了王明《两条路线》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用发烫的头脑，写下了发烫的字句：

“武装保卫苏联！”

“吸引数十万新工人加入赤色工会！”

“中国的革命高潮是必不可免的！”

“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攻——这是现在的口号！”

远在鄂东北地区的鄂豫皖省委对来自上海的“左”倾冒险主义言听计从。

1932年11月12日，留在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中共鄂豫皖省委匆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走了，加之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形势非常紧张。然而，与这种恶劣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却乐观地认为：

红军的游击战争“已经使国民党遭受严重打击”；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人失败的地位”；

“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

不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政治动员，仅作鼓舞人心用。恰恰相反，省委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对形势作了种种“已经”的总结后，马上规定了这支两万余人的留守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和红军伤病员）的总任务是：

“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争运动打成一片”；

“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

形势喜人，任务催人。偶然的“柳暗花明”，不少人便陶醉在春色之中。

郭家河战斗的第二天即1933年3月7日，省委在郭家河举行



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省委在这一天散发的以《鄂东北通讯》命名的油印小报上，号召广大军民：

“起来！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3月下旬，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召开，与会代表更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甚至认为郭家河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大举反攻时期”的开始，这场战斗已“把国民党主力扯的稀散”，“国民党军阀的四次‘围剿’已到末期，而我们反‘围剿’的斗争，走到更顺利的前途”。

“行船遇顺风”，这句民谣便自然地收入了会议的报告中，大家也真的认为鄂豫皖的革命已扬起了风帆，“乘风破浪须有时”，机会终于来了，会议号召根据地军民“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城等中心城市”。

然而，这时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围剿”的总兵力有15个师又4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近20倍。

军事书上有“以一当十”之说，这不过是形容一个人的英勇善战，如果不顾时势，强欲与争，聪明的智者会说，这是“以卵击石”。

并不是每个人的头脑都在发热。吴焕先就显得较为冷静。

作为一军之长的他，向来很少泛泛空谈。一连串胜利的热浪也使吴焕先心情为之振奋。但面向现实，他清醒地看到：敌人仍像黑云般地压在鄂东北境内，几乎占据着所有的中心城镇，而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能量，只能恢复类似郭家河的几处乡镇，无论如何也难以“夺回”上述几个“中心城市”，实现省委的战略意图。就形势与任务来说，红二十五军也只能采取那种“飘忽的游击战略”，达到力所能及的作战目的；不切实际的“夺回”这个那个的，谈何容易！

经过一番思考，他找到省委书记沈泽民，如实讲了自己的看

法和意见。但遭到否定。

当然,吴焕先那会儿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及其严重后果。他没有洞察一切的眼力,也不具备超人的雄才大略。他的独秀之处就在于能面向实际,能实事求是讲点个人看法,或提点什么建议。

就此一点,难能可贵。

历史过去30年以后,郑位三曾讲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就领导人分析,是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我也在内。我们这些人年轻幼稚,马列主义有一点,革命精神很好,单凭热情干事,思想上夹杂。所谓夹杂,就是有主观主义!这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不犯错误。……那时写的文章观点害人哪!文件中国际国内形势一部分,……那尽是吹牛,逼得人家同意,不要说现在不曾记得,当时就没注意。文件中只有实际行动那一些,是焕先同志出的主意。吴焕先重视实际的精神很强,不是靠书本过日子,他有好多优点限制了‘左’倾错误。”<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都在制定“反攻计划”。

1933年3月,鄂豫皖省委收到了党中央在这个月10日发出的《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指令》提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和常备的军队”。规定红二十五军的“反攻计划”是:第一步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间地段,并把黄安与麻城东北部地区和商城南部地区连成一片。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指令》还规定,必须把一切常备的武装都归编到红二十五军里去,“改组后的红二十五军,应当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中央的

<sup>①</sup> 《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153~154页。

《指令》最后强调：“对于我们的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是现在”，“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充分迅速和坚决去执行我们所提议的军事行动的话”。

这看上去很委婉的措词，军人们都能品味“军令”的分量！

3月15日，中央又发出了《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全文长达2万余字。仅选取其中几段，从中可以了解“左”倾的风源以及即将要掀起的“大反攻”战略：“前此送给你们的秘密训令，是关于再组织你们的军事力量，及你们立刻要执行的军事计划，希望你们以最大的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积极性，把它们完全实现到实际工作中去……”

去年9月间所开的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对于目前国际情势及共产党的任务曾有最清晰的分析与指示；至今时逾半载，一切过渡，完全证明了这一分析之正确。十二次全会告诉我们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之尖锐化，猛烈地向前进展，危机已到了新阶段……

接到省委2月21日的信后<sup>①</sup>，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戒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据信说：‘敌人正在找我们的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而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定的反攻计划，仅用‘飘忽’的战略去对付。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训令，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

来自党的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铁的旨意。它一扫前此军事指令中的绵里藏针的措词，这么严肃，又是这么尖锐，铁板钉钉，毫无商量的余地。即便是对“反攻计划”有异议的吴焕先除了服从中央的决策外，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4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令的精神，省委发布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六号》，对当前的形势更加乐观地估计为，“从鄂

<sup>①</sup> 即沈泽民写给中央的信。

家河胜利以来开始的鄂豫皖的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反攻时期”，并且具体规定了“反攻计划”：“（一）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二）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三）收复整片苏区鄂豫皖和扩大新苏区。（四）拿鄂豫皖苏区积极反攻和反攻胜利来多牵制敌人的兵力，帮助中央苏区。

反攻！反攻！省委决定：首先夺回七里坪！

七里坪，坐落在黄安县城以北20公里处，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集镇。四面群山环抱，倒水河从西门外悠悠流过。当年，黄（安）麻（城）农民运动的烈火就是从这里点燃的，并很快映红了整个800里大别山！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宣布建立，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总指挥徐向前在西门外的河滩上检阅了威武雄壮的红军，这里回荡过战士们那嘹亮的歌声。

1932年12月，敌人占领了七里坪。

七里坪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用兵之地。国民党军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修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修筑了重重防线，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派下重兵驻防：

敌第十三师三十八旅七十五、七十六团进驻七里坪、古枫岭一带，第七十八团随师部驻七里坪以南约两公里处之枣林岗；

敌第三十七旅七十三、七十四团驻七里坪以西13公里处之华家河，第七十七团驻七里坪西南20公里处之河镇，接替了第八十九师除黄安外之“驻剿”任务。

敌第八十九师驻七里坪等地部队即集中黄安。

敌人紧紧盯住了七里坪，似乎预料到这里很快会有战事。到4月下旬，便作好了兵力部署，这样，七里坪枪声一响，敌人会马上从西、南两路前来增援。而红军装备较差，弹药给养严重匮乏，要打下七里坪，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情况，红军不少领导干部是十分清楚的。在战前动员会上，吴焕先、徐海东曾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不少红军将领表示了异议。但是，省委强调中共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强调夺回七里坪对恢复苏区的作用和意义，坚持一定要打。并且指出：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这样，这场影响红二十五军命运的七里坪战役便发起了。

5月2日晚，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进入作战阵地。由于兵力不足，无法实施四面包围，只能占领七里坪以东以北一条弧线，形成半包围的态势。七里坪南至黄安县城、西至华家河的道路，红军无兵力控制，无可奈何地给敌人留下一个自由调动兵力、补充军需的大口子。

红军刚进入阵地，还在抢筑工事时，敌人就首先发起进攻。几番激战，才把敌人打退。此后，红军数次向敌前沿发起冲锋，均未突破敌外围防线——既未能占领敌人阵地，又未能予敌以大的杀伤。

七里坪的南面有两处突出的制高点，这便是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向敌人设防坚固的前沿阵地发动进攻未能得手后，7日晨，我军七十三师二十一团袭击敌制高点小悟仙山，但也未能夺取敌人阵地。11日晨，红军又向大悟山发起进攻，仍未奏效。

这时，驻守在七里坪外围的敌人从红军包围圈的缺口中涌进了七里坪。形势更加严峻。

5月21日晚，红军以第七十四师二二〇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的两个营，再次突然袭击小悟仙山。战士们浴血奋战，攻占了敌前沿阵地。

夜战，是红军的特长。

然而，第二天拂晓，敌八十九师两个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居高临下，猛烈反扑，红军被迫撤回。从此，敌我双方形成阵地对

峙状态，进攻不成，撤退不能，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红军反倒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

就这样，又坚持了20多天。

旷日持久的七里坪之战，红军餐风宿露，艰难地维持着。战斗开始前夕，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在郑位三领导下，发动全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红二十五军作战准备和战斗。各县独立师（团）、游击队，主动袭扰敌人；妇女为红军做衣做鞋，救护伤员；广大群众给红军送柴草，有些群众把家中的门板、铺板都拿出来支援红军做工事。但是，战役开始10天后，红军断粮。人民群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一碗一升地拿出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以野菜充饥。

群众的口粮没了。即使是天天受饿，即使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拿出十二分拥护红军的热情，最后每天也只能从地里挖点野菜，或掐点油菜叶子、薹点豌豆苗子，挑着送上阵地。为伤病员送点拌着谷糠麸皮的稀饭，也是莫大的照顾。四周的乡村根据地，饥饿、疾病、疲困和厌倦情绪，也像瘟疫般四下蔓延，……处于艰难境地的根据地军民，都在眼睁睁地望着正在扬花灌浆的青稞穗儿，经受着严重的饥饿威胁，忍受着痛苦的战争折磨！

部队也充分认识到断粮的危急和群众生活的艰难，只得一面以野菜、树叶充饥，竭力保持住与敌相持的态势，有时不得不抽调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出“打粮”，以解燃眉之急，筹粮部队常常运动到一二百里以外的宋埠、黄冈、陂安南等地区，但每次所获不多，难以解决大部队的需要。徐海东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正是青黄不接时候，我军大部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蔬菜，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搞多吃，搞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皮，

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sup>①</sup>

如此与敌对峙下去，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持。拼火力，拼不过敌人；熬时间，又没得吃的，也熬不过敌人。令红军和群众心焦的七里坪之围，就这么半死不活的拖着、熬着、苦着……

部队到了十分疲困饥饿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战斗力。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军长吴焕先和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再次向省委建议及早撤离，抓紧时机休整部队，以利再战：“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两位军领导都有些急了，直截了当地向省委陈述撤离的理由。

谁知，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反而在5月24日发布了《通告第一〇七号》，《通告》指出：在我们“大举反攻中间，敌人是被击溃了，局部被消灭了”。目前，“全国革命是在高潮中，蒋介石的主力是被中央红军击溃了，他的全部军队是被全国各大苏区和农村游击区域牵制着，决不会增加兵力到我们这苏区来。因此，我们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反攻敌人”。现在麦子熟了，谷子正要下种。红二十五军包围七里坪，把国民党的主力牵制住了，这是对春收、春耕最大的保障。《通告》要求迅速“坚决拿下七里坪”，还要“准备更大力量加倍迅速夺回一切其它中心城市”。《通告》还强调指出，怀疑能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市镇的就是“右倾思想”……

在当时的省委看来，能不能拿下七里坪，已成为革命成败关键的分水岭。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胜败在此一举。《通告》对此已有定论：“革命是不许可停止的，不进就要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如果拿下七里坪，苏区立刻大大扩充巩固，……并且走上顺利完成一省数省政权的大路。如果拿不下

<sup>①</sup> 徐海东：《保卫红军土地》，载《皖西革命回忆录》。

七里坪，……鄂豫皖就要重新受到残酷的破坏，群众的粮食就完全落空，发生很大的饥荒，革命就将走到更困难的环境。除在这两条路线之外，没有不进亦不退的中间道路，我们在全国革命高涨这样有利形势下而决没有理由放弃这个胜利的前途，自己找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然而，就在这《通告》发布的第二天，5月26日，红七十四师到打鼓岭附近截敌给养，与敌浴血奋战，仅获面粉22袋，而红军却伤亡160多人，次日，又以180余人的伤亡代价，于古枫岭附近获面粉30余袋。

两次武装“打粮”行动，以340余人的伤亡代价仅换来50余袋面粉。每一袋面粉要以7人的流血牺牲换来。这铁一般无情的伤亡数字，实际上宣告了“夺取七里坪”的破产，也是对省委《通告》的最实际不过的回答。

当然，还有比这更糟糕的。6月初，徐海东带领七十四师绕到七里坪西南方向的灯笼山地区截敌给养，敌第八十九师师长汤恩伯发现红军行动后，亲自率领第二六五旅由黄安县城出发，大举向灯笼山地区进击，同时令其二六七旅1个团，由七里坪西出堵击，断我归路。6月3日，徐海东率部先后在灯笼山、么儿山与敌展开激战，经过多次肉搏，得以夺路返回，粮食一粒也没有获得！

多灾多难的七里坪之围啊！……

位于七里坪东北方向的龙王山，恰在七十三师与七十四师的阵地之间，是军部指挥所和七十五师的作战阵地。吴焕先就住在山上一座地窝棚子里。这天，恰是个晚霞似火的傍晚，吴焕先蹲在窝棚外面的战壕边上，正在与师长姚家方交谈情况，商量夜晚截敌给养的作战行动，就在这时，“老经理”忽然奔上山来。

被称为“老经理”的后勤供应总管，就是吴焕先的同乡——四角曹门的吴维儒。这个由吴焕先介绍入党的本家叔父，最早就领着大儿子参加红军的“父子兵”，因在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随



后就转入地方工作。红二十五军成立不久，他又自告奋勇地参加了红军，留在军部经理处担任经理处长。吴维儒的大儿子吴先顺，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到皖西时英勇牺牲，他又将二儿子吴先海、三儿子吴先党，都一块儿领上家门，参加了红二十五军。闻名全军的“老经理”，能够舍得自家的三个儿子，却休想从他手中掰去一块多余银元，多领取一粒粮食。他就是这样一位理财能手！

这次他走上山来，虽然不可能再“贡献”出一个儿子，也不可能给军长带来“吃的问题已解决”的喜讯，但至少他认为是一件好消息，因而兴冲冲地告诉军长：“……你媳妇来了，就歇在山底下。你……是不是下山看看，她……”

吴焕先听了先是一愣，脸上不由得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随后很不耐烦地回答：“唉呀，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有事，不去不去！”

一个多月来，战不能胜，退不能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林林总总的事，够他伤脑筋的了。眼下哪还有什么兴趣跑下山去看妻子……

“老经理”没头没脑地遭到数落，讨了个没趣。

她走了。挎着她的小竹篮儿，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没有一丝委曲，没有一句怨言。她的目的达到了：送来了一口袋粮食，还有一个粗布包包——这是军长的“专利”——内有一双新鞋和十几个煮熟的鸡蛋。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事，她满面绯红地当着吴焕先的警卫员的面说：“大兄弟，你回头悄悄告诉他，就说俺有喜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青山、绿树、流水，沐浴着落日的光彩，斑斓似锦。她那瘦弱而又倔弱的身影，渐渐地消逝在嫣红的晚霞中。

晚上，大家高兴地分享着吴军长的“专利食品”。有人还把那一口袋粮食解了开来，借着灯光一看，当下就傻眼了。这是一袋什么粮食哟，有大米、小麦、黄豆、谷糠、麸皮……分明是乞讨

而来的“百家粮”啊！

吴焕先也慌了神儿，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个已经被他打发走的妻子，居然为红军送来了自己“打”的一口袋粮食！就此一点，作为七里坪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无论如何也应当下山去见上一面。

他怎么也没想到，她一去竟是永别！

他做梦也想象不到，当自己的警卫员走下山去“叫她回去好啰”时，半晌都没有喊出一声“嫂子”。一个多月不曾相见，她忽地变成个活鬼似的人儿，原来那一张白净透红的脸盘，好像被碱水浸泡过一般，变得又黄又瘦，似乎苍老了几岁。

警卫员把嫂夫人捎给军长的话，实实在在地讲了一遍，唯独没有把嫂子“有喜”的事告诉军长。他不知道，她给军长留下人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梦。虽然还是个正在腹中默默蠕动的小生命，可是足以使她和他感到幸福面充满希望，这也是不久的未来，作为母亲和父亲的骄傲！

夜里，吴焕先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警卫员后来对人说，军长一晚上都不曾睡着，为那一口袋“百家粮”难受啊。妻子“打粮”的影子总在眼前晃来晃去……

“打粮”这个名词，在鄂豫皖苏区包涵着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殊内容，很难对其下一个确切定义。总而言之，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把粮食弄到手，都称之为“打粮”。就其方式而言，往往以夜间行动居多，带有神出鬼没的传奇色彩，或打击土豪，或劫持粮商，或偷袭敌人的补给站，或截获敌人的运输车辆，但都必须采取武装性质的暴力行动，否则，就不可能“打”回一粒粮食。根据地内土豪劣绅的粮食囤子被打光了，无奈就得长途奔走，远到赤白边界从事“打粮”活动。不言而喻，别说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就是以枪杆子为后盾的军队又能打到多少粮食。妻子所谓的“打粮”，只不过是挨门乞讨的代名词，好听一些而已……吴焕先对于妻子“打粮”的行动，最清楚不过。这如何能让作为军

长的他心安呢！

到6月上旬，多日的饥饿、劳累、疲惫，再加上战斗伤亡、疾病减员以及扩大化的肃反，全军万把人马损失过半。剩下的6000余人，体质也极度虚弱，已经到了难以补救的地步。敌人则乘红二十五军兵陷七里坪之时，不断侵犯根据地中心区域，破坏麦收和插秧，逼迫群众插“白旗”，强化其反动统治，形势日益严重。若再持续下去，全军非覆灭不可！

6月13日夜，省委才不得不决定全军撤出七里坪。

43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当那一轮明月羞羞答答从东面的光宇山顶仰起脸时，部队也开始整队撤离。

夜行军向来是神速的。谁知这支飘忽若神的红军队伍，行军的速度却那么迟滞、缓慢；红二十五军这支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队伍，而今却变成了零乱的队形，憔悴的面孔，疲弱不堪的脚步，五花八门的背枪姿势。一路上零零散散、稀稀拉拉，有的像初春时节又乏又弱的羊羔，摇摇晃晃，昏昏欲倒……

月亮隐下山去了。这支部队仍在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奔走着。

部队到达长冲附近时，吴焕先得到消息，自己的妻子饿死在长冲以东的甘渣岗。他才匆匆赶到现场……

她，倒毙在绿草丛中，听说是刚刚咽气不久。身上，还是那么一件已经褪了颜色的衣衫，一条膝盖上缀着补丁的粗布裤子；那么一双奔走过多少山山岭岭的脚，被已看不出本来色泽的鞋袜包裹着……身边，还是那个盛过豌豆角、青稞穗和蒲公英的小竹篮，里面还有几样野菜，几束黄熟的小麦穗子。那张已完全冰冷的嘴唇，还紧紧咬着一支鲜嫩的蒲公英，叶儿已吞进喉里，滴滴点点的绿色唾液，凝结在她的下颏……她，就这样躺在自己的“相公”面前。也许她不敢奢望她的丈夫会赶来相会，这最后一面，对

吴焕先来说，应当是在七里坪战地的一角——龙王山下！然而，火气旺盛的他，偏又那样执拗而任性，直到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再也抑制不住哀怜、悲痛而又疚心的泪水……

那天，妻子从龙王山回到村里以后，第二天就要收割青稞，偏又遭到敌人的骚扰破坏，婆媳俩一块逃出村子，半路上又被敌人冲散，各自不知去向……眼见已经黄熟了的青稞，大都被敌人放火烧了，想必是青稞没了指望，她才跑反到了离家30余里的甘渣岗。

活在人世，普普通通，死人冥府，默默无闻，这位年轻而又漂亮、纯洁而又质朴、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即使是知道她是军长的妻子，又有几人知道她叫曹干先，又有谁知道她即将成为母亲之时，却被死神阻拦在人生命运的坎坷路口。

她，被小心翼翼地就地埋葬。没有墓碑，没有追悼会。只有甘渣岗上满山遍野的山花，会一年一度地凭吊、陪伴着她。

43天的七里坪之围，似乎不足以证明教训的深重，非要在这片血与火的战地上，再导演一幕“夫妻相会”的场面。

## 二 “老三”便是“第三党”

红二十五军安全撤离了七里坪，摆脱了坐以待毙的命运。但“肃反”仍紧紧纠缠着这支队伍，它像蚂蟥一样贪婪吸吮着已饱受饥饿之苦的军人们的鲜血，无情地摧残着本已疲弱的肢体……

“肃反”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极为痛心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中共鄂豫省委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在肯定张国焘“在苏区内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sup>①</sup>的同时，又批评张国焘、中央分局肃反还不彻底。

<sup>①</sup> 《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1月5日。

张国焘“肃反”的“功绩”何在？

笔者在尘封的历史资料中寻根求源。

1931年3月28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下发各根据地。决议指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它的基础建筑在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旧官僚的身上……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与工会中进行他们的破坏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进攻。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凭借着苏维埃区内富农的领导，更利用立三路线‘左’的以及极右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合，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影响与葬送红军的主力。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

富田事变错综复杂。决议中讲的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就是所谓的“AB团”。

AB团本是一个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前来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来月。1927年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逮捕了“AB团”骨干30多人，捣毁了“AB团”总部。

本来，“AB团”作鸟兽散，“AB团”问题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从1930年3月开始，江西地方党组织纷纷报称破坏了“AB团”的“下级的零碎组织”、“大批组织”以及发现了改组派“AB团”等等。这样，“红旗下的奸细”愈来愈引起人们的警惕和不安，肃清“AB团”的声势也就愈来愈大。由于“乱供乱咬”、“乱打乱

杀”，实行逼供信，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最后引出了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发动“富田事变”，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并且采取了更不正当的手段，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

事情越闹越大，“奸细”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32年1月12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要求各根据地党部和苏维埃政府，对“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

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都先后进行过“肃反”。

1931年4日，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不久便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他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几个月后，他就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了鄂豫皖苏区的状况以及他领导下的“肃反”：“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这一苏区第一个发源地是黄、麻。由于1925—1927年，这些共产党员（多半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员长期混合，共产党之无独立政纲，1927年后，经过许多变节、失望、消极与国民党左派去分化，其中一部分党员最具革命热情，……成立农民政府，……并有一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当然也与富农混杂着拥护这些干部。……这苏区第二个发源地是商城。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实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将农民的武装缴交民团，为地主豪绅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农民。……这些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派失势的时候，就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员，暗中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无所谓土地革命，不过与农民最恨之部分的地主豪绅斗争，土匪流氓都被拿入党、苏维埃与红军中，也因为农民受痛苦之深，得到一部分农民拥护，形成商

城之赤区与红军。实质商城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人物，如周维炯、陈慕尧（党的负责者）等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至于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

“在这三四年中混进这苏区和红军中来的有不少的自首告密变节为国民党捕杀的所谓共产党员（奸细），有的是自己混进来的，有的是从信阳等处党的组织介绍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并是中央及长江局介绍来的，许继慎、熊受暄即为其首领，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改组派、各国民党军队、当地地主民团选进来的侦探也不少。”<sup>①</sup>

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国焘基于这样的形势分析，一场罕见的“肃反”也就开始了。史称白雀园“肃反”。

1931年10月上旬，红军部队移驻白雀园地区。张国焘前来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工作。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就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

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

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萧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

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园

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拂，政治委员罗炳刚

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翼石

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

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

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

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

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

<sup>①</sup> 张国焘关于白雀园“肃反”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1月25日。

第三十六团团团长魏孟贤

第三十六团政治委员任难

红四军下属的 12 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无一人幸免。

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11 月 20 日，积极贯彻张国焘指示的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也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注：指改组派）1 000 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 1 500—1 600 余人。”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徐向前痛心回忆：“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知识’、‘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sup>①</sup>

“白雀园‘大肃反’，……肃掉了 2 500 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sup>②</sup>

“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158～159 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152 页。



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sup>①</sup>

11月25日，张国焘兴致勃勃地递交了近万字的“关于白雀园‘肃反’给中央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之原因以及我们为什么在斗争中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报告中张国焘甚至狂妄地讲：“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sup>②</sup>

所谓的“经验”，徐向前气愤地讲，就是‘一逼、二供、三信’：“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看京戏，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动不动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苏三起解》里的老解子，见到的冤案太多，才发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叹。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起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sup>③</sup>

这就是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的“经验”。这或许就是鄂豫皖省委所谓的张国焘“在苏区内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

张国焘走了，“肃反”的“经验”留了下来；但是，鄂豫皖省委认为张国焘的肃反还不彻底，仅仅属于“开始肃反”，以后肃反的任务还很艰巨！

这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鄂豫皖省委使用这几个字眼并非无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9～160页。

② 张国焘关于白雀园“肃反”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1月25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1页。

所指。因为，鄂豫皖省委在红二十五军中开始的“肃反”表现了一种更“左”的态度。他们进一步夸大“内部敌人”的力量，认为到处都有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活动，强调要“加紧肃反”，“消灭内部敌人”，对党团组织、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实行所谓“改造”。

1933年4月20日，鄂豫皖省委在写给中共皖西北道委一封近乎最后通牒式的信中，就前期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认为皖西北“肃反”还没有发动，在各方面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反革命活动是很多的，要求皖西北道委“必须严格注意这种肃反工作的危险”。信中责令道委要“坚决进行肃反”，“对于工作中表现不好的没有得到参加反革命组织的确凿证据的，要根据两条战线斗争立即指明他的错误，来教育干部与群众面撤销或调换他的工作，不要迁延耽误”，“肃反、斗争和教育这三者是肃反的整个一套武器，绝不能偏重那一个方面的”。

接着，省委又责令中共鄂东北道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肃反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责鄂东北地区过去肃反工作抓得不紧，“尤其是没有抓紧武装中的肃反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对武装中的肃反更要抓紧”，“肃反斗争，要联系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联系到反老大、顽皮、消极怠工、官僚、腐化”。

错误的决策导致了错误的行为。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又继续进行“肃反”。

据徐海东的回忆，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又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肃反。

第一次，发生在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整编就绪，七十四师开往麻城、光山东部一带，七十五师开往光山南区、罗山、黄安一带，主要任务是巩固苏区。但刚组建起的年轻的红二十五军就莫名其妙地被“肃反”。徐海东亲眼目睹了这一幕：“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成立。全军共11000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

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起去，只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17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sup>①</sup>

多么滑稽的“肃反”逻辑。徐向前回忆当年张国焘、陈昌浩在领导“肃反”时说过这样一件事：“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sup>②</sup>

身为一师之长的徐海东在这种“肃反”逻辑面前一度表现得无可奈何。他实事求是地说：“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的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49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2页。

<sup>②</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0~161页。

睛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sup>①</sup>

师长眼睁睁看见自己的战友莫名其妙地“永别”了，自己连过问的权力都没有，甚至难以自保，难以弄清自己是否也是“反革命”，除了对死难的人偷偷流下惭愧的泪水还能有什么方法告慰亡者的灵魂？

在先后进行的4次较大规模的“肃反”中，对红二十五军摧残最严重的要数围攻七里坪时。

1933年3月围攻七里坪时，部队一开始就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十几天后就断粮了。红二十五军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内部还开展了大肃反，不少干部、战士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恐怖，甚至比饥饿还要可怕的恐怖又降临到七里坪外围那批面黄肌瘦的红军身上。怪事不时而生：

——在战役期间，有些指战员对冒险围攻七里坪流露出怀疑和不满情绪，省委就给这些指战员戴上“右倾思想”的帽子，甚至说他们“政治上、思想上动摇，走到受欺骗加入反革命组织”。从思想动摇到加入反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规律。

——战役期间，敌人大米白饭吃得饱饱的，红军连野菜稀汤都喝不上，天天总有人白白死去。战士们蹲在战壕里干熬着，难免有几句牢骚，说点怪话……所有这些，理所当然的是要“肃反”的对象。

——几个战士偶然在一起吃过豌豆角角，就被指责为消极怠工的“吃喝委员会”。……

——有的战士不慎丢失枪支或枪支的零件，自然难逃厄运。

——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话，往往会疑为是“反革命活动”，不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3页。

是“AB团”、第三党，就是改组派……

——家庭成分不好的、从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及戴眼镜或留分头的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必然要发生动摇或加入反革命组织。

——负责“肃反”的领导干部，有一两次竟将部队集合起来，在队前进行点名“肃反”，用察颜观色的办法，如果发现什么人的神色不对，或表现出恐惧表情，就认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理由大该简单明了，“作贼心虚”吗！今天处于和平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当时的战士应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表情、仪容……

这些“怪事”同“白雀园肃反”比较，人们会觉得“似曾相识”但“又添新色”。

要说新，当首推“老三”便是“第三党”的奇闻。

第三党是土地革命时期出现的政治派别，主要领袖是邓演达。这个政党的政治活动被史学家们概括为“七分反蒋，三分反共”。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议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这段引文详细说明了什么是“第三党”。

“老三”为什么成了“第三党”？

七里坪战斗的间隙，有几个战士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这大该是战士们寻找一点乐趣，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偶然有位战士论年龄排在“老三”。没过多久，这位排行是“老三”的战士不明不白地被指责为“第三党”，给抓起来杀了！

“三”字竟成为“第三党”的代名词，这岂不成了千古奇谈。

43天的围困战，没有困倒敌人，红二十五军自己反而被困倒了，肃反扩大化，搞得人心惶惶。担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的徐海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在省委召开的骨干会议上重重地放了一炮。他在《生平自述》中讲：“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sup>①</sup>

人们都盯着徐海东。有人打心眼里支持他，有人对他敢讲真话暗暗吃惊，禁不住替他捏了一把汗。有人却不同意他的说法，尤其是一些领导人……

徐海东抑制不住心头的火，越想越生气。不知怎的，突然站起来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sup>②</sup>

没等徐海东把话讲完，省委书记沈泽民的脸都变色了。他走近徐海东，用烟斗指着徐海东的脸，气呼呼地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sup>③</sup>

“出去！”随着几声吼叫，徐海东立即被推出了会场。

从党的会议上被撵出来，这是徐海东入党9年来头一次碰到的事。不要说自己没有经历过，他也从来没有见别人遇到过这种场面。他像挨了一闷棍，头又晕、又胀、又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当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的郑位三，也是一位对省委“肃反”持异议的人物。即使是被省委责令作出的《关于肃

<sup>①②③</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5页。

反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为“肃反工作抓得不紧”，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依然立场坚定，尽力抵制“肃反”在鄂东北的蔓延。

郑位三对“肃反”的正确态度，来源于他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郑位三是黄安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他不但是本地人，而且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在黄安领导贫苦农民进行革命斗争，非常熟悉鄂豫皖地理、民情，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时他才近30岁，因为他是一位老党员，做事稳重老练，所以，人们才亲切地称他为“位老”。

刘华清谈到他当时对郑位三的看法时说：“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他生活艰苦朴素，长期在农村工作，住在农民群众家里，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穿的也是土布衣裳和草鞋。他善于用当地群众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通俗透彻地讲给农民、战士们听，大家都愿意听他作报告。由这样一位有经验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老同志来领导鄂豫边区人民反对敌人的反革命‘清剿’，干部、战士和群众便感到信心百倍，都表示要在道委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到底。”<sup>①</sup>

“位老”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身旁会隐蔽了那么多需要“肃”的“奸细”，拒理力争。抗争的结果，自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刘华清回忆说：“当时，郑位三和其他许多同志，对红军肃反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郑位三同志反对肃反，反对围攻七里坪，有些领导人便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事实证明，郑位三同志是正确的，他代表了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然而他的正确意见却在一个时期内被省委否定了。”<sup>②</sup>

一个干部被审查，他的部下受牵连；一个人被捕，和他接近的人也会跟着遭殃。在这个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敢于

<sup>①</sup>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革命回忆录》1982年第7辑。

<sup>②</sup>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直言领导者，其胆识决不逊色于战场上那些铁骨铮铮的硬汉！

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被人们称作“郭大个子”的郭述申。

当时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皖西北道委抵制在内部肃反上的错误做法，反对乱捕乱杀。省委在鄂东北将留学苏联的干部胡正明指为“反革命”而错杀后，责令郭述申将其在皖西北工作、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的爱人夏玉华处决。郭述申立即进行细致的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与丈夫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工作很好，是个好同志，便没有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

保护一个同志比杀害一个无辜不知要多冒多大的风险。

1934年4月，郭述申又遇到棘手的难题。省委派到皖西北道委的巡视员，凭借用逼供得来的所谓证据，指出皖西北道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等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他们逮捕。道委书记郭述申对此坚决反对。于是，1934年9月28日，省委召开了第四次党委扩大会，作出了《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指责郭述申在苏区“没有执行扩大红军、肃反、整理地主武装、改造苏维埃的任务”。在这四条罪状之外，特别指出他“对工农出身实际做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情的吴宝才、江求顺、高开文、曾照瑞等，也以为是老干部姑息留念（变）”，“只看到刘德利打仗勇敢而认为他是好干部”，“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等等。

最后，会议认定“郭述申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当然，让这样的“危险”人物担任领导是不可能的。郭述申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被撤销。

所幸的是，郭述申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而未被当成“AB团”什么的遭到杀害。他走完了长征路，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长征回忆资料。

是因为红二十五军需要马上转移无暇“深究”还是念其革命有功？还是另外什么原因？



那些被郭述申冒险保护过的一批同志后来处境怎样？会不会因郭述申被撤职而再陷囹圄？

这些历史之“谜”大概不会引出人们太多的关心。因为比较那个“老三”便是“第三党”的战士，他们或许是“肃反”中的“幸运者”！

### 三 死亡档案

红二十五军的几次“肃反”中有多少人遭诬谄而死？擅长考据的历史家对此恐怕也是无言以对。这已是个“无解”的简单方程式。

历史无法复原，但这不等于人们可以不尊重历史，不去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红二十五军“肃反”的教训太深了，也太残酷了。不少人尝试着为死者建立一种档案，虽然算不上是为冤魂“昭雪”，至少也以告慰那些不幸的人们。更重要的，是让现在的人们懂得历史，把握今天，瞻望未来。

但治史者心里明白，“这是枉然”。大多数被“肃反”掉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像昙花那样一闪而过，无人会知道他或她来自何方，姓甚名谁，他们至死也没有指望谁会为他们洗去不白之冤。徐海东亲眼目睹的那个被师政委吊起来拷打的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算得上“侥幸”死去，因为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念念没忘记他，说他刚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皖西北少年共产主义道委宣传部长。

这算是徐海东比较了解的。但只知道他姓朱。后来的历史书上谈到此事时，又在“朱”字前加一个“小”字。他叫小朱，临终时还喊道：“我不是反革命！”直到枪响之前，他还一直不断地

呼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sup>①</sup>

徐向前在回忆白雀园肃反时说过：“……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

能为有名有姓的建立起档案吗？恐怕鲜有人敢包揽下来。

还是从几个最知名的将领着手吧。这决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每一位从事红二十五军历史研究的学者唯一可行的选择。

在这些将领中，刘士奇是较早被错杀的一个。而关于他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记载却又少得可怜。

刘士奇，湖南岳阳人，生于1889年。192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勤奋工作和忘我的斗志使他迅速脱颖而出，1926年就升为中共岳阳地方委员会书记。一年后又到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以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中共九江市委书记的身分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29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秘书长、特委书记。1930年初任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后任中共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委员、常务委员，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1年，刘士奇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初期，担任红军东路游击司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时曾致信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斗争。张国焘信中特意提到了刘士奇和徐海东……

不久，皖西北革命武装在金家铺河滩召开大会，成立了二十七军。军长便是刘士奇。他率部于东线艰苦作战，对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做出突出贡献。

然而，就在刘士奇率红二十七军主力开赴鄂东北找中共鄂豫

<sup>①</sup>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皖省委汇报工作及与各主力团会合时，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在东线作战经过时的情况汇报，而是听信了片面的反映，对军长刘士奇作了错误处理。1933年初“肃反”中将其错杀。

军长的职务免了，脑袋掉了。但始终查找不到他被错杀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等方面的材料，刘士奇的一生，永远成了一份无法完整的历史片断。

但在他的历史中，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对死者，这也许是他牺牲前的最大期盼，对撰写《刘士奇传》的学者，成了绝对不会忘记、舍弃的神圣的档案资料。

在红二十五军第二次肃反——七里坪战役的“肃反”中，有一批领导干部被错杀：

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

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

独立第六师师长叶启文

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

……

在这一连串将领的名字下，廖荣坤的历史最“清楚”。我们曾在“第一章”中点滴介绍了他率领红二十八军英勇作战的事迹。

他，是员虎将。

廖荣坤，湖北麻城人，生于1903年。1928年入党。从此，开始了他艰苦的斗争历程。

1927年他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在敌人的围攻下，起义部队被迫撤离黄安。廖荣坤当时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快枪队队长，他右手挥舞大刀，左手提着驳壳枪，杀出一条血路，护送部分伤员安全转移到木兰山。在这里，突围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共3个队，廖荣坤任二

队队长。

1928年4月，经过血战黄安和围战木兰山的第七军，重返黄安地区，创建了以光山县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不久，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全师4个大队，廖荣坤任第二大队队长。1929年6月，中央军委派徐向前到红三十一师担任领导工作。从此，廖荣坤在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尤其是在粉碎敌人的“罗（霖）李（克邦）会剿”中，廖荣坤身先士卒，立下战功。在庆功大会上，徐向前连声夸赞坐在身边的廖荣坤“打仗很勇敢，是员虎将”。

在接踵而至的第三次“会剿”——“徐（清泉）夏（斗寅）会剿”中，由于对敌情把握不准，红军部署张口太大。为避免硬拼，徐向前命令迅速撤退。当部队撤回到老君山的油榨湾时，不见了师长徐向前。这可急坏了战士们，哭的，喊的，互相抱怨的……徐向前又初到鄂豫边，人生地不熟，连与人交谈都需要靠“翻译”，这可麻烦了。廖荣坤自告奋勇，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漆黑的山野中摸索着前进，终于找到了徐向前。

徐向前后来回忆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时始终没有忘记廖荣坤：“……我带了一个队在正面打，敌人的火力很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两翼的部队也没占到便宜。敌人开始反扑，部队撤退，最后连小号兵也撤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近在咫尺，幸好天已擦黑，我就趁机往外跑，敌人在后面追。那时我腿部的伤势未愈（是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的），跑也跑不快，见前面有片林子，往里一钻，敌人找不见，乱打了几枪，就回去了。我坐在林子里，腿疼得厉害。廖荣坤同志带了几个人来找我，才把我接回去。”<sup>①</sup>

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合编为中国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3～84页。

革命军第四军。廖荣坤被任命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

红四军成立后不久，在徐向前的亲自指挥下终于攻下了新集。

新集是大别山区一座古城，三面环山，东临潢河。早在清末就筑好了坚固的城墙——全部由长条石砌成，高7米，宽2米多。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反动堡垒。守城的民团和“红枪会”借助有利的地理条件死守新集。

红军连续攻城7天都未成功。

廖荣坤和三十团团团长王树声反复研究后，提出了“坑道爆破攻坚”的作战方案。廖荣坤还亲自担任爬城突击队队长。

“轰隆”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城墙被红军利用“坑道爆破”炸开了一丈来宽的缺口。随着响亮的冲锋号的呐喊声，廖荣坤率领120多名突击队分东西两路迅速攻进了山城……在夜幕降临时，新集战斗胜利结束。

从此，新集成为鄂豫皖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今天的新集（即河南新县）仍保存有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及鄂豫皖军委航空局的旧址。这里宽敞的街道，高大的建筑，把这座古城点缀得异常壮美。城东南山头高耸的烈士纪念碑，时时在提醒人们回顾那战斗的岁月。……

1932年5月，廖荣坤调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长。接着，他奉命率部攻取淮南重镇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安徽省寿县西南部，淮河、淝河、颍河的汇合处，素有“七十二道归正阳”之称。它既是南来北往的水陆码头，又是四方客商聚散之地。这里有敌人重兵把守，在关外的河堤上，敌人架有3挺重机枪，威胁很大。

廖荣坤并非只会舞刀弄枪的上将，而是一位善于用脑排兵布阵的将领。根据敌情，计上心来。决定采用内外夹击的战术，奇袭正阳关。

太阳冉冉升起，淝河水闪着银光。河面上远远驶来大片帆影。

当河堤上的敌人发现红军准备抵抗时，身旁那些卖柴的、卖草的或逃难的突然抛下担子，拔出短枪，一齐向守敌开火。等敌人明白过来这些“难民”的真正身分后，3挺重机枪已成为红军的战利品，他们也已成为阶下囚。这时，已潜入城内的“难民”也露出了真正面目，城内城外互应，迅速占领了正阳关。

正阳关解放了，红军未伤一人，歼敌400余人。红二十五军威名大震。从此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五月里来大麦黄，  
红二十五军到正阳，  
打一仗来胜一仗，  
打得白匪喊爹娘。

翌日，廖荣坤又指挥七十五师乘胜向霍丘进发。霍丘城守敌被廖荣坤的“虎威”吓破了胆，闻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进入霍丘，接着，红七十五师前锋直抵金桥，威胁合肥，南京大震。逼迫蒋介石亲自出马，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的大举“围剿”下被迫撤离。在向皖西转移时，廖荣坤奉命指挥七十五师和七十四师一部阻击敌人。面对敌人11个团的兵力，他沉着坚定，果敢指挥，激战13个昼夜，毙伤敌3000余人，掩护了主力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根据地向西转移时，廖荣坤在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后留了下来坚持鄂豫皖的斗争，并组建了红二十八军，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33年4月，廖荣坤率领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整编，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接着，他和吴焕先等一起指挥部队取得了潘家河、杨泗寨战斗的胜利。

廖荣坤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针对鄂豫皖省委的“左”倾机

会主义和在革命队伍内部大搞“肃反”，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省委主要领导人非但不接受他的意见，还以“对抗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攻占中心城市的决议”为罪名，诬指廖荣坤是“反革命”、“改组派”。

1933年5月，年仅30岁的优秀指挥员廖荣坤在黄安七里坪龙王山惨遭杀害。

被徐向前誉为“虎将”的廖荣坤，像一颗突然坠落的流星，从他热恋的热土上悄悄地消逝了。

随之而来的，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受珠连，被秘密处死，不少人也神秘地“失踪”了……

很多红军将领讲到“肃反”时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人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后就没影了。

“冤死不如战死。”要打仗了，被关押的“内部敌人”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就是死也要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

徐海东因顶撞省委书记被推出会场后，一度也想当个“烈士”。他回忆说：“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句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是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〇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衩，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

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sup>①</sup>

饱受委屈的徐海东充分体验了被冤枉的滋味。在以后的两次“肃反”中他曾试图保护那些无处可伸冤的人们，但在“特派员决定一切”的“肃反”年代里，连徐向前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子程训宣，徐海东又能有多大的作为？

按徐海东生前回忆，红二十五军第三次的“肃反”发生在1934年4月（阴历）月上旬，红二十五军打罗田后，仍转回僧塔寺，又经前后畈、汪家大湾到达赤南三区老姜湾一带<sup>②</sup>。这次“肃反”限制在原红二十八军内，即1933年阴历9月上旬由徐海东和郭述申在皖西苏区领导的那支部队。“肃反”的理由是省委和军的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支部队未经整训，没有肃反，政治不纯。从此即开始肃反。对这次“肃反”中无辜被害的情况，由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根据徐海东生前的回忆整理出来，刊登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集上。内中有这样一段：“先后把原红二十八军营以上的干部都逮捕起来，除极少数幸免外，全部被杀害。部队行动到霍山、团山，省委和军的主要领导人又说八十二师也要肃反。徐海东说：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我不太熟悉，政委江求顺是雇工成分，在东路游击红二十七军任三团政委，还任过三路游击司令，该同志忠诚勇敢。有一次三个地方的联保主任在东西莲花山开会，江求顺带人晚上求搜，将反动派十七人全部杀掉了。这两个同志不像是反革命。军领导责问徐海东：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反革命？你说不是反革命就要你去捉。省委领导人都同意徐去捉。徐海东说：既然省委要我去捉，我就去。八十二师有八百多人，听说老军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当徐海东宣布他们师长、政委是反革命时，同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5～27页。

<sup>②</sup> 《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页。



志们都把头低下去。林维先、江求顺站起来，自动交出手枪，把手背在后面，叫徐海东捆。徐海东说：不用不用，跟我走就是了。到军部时，有的领导人还说：你对反革命还很宽大。徐海东忍不住气说：他们没有跑掉嘛！要跑了，我负责。当晚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江求顺杀害了。”<sup>①</sup>

林维先不久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罚做苦工。

徐海东始终未能也无法“负责”江求顺的生存。

从有关介绍江求顺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发现了江求顺被处死的原因也与围攻七里坪有关。

当省委主要领导人提出“要集中红军攻打敌人占据的重要城镇”时，曾命令在皖西江求顺的红八十二师西进参战。江求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七里坪是错误的，坚决抵制了省委的错误决定，没有攻打七里坪，继续留在皖西开展游击活动。

七里坪战斗失利后，江求顺又向省委建议，不能再搞军事冒险主义。谁知江求顺坚持正确主张，而且这种主张已经过战争失利证实了反倒招来了杀身的横祸。

1934年7月，鄂豫皖省委代表来皖西北，用逼供信得来的证据，诬陷江求顺是“改组派”、“反革命”，撤销了他红八十二师政委职务。这位曾为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轻将领，尽管蒙受极大冤屈，仍对党忠贞不渝。他不能指挥打仗了，就拣最苦最累的活干，挑米，担水，做饭，打柴，从无怨言。他在战斗中被打散了，拖着绑缚他的绳索又找回部队。1934年9月，江求顺被错杀于赤南县老姜湾，年仅25岁。

直到1983年，江求顺死后近50年，经党中央和安徽省委批

<sup>①</sup> 《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第474页。

准，给江求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皖西六安县黄家庙横店子（现徐紫区分路口乡）——江求顺的故乡，才增加了一位早已“光荣”的烈士。。

按徐海求的回忆材料，第四次“肃反”仍然发生在皖西。时间是1934年8月（阴历），部队驻扎在古皮冲到南溪北一带。从回忆材料中我们又找到了一批死亡者的名单：游击司令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一路游击司令朱世金、二路游击司令杜老虎（杜昌甫）、赤南保卫局局长曾兆瑞等<sup>①</sup>。

皖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1977年，中共安徽省委听取在皖西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革命前辈的意见，指示六安地委组织力量，编写皖西革命史，修建纪念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征集的革命史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极为严重，所以从1978年初开始，集中力量广征“死资料”，抢救“活资料”，经过核准和精编，共用了5年时间，写出《皖西革命史》征求意见稿，后经四易其稿，两次统编，本书终于发行。作者用辛勤的汗水凝聚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皖西北后来“肃反”的情况和死亡者的部分名单：“郭述申被撤职以后，省委派来的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于1934年9、10月间，将许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有丰富斗争经验、有才华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加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其中除吴宝才、江求顺两位领导人外，还有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生及其师政治部主任萧新甫、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夏玉华（女）、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前相、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赤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文炳等。仅在熊家河和南小润两次开会时，就逮捕了100多人，先后处决几十人……”<sup>②</sup>

<sup>①</sup> 《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第475页。

<sup>②</sup> 《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sup>①</sup>

一大批红军领导干部和许多基层干部被无辜杀害，不仅造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严重缺乏，造成了许多人宁愿当战士不愿当干部的恐慌局面，而且削弱了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的威信。1934年5月22日《鄂豫皖苏区刘士杰关于红军和苏维埃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披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红二十八军里及地方支部介绍某群众入党或入团时，群众都说：我们不要加入党团，我入党也是革命，不入党也是革命，……你看加入共产党的完全是第三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完全是AB团。因为肃反所杀了的大半是党团员，……所以使群众又不敢加入党团。去年7、8月间，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党团完全解散等，因党团内的第三党、AB团太多了，使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是什么，……把整个的七十五师党团解散，使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失去组织关系。”

“肃反”使党失去了领导干部，失去了党团组织应有的群众组织，失去了威信，失去了根据地，失去了无法用言语表达清的许许多多。

当然，不能忽视另外一种可贵的东西没有丢失：忠于革命事业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及根据地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仍然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地同敌人战斗。有不少被诬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的干部战士被罚做苦工，但始终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不曾脱离革命队伍。有些被看押的同志，在战斗中被敌人冲散以后，仍像江求顺那样千方百计地返回革命队伍中来。他们被宣布释放时，第一个要求就是发给他们一支枪，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其中有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这种精神足以动天地、泣鬼神。

这，也是一种死亡，是一种带着“获释”后从未有过的自由感与真正的敌人交战后的壮烈牺牲。战士们在快活和幸福中死去，没有半点遗憾和悲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得悲壮、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这，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值得更加珍惜的死亡档案。它永远会熠熠闪光。

#### 四 逼上老君山

1933年7月。

大别山区笼罩在层层烟云之中，天阴沉沉的，一点风也没，整个大地闷得像个蒸笼似的。疲惫、饥饿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自6月13日从七里坪撤围后，日日夜夜，风餐露宿，辗转到光山、麻城、商城交界的山区中筹集粮食。这些天来，干部、战士的脸也像天空一样阴沉，队伍里没有笑语、更没有歌声。指战员围攻七里坪之前那种高昂的士气、饱满的情绪，几乎都消失殆尽。有人叹气，有人埋怨，有人指天骂地：

“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开晴？要把人闷死了！”

“唉，真想吃点……”

在围攻七里坪的43天里，整整一个军中伤亡、逃跑、饿死的加上肃反扩大化被关押、枪毙的，损失超过一半人。如今剩下的这些人当中，又有大量的战士患了疾病。每个连队几乎大部分人都抬担架，照顾伤病员。许多抬担架的战士脚板溃烂，走路一

扭一扭，瘦得皮包骨头……

军人也同样要以食为天。部队开始了边“打粮”、边打仗、边恢复体力、边疲于奔命的艰苦斗争。

为了打粮，按照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首先攻打光山县南的沙窝集。这个粮食比较富足的小集镇，自从被敌人占领后，里外筑起好几道工事，防守相当森严。红军拂晓发起攻击，接连几次都未奏效，并且伤亡战士数十人，不得不撤出战斗，转向商城县境。数天以后，又转到七里坪西南、黄安以东和麻城福田河地区。这种疲于奔命的群体“打粮”活动，不仅会遇上无粮可筹的局面，而且要与敌人浴血奋战！

好在到达福田河地区，郭述申带领的红八十二师由皖西北来到鄂东北，寻找省委报告工作。两支艰苦作战的红军队伍，在福田河畔携起手来。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正酝酿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敌人向鄂豫皖苏区的第五次围攻又步步逼近了。

由于“清乡”、“清剿”均未得逞，蒋介石遂于1933年5月初任命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调动的总兵力为14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10万余人。地方武装2万余人。

1933年6月5日，刘镇华将总司令部设于河南潢川县城，以潢（川）麻（城）公路为界把根据地划为东、西两区，首先进攻鄂东北地区，即所谓的“西区”。企图首先摧毁鄂东北革命根据地，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然后转移兵力，再吃掉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此，仅在西区就布下了8个师又4个旅共53个团的兵力，并加紧修筑碉堡，运集粮弹，编练民团，杀气腾腾地叫嚷：一举消灭豫鄂皖共军！

动用10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合围6000余人的疲惫之军，蒋介石也真舍得下赌注。中国史书上有不少这样的战例，一概名之曰：兴师动众。

新的战事又要出现了。但鄂豫皖省委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敌人的又一次大“围剿”。

“兵败七里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人们才可以这样冷眼相观。可在当时叫“七里坪——撤围”，看不出“败”的痕迹和影子——至少从字面上可以这么说。

“兵败七里坪是‘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必然结果。”当代学者可以这样坐而论道，可当时的决策者无人愿意也不可能承认这一事实。相反，头脑继续发烫，“左”倾幼稚病仍顽固地存在和表现着自己。

7月1日、2日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因为派往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的邵达夫返回了鄂豫皖，有必要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会上，邵达夫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给鄂豫皖苏区党省委的信》，通过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我们曾指出了中央3月15日指示信出台时的背景。这封信迟至8月2日收到。

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要求省委要明确当前的中心任务，即：“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地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的敌人，将这一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所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和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进而恢复和联结豫南、皖西北的整个苏区向前发展。”

在指示信中还告诫：“目前最大的危险——决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是不愿爽爽快快地依照一定的计划，配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

七里坪战役的失败，省委本来就没有认识其中的原因和严重

恶果，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虽然是口头传达），使省委更加无视现实。即使看到了敌人要进家门，“刘镇华来了以后，正在极力设法布置新的进攻”<sup>①</sup>，但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对鄂豫皖边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认为新的进攻是以“破坏苏区秋收为主要目的”<sup>②</sup>。

省委甚至乐观地认为“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了相当的巩固”<sup>③</sup>，“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sup>④</sup>，加之全国“反帝运动、工人斗争、灾民斗争、民族斗争和红军的胜利，这五个力量的汇合，将要使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完全崩溃，中国革命走向全国暴动形势”<sup>⑤</sup>。

基于这种形势分析，省委明确指出：“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

省委也“爽爽快快”地制定了行动计划：

“要执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全力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

“要在苏区内大大修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

“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等原始武器对外”；

……

错误的形势分析和采取的这种内线单纯防御来保卫根据地中心区的错误作战方针，使大伤元气的红二十五军又而临新的危机。

无独有偶。这时的中央根据地，面对敌军 50 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也同样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

① 《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八号》1933年7月5日。

②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3年7月9日。

③ 《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八号》1933年7月5日。

④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3年7月9日。

⑤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33年7月9日。

节抵御、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

历史，再一次把红二十五军拉到了坎坷的关头。

敌人自认为兵多将广，粮草齐备，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时日，选择路向举行进攻。

近一个月的准备，刘镇华终于踌躇满志地坐镇新集，指挥着各路部队向鄂东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7月17日。

各路军队如同棋盘中的棋子，刘镇华摆了又摆，放了又放，脑子中总闪现出前几次“围剿”损兵折将的阴影。最后终于咬咬牙，确定：

梁冠英第三十二师由光山陡山河向南，新调到鄂豫皖地区的刘茂恩第六十四师、刘镇华第六十五师由新集向南，齐头并进；

彭振山第三十师由麻城谢店向北；

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由骑龙寺、福田河一线向西。

这四支部队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

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万耀煌的第十三师、李敬明的第三十一师等部队的任务是加紧“清剿”与防堵，“勿使一人漏网”。

敌人“围剿”开始时，红二十五军仍在福田河地区加紧筹粮。无论战局怎么变化，部队总是要吃粮的，七里坪之围就是铁证。在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也认识到“积蓄粮食计划之未能实行，将影响到红二十五军不能打破敌人新的进功，决定无论如何准备一月之粮”<sup>①</sup>。

“大军未到，粮草先行。”这似乎已成了军事战争常识。七里坪之围，作为历史悲剧的一场序幕，也许由于刚刚揭开来，省委已预感到“粮草”会给这场新的战斗带来的影响，而这次战斗的

<sup>①</sup> 沈泽民 1933年8月2日写给中央的报告。



中心任务又是“保障秋收”，同样也是为了粮食！粮食已成为中心苏区能否巩固与存在的命脉！然而，怎么才能在这片山区中筹集“一月之粮”？为了“保障秋收”，现在所筹备的粮食，又能维持多久？距离中秋时节，至少还有两个月，能不能坚持到稻谷成熟？根据地内的粮食，到底能支持多少日子……粮食问题牵动着红二十五军每一位领导、战士的心。

筹粮计划正着手实施，刘镇华已率部猛扑过来。

18日，敌第六十五师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光山南部的双山门，逼近省委驻地——太平寨；

19日，敌第三十二师占领郭家河；

同一天，敌第六十四师占领观音寨。

太平寨告急！省委一面命令两个独立师等地方武装从正面阻击敌人进攻；一面命令红二十五军立即赶回太平寨，坚决保卫中心苏区。

20日，红二十五军疾行赶到太平寨时，敌第六十五师已推至双山门西南的王家湾。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王家湾以南的陵牌石与敌第六十五师一九五旅展开激战，杀伤敌700余人，击伤敌旅长马祺臻。但未能将敌人击退，红军也伤亡500余人。

22日，敌第三十师突然占领长冲，并向檀树岗进犯。在此紧急时刻，红二十五军又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奉命调动南下，抢占长冲以东的光字山阵地，阻击敌三十师的进攻。经过几次激战，毙伤敌400余名，也未能将敌人击退。

几天之内，部队忽北忽南疲于奔命，两头设防抵御，首尾难以相顾。鄂东北境内的几块中心区域大都被敌人占领，根据地危在旦夕！尤为严重的是，好容易筹备下的一点粮食，这时已吃光耗尽。粮食断绝，只得撤出战斗，部队不得不转向麻城北部董家畈一带，在福田河等地首先解决吃饭问题。

盛产粮食的福田河，经过红军几次“打粮”之后，加上反动武装顾敬之民团的搜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在此筹粮，势必要发生“与民争粮”，侵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经过再三考虑，部队绕开福田河，忍饥夜行，到两路口以东和以西的王家山、纯阳山、齐头山一带打粮。

两河口是个位于福田河上游的狭谷小镇。东西两面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粮食出产很少，老百姓也相当困苦。南面，距离福田河虽说只有20余里，但就地理条件和粮食出产，完全是两种不能比较的天地。北面一翻过小界岭，便是粮食富足的沙窝集，相距40余里的路程。但七里坪战役后打过一次没有成功，决不是轻易可以“打粮”的去处。无奈只能奔走于东西两面的山湾村寨，向老百姓筹得一些吃的，暂时填填肚子而已，好不容易筹得少许麦豆杂粮，因为缺少碾子石磨，仅凭老百姓家中的几个石臼，实在难以应付。饿急了，等不得脱去皮壳，只好煮吃整食。有的连队弄到一点小麦，又没铁锅蒸煮，就找几口瓷缸，就地架火烧煮。麦粒刚刚膨胀，还不曾熟烂，瓷缸“嘣”地一声炸裂……战士们把半生不熟的东西吃下去。许多消化不良的同志，吃下去什么，拉下来的还是什么。加之部队多在高山野外露宿，白日里烈日曝晒，晚间寒冷袭人，雷雨又多，患病者与日俱增。<sup>①</sup>

下一步怎么办？全军几千万人马，全部一窝蜂似地拥在高山狭谷地带“打粮”吃，即使不被敌人“围剿”，也会活活饿死。

就在这里，因饥饿劳累过度的军长吴焕先第一次病倒在担架上。病中的他，想起了在皖西的郭述申。

在福田河畔会师时，吴焕先曾紧紧拉着郭述申的双手，问起皖西北那面的斗争形势，包括燃眉之急的粮食问题。“郭大个子”对他讲过，皖西北“吃”的问题要好解决一些。两年会师后，在

<sup>①</sup> 卢振国：《吴焕先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福田河西南的黄土岗一带，将来犯之敌第五十四师一六二旅的所谓“钢三团”、“铁四团”（即第三二三、第三二四团）全部击溃，歼其一部，毙其旅长郭子权，红军战士士气为之一振。战后，郭述申率领红八十二师又返回皖西北……

“不能守在一棵树上吊死！”吴焕先向省委讲明了自己的观点：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全红军力量，把部队拉到皖西北去！

但是，省委仍坚持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决不能丢弃鄂东北根据地，而且提出了“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再次表明了他们的绝粮情况下坚守根据地的立场。这里不妨摘抄几段：“……红二十五军转到福田河至两河口一带来了。我们的目的本来是打到10天左右的粮食，即回苏区一战！可是打得的粮食只够红军吃两天的，所以现在全军只得驻扎在两河口以西的纯阳山、齐头山一带继续打粮，……”

“再过许多天，谷子熟了，我们的粮食困难到处可以得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只要鄂东北党与苏维埃政府能够坚决领导群众艰苦奋斗，度过现在这个难关，就逐渐转到比较优越的条件，可以重新争取中心苏区的巩固。

“根据这种形势，我们决定红二十五军行动的总方针，认为在这个时期之内，到皖西北是不相宜的。到皖西北去的行动，可以得到军事上的胜利和解决红军给养，但政治上将使敌人能够从容布置在鄂东北苏区树立白旗，……”

“我们的粮食，今天已经完了，明天又要去打粮食。”

此信写于是年8月1日，署名沈泽民、戴季英、高敬亭、吴焕先，信是以“我们”的名义写的，吴焕先的名字排在省委成员的末尾。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吴焕先只能服从省委多数成员的意见。

两天后，即8月4日，沈泽民在写给留在中心苏区的紫云寨的省委成员徐宝珊、成仿吾、郑位三的信中，仍不乏这样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打不到粮食，现在又想另找地点……否则，对于我们实行原定的战略，当有重大损失。目前最重要的是……弄得一月或半月之粮。”

粮食，还是粮食！在贫瘠的两路口一带筹粮计划落空，红二十五军又回到了中心区，辗转活动于光宇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等依然是无处食宿的大山上。在此期间，地方苏维埃曾采取与群众订立契约的办法，将群众之部分稻田归红军收割，但数量上少得可怜，难以满足红军需要。军、民都是“以食为天”，军队还要“以民为天”，决不能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为此，部队每天总要派出一部分远到桃花镇以至宋埠附近筹粮，亦不过日得一餐。因为打粮而造成的战斗伤亡、失散、掉队或中途病倒的也越来越多。“屋漏偏遇上连阴天”。连日大雨，饥困交加，生病者占半数以上。鄂豫皖省委后来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沉痛地诉说（大意如下）：军长吴焕先、军政委戴季英之病未愈，而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引者注）又病，副师长兼团长黄绪南同志带彩未愈，营长病者亦多人；七十五师三个团的团长、团政委病者也占半数，各级干部病者亦多人。……战士每天打粮一次，沿途分队，到天明集合时能收队，每次病及失散多至一二十人，队伍锐利的缩小，实走向瓦解前途。<sup>①</sup>

雨，越下越大。雷声在战士们的头顶上响着，震动着每一位战士的心。红二十五军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新的危机又悄悄走近。

8月中旬，刘镇华以3个师的兵力，再次向红军发动围攻。红二十五军准备固守，又腹背受敌。退到紫云寨，再退至大小坳口，敌人继续逼来，被迫撤出鄂东北中心区，转移到了太平寨。

太平寨，不太平。至少没让这支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败下来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1933年11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的部队太太平平地住几天。部队在这里还未曾缓口气儿，敌人又很快合围上来。无奈又被迫向东转移，再次来到福口河附近。26日夜，经由福田河以南松子岭、张家店之间越过潢（川）麻（城）公路，向反动民团总领顾敬之盘踞的“亲区”行动。

“亲区”亦称“二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南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这里省委仍想尽量不远离鄂东北中心区，打算就近筹粮，休整部队，“而图再举”<sup>①</sup>。可是为了筹粮，部队只好不断向东转移，边行军，边作战，边筹粮。31日，当部队进至商城南部的长竹园附近分散筹粮时，因临时改变宿营计划和组织掩护不力，遭到顾敬之部的截击，又受到很大损失。

近半个月的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结果还是把中心区丢了，部队减员达1500余人。大势已去，省委被迫决定暂回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这时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虽然也处于敌人重兵“围剿”之下，但仍保留着一块方圆百余里的地盘，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几座互为依托的中心集镇，依旧在我手中。红八十二师自7月中旬由福田河地区返回皖西北后，坚持正确的方针，同地方武装一起积极开展游击战争。8月17日，向以打仗勇敢著称的年轻师长刘德利，指挥红八十二师和三个地方游击师，在史家河边打了个漂亮的“断粮仗”。截获敌第十二师两个营押送的70多对毛排的军需给养，战斗中歼敌一个多营，缴获大米140多万斤及大批物资。接着，又在石八地截击敌运输队，缴获大批被服等物资。军队士气高涨，群众情绪稳定。

9月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南溪，与红八十二师又一次会合在一起，当地群众也热烈欢迎自己队伍的到来。这些使省委书记沈泽民感触很深。后来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讲道：“皖西北对于红二十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1933年11月10日给党中央报告。

五军的去，是异常热烈欢迎的，双河、南溪一带群众闻二十五军之来，送饭者云集，使二十五军连吃饱饭，绝对不愁粮食。这里群众对二十五军欢迎之情形，迥异于黄麻群众对二十五军之态度。”<sup>①</sup>

刘镇华发现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北境内，遂将前线指挥部从新集东移沙窝集，并将第五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二二三旅、第六十四师一九〇旅由鄂东北调至皖西北地区，同时调第六十五、第六十四师一部进至潢（川）麻（城）公路北段，第三十一师进至南段，严密封锁公路，切断红军西归之路。9月10日，刘镇华亲自率领大军兵分四路，向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进犯。刘镇华作了周密安排：

第四十五、第七十五师由北，第五十四、第六十四师由西，第四十七师由南，第七、第十二师由东。从四面八方合围，发誓要把红二十五军“困死在皖西北”。

面对敌人的围攻，省委依然高喊“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决定以第七十四师在南溪东北之桃树岭一带构筑工事，正面抵御敌人。

这种布置还是那种被称为“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

9月13至23日，红军在中心区内的双山河、南溪、瓦屋基、汤家汇等地，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经反复冲杀，虽然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难以扭转危局，只得于23日撤出汤家汇，向南转移。

前后才十几天时间，敌人就占领了双山河、汤家汇、南溪、关王庙等地，皖西北根据几座重要乡镇终于陷入敌人之手。

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宣告失败。

省委书记沈泽民在这紧要关头也病倒了。

9月26日，沈泽民抱病躺在担架上，于大埠口附近召开了省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

委紧急会议。省委根据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沦陷，敌人主力转移到皖西北，鄂东北之敌减至5个师等情况，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会上，对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第七十四师由3个团缩编为3个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分别编入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全军两个师只剩下3000余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中心苏区保卫战，兵员又损失过半。5个月之内，红二十五军由潘家河战斗胜利后的1.2万余人，到七里坪之围失败后的3000余人，而今扒拉来扒拉去，清点一下人数，成倍地减少，怎不让人伤心。

9月27日，这支3000余人的队伍又一次冒雨翻山，踏上奔赴鄂东北的坎坷征途。

这时的刘镇华洋洋得意起来。他似乎猜透了红二十五军领导的心思，早把红二十五军的退路切断，并布下口袋，等待着这支队伍来钻……

9月29日夜晚，红二十五军到达福田河以南的石香炉附近。发现南至黄土岗、北至两河口一带，全部布满了敌兵，难以越过潢（川）麻（城）公路。部队隐蔽了一天，遂改向黄土岗以南运动，伺机穿过公路。

黄土岗以南地区，是敌第三十一师张印湘部的防地，有两个旅的兵力在这里严密把守。

10月2日，红二十五军借着黎明前的昏暗，从黄土岗至四道口之间强行通过公路。敌第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以猛烈火力，实行封锁阻击。沈泽民、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第七十五师大部、第七十四师一部共2000余人，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穿过公路以后，天色已亮。这时，敌人忙又调九十二旅协同九十三旅，从南北两面实行夹击，无法再突破封锁线。徐海东及后续部队，还有全军大小行李挑担，都被敌人阻于公路东面。徐海东回忆说：“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

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6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6个连队连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sup>①</sup>

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又被敌人截成两段，处境更为艰难！

省委和军部率领2000余人进至路西，连续打败敌人的追堵后，经董家畈、诸婆寨、凤到山等地，向紫云寨地区前进。10月7日，在紫云寨与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第七十三师会合。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皖西北期间，鄂东北道委将被敌人隔绝的两个营与独立第七师新编为七十三师，下辖二一七团、二一九团。目前这已经成为鄂东北的两个主力团。另外一个主力团便是通过黄麻公路时随军而来的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通过黄麻公路的七十四师部队也加入了该团。

这时，敌人仍占据着鄂东北中心区，但省委仍不面对现实，把敌占中心区的某些空隙地带继续作为中心区来“巩固”和“保卫”，并决定红军3个主力团在紫云寨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活动。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省委又决定3个团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四处“打粮”……

10月14日，敌人调集4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围攻。各路敌人首先对紫云寨中心进行了数日的“搜剿”，然后集中兵力向紫云寨发起猛攻。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9页。



由于分兵作战，这时留守在紫云寨的只有红二十五师二二四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紫云寨几乎是一座“空城”。

吴焕先率领这支队伍在紫云寨、高山岗一带与敌人恶战一天，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乘夜突出包围。随后，便经大小坳口、灯笼山、平头岭等地，被迫向老君山、天台山撤退转移。

耸立于鄂豫边界的老君山、天台山，座落在大别山脉的环抱之中，相距不过二三十华里。巍巍的老君山，海拔2936米。传说太上老君曾在此山冶炼仙丹，打制农具，故名“老君山”。此时的“太上老君”宫殿，已日趋衰落，残破不堪。相比之下，天台山比老君山虽说矮了几分，但景色宜人。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无人会遐想这美丽的传说，无人会注意这大山的景色。沿着两山之间的崎岖小道，朝老君山方向匆匆奔去。

“山”的意义已成为保存生命的处所。

在上老君山的途中，省委也逐步得到了分散作战的其他各团的情况：

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在姚家寨地区与敌人4个团辗转苦战，大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奋力突围以后，直奔天台山上而去！随该团行动的七十三师政委王少卿，被俘叛变……

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在紫云寨以北地区，经过连续苦战，伤亡减员大半，随该团行动的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图谋率部到七里坪投敌，幸被该团二营政委李世煌及时发现，即组织该营第五连和营部通信班将其就地处决！该团剩下为数不多的零散人员，也都奔上了天台山……

逼向老君山的途中，敌三十师彭振山部在其“作战详报”里讲：“匪首吴焕先率二十五军残余约千人，经敝师截击，向老君山方向窜去，……获匪首吴焕先乘马一匹，生擒匪少校医官一人，医疗器具两箱，……”

吴焕先有无“乘马一匹”，红军中有无“少校”之类暂且不论，

倒是战报中的有关红二十五军所剩人数以及行军路线没有什么差错。

至此，在鄂东北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 1 000 多人；党员只剩下 200 多人，党政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下几十人；紫云寨地区原有万余人的 3 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大批群众被屠杀；物力、财力被摧毁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

整个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形势空前艰难。这也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斗争最为艰难的时期。

“逼上梁山”与此相比，不知要逊色多少！

---

## 第三章 决胜千里

### 一 沈泽民抱病检讨

老君山以东的群山之中，有一条长蛇似的狭谷，弯曲的小河流水，由北向南悠悠而过。就在这狭谷的深处，有几座屈指可数的小山村错落其间。当地的山民们一般都把村子叫做湾子，诸如刘家湾、许家湾以及别的什么湾子。这里多以宗族姓氏为群落，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蚕吐丝、蜂采蜜、树结油”，这句远古传下来的歌谣又反映了在这偏僻的山村百姓们的自豪之情。这是大自然的赐福。时值初冬，“蚕吐丝”的日子早已错过，“蜂采蜜”的时节日渐冷落，唯有一年一次的“树结油”，正是果子成熟的收获季节。山坡、路坎、河边，大大小小的木梓树，经过几场秋霜打过以后，树叶纷纷飘落在地，枝头上剩下了一串串早已熟透的木梓颗粒……

国民党的几次“搜剿”，搅乱了这里的平静。山民们大都背井离乡，如玉似珠的野生木梓，一串串挂满了枝头，无人去采撷收获，干巴巴地被晾在那里。

木梓油是一种工业原料，据说，每百斤木梓，可榨取皮油（白油）、核油（红油）各20斤，用途颇为广泛。但在当时，山民们只能靠简单的手工劳动去榨点油汁，用以点灯照明。用梓油做成的蜡烛，被当时的人们用于年下祀神祭祖。

夜深了，远山、近水、丛林，全部笼罩在浓密的雾帐中，此刻，刘家湾东头二间低矮的茅草屋里，还亮着灯光。那是用破碗做成的梓油灯，碗口浸着油的棉花芯子，燃闪着豆粒般微弱的亮

光。

灯下有一位30出头、疲弱不堪的年轻人，手里握着一支钢笔，在一摞质地粗糙的发黄的毛边纸上，伏案疾书。

他，就是当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

我们在前几部分多次提到这位省委书记，这里系统地把这个人物介绍给读者。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1900年生。是文学巨匠沈雁冰（茅盾）的胞弟。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救国的工程师。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立志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救国之道。

据中共党史专家的考证，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组织中，就有茅盾和他的胞弟沈泽民。说来也巧，在17个人组成的上海共产党组织中，年龄最小的便是沈泽民，当时只有20岁。

沈泽民的党龄，应从1920年算起。算得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1922年5月，出席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春，到南京建邮大学任教，负责建立南京的党组织。1924年初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5年底，他和爱人张琴秋，先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随后，又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对于国民党的影响。

1930年10月，沈泽民回国后做党的宣传工作。1931年1月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关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事，1931年2月22日的《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中介绍说：“立三、

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亦退出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9同志，内中5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16人中10人是工人出身。”<sup>①</sup>

1931年3月，任职不久的沈泽民便接到中央新的使命，和张琴秋从上海乘火车到蚌埠，然后再乘船到正阳关，到达皖西北的金家寨，投身到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洪流中。

两星期后，张国焘也来到了鄂豫皖的金家寨。他对沈泽民的印象是：“沈泽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志。与我友谊较为密切，大体能和谐共事。他也许受莫斯科的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却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sup>②</sup>

张国焘把自己扮装成“矛盾”的解决者，这一点是否符合实际暂且不论。沈泽民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却是历史事实。他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曾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也曾积极参与了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专门提到了他：“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印本，第21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59页。

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同志说过这句话，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辩证的观点，看待同志，看待事物。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人，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或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依据，行吗？革命与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势必搞扩大化。”<sup>①</sup>

教条主义坑害了大批红军战士，错杀了许多红二十五军的杰出将领，也直接导致了七里坪战役的失败，鄂东北中心保卫战的失败、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以及鄂东北内线分兵活动的失败……

教条主义也害了他本人。

七里坪战役惨败后，红二十五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披星戴月，千里转战，但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重重围攻，只好且战且退。红军队伍越来越小，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游击区域越来越小。就在这个艰难时刻，由于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行军途中尽吃些树根野菜，沈泽民早已染上的肺病又严重地复发了。此次又染上疟疾，身体更加虚弱了。开始，他还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转移，并于病中主持召开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后来，病情加重，部队转移到老君山以后，把他隐蔽在这个外人很少知道的刘家湾养病。

现在，病中的沈泽民，正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起草一份《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这是两间极普通的农家草房。他住在里间，靠山墙一张旧木床，占去屋子一半，还有一张三条半腿的白木方桌和一把一坐吱呀直响的破椅子。桌角上放着一个棕色牛皮包，装得鼓鼓的，全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0页。

是文件和书籍。此外，除了一个破搪瓷茶缸外，陪伴着这位省委书记的就只有这盏特殊形状的梓油灯了。灯油是勤务兵在木梓树底下拣的颗粒，用石臼捣碎以后，从手心里一滴滴挤出来的。棉花捻子，还是从这位省委书记的棉袍袖头上，一丝丝抽出来的。

昏暗的灯光，将他瘦削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土墙壁上，越发显得瘦弱。刚到鄂豫皖时那白皙清秀的面色不见了，露出一副蜡黄的面孔。满脸的络腮胡子，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他一边巴嗒着抽旱烟，一边咳嗽。一旦咳嗽起来，半晌都喘不过气来。吐出来的痰里，都带着鲜红的血块。

他应该好好养养病。即使在那个缺医少药或者少医无药的岁月里，至少也应该躺一躺，恢复一下元气。

然而，他知道自己更为严重的病是“心病”。子是在咳嗽稍稍平息后，他便在灰黄色的毛边草纸上，首先写下了这样的“开篇”：

中央：

自从正月间邵达夫及二月间石健民同志带上报告以后，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已经经过了许多变迁。这些情形已详于此次交通带上的几个旧的报告，现在，把秋收中间的经过情形和苏区现状，再向中央作补充报告……

自从他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已经度过了近1 000个战斗的日日夜夜，这蕴含着血与火的岁月，有胜利和欢乐，也有失败与牺牲。鄂豫皖苏区的胜利和失败的教训，必须尽早地向中央报告！

这份由他起草的《鄂豫皖省委的报告》，落款日期是1933年11月10日，可实际上他从10月中旬就开始断断续续写作了。

他望望手中的长杆旱烟袋，愣了好一会儿。他原来有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时朋友送的。来

鄂豫皖苏区后，他一直把它同整天不离身的怀表视为心爱之物。不料前不久在一次转移途中，不慎把烟斗丢失了。他不得不让警卫员向老乡借了一根竹旱烟袋，但由于气力不足，抽不动，总是过不了瘾。但他的思绪却异常敏捷，继续写道：“党的工作，现在张国焘、昌浩都同红军离开苏区去了。留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委员只有沈泽民同志一个，中央分局的会已开不成了。这里还有省委，一些主要的干部还在苏区，所以经常开会，领导全盘工作。”

看着刚刚写下的这段文字，他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决定红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黄柴畈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沈泽民认为：反四次“围剿”，我军未能击退敌人，处处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现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

根据徐向前的回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他的意见。<sup>①</sup>

会议最后决定，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根据地。但沈泽民留了下来，由他负责带领两个师与各独立师团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是由于沈泽民的坚持，还是由于他坚持根据地游击战争的主张也有部分合理的因素？沈泽民留在根据地好像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本来，对于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沈泽民也是负有责任的。在敌人部署此次围攻红军之初，徐向前等人建议红军在连续作战之后应休整待敌。但却遭沈泽民的反对，决定南下进攻麻城。张国焘同意沈泽民的意见。1932年6月，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约30万军队向鄂豫皖扑来。对蒋介石这次空前规模“围剿”的严重形势，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军委负责人的张国焘，麻痹轻敌，未做好粉碎敌人进攻的任何准备。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0页。



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又惊慌失措，仓促应战，被动挨打。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决定退出根据地后，沈泽民仍坚持主力红军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的主张。沈泽民为此曾亲自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信，要他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信写好后，请省委成员传阅，在郑位三、成仿吾、郭述申、张琴秋等同志分别签名后，递交张国焘。张国焘对这封长信竟未予置理。甚至在沈泽民及省委、道委其他同志“无数次打电话去询问总方针之决定，亦不肯相告。直到退出金家寨，退到燕子河的策略已决定，才找泽民去，则木已成舟，大军已退出金家寨到燕子河一带”<sup>①</sup>。

想起这段往事，沈泽民禁不住气上心头。10个月前自己曾专门就鄂豫皖反四次“围剿”的情况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现在他要进一步理清张国焘错误的根源。他提笔又写道：“四次反‘围剿’一开始，国焘同志即动摇，以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说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失败情绪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根源……”

写到这里，他感到气闷，似乎有一团乱草塞在胸中。他拿起旱烟袋，狠狠吸了几口，又连锁反应似地大声咳嗽起来，咳得肺叶和心中一阵剧痛。

他搁下笔，让警卫员在外屋饭锅里烧了点开水，轻轻呷了两口。病情似乎未减轻。他抬起头，目光透过桌前的小窗口，投向屋外遥远的、黑沉沉的苍穹，思绪又拉到了红四方面军西去的那一幕。

那天中午，沈泽民遥望着渐渐远去的红军主力，满怀惆怅和愤怒。送别红军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人们默默注视着远去的队伍，

---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346～347页。

心情十分沉重，没一人言语，偶尔能听到一两句的哭泣声。

这一情景，使沈泽民的心都碎了。他仿佛看见苏区的革命群众被敌人排枪扫射的惨状，仿佛看见刀光剑影下苏区百姓被土坑活埋的悲剧……一时间，他胸中像压上一盘石磨，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部队撤离根据地的那天上午，妻子张琴秋来向他告别。这位和他多年患难与共的伴侣，从河口县委书记的位置刚调到王树声的七十三师当政治部主任，她将随主力西撤。临行前，她依依难舍地走到沈泽民面前，深情地说：“以后苏区更加艰苦，你还有病，留下来能挺得住吗？还是我们一起走吧？”看他沉默不语，她又接着说：“要不，我去要求一下，留下来陪你，你不能没人照顾啊！”

沈泽民望着那双熟悉的眼睛，十分坚定地说：“放心走吧！你在四方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应该服从命令，我们不能只为个人而误了党的大事。”最后，他拉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你走吧！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他哪里知道，这次夫妻间的短暂分离，居然会成为永别。

他也无法预料，红四方面军在西撤后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确实无法再圆“重返鄂豫皖”的梦。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国民党20万军队对鄂豫皖的“民尽匪尽”的政策。

形势极为严峻！面对这个残局，沈泽民义无反顾的挑起了重整旗鼓的重担。看着重新组建起的红二十五军，他有些情绪激动。平时讲起话来总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的他，一改那副慢条斯理的面孔，晃动着那个小烟斗，高昂地讲：“张国焘抛弃了苏区，我们就得死守住苏区，无论如何也不能当逃兵。创造这块苏区是容易的吗？流下多少烈士的鲜血？献出了多少生命？我们怎么报答这里的父老乡亲？我是省委书记，职业就是革命！我虽说是个书生，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也没有点滴实践经验，来鄂豫皖苏区后，一

直专做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可是，我的战斗岗位现在是保卫苏区，就是喋血战死，也不会离开苏区的土地！”

从此，他开始了新的创业。

这是一段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笑容也有眼泪的日子。

他依稀记得自己怎样和吴焕先等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一起商量对敌策略和行动方针，这时，没有争吵，也没有过多的争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红二十五军的大旗高高扬起在大别山上。

他清楚地记得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几个大胜仗。郭家河首战告捷！潘家河、杨泗寨战斗又传喜报。那时他站在山头阵地上，吸着小烟斗，望望那刚刚逝去的硝烟，看看这山青水秀的山镇，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色。

望望手里拿着的这根竹旱烟袋，沈泽民思绪万千……

刚刚兴旺起来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接到了中央新的指令，“要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一地区为第一任务”。根据这个指示，沈泽民迅速作出反映，并发布了《省委通告第一〇六号》，提出当前要进入“反攻时期”，以便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金家寨等一切城市”。

沈泽民头脑发胀了。根据中央的形势分析和指示，对照一下红二十五军接二连三的几场胜仗，沈泽民变得过于自信起来。由他署名的《潘家河的胜利》的政治宣传材料中，除了评述潘家河战斗的胜利意义、阐明反攻时期的军事形势任务以及敌军动态以外，最后着重讲了以下两点：

第一，要赶快扩大红军，使工农群众像潮水般涌向红军中去，补充扩大红二十五军，假若现在能够扩大到两万人，马上就可以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金家寨等一切中心城市；

第二，要准备大批的粮食，务必使广大群众晓得，要想收回中心城市，完全消灭敌人，巩固苏区和出出四次“围剿”以来的一

口怨气，就一定要把粮食送给红军吃，省下锅里的一把米给红军吃。

5月2日开始的七里坪之围就是在这种政治动员和政治口号下进行的。在战前动员会上，吴焕先、徐海东曾提出反对意见，沈泽民却振振有辞：“革命是不许可停止的，就是要进攻了再进攻，胜利了再胜利！不夺回失去的中心城市，就达不到恢复苏区的目的！”“中央的军事指令和指示信，有如春风吹人”，“行船遇顺风，就得赶快乘风使舵，破浪前进！”

按沈泽民的估计，七里坪一仗应该像风卷残云一样迅速结束战斗。但竟然双方阵地对峙了20多天。

他对此异常焦急，时时到前沿阵地巡视。虽然发现敌我力量悬殊，求胜不易，可是依然觉得最后的胜利属于自己，并一味地给军长吴焕先鼓劲说：“现在可不能泄气！如此对峙下去，能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

这样，又坚持了20多天。难以忍受的饥饿、劳累、疲惫，再加上战斗伤亡以及扩大化的“肃反”，全军人马损失过半，已经到了难以补救的地步。沈泽民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后果。可他不说不撤，也不说就撤。头脸和手脚，似乎被紧紧地捆在“中央军令”和“中央指示”上，这成了难以挣脱的绳索，自己也深深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徐海东、吴焕先苦苦相劝，要他下令撤出，他沉思良久，无可奈何地感叹起来：“唉呀，骑虎难下！骑虎难下……”

无论怎样“骑虎难下”，他不得不忍痛作出最后决定——撤离。43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啊，沈泽民脑海中无法抹掉这沉重的一幕。

今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不想也不会回避这段痛苦的经历。他流下了愧悔的泪水，就着眼泪写道：“目忍饿围七里坪，二十五军一般战士都饿得黄瘦衰弱，很久未能恢复，以至冲锋陷阵大不如前……这亦是机械地执行了中央的军事指令的原因。”

兵撤七里坪之后，沈泽民仍旧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死守”和“与土地共存亡”，由此而产生了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初期的接连失利，部队最终不得不逼上老君山、天台山一带……这时的他，才真正感觉到一阵阵从未有过的痛苦和悔恨。

转眼到了秋凉天气，烂漫的山菊花一束束、一丛丛闪现在山沟田坎上，黄得耀眼。红二十五军钻进鄂豫皖边区那重峦叠嶂的深山以后，经过恢复和休整，战斗力逐步增强。此时，沈泽民却突然病倒了。开始，他还躺在担架上坚持工作，并主持召开了第三次省委扩大会议，布置苏区今后的武装斗争任务。可后来，病不见好转，又患上恶性疟疾，上吐下泻不止，身体虚弱不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几步路都走不动了。省委决定送他到上海治疗，他不去；只让人在当地请来个老中医，配了几副中药服用。恰在这时，他的大哥沈雁冰托人从上海带来一封信，信中提到他过去患下肺病，劝他及早到上海治一治，信中还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投身革命。信中告诉他一个喜讯，说长篇小说《子夜》终于出版了，因路途遥远，封锁太严，未能寄来，并说以后此书他会看到的。

看罢信，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最初踏上革命道路，还是大哥引路，没想到如今事业未竟，而落到病魔缠身，有志无力的地步……

几位省委委员知道来信的内容后，都劝他一定要早去上海治病，因为路途遥远，准备多派几个人护送。

几千里的路程，沿途要经过敌人多少封锁线，冒险不说，耗费人力财力送自己去，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再说，鄂豫皖是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即使长眠于此也心安理得……想起这些，他十分感谢党和同志们对自己的关心，但谢绝了大家的劝告。

不久，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一阵接一阵地咳嗽，大口大口地

吐血。省委为了让他静心养病，把他隐蔽在老君山下一家姓张的农民家里。这家只有老夫妻两口，都60多岁了，一个儿子两年前当了红军，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走了。老两口不知道住在他们家的病人是省委书记，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而且来看望他的将领都管他叫“胡子”。尽管老两口和同志们对他悉心照料，但因敌人多次“清剿”，苏区十分贫困，再加上经济封锁，缺医少药，不说治疗，就连填饱肚子都成了一种特殊的享受，因此病总不见好转。同志们都很焦急，可他整日还笑呵呵的，不愿给身边的同志增加负担。

患难与共的红二十五军将领眼见自己的省委书记一天天瘦下去实在不是滋味。担任警戒任务和护理任务的五连指战员更是心急如焚。一次，他带了一个排的战士外出打粮时，出于一番好意，一心想搞点好吃的东西，好为省委书记补养身体。实在没得法子，就抄了土豪家里的鸡窝，抓了两只老母鸡，偷偷装在口袋里背了回来。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沈泽民一听说抓了两只老母鸡，就下令把指导员捆起来，非要杀头不可！

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念念不忘这个有损于政治影响的事。

原来，自从红二十五军组建以来，就自觉形成一种不吃鸡的规章。平时弄到几个鸡蛋，也要交给本单位的经理处，由主管人员批条子，分配给伤病员补养身体。对于鸡，指战员们都认为是老太婆养的，捉来杀了吃怪可惜的，老百姓会把红军跟国民党匪军一样看待！就是到赤白边界打土豪弄粮食，从来也不抓鸡，怕落个“鸡犬不宁”的名声！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能够形成这样一种铁的纪律，已是难能可贵。而这其中人们绝不会忘记领导者的榜样作用。

一天，吴焕先、徐宝珊、王平章、徐海东等提着一包白面去看他。在病床前，他们告诉他省委最近的工作情况和红军的胜利。他们还专门讲，在这段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红二十五军依然严格

维持群众纪律，干部以身作则，经常同战士们一起吃老南瓜和野果，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他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平时强调最多的就是红军纪律。他激动地讲：“好！好！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就靠你们了！”

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沈泽民心情难以平静。他想起了自己与吴焕先在攻打七里坪问题上的争吵，想起了自己与徐海东之间经历的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感到欣慰的，自己已经用真情换来了友情。这一点，徐海东尤为感动。

七里坪兵败后的省委会议上，徐海东当面指出了沈泽民的“小资产阶级”而被推出会场。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围上来，徐海东抱定“牺牲的决心”打退了敌人，掩护了省委。沈泽民不计前隙，亲自“上门道贺”。徐海东回忆说：“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不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sup>①</sup>

两人默默对坐，有许多心里的话还没说透、说够。

“我该走了。”沈泽民想到自己还有其他事情便抽身告辞，并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钢壳旧怀表，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

“几点了？”徐海东问了一声，原来他自己的那块怀表早已坏了。

“我这块给你用！”沈泽民问明了情况后说，“指挥打仗没有表

<sup>①</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27页。

怎么行。”

“这怎么行，不能要，不能要！”

“先用着，我再想办法弄一只嘛！”

沈泽民说着把那块表放在徐海东手上，走出了房门。

徐海东手捏着那块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听沈泽民自豪地讲过这块手表的不平凡来历：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刚刚十月革命成功，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献金物，瞿秋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了出来。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给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伴随着瞿秋白。1930年9月沈泽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为表达对沈泽民的友情，便把它转送给了沈泽民。

徐海东算得上是这块来自莫斯科怀表的第三位传人了。

真正的友谊和谅解，并不需要多少华丽的语言来表达，也是任何贵重的东西换不来的。沈泽民了解了徐海东，也换取了徐海东对沈泽民的更深了解：一位关心人、体贴人、重友谊的同志！

回顾这段往事，沈泽民又似乎增添了一点精神，伏在梓油灯下，继续写那份未写完的报告。以后，他强忍疼痛，断断续续地写着。烟没少抽，痰也没少吐，……可他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完成了写给中央的报告，了却了一位共产党的耿耿丹心！

这一天，是1933年11月10日。

完成了这份长达1.3万多字的报告，沈泽民也彻底垮了，疲弱不堪地躺在屋子里面，难以起坐行动。不几天，就再也支持不住了。

11月20日的夜里，在这间简陋的茅屋里，伴着窗外呼啸的寒风，沈泽民终于走完了31年短暂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当吴焕先拿着缴获的香烟和沈泽民生前让他购买的草鞋来到



刘家湾，看望这位省委书记时，屋子里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盏残破的梓油灯。沈泽民被安葬在了刘家湾子，他的棺材只是两扇门板，丧事是由郑位三亲自料理的。

吴焕先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来到沈泽民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献上几束青翠的松柏枝叶。当他从郑位三手中接过签有“沈泽民”之名的报告后，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

报告的篇幅很长，内容繁多。包括七里坪之围后的几次作战行动，打粮的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艰难处境，有关党的组织工作、“白旗”下的群众工作、红军补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敌情动态和今后的斗争方针等等，全都涉及到了。最后的几段内容里面，闪烁着—个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品格和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风貌：“我们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实在还是一介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不能够好好地领导实际工作……请中央注意派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以具体的指示。”

吴焕先深深地被这几行催人泪下的字句所打动。它就像一根尖利的银针，猛一下刺入他的神经中枢。他强忍哀痛，又看到沈泽民留下的这样的遗念：“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我们真正成了工农的罪人！但我们并不认为前途没有出路，生死存亡只在—个问题上来判断，即对群众的关系。过去有四次‘包剿’前之大苏区，而零落至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贯脱离群众造成。……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渐削弱到如此情形……”

“总之，我们企图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今后唯有以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转变！唯有以“万死的决心来转变”！这凝结着血和泪的经验教训，凝结着一颗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严于自我批评的共产党员的心！

1934年4月1日，为纪念沈泽民同志的革命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一所苏维埃大学，改名为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任管理委员会委员。

1963年4月15日，大别山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同志的遗骨安放在红军革命烈士陵园。董必武亲自在墓碑上题写了“沈泽民同志之墓”。

## 二 豹子岩会师

大别山上红旗飘  
 咱穷人革命在山坳  
 青石野草当床睡  
 密密山林比楼高来比楼好  
 白匪儿孙真孝顺  
 砍山又修宽大道  
 沿着大道采野桃  
 沿着大道采野桃  
 野桃咧嘴对我笑  
 谁说革命吃苦头  
 咱们吃穿住行样样好来样样好

青山绿水陡石岩  
 穷人革命上山来  
 饮不尽的清泉“酒”  
 吃不完的美味“菜”  
 苦去甜来见胜利  
 幸福花呀遍地开呀遍地开

这首《大别山上红旗飘》的歌谣，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当年红二十五军生活的某些片断，它也像春风一样温暖过被“逼”而走上老君山、天台山一带的红军战士们的心。

老君山、天台山、仰天窝是黄安、光山西部和罗山交界处的大别山西端较大的山区，也是最老的中心苏区之一。这里经过敌人多次的“清剿”，已是无人区，敌人大部分不好长久驻扎，小部分也不易住，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所以，在敌人的“清剿”、“扫剿”之后，红二十五军照样能继续控制它。军部机关、医院都分散在这个地区。靠近它周围的县、区还有一些党政组织和游击队，他们在附近敌占区内开展活动。鉴于这里的情况和群众基础，11月以后，省委和鄂东北道委率领只剩下80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转移到这些地区，在深山老林里继续斗争。

天台山同老君山一样，算得上是座名山。它奇峰突起，异石耸立，层峦叠翠，风光绮丽。因其“山形类台，巧若天造”，故名“天台”。了心关、坐忘台、留月岩、宾阳壁、抚松岩、披云峰、探奇窟、卧龙洞、作霖池、告天炉，即为天台十景。“离垢”、“自缘”、“达天”——通往天台山巅三座石门的题壁镌刻，至今手迹犹存。这里气候宜人，风物秀丽，乃是一处避暑旅游圣地。明代万历年间，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移居湖北黄安时，曾留下了一首《宿天台顶》，盛赞这里的风光：

缥缈高台起暮秋，  
 壮心无奈忽同游。  
 水从霄汉分荆楚，  
 山尽中原见豫州。  
 明月三更谁共醉，  
 朔风初动不堪留。  
 朝来云雨千峰闲，

恍惚仙人在上头。

邑人耿定向（明朝世宗时期的户部尚书），曾在此举办过“天台书院”，并著有《天台记胜》，写下《天台》、《重游在台》、《题天台别意图》等诗篇。

天台山、老君山，现代人竞相登临观赏风光绮丽的景色，可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红二十五军被围困在这里的艰苦岁月。

对于当时艰苦的环境，曾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的程垣和秘书科长的刘华清都有过深切体会。程垣回忆说：“……我们住在深山里，敌人经常来搜寻，随时有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晚上，我们睡在青石板上，时已深秋初冬，我们穿的还是破烂的单衣。一件衣服，日当衫，夜当被，长期穿在身上，没有换洗的，上面长满了虱子。粮食奇缺，当时连吃的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每天白天怕敌人发现，不敢烧火，只得在晚上才生火煮东西吃。没有锅，只好用小茶缸子煮，煮一缸子只能够一个人吃一顿，每晚要煮一二十次，才能使每个人吃到一小缸子东西到肚子。我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在深山老林里度过了一年多。”<sup>①</sup>

最难熬的是冬季。寒风裹着大雪侵袭着大别山。刘华清回忆说：“1933年冬天，大雪封山，所有人员都穿着单衣，缺衣少粮，极端困苦。两个多月的严冬甚是难熬！晚上在山洞或山上窝棚里烧起一堆堆篝火，大家躺在周围睡觉。”<sup>②</sup>

有时，“难熬”的往往不是恶劣的天气，而是面对着的敌人和敌人的“清剿”。红二十五军被逼上山后，敌人并没就此罢休。刘华清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敌人在12月间尾追我们，对天台山、

① 《访问程垣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8月8日，《郑位三传》，第107页。

②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老君山、仰天窝进行了几次大的‘清剿’，我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对付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们藏在悬崖绝壁上的山洞里，利用森林的遮盖，安全躲过了敌人的‘搜剿’，在山洞里，我们能看见远处敌人的行动，听到近处敌人在说话、叫喊……我们在山洞口上将所有的枪口对准敌人来的方向，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他们血战到底。”<sup>①</sup>

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人民群众蒙受巨大灾难。当时任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的郑位三一家也遭不幸。他家当时有父亲、母亲、妻子、三个弟弟、两个弟媳、一个妹妹、一个侄儿和一个女儿，连他一共12口人，结果死的死，逃的逃，整个家庭被拆散了，他自己也染上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像这样不幸的家庭何止一家，在敌人的屠杀政策下，这里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无人区，以至红军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红军长期在深山荒野中露营，指战员大都带着镰刀斧子，每到一地，割野草，搭茅棚，以避风雨。有时情况紧张，只能在寒风中就地休息一会……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缺药断粮，更为困难。医护人员一面掩护伤病员，一面冒着生命危险，到山下筹集粮食和其他物资。没有药品，他们就用盐水、南瓜瓢、烟叶等为伤员治疗。医护人员把心都放在伤病员身上，一把米、一点盐，也要留给伤病员，一切为了伤病员。敌人天天搜山，放火烧山，伤病员随时都得转移地方。一次，敌人抓到红军一个女护士，施以吊打、火烙等各种酷刑，逼她说出伤病员隐藏地点。她坚贞不屈，最后用生命保护了伤病员的完全。

艰苦的环境磨练出红二十五军钢铁般的意志和高昂的斗志，他们豪迈地唱出了心中的歌：

---

<sup>①</sup>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山林岩洞是我的房，  
青枝绿叶是我的床，  
野菜葛根是我的粮，  
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  
哪怕白匪再“围剿”，  
红军越打越坚强。  
任凭敌人逞凶狂，  
烧我房屋抢我粮，  
一颗红心拿不去，  
头断血流不投降。

“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凭着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1月底，红二十五军在天台山和西高山地区恢复了两小块游击根据地，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这时，敌第十三师调往江西，在鄂东北地区剩下敌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四师等4个师。红二十五军抓住战机，利用敌人调整部署和兵力相对减少的机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2月4日，红军袭击宣化店，缴获了一些粮食。

12月11日，红军又北上光山彭家大湾，截获敌第三十二师一批粮食。

12月下旬，红军又连续打下罗山县的定远店、周党畈和光山县的南向店等地，消灭民团数股，击溃敌人第三十二师一部。

这段时间，红二十五军在游击战争中，打击和消灭了部分敌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食盐，对于缓解红军的物资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仅党田畈战斗就缴获步枪140余支及一些面粉、食盐等。

转变，以“万死的决心转变”。沈泽民从错误中猛醒，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痛苦中转变“左”倾方针。正是由于这个转

变，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又开始活跃起来，并得到发展。

沈泽民无法亲眼目睹这次转变后的初步成效，他在病中主持的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和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正是这个转变，才被史学家们评价为“标志着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斗争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sup>①</sup>。

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新方针，省委于1934年1月2日发布了《通告第一一〇号》。《通告》向各级党组织明确指出“鄂豫皖苏区在敌人年来的包围会剿中，因为领导上的错误，致受了暂时的失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紧急任务，是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切实执行中央给予我们的正确指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根据当时的形势，《通告》提出了今后的具体任务：

第一，“红军主力要有计划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盐、抗捐税”斗争，“设法解决群众的粮食问题、生产问题、农具问题”，“与当地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第二，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扩大红军队伍，要“吸收‘白旗下’群众参加红军”，在红军中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加紧军事训练，正确的发展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工农干部”。

第三，“便衣队、袭击队、教导队、独立团，要经常到敌人后方、侧方突击敌人，骚匪军，打民团，宣传士兵义勇队，砍电话，掘汽车路，断绝敌人交通与粮道，到处发动当地群众起来分粮、抗捐税，组织群众与建立秘密工作”。

第四，要注意执行区别对待反动力量的政策，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要加强对民团和白色士兵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对哗变或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官兵和民团、义勇队，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对

<sup>①</sup>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

于富农的土地、粮食，只能征收不能没收。

第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奸淫掳掠、烧杀抢抓、拉夫派差、苛捐杂税等罪恶，宣传全国革命形势，继续鼓励根据地广大军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沈泽民逝世后，由徐宝珊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有郑位三、吴焕先、戴季英、郭述申、徐海东、高敬亭。在郭述申等几位常委缺席的情况下发布的上述《通告第一一〇号》，同样反映了新的领导集体的意志和决心，因为它是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的逻辑发展，也是对沈泽民给中共中央报告内容的一种补充。它标志着新的省委确实在“用最大力量来转变”。

省委《通告》发布后，红二十五军又开始了新的“动作”：向北活动，开辟光山凌云寺及其以北地区，以巩固扩大天台山革命根据和解决粮食问题。1月上半月，红二十五军与罗山独立第十六团一起互相配合，多次打击长期盘踞该地的反动地方武装易本应部，并在该地区宣传和发动群众，使这个地区成为红军的游击区。

敌人又开始发现了自己的“顽固对手”。

1934年1月15日，按农历算这一天正是癸酉年腊月初一，离春节虽然还有一个月，不少人家已开始张罗着准备年货，盘算着春节的礼物。

这一天，红二十五军迎接的却是另一种特殊的“礼物”。敌第三十二师、第四十五师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正在凌云寺以南之仰天窝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发起围攻。敌人来势凶猛，声言要在腊月间把红军“剿灭”干净，好收兵回营过春节。正如他们所叫嚷的：“消灭吴焕先，过年也心安。”看来，敌人把消灭吴焕先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当成了要准备的主要“年货”。

敌人迅速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包围。当天，部队要想摆脱敌人已经来不及了。吴焕先当机立断，指挥几个连队，抢占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天也黑了，这才从仰



天窝突围出来，转到老君山以南地区。谁知敌人紧紧追来，红军又在老君山以南和宣化店附近等地与敌人进行了数次苦战，难以打退敌人的围攻，无奈又转到仰天窝以北山地，与敌人进行周旋。

高山环绕的仰天窝，如果没有兵匪扰乱它，自然也是一处环境幽静的安乐世界。在骚人墨客的笔下，仰天窝不失为人间仙境。有诗云：

天窝古洞天，  
幽灵与世绝；  
日月自中生，  
回龙护山阙，  
乱峰入光流，  
四壁动明灭；  
沾然一老僧，  
意气春云叠。  
手拄楞木经，  
见面不识客；  
花木也静休，  
含香未轻接。  
会心慌众妙，  
忘机莫能说；  
忽指山恋音，  
声从何处歇？

跟随吴焕先在仰天窝进行突围的战士，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描绘了当年的仰天窝：

仰天窝，  
像口锅；  
中间破庙一座，  
四周居民不多。  
日月当头过，  
昼夜受折磨；  
敌人搜山又放火，  
红军突围又穿梭……

刚从仰天窝以南突围至仰天窝以北的红二十五军又面临新的挑战！

21日，敌人又以4个多团的兵力，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当时，部队已弹尽粮绝，指战员多以大刀、长矛和石头进行搏斗。敌人惧怕白刃格斗，便旧伎重演，使用了损招——放火烧山……红军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拼刺肉搏。敌人愈来愈集中，进攻愈来愈猛烈。在此紧急关头，担任军长的吴焕先率领一个排抢占洪家河北岸高地以吸引敌人，击退敌人多次反扑，掩护红军大部分散突围。

部队已突围成功，吴焕先这才按照约定的会合地点，与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一起分散突围。然而，被吸引过来的敌人已对他们形成了重重包围。浓烟烈火之中，到处是一片声嘶力竭的嚎叫：“抓活的！快抓活的！”“抓住一个共党，赏给两块大洋！”“抓住了吴焕先，赏给大洋两千！”

吴焕先身上裹着一件黑呢子大氅，手里拎着一把手枪，目标显得十分突出，敌人更是拼命地追捕着，疯狂地吼叫着：“快呀，抓住那个穿大氅的……别叫他跑掉！”吴焕先率领手枪团和交通队数十人，奋不顾身地穿过一片浓烟缭绕的地带，在团团烟雾的遮掩之下，夺路而去。

刚从浓烟烈火中闯出，斜刺里忽然又冒出几个敌人，朝着吴焕先猛扑过来。“跑不了啦！快抓活的！”眼看敌人追到了眼前，情势相当严重。这时，吴焕先急中生智，忙把身上的大氅甩掉，接着又把随身携带的一布袋银元，“哗啦啦”地一下撒了开来，撒向敌人。“要财不要命”的围追之敌为了多抢几块大洋，相互间又厮打争夺开来。因为他们也知道，抓住一个共产党，才不过赏给两块大洋，何苦把眼前白花花的银元弃而不要去抓一个仅值“两元”的共党分子呢？当然，如果他们知道眼前的“人物”是吴焕先，说不准真会视这袋银元如“粪土”而争先去捕捉这个值大洋“两千”的“猎物”，这笔买卖划得来。

就在敌人挣抢银元的瞬间，吴焕先率领所部安全突围。当天晚上，他们一口气赶到宣化店以东的黑狗寨，与部队及时会合在一起。天亮以后，吴焕先把部队集合起来，仔细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战斗中牺牲的十几人以外，大都从浓烟中突围出来，没有一个掉队离队。不少挂了彩的战士，也在战友的关怀下及时赶到了集合地点。

仰天窝突围，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战斗。军长掩护战士突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范例。这次突围的前后经过，全体指战员都一清二楚，吴焕先就是在这种生与死的考验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把处于危急中的红军紧紧团结、集合在一起。大家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聆听着吴焕先的讲话。

他指出，这次突围的胜利，证明同志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军是打不垮、拖不散的，只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革命就一定胜利。同时宣布：今后要进一步向外线发展，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

没有丝毫的自我标榜，表扬的是突围成功的战士们；没有深刻的说教，红军战士照样声声入耳，个个斗志倍增。

第二天（1月23日），吴焕先带领部队以极其神速的飘忽行

动，一举攻入了罗山边界的钱铺。24日，又一次占领三里城和大新店。25日，乘胜攻占双桥镇。3天之内，接连奇袭4座集镇，歼灭民团数股，缴获了一大批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

转眼间到了年根底下。整整一个腊月，敌人经过数次与红二十五军交手，终于感觉到新年的“年货”不好准备，吴焕先这碗“饭”不好端——吃又吃不掉，想咬一口反把自己的牙给磕掉了几颗。这个年，到底该怎么过？

吴焕先率领的红军队伍，则在飘忽的游击活动中，欢度甲戌年的新春佳节。在此期间，他们西起孝感以北的三里城，东至光山县的泼皮河，飘忽回旋于200多里长的边界线上，急如穿梭一般。有时远程奔袭，有时化装奇袭；有时埋兵伏击，有时引敌就范，聚而歼之。忽而攻破定远店、周党畈，忽而打下晏安河、南向店，忽而又占领新集（经扶县城）以北20余里的浒湾。2月底，获悉敌第三十二师派部队护送物质，红二十五军即在浒湾东南的松林中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后，红二十五军突然出击，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数10支和一批弹药。

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共”总指挥刘镇华，满认为只需要4个师的兵力就可以把吴焕先消灭在鄂东北，结果红二十五军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而且在鄂东北地区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高山、西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根据地，力量日渐壮大。一天，他突然接到情况，说皖西又冒出了一个红二十八军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红二十八军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1933年10月2日突破潢（川）麻（城）公路时被敌人挡住的那部分红军，由徐海东带领转回皖西北并找到了党组织——皖西北道委。10月11日，皖西北道委在皖西南溪东北部的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决定将游击在皖西的红八十二师与徐海东带来的人员（编为第八十四师）合编，组建成一个军。这就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辖第八十二师，师长刘德

利，政治委员詹大列；第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政治委员周化贤。全国共有2300余人。

在人数上超过红二十五军的这支新编红二十八军，同样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形势。因为遭到敌人反复“清剿”后，可以活动的地盘，只剩下一条狭长地带。红二十八军留在这里不仅缺衣少穿，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根据这种形势，皖西北道委制定了红二十八军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弹药，武装自己，让红军战士吃饱穿暖。还决定红军暂分两路。八十四师一路，由军长徐海东率领，北上熊家河一带，在外线打游击；八十二师一路，由皖西北道委书记兼军政委郭述申率领，在原地坚持斗争。

两支队伍在当地武装和群众的帮助下，分头游击，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多次冲破敌人包围，沉重地打击了“围剿”之敌，激励了部队的战斗士气。为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北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1月下旬，红八十二师北上熊家河地区与八十四师会合。经过侦察，了解到固始县南部地区的敌人，只有四十五师和独立四十旅，兵力比较薄弱，而且该地区物资比较丰富。根据这种情况，道委和军领导人大胆决定：以熊家河地区为依托，向固始县南部发动游击战争。

已经入冬了，寒风不断从山峰上刮过，一夜夜紧，一阵阵凉。部队吃饭、穿衣都成了严重的问题。白天，他们隐蔽在深山里，割草搭棚，煮点野菜充饥；夜行军走到风口里，再硬的汉子都龇牙咧嘴，冻打得哆嗦。

11月初，徐海东率领第八十四师在石门口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棉衣，一部分同志换了装，基本解决了过冬问题。但两师会合后发现大部分同志仍是日间一身单，夜间盖茅草。就这个样子，部队怎能过冬？在供给处长手里，全部家当只有30块大洋，这点

钱即使都用来买了棉花和布，也解决不了冬装问题。

军领导正在发愁，侦察员带了好消息：驻吴桥、段集的民团，刚刚运来一批棉布！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徐海东当机立断，亲自率领1个团，于12月14日、15日，接连袭击吴桥和段集，把敌人还没开包的棉布一窝端了。紧接着，又根据情报进攻霍丘县的黎家集。三战共歼民团500余人，缴获棉布600多匹，棉花1000公斤……

供给处长看着这些布匹和棉花，乐得合不拢嘴，当然，犯愁的事情是如何把这些“半成品”做成“成品”。

红二十八军开始了另外一场“革命”，从师长、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都拿起了针和线，领到了自己的那份棉布，穿针引线做起棉衣来。这是奇迹还是一种奇观？战场上的男子汉忽然都变成女人似的，盘起腿坐在地上。会做针线活的女战士穿梭各班各组，指指点点，有了用武之地。当然，村子里的乡亲们——不论是老奶奶、大嫂子，还是姑娘、丫头也都组织起来，夜以继日地帮子弟兵做棉衣。几天工夫，整个部队全部换上新军装了。真是“人凭衣服，马靠鞍”，红二十八军军容大变，指战员们新装一穿，绑腿一扎，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连行军时的步子也格外带响。

红军战士身上暖了，肚子饱了，在敌人大包围中跳出跳进，今天埋伏，明天偷袭，游击战越打越热闹。

在红军的多次袭扰下，驻固始之敌第四十五师，胆战心惊，不敢派小部队行动，运送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一般都派部队护送。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针锋相对，决定伏击敌护送部队。

1934年1月10日，红二十八军在商城的苏仙石、金寨县的皂靴河之间公路上，伏击了敌护送物资部队，截获敌第四十五师大批物资。下午，敌两个团从皂靴河方向赶来，企图抢回被截物资。红二十八军在徐海东的指挥下又在皂靴河东北之高家畈、铁炉冲

附近设伏，一举将敌击溃，缴获武器弹药甚多。

战斗结束后，红二十八军再度深入固始县境内打击敌人。1月11日，他们奔袭了樟柏岭，歼敌第四十五师和民团各一部。从14日至22日，又连续袭击了段集、王家玲、顺河店、陈集、黎家集等敌人据点，把敌第四十五师的后方折腾得一塌糊涂。

红二十八军在固始县境游击取得节节胜利之后，获悉六安县的大小马店驻有敌保安团4个连，遂于1月底挥师南下，一举歼灭这股敌人，俘敌300余名，缴获大米百余石。伴随着新年脚步的步步来临。红二十八军高高兴兴地于2月初返回赤南根据地的葛藤山地区。

敌人惊呼：“徐海东真是一条抓不住的游龙！”

刘镇华坐不住了。

2月初，刘镇华发布命令，组织第四十七、七十五师和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以上两师接替调走的第七、第十二师）等部队立即对红二十八军实施合围。

2月6日，红二十八军在火炮岭以南地区与敌展开激战，第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负重伤后牺牲。战斗结束后，为避免与敌硬拼，红军离开葛藤山地区，到六安县大小马店以南活动，数日后，北上固始县南部地区。

3月初，当红二十八军在熊家河活动时，敌人派两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前来合击。红二十八军抢占了有利阵地，与敌人激战一天，黄昏后突围南下，进至金家集东南的古碑冲一带，开展群众活动，发动分粮斗争。

敌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夸下海口要活捉徐海东。3月10日，他亲率该旅一个团和立煌民团前来进攻。由于红军已有准备，徐海东看准时机，指挥红军指战员在古碑冲将敌人全部打垮，俘敌百余人，缴获追击炮1门、重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子弹两万发、手榴弹百余枚。郑廷珍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抱

着流血的脑袋逃走了，那个为第五旅带路的县长却被击毙在路上。

熬过寒冬，迎来阳春。3月，大别山区春暖草绿，军长徐海东和政委郭述申率领红二十八军，游击到皖西的葛藤山一带。他们本打算休整几天，再寻找机会，打个胜仗。谁料到部队刚刚落脚，驻扎在南溪之敌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两个团）便倾巢而出，代理师长兼旅长刘树春亲率大军猛扑而来，声称要活捉“徐老虎”。

刘树春是个老牌军官，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当过13年的团长和4年的旅长，眼下还只是个代理师长。他总是想升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和靠得住的稳后台。这一回，他一心想争个头功，好把师长前面的“代”字摘掉。他哪里知道，徐海东已经摆下了迷魂阵，等待着他自投罗网。

根据刘树春急于和红军交火的心理，徐海东决定：第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葛藤山东南山脊——阻击来犯的敌人，第八十二师（欠第三营）向葛藤山西南簸石沟佯动，造成敌之错觉，吸引敌之主力。

刘树春果然中计，当他发现红军出现在山梁上时，忙不迭地指令他的部队向簸石沟发起攻击。

往山头上前进的红军主力，有的人心里也犯疑：往日里打仗，多是夜战、游击战，三五成群的小行动，很少和敌人大白天里正而交锋，死拼硬打。今天，军长真是犯了老虎脾气，为啥把两个营明摆在梁上，往上抢山头呢？这不是白给敌人当靶子吗？

爬上山头的战士望见远处敌人主力跟过来后，突然又接到新的命令：留一个排的兵力将敌之主力紧紧吸引住，其余隐蔽撤回。

刘树春指挥他的两个团往山上爬。这次可是追上红军了，心里暗暗高兴起来。

突然，埋伏在山下的第八十二师主力协同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的八十四师二、三营向敌人发起猛攻。簸石沟的一个排和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第八十四师一营也乘势出击。得意忘形的刘树春，



这才发现已陷入三面夹击的境地，想要调整兵力，已经来不及了。山坡上的敌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东奔西逃，你推我搡，乱作一团。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将敌击溃。红军打死打伤敌1000余人，俘虏官兵130余人，缴获长短枪127支，子弹1万多发、炸弹和迫击炮弹200多枚。

葛藤山反击战是红二十八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一个大胜仗。也显示了“徐老虎”的威风和智慧。

徐海东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据说，国民党蒋介石曾悬赏10万元，用以买徐海东的头颅。<sup>①</sup>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人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了。”<sup>②</sup>

徐向前曾说：“要写鄂豫皖红军斗争历史的故事，去找海东同志。他是窑工出身的将军，很会打仗，他知道许多故事，他自己就有许多故事！”<sup>③</sup>这或许就是徐海东的“神秘”之处吧！

跟随徐海东作战多年的战士说徐海东打仗有个脾气：一要全胜，不让敌人逃跑；二要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三是自己的队伍伤亡少。若是抓不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自己的人又伤亡多了，他就要“骂娘”，说这是“半胜”。

葛藤山反击战活捉了刘树春。徐海东欣喜得眯起了眼睛。因为达到了他心目中的“全胜”标准。

这位“保定”出身的刘树春被押送到徐海东面前。他素闻“徐老虎”的大名，今日擒虎不得反入瓮了，不再趾高气扬了。

① 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第1~2页。

② 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第1~2页。

③ 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第1~2页。

《徐海东大将》一书记录了两位军官的一段有趣的对白：

“请问军长，您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摇头，他不明白这家伙问话的意思。

“那么，您一定是‘保定’的了？”刘树春接着又问。

在刘树春看来，像徐海东这样能指挥打仗的将才，必定是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只有这个名牌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军人，才能如此神通广大。再说，刘树春本人就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他想和徐海东拉个同学校友的关系，给自己垫上几级下台的阶梯。

“我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有进过黄埔的门！”徐海东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树春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望着徐海东问：“请恕鄙人学识浅薄，不知道这‘青山大学’设在什么地方？”

“喏，就在那里！”徐海东手指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说。<sup>①</sup>

大别山培养了无数英雄豪杰。徐海东就是其中的一员。这里的山草树木培育出了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sup>②</sup>，也铸造出了这位大将的“神秘”的战术和战争智慧。

国民党武汉“清剿”总部惊闻旅长刘树春被俘，气急败坏，决计进行报复，集中了10多个团的兵力，于3月下旬向红军驻地杨山地区进犯。这时，红二十八军士气高昂，弹药充足，两个师发动歼敌竞赛，与敌激战了一天多，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这次战斗中，红第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英勇牺牲。战后，红二十八军开到余店、汤家汇地区进行发动群众工作，继续在“青山大学”里

① 《徐海东大将》，第122页。

② 《徐海东大将》，第2页。

深造着……

吴焕先、徐海东虽然被敌人强制分割开。但由于政策对了头，结果都是一样的。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部队力量壮大了，根据地逐步扩大了。战士们脸上闪现出笑容，根据地群众也树立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豹子岩胜利会师。

半年时光，是短暂的。徐海东和吴焕先却像已有几年没见面了。两个人坐在一起，从头诉说在黄土岗被敌人分割后的种种遭遇。战士们相互间也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畅谈自己的感受。

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分割，中共鄂豫皖省委与皖西北道委失去联系，虽先后6次写信给皖西北道委（只接到两次）要皖西北道委报告情况，均无结果。省委无法了解皖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又听信了红二十八军经理处来人反映的一些片面情况，因此，曾批评皖西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以打粮为事”，不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战争”，并于1934年4月13日向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待省委得知皖西北地区的真实情况后，于1934年5月写信给皖西北道委，肯定了皖西北军民英勇斗争的成绩。7月5日，省委又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纠正了4月13日报告中反映情况的不实之处，并就红二十八军和地方部队的几次战斗胜利，向中共中央作了补充报告……

4月17日，即豹子岩会师的第二天，根据省委4月13日“对红军二十五及二十八两旧部完全编为二十五军”的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第八十二师改编为第七十四师，辖三个营；第八十四、第七十五师编为第七十五师二二三、二二四团。军领导成员为——

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

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

两个师的领导为——

第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姚志修。

第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治委员：高敬亭。

吴焕先以军政委的身分，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红二十五军主力分别半年之后，现在又会合了，这是一件大喜事。红二十五军前一时期的斗争，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碰了很大的钉子，这是很痛心的。但是，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针，我们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为打破人的“围剿”而斗争……

吴焕先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战士们心里明白：这个具有就职演说意味的开场白，如同开场锣鼓一般，把他们带到了战场上，去迎接新的使命！

### 三 灵活的“八会”

战争，给军事指挥员提供了施展满身解数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较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说过，战争的基本要求：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sup>①</sup>

战斗打响了。双方总希望以小的代价取胜。

于是，人们评价一位好的军事指挥员时总善于简明扼要的概括：他会带兵打仗。

“会打仗”，这是对每一个指战员的基本要求，但又不是轻易能达到的目标，主要原因大概在于这个“会”字着实让人不敢随便地接受，它需要智慧、才能、胆识……因此，不知有多么军事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指挥家在这个“会”字上倾注了他们毕生的心血。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谈到毛泽东的“会打仗”，一般会熟悉地说起在井冈山时期他提出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当然，有人还会眉飞色舞地讲述一番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

人们还会举出十大元帅，举出许许多多……

不错，自从共产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开始，就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会打仗”的军事人才。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专门提到了他们总结的游击战术原则。他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是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他接着讲：“我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在军事问题决议案里，总结了这么几条：

(1)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7) 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sup>①</sup>

也许是一种历史巧合。在鄂豫皖转战的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师后，总结了以往的斗争经验，也提出了“八会”：

(1) 会打仗。打就要胜利，无胜利把握的仗不打。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6页。

(2) 会进攻。进攻要迅速、突然、勇猛，打敌措手不及。

(3) 会防守。常以少数兵力佯作主力，防守一处，诱敌深入，而主力部队则出其不意，击敌侧后，转守为攻，聚而歼之。

(4) 会转移。敌大兵力合围或敌突然遭遇而打不赢时，要很快进行转移，善于钻敌人的“空子”，化险为夷。

(5) 会突围。在敌包围合击时，要能够独自为战，看准敌人的薄弱部位，分散突围，自动集合收拢，使敌人围不住也打不散。

(6) 会隐蔽。善于隐蔽自己，善于埋伏歼敌；避敌锋芒，保存自己。

(7) 会行军。黑夜行军，远程奔袭，神出鬼没。

(8) 会侦察。手枪团是全军的主要耳目，乔装改扮，四出侦察，捉俘虏，找报纸，以各处手段搜集敌人的情报。

有趣的是，跟红军交手多回的蒋介石在自己的《赤匪的战术》倒也十分形象地勾画出红军作战的特点：

(一) 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 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 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 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五) 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以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围城，应离敌远，巡查严密，……因地制宜，出奇制胜……<sup>①</sup>

<sup>①</sup> 《剿匪手本》，转引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弱小的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仗，必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斗争策略。红二十五军一度把自己的斗争方式形象为“飘忽的游击战略”。所谓“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这曾经是红二十五军初建之时的拿手好戏。

后来，“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的省委批评了这种“飘忽”，代之以攻占中心城市，终于导致了兵败七里坪，逼上老君山。

红二十五军从挫折中走出来，学会了怎样打仗，逐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其中，便衣队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便衣队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1933年5月至10月，七里坪战役和中心区保卫战连遭失败后，地方苏维埃政权无法维持，群众和党、政干部不能安家，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在失败和困难面前，敌占区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便组成了六七个人组成的小型游击队。他们以老君山为依托，白天隐蔽真正身分，深夜下山侦察敌情，“摸敌岗哨”，做群众工作，斗争活跃，成绩显著。在黄安县的河口、二程、仙居等地区首先出现了这种斗争形式。同年10月，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得知这种小型的游击队伍开展斗争的消息后，感到很满意，并指示他们今后改为便衣队，到天台山一带开始活动。所以，人们常说郑位三是鄂豫皖苏区便衣队的倡导者。程子华、郭述申等也说过：郑位三同志“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并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sup>①</sup>。

当时，人们把便衣队视为“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权”。由于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随时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加上他们队伍小，行动灵活、秘密，敌人很难对付。刘华清高度评价说：“便衣队是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极为适宜的游击武装组织。”<sup>①</sup>

沈泽民在病中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sup>②</sup>

郑位三不仅慧眼发现了便衣队这种灵活的对敌斗争方式，要求加以推广，而且及时给予正确指导。从1933年11月以后，他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分期分批轮流训练各区、乡的便衣队负责人。主要课程是时事政治和军事常识。郑位三亲自讲课，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便能马上出现了和农民一样打扮的便衣队，奔走山林村庄，来往于赤白区之间，“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指明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胜利前途，秘密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扩大红军和游击队，恢复并发展党和群众的组织”<sup>③</sup>，并且出色完成了“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袭击敌人，消灭小股民团，镇压反动分子，筹集粮食物品，安置伤病员等工作”<sup>④</sup>。

处事老练的郑位三是位细心的人。为了使便衣队更好地完成它担负的战斗任务，他冷静分析了红军当时的困难处境，规定了便衣队的行动方针。他说，敌人为了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林中，一方面派一些“感化”了（插了白旗）的群众，在山口放哨，看见红军、游击队下山，就打锣向敌人报告，另一方面又在群众

① 刘华清：《鄂豫皖道委领导下的两军游击战争》。

② 《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11月10日。

③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④ 刘华清：《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



中搞五家连坐，发现某家有人与红军、游击队发生联系，就将这五家人全部杀掉。这样，红军、游击队不但很难公开活动，而且群众也不敢接近他们。群众看见从山上下来的人就跑，有的红军家属连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回家也不敢收留。有一天，“便衣队员徐如意回到家中，他母亲见了只是抱着哭，就是不敢留他在家，要他快点走远一些。因为保长经常到他家搜查，要是留他在家，被保长发现了，不但他一家人性命难保，全村都要受到连累”<sup>①</sup>。针对这种情况，郑位三给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方针，即便衣队要用游击战争的方针，白天埋伏在深山里或可靠的群众的家里，晚上到群众中开展活动；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做好伪保长的分化工作，争取他们当中比较倾向进步的，成为“两面派”，明着为国民党做事，暗地给红军、游击队帮助，如帮助我军送情报、筹集粮食和其他物资，掩护部队行动和伤病员等。<sup>②</sup>

人们对于“插白旗”地区的群众的心态和行为，形象地概括为：

日降夜不降  
女降男不降  
口降心不降  
明降暗不降

这是便衣队开展活动的重要群众基础。郑位三在解释便衣队昼伏夜动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在革命斗争尖锐的时候，农民一般在白天是不敢干的，但在夜晚都愿意干，这就要有昼伏夜动

①② 《郑位三传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的政策。”<sup>①</sup>

老便衣人员黄究儒后来回忆说，便衣队按照郑位三同志规定的“昼伏夜动”的行动方针开展活动，效果十分显著。当时群众不敢接触我们便衣队，我们就利用晚上到独家的村子去，把门叫开，外面放着哨，我们向群众解释，说明共产党是为穷人的，只要有群众存在，就有共产党存在，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我们便衣队回来也是为了你们，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害怕就去向敌人讲，但最好是不去讲。天不亮我们又上山去了。经过我们这样的多次解释，就逐渐打消了有些群众怕共产党的念头，同群众的联系也就逐步建立起来了。<sup>②</sup>

当代人习惯上把那些明一套暗一套的称之为“两面派”，是个贬义色彩很浓的概念和称谓。然后，郑位三在当时却要求大家积极工作，努力使伪保长成为“两面派”。他认为，保甲长反动的是少数，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因为在“白旗下的保甲长许多是农民当的”<sup>③</sup>。当然，保甲长毕竟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地位，把他们中的多数争取过来，使其成为“两面派”，对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活动是有利的。

“两面派”被郑位三赋予了特定的涵义。不少保甲长在共产党的争取下确实成为名副其实的“两面派”——明降暗不降，不知不觉中他们扮演了共产党“间谍”的角色。

对于少数坏保长和反动民团头子，郑位天的理论是：要想使便衣队在群众中扎下根，就坚决打掉坏保长！

把自己的三叔（坏保长）打死的便衣队指导员何耀榜也说：“由于打了坏保长，其他保长比以前老实了，他们再不敢向敌人报

① 转引《郑位三传》，第114页。

② 转引《郑位三传》，第114页。

③ 郑位三：《红二十五军战史中的几个问题》1958年3月2日。

告便衣队的活动了，使便衣队能在群众中站脚稳根。”<sup>①</sup>

便衣队员“干掉”环保长总会施展自己的夜行本领，在不知不觉中让那些恶贯满盈的环保长和反动民团头子永远“消逝”在地平线上。

河南民团有几位榜上有“名”的反动民团头子。排在首位的当属河南民团的总团丁印昆。他仗着国民党的势力，摧残红军家属，组织反动民团……没过多久，国民党就发出讨告，并声称要缉拿杀害他的凶手。

便衣队宣称：是我们干的。

河南罗山还盘踞着两个反动头子刘子万、阮义伯，到处抢掠烧杀，欺压乡里，自称是罗山“二老天爷”，当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便衣队经过精心策划，终于让这“二老天爷”命丧黄泉，沉入地狱。何耀榜高兴地回忆说，自从打掉了这几个反动头目后，“这一带的民团头子一听说共产党，就心惊肉跳，不敢随便找我们的麻烦了”<sup>②</sup>。

鄂东北的便衣队运动，可以说是郑位三的一个伟大创举！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吴焕先当时也从部队中抽调了几十名富有斗争经验，能够掌握政策，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骨干，补充到各地的便衣队。与此同时，他还在部队经常出动的几处游击区域、交叉路口、乡镇附近，建立和安排了几支便衣队，以配合部队的战斗行动。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的组织建制，说法是仿照便衣队的活动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似乎又成了吴焕先的创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逼上老君山的红二十五军领导对于便衣队这一新生事物达成共识，沈泽民代表鄂豫皖

<sup>①</sup> 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郑位三传记》，第114页。

<sup>②</sup> 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参见《郑位三传记》，第114页。

省委于1933年11月1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在便衣队的运动”，并“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形成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斗争运动。

就是沈泽民抱病给中央写报告之时，成仿吾则根据省委决定去中央汇报工作。当然，担任护送任务的首先是便衣队。

成仿吾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13岁就随哥哥成邵吾东渡日本留学，后与郭沫若等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经日本转赴苏联，到过法国和德国，精通几种外语。当年，他与鲁迅、茅盾以及沈泽民（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间，还打过不少笔墨官司。但在鄂豫皖苏区的两年间，他与当代中国文学巨匠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却又完全捐弃前嫌，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事艰苦的根据地斗争。

1931年10月，成仿吾从德国返回上海不久，就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他一直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负责苏区的文化教育。遍及于苏区各地列宁小学的识字课本，就是他亲自主持编写、审定、印刷的。许多红军指战员的青少年时代，都念过这样有趣的课文：

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富豪不完粮。

我们的飞机来了，大家快来看飞机。昨天向黄安县城抛了两个炸弹，把敌人吓得发抖。这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列宁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他领导下完成。

成仿吾来到鄂豫皖苏区整整两年了。临行前，沈泽民在他的

衬衣襟上，亲自用米汤密密写了这样几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字母。这便是成仿吾此行的特别“介绍信”。

成仿吾骑着一头毛驴，由几十名便衣护送着离开老君山地区。但由于敌人戒备森严，无法靠近车站。最后，成仿吾穿上长袍，戴上礼帽，化装成个教书先生，在陈先瑞、韩先楚、刘幼安（刘震）所在的特务四大队的护送下，想尽各种办法，终于把成仿吾送上了去武汉的火车。搭车时还坐着一台轿子，后头跟着两个便衣书童，在他的身边保驾！

成仿吾经武汉到达上海后，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找到鲁迅，后又通过鲁迅、茅盾与瞿秋白接上党的联系，于1934年1月由汕头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完成了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交给的神圣任务……很快，鄂豫皖省委便接到了中共中央批转的中革军委的一个同志写的《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的重要文件。当吴焕先、郑位三等人从《建议》中发现中央肯定了“便衣队”的作用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评价，实际上证明了红二十五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创出了一条新路。

中央有理由相信，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会走路了”，开始走向成熟了。

在中央的《建议》中还提出红二十五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对于这个建议，鄂豫皖省委曾于4月10日的会议讨论认为，省委对于根据地以外的情况不了解，根据地的红军力量又比较弱小，加之平汉铁路敌人设防严密，部队要通过很困难，而且桐柏山区距离根据地较远，难以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所以还是在鄂豫皖地区边沿谋求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会议初步选定以光（山）罗（山）息（县）和英（山）罗（田）霍（山）两地区为开辟新区的目标。

省委把这个意见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时间是4月13日。

4月20日，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4月10日省委会议的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到边沿地区进行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的活动。对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会议强调要“活泼、慎重，不要机械”。

5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了解皖西北地区的斗争情况，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东北转至皖西北地区。此后，便开始转战罗（山）（黄）陂孝（感）地区，进入了恢复和开辟朱堂店根据地的阶段。

5月6日，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敌第五十四师后方所在地罗田县城。罗田县位于大别山主峰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坚固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民团留守，约3 000人左右。

红军掌握敌情后，拿出自家的“会行军”的本领，从麻城北边直向东南而下，经过100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经过激烈战斗，歼敌一部，缴获银洋7 000多元及大批军用物资和几十匹骡马。

罗田战斗后，部队稍事休整，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总结，并帮助群众麦收。刘震在回忆中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当时在手枪团任代理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讨论战斗总结时，徐海东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根据上级的情况通告和个人的感受，在会上谈了对罗田战斗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在此次战斗中部队打得勇猛，消灭敌人一部分，缴获了一批银元及弹药物资，应该算个胜仗，但有不少缺点，主要是战术运用问题。该城守敌仅一个营，以其大部分驻守城北的山头，构筑了防御工事。我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几次都没有攻上，原因是火力没有组织

好，机枪未起到掩护作用，造成较大的伤亡，不得不退下来；而在退出战斗时，又没有周密的部署，队形较乱，不注意隐蔽和掩护。再就是，手枪团进城背运银元的时机晚了些，如早进去还可多运出一些。因此我建议，今后部队要加强战术训练，重视火炮兵器的配合利用。对历次缴获敌人的迫击炮不应掩埋，可用牲口驮运，并学会使用，以便必要时能充分利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的发言后，当即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要求今后从班排连到营团各级都要加强战术训练。”<sup>①</sup>

刘震接着说，部队休整后他即奉命调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营一连指导员。这或许因为他的上述“建议”被认可，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建议”，它与后来红二十五军形成的“八会”相关。

战后，红二十五军挥戈北上，经罗田县僧塔寺，到达霍山县团山。省委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从二十五军中抽调部分骨干组织一支游击队，在团山地区开辟工作。几天后，因敌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向红二十五军进逼，为摆脱敌人，红二十五军经麻河岗、银山畈、枫树坳、大柳树等地向鄂东北转移。

红二十五军在向鄂东北转移途中，敌人不断派兵追击。在枫树坳和大柳村两地经过激战，击退了敌人的追击。但在红军队伍的后面，仍有一点“尾巴”跟着。5月30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到达光山县凌云寺时，部队正在做饭，警卫员紧急报告：敌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追到山下。

吴焕先政委当即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我军经过连续行军，相当疲劳，现在敌人迫近，如果转移，就要遭到危险。我们必须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的地形，狠狠打击敌人。

战士们忍着饥饿，迅速占领阵地，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

<sup>①</sup>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0页。

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顽强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趁敌人后退之际，红军吹响了冲锋号，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这时，敌人以3架飞机向红二十五军阵地狂轰滥炸，敌人地面部队乘势再次发动疯狂进攻。红军指战员沉着迎战，愈战愈勇。激战至黄昏，终于打败了敌人陆空配合的进攻。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军700余人，缴获部分机枪和步枪。红二十五军亦伤亡600余人。战后，红二十五军进至茅草尖一带，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后又北上直插罗山、信阳一带，消灭保安队数股，截断信（阳）潢（川）公路，威逼信阳。

通过这次游击活动，省委进一步了解到罗山、息县交界地区地处平坦，而红军缺乏平原作战经验，不利于在这一地区活动，遂决定放弃开辟光（山）罗（山）息（县）地区的计划，改向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恢复根据地。部队掉头南下。

6月7日，红二十五军南下途中，在罗山县的彭新店与敌第四十四师一三二旅两个团遭遇。红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当敌人进入伏击区后，我军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从东西两面实行猛烈夹击。敌人不支，向南退却，红军乘胜追击，一直追至彭新店以南的九龙河。

第二天，红军在殷家湾休息时，发现这股溃退之敌携伤兵回窜宣化店。红军立即出动，抓住战机，将部队运动至杨家店一带予以截击。敌人万万没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个“程咬金”，一个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两天两战，两战皆捷。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为在罗、陂、孝地区恢复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因屡遭失败，恼羞成怒，又以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第三十九师九十四旅和第一〇五师一部，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红军杨家店地区进逼，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向西压迫到平汉线而消灭



之。红二十五军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将计就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南下孝感会亭河、蔡店一带敌占区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6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挥师北上，在胡家冲、观音寨、杨平口等地给花园、夏店出动之敌以沉重打击，敌人吃尽了苦头，只好躲进了自己的老巢。

这时，敌人将第四十四师调往鄂东北的老河口地区。省委看到罗、陂、孝地区敌情暂趋和缓，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南北地区进行恢复和开辟根据地工作，扫清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分配土地。这样，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红军就在朱堂店至铁铺一带，恢复和开辟了一块南北长60余里，东西宽40余里的根据地，建立了朱堂店区和两个乡的革命政权，建立了有30支枪的游击队和200多人的赤卫队，扩大红军80余人。

这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即成为罗山、黄陂、孝感交界特区委（即临时县委）和独立团的所在地，随后也是红二十五军实始长征的出发地。

在朱堂店地区进行恢复和开辟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充分利用时间，狠抓部队的全面建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军事工作方面，部队比较集中地进行射击技术训练和班、排、连的战术演习，组织干部研究战斗指挥和战术动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克敌制胜的“方略”，这便是前文提到的“八会”。这是一种经验总结，也是红二十五军用鲜血和汗水转化成的结晶。它武装了刚刚在豹子岩会师的这支人数不算太多的队伍，武装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上这支“飘忽”着的革命力量。

#### 四 奔袭太湖县城

春天又来了。

大自然的春光仍旧是那么明媚，那么清秀，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在持续“围剿”与反“围剿”的大别山区，依旧是血与火的战场。千山万壑之中，仍然笼罩着一团团浓厚的战云。

震惊中华大地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早已失守。就在这一时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口号。1934年2月底，那位奉命一枪没放就退出东北的张学良将军又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命令东北军半数以上从华北开到鄂豫皖地区。4月中旬，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辖第一〇七、一一〇、一一七师）、何柱国第五十七军（辖一〇八师、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及刘多荃的第一〇五师，共9个师，陆续开到鄂豫皖地区。加上原在这一地区“清剿”的国民党军刘镇华部，共16个师又4个独立旅，80余个团，开始大规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就在此刻，鄂豫皖省委于4月10日召开了会议，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和创建新区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议论。会议还认为，无论是否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必须首先集中红军主力，以加强对敌斗争。为此决定：红二十五军利用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先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并一同返回鄂东北。

4月18日，豹子岩会师后重新整编的红二十五军接省委要求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通过潢（川）麻（城）公路以后，驻光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牛元峰部派出两个营尾随而来。红二十五军领导根据敌情和地形，确定打敌人一个埋伏！

徐海东再次显出其运筹帷幄的将领风采，一决定跟敌人打，作战方案便立即形成了：他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伏击区时，七十四师3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

面发起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 52 人，缴获轻机枪 10 余挺，步枪 100 余支。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

战后，红二十五军进至高山寨西南的省委驻地。吴焕先报告了部队的整编情况，眉飞色舞地介绍了高山寨的战斗经过。担任省委书记的徐宝珊听得美滋滋的。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尚在接防部署之时，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

省委于 4 月 20 日召开扩大会议。接着，4 月 25 日、30 日又召开了第二、三次常委会议，议论了反“围剿”问题，并作出了两个决议。

4 月 25 日通过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鄂豫皖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分析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沉痛经验和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教训，检讨了这方面的错误，同时认真分析了鄂豫皖地区总的形势和斗争特点，指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的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新阶段，是中国工农红军整个第五次反“围剿”的一部分，必须动员广大军民为粉碎这个新的进攻和恢复根据地而坚决斗争。

《决议案》全面分析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第一，根据地人民群众经过战争的锻炼，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仇恨和反抗，因而更加坚定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拥护，更加对红军热爱和支持；

第二，由于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及便衣队的有力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势力，有的地方反动武装如民团自动瓦解了；

第三，由于“共产党与红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打破了几年来赤白对立的状态”，白区群众多由分粮斗争，大批地起来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积极支持红军和便衣队斗争；

第四，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到鄂豫皖后，因为人生地疏，不善山地作战，又要求抗日，对蒋介石十分怨恨，因而“剿共”情绪不高；

第五，“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经过几年来的残酷‘围剿’的锻炼，政治工作得到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第六，省委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总结了经验教训，注意纠正过去的错误，“执行了布尔什维克的转变”，逐渐转到正确的斗争方针。

根据这些有利条件，省委有信心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当然，摆在面前的任务也是艰巨的。省委就粉碎五次“围剿”的任务及方针政策作了详细分析，并就加强党的领导、军事工作、大力发展游击战争、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

在4月30日通过的决议中，着重针对东北军的情况，提出了新的策略方针，强调除了在军事上坚决打击外，必须加强政治瓦解工作。

其实，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早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千古绝唱；也有不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成功范例。但只有在共产党的手中，才真正称得上掌握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秘诀，因为它被毛泽东视为打天下、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只不过这时的称谓是叫“统一战线”。

徐向前回顾在鄂豫皖斗争的经验中就说过，“开展政治攻势，

瓦解敌军”，“这一条很重要”<sup>①</sup>，其中，尤其是善于捕捉敌军的心理，如对被围之敌的喊话，就编成了很有趣又很“管用”的顺口溜：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  
本是穷人，理应反蒋；  
为蒋卖命，卖得哪桩？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  
一年到头，难见妻房。  
长官待你，何处一样？  
长官洋面，鱼肉鸡汤。  
你们吃糠，树皮啃光；  
更有兄弟，饿死床上。  
飞机运粮，有啥指望？  
红军围城，铁壁一样。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  
放下武器，红军有赏；  
若不交枪，困饿死光。  
来当红军，前途亮堂；  
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现在，红二十五军遇上了个想抗日且怨恨蒋又前来“剿共”的“东北虎”，抓住这个复杂的心理，红军展开了政治攻势。

高山寨战役后对俘虏的东北军，经过一番了解和说服后，大部分予以释放，剩下的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2页。

编成了一个班，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为贯彻省委4月25日、30日的会议精神，各政治部印发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其中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口号中，就有对东北军的几条：“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打）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起来，收回东北失地”。

政治部印刷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建立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招待处，或派俘虏兵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向敌人喊话鼓动，搞得十分活跃。军政治部还要求每次战斗后，对俘虏除大部分教育释放外，还应吸收一部分士兵和下层官兵参加红军，并选择一些人担任红军的机枪教练，以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及壮大自己。

这些工作对于瓦解东北军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正如1934年9月19日《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所讲：“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各部匪军中天天都有，以东北军为最多。哗变到我方来的前后共计数十人，都是东北军。一〇五师一个排打死排长，寻找我们未遇……前后吸收东北军数十人在红军之中。”<sup>①</sup>。

高山寨战役后那个留在红军中的“俘虏班”，经过教育后也补入连队，分别担任机枪“教官”。这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也是个十分有趣的在编职称，连队中所以增加这个“教官”，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高山寨战役就一下子缴了十来挺机关枪，都是些捷克式的新玩意，我们的机枪手掌握不了，卸都卸不开。因此让被俘后自愿留在红军中的那些人承担“教官”的角色，以便更好地使用掌握缴获的“捷克式”。

<sup>①</sup> 《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1934年9月19日。

每个连队的机枪“教官”，均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在日常生活中，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连喝稀粥时也得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都跟连长、指导员一屋同住，而且还得想办法支上一块门板，或铺点稻草……这在当时的艰苦岁月，也是一种莫大的特殊照顾，那些东北军士兵无不深受感动。

有两位担任过机枪“教官”的人物，值得一提。

一位名叫刘玉甫，会讲几句俄语，平时很喜爱喝酒，被俘时腰里还缠着个猪尿泡（盛酒袋子），盛着半袋子烧酒，动不动偷偷呷上两口。有次被营政委发现后认为这是“反动习气”，非要予以没收。刘玉甫死也不给，说他宁肯舍命，他不能丢掉“酒袋子”。吴焕先得知此事，当即为刘玉甫“开脱”，讲了军人饮酒应注意的事项，允许他把“酒袋子”带着，这算不上是“腐化行为”和“享乐主义”，也算不上是“反动习气”……刘玉甫乐得一蹦三高，嚷道：“我的酒袋子——乌拉！”从此，刘玉甫也就落得个“酒袋子”的绰号。

事隔50年后，1984年11月17日，当年在红二十五军中的小将周世忠这时已升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他在接受采访时还曾提到过“酒袋子”，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刘玉甫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这至少可以说，刘玉甫早已成为共产党员了。

确实如此，长征入陕后，绰号“酒袋子”的刘玉甫，时已当上了连长，而且加入了共产党。挽在后腰上的猪尿泡，据说已在战斗中丢失，从此也跟“酒袋子”断了缘分。藕断丝连，那个“酒袋子”的绰号则是叫定了，胆大的或者熟悉他的甚至喊他“酒袋子”连长！

郎献民也是被“赤化”后才真正走了“献民”的道路——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

作为一名机枪射手的郎献民，即使被俘后也不听信什么“政

治教育”、“赤化宣传”。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饭，就为谁打仗！当时，军政治部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问题编印讨论大纲，发至每个基层单位，以“问答会”的形式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将省委的方针、政策贯串到战士中去。有一次，郎献民所在的连队举办“问答会”时，他恰好抽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什么动作？”

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

指导员笑了笑说：“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

他随口又道：“这不是我考虑的事。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轰然大笑。

这位政治讨论问答会上闹过笑话的郎献民，不久同样被“政治化”了，不仅要求参加红军，而且积极申请入党。

在红军战士普遍掌握了捷克式轻机枪的射击操作技能后，“机枪教官”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领导决定让郎献民担任二二三团二营四连连长。而后，很快又当上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郎献民已升任二二五团团团长，在榆林桥与东北军第一、七师作战中壮烈牺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每一位东北军听了红二十五军军部宣传队编制的这首凄凉动人的歌，哪一个能不为之动容？



然而，就在朱堂店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展了全面建设包括有针对性地瓦解东北军工作时，前来“围剿”的张学良又烧了一把火，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100天“围剿”计划，使用了15个师又3个独立旅共70多个团的兵力，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敌人将鄂豫皖划为6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平汉铁路）”，并以2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对红军主力实行跟踪追击。

张学良夸下海口，要在3个月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7月初，敌人即开始行动，向红军压了过来。

7月12日，敌一一五师姚东藩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协同护路队一〇五师刘多荃部一部，从东西两路向朱堂店地区大举进犯。红军主力为避强击弱，掌握主动，即由朱堂店向铁铺以东地区实行转移，与东北军展开了“推磨”战术，打起运动战来。

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从殷家冲向何家冲转移，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时，徐海东从望远镜里发现前面山坡上全是敌人，山头上架着3门迫击炮，朝西方盲目射击；几顶黑色帐篷也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

徐海东马上与吴焕先政委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打它个出其不意！”

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比较狭窄，敌人只不过是夜间借以宿营，并无工事可守。只要红军将敌前面的部队打垮，后面的敌军就无法展开，红军再乘势压过去，必能获胜。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按作战方案开始行动：第二二四团一营攻击岳家沟以西敌之排哨，消灭该敌后，继续向敌纵深猛插；第二二四团二、三营攻击岳家沟以南敌之连哨，消灭该敌后，即向长岭岗至岳家沟之间之敌第六四三团（欠第一营）实施腰击；第七十四师（欠第一营）俟第二二四团得手后立即加入战斗，协同

该团向纵深进攻，消灭长岭岗一带的敌人。

9时，第二二四团一营首先以迅猛的动作将敌排哨消灭，接着，乘势将敌第六四三团一营打垮。与此同时，该团二、三营也将敌连哨消灭。敌第六四三团二、三营急忙向岳家沟以西增援，红军第二二四团二、三营分别在军长、政委的指挥下，从左右两侧向敌猛攻。顿时，长岭岗枪声四起。

敌人原来只知道这一带有红军的游击队，没有料到红军的主力会突然杀来。等到他们感觉不妙时，摆在长岭岗上的一个团已被红军拦腰突破。敌人呆在光秃秃的山上，这才发现此处既无工事，又无险可守，进退两难，退不了，不由得心慌意乱，乱作一团。

正当红二十五军同敌人酣战之时，在附近活动的地方武装也占领了长岭岗以北的高地，配合主力作战。

红军指战员如虎添翼，越战越勇，一边冲锋，一边喊道：

“缴枪不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东北军弟兄，快投降吧！”

“……”

在红军的三面夹击和有利的政治攻势下，敌第六四三团顿时混乱，纷纷奔路而逃，团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身逃往长岭岗师部。

红军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向敌师部冲来，敌师长见势危急，慌忙令第六四四团派两个营占领长岭岗以西阵地，企图阻止红军攻击。但眼看第六四三团溃兵的抱头回窜和红军的猛烈的冲击，这两个营被吓破了胆，无法前进，只得仓皇在其师部附近就地抵抗，掩护师部及第六四三团残部向东北逃窜。这时，红军第七十四师的两个营也投入战斗，向敌猛攻。敌人两个营被迫后撤。于是，红军以5个营的兵力乘胜追击，敌人纷纷缴械投降。绰号“姚二

愣”的敌师长姚东藩，率残部向倒座湾遁逃而去。

长岭岗一仗，给张学良的3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敌第一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两个团，遭到歼灭性打击。战后，该师残部即调往孝感休整，师长姚东藩亦被撤职。两年之后，张学良仍不忘此事，说二十五军在湖北一伸手，“姚二愣”就垮了！

战斗中抓得俘虏400多名。各级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别对俘虏兵进行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其能够为红军服务。不愿意当兵的，全部发给路费，予以释放。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亲自与留下的东北军士兵谈话，对他们进行教育。数十名经过教育的东北军士兵分别编入连队，担任红军的机枪教官。

长岭岗战斗是红二十五军豹子岩会师改编后的第二个漂亮仗，使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此役缴获的大批新武器，使红二十五军的装备大为改观，不少连队配备到9挺轻机枪，有几个营全部换上了“奉天造”的新式马步枪。全军上下，战斗情绪十分旺盛。枪，对于改善劣等条件下的红军队伍，确实有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少年轻战士背上新式的枪高兴得走来走去，神气得要命。

与此同时，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也加强了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戴季英还多次给驻扎在光山县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写信，并送去许多传单和标语口号，试图与其建立联系……所以这些工作，对东北军官兵产生了政治影响，在东北军士兵中秘密流传着“不打红军，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常有一些零散东北军官兵自动投奔红军。

红二十五军随后又采取飘忽的游击行动，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搞得敌人晕头转向。8月初，部队转向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活动。当敌人3个追击队和第三十二师及1个独立旅对红军再次实施合围之际，省委考虑到继续留

在这一地区活动不利，遂决定红二十五军再次向皖西北地区行动。敌人的合围计划还没有完全布置妥当，就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地区的熊家河，即大踏步地回旋活动于商城、六安、英山之间的广大地域。其间，摧毁了不少的民团堡垒围寨。8月25日，在独立郝集击退敌第十一路军独立旅的进攻，毙伤敌100余名，俘敌400余人，缴枪3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皖西北的广大军民，在红军主力离开期间，坚持了英勇斗争，并取得很大胜利。新组建的红八十二师，于4月中旬完成掩护红二十五军转移鄂东北的任务后，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打下了长竹园，袭击了四姑墩，拔掉了苏仙石附近的围寨，奔袭了罗田县与金寨县交界的西界岭。这些胜利，为红二十五军转到皖西北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

为了扩大红军主力进入皖西北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攻打英山县城。

英山县，同鄂豫皖边区的其他城镇一样，盘踞着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占据着主要的土地，对农民进行层层剥削。在英山县文化馆还收藏着一张当年地主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地租契约。契约全文如下：“主凭东约人胡春晖，今凭得东主余静修批种三石，自凭之后，东主呼唤即到，须传须到，不得迟缓片刻，无论风霜雨雪。恐口无凭，立此为据。”<sup>①</sup>

这是地主对农民压迫的例证。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盼望着红军的到来，渴望自身的解放。

徐海东在英山城下，试探性地指挥部队攻了一下，发现城内

---

<sup>①</sup>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简史》，第250页。

驻有敌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个团，还有不少的地方民团，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一看不能攻打，就把部队撤了下来，立即建议省委改变作战计划，与其以很大伤亡攻打英山，不如远距离奔袭太湖县城。太湖县城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力量薄弱，红军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胜利把握较大。同时，太湖县城距离安徽省会安庆较近，物资丰富，攻克后能更好地解决部队的给养，政治影响也更大！省委认为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决定远程奔袭太湖！

徐海东后来也回忆说：

“长岭岗战斗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试探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20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sup>①</sup>

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向来都是十分紧张、繁忙的，尤其是有不少干部、战士对放在眼前的英山城不打，偏要舍近求远到200多里外的太湖，一时想不通。尤其听说夜里还要走130多里，也有不少怨言。这时，就特别需要发动、鼓动、宣传，打消大家的疑虑。

“甩开膀子磨脚板，一夜走它百二三。”战士们发出了豪迈的誓言。部队继续施展“昼伏夜行”的本领，于9月3日傍晚17时，从英山东北的杨柳湾出发，当夜行军40余公里，隐蔽地进至太湖西北的回龙湾。

<sup>①</sup> 徐海平：《生平自述》，第34～35页。

敌人也听到了一点风声。一方面派太湖自卫团团总胡鹿鸣带领两个中队160余人进驻李杜店、太湖河一带，企图抵御；另一方面电请潜山自卫团来太湖援助。但当红军进入牛凸岭、龙湾等地时，敌军探知红军声势浩大，来势英勇，怕引火烧身，伪自卫团两个中队不战而逃，龟缩到宿松方向去了。

9月4日下午，红二十五军抖擞精神，行军60余公里，直奔太湖城。

晚10时许，太湖城内静悄悄的。在夜幕的掩映下，隐隐约约能看见城头上晃动的人影，值班的士兵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不时地竖起耳朵，探听着远方的狗叫声，心里禁不住打个冷颤，睡意皆消。

这时，红军兵分两路，迅速靠近了北门和东门。

突然，行军吹响了攻城号。吴焕先率领的红军主力像离弦的锐箭，从东门城墙上猛冲上去。这时，守城之敌见红军黑压压地爬上了城墙，慌忙向西关、南关和东门三路逃窜。

徐海东率领红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东门进入。此时，守城之敌潜山自卫团妄图从东门逃窜，正好与主攻东门的红二二三团相遇。红二二三团全歼敌潜山自卫团80余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顿时，东门城楼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

按照军政委事先通知：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信号。两处城门得手后，随着阵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一面冲锋，一面搜索，杀声震天，两路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sup>①</sup>刘震回忆说：“于半夜时以神奇动作攻占了太湖县城，消灭伪安徽省警备派一部，缴获了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战后，全

<sup>①</sup> 《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2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7页。

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当时经常露宿，所以大家都高兴地说：‘一把伞就是一间房啊！’”<sup>①</sup>

徐海东也自豪地讲：“我军仅以牺牲1人，伤3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sup>②</sup>

远程奔袭太湖县城的胜利，鼓舞了群众，振奋了军心。当天，军政治部就组织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县城内外，一片热闹景象。其声势影响之大，遍及附近几个县境。据记载：“太湖、霍山许多地方群众，自动抗租子和高利贷；潜山、宿松一带起来杀反动、打游击；合肥、屯溪发生了很大的爬粮暴动；以上地方，有些穷人自动跑来参加红军。”<sup>③</sup>

之后，全军两个师分开活动：军长徐海东率领第七十四师南下蕲春县张家湾一带，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军政委吴焕先则率领第七十五师，就近在陶家河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地区恢复了纵横近20公里的小块根据地，成立了区委和两个乡政权，分配了土地，镇压了大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张学良3个月“围剿”计划的最后一天。驻扎在鄂豫皖边区的16个师又4个独立旅的军事长官们，都雄心勃勃地期待着“双十节”的到来，好举杯相庆，“以竟全功”！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天，鄂豫皖省委于红二十五军的驻地——陶家河，发布了《为粉碎五次“围剿”告劳苦群众书》。其中宣传了奔袭太湖县城的胜利，以事实向群众宣告：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劳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① 《刘震回忆录》，第42页。

②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35页。

③ 《鄂豫皖省委》，《为粉碎五次“围剿”告劳苦群众书》1934年10月10日。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张学良的3个月“围剿”计划，实际上也宣告破产。

然而，新的“围剿”计划接踵而至。

红二十五军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

## 第四章 转 移

### 一 程子华来到鄂豫皖

鄂豫皖省委深深体会到，自红四方面军走后，他们面临许多困难：缺粮、缺枪、缺干部……

1933年1月5日，省委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联名向中央请求：“务必设法多派干部来，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估量中央无积有大批干部调到苏区来，至少请派10人左右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能领导全盘工作的干部来苏区，除党的工作人员以外，军事高级干部亦请多派几人，这是我们迫切的要求，务请中央答应我们，并立即派来，知道中央干部也是困难的，不过这个苏区目前的状况，实在是干部缺乏，困难到不可形容，请中央务必设法帮助我们。”<sup>①</sup>

兵败七里坪后，省委多次讨论过向中央要人的问题。沈泽民病中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再次提到：“我们现在完全成了井底之蛙，工作上也难以领导得好。”“请中央注意派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以具体的指示。”

成仿吾也带着“向中央要军事干部”的使命来到了中央苏区。

……

中央也在时刻关注着鄂豫皖。

193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发出

---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报告（1934年9月19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期，国防大学印本，第348页。

了一份标有“急！绝对秘密！”的军事训令。训令中最后还特别提到这样一句：“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帮助你们工作。”

所派的军事干部是谁呢？

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9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由中央苏区来的权同志于8月28日已到苏区了，所带来之7月29日补充训令及7月×日中央秘密通知（并于组织抗日先遣队），7月1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文件共计三都收到了……”<sup>①</sup>

其中提到的“权同志”，即程子华同志。

程子华，山西运城解州人，1905年6月20日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彭湃领导的保卫海陆丰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斗争，不久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未学完，就接到了去鄂豫皖的新任务。对于这段经历，程子华有过详细的回忆：“我在‘红大’学习不久，鄂豫皖省委派宣传部长成仿吾经上海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中央决定派我去。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周

<sup>①</sup> 鄂豫皖省委报告（193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教学参考资料》第15期，国防大学印本，第374页。

副主席讲如何建立新区时指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该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势和前途是这样的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sup>①</sup>

有趣的是，成仿吾如何在上海找到中央的这一细节在《成仿吾长征回忆》一书中查不到，在《程子华回忆录》中记载得颇为详细：“1975年，我在中央党校读书结业时，住在那里等候分配工作。这时成仿吾是党校顾问，就住在附近。有一次我俩谈起1934年那段事情，他讲道，1933年夏，他从鄂豫皖到了上海后，找不到党的关系。他想起了鲁迅先生，估计他可能是党员，就到四川路内山书店去找内山完造。内山完造与鲁迅关系很深。他找到内山完造后，就说有要紧事必须见鲁迅先生。内山完造说：你过两天来听信吧。两天后内山完造告诉他说：明天下午你到四川路咖啡馆去，鲁迅在那里等你。仿吾按时到了那家咖啡馆，见鲁迅和茅盾一起在那里喝咖啡。仿吾坦率地讲了自己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有要紧事通过上海党找党中央，问鲁迅能不能帮助联系。鲁迅说可以。这样仿吾才找到了党的关系。”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为什么详细写这一段呢，他解释说：“因为不少人看鲁迅的《而已集》、《三闲集》，只知仿吾、鲁迅笔战激烈，关系不好。上述事情可看出，他二人虽有笔墨之争，但在有关党的利益之时，仿吾毅然找鲁迅，鲁迅先生也毅然帮仿吾接上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党的关系。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sup>①</sup>

程子华的顺利到达，以及所带来的3份密件，是与那位往返穿梭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神秘人物”——党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分不开的，石健民是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的向导，又是沿途担任交通联络、负责安全保障的得力卫士。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这次极不寻常的护送任务。

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他们都装扮成普通商客，随身带着几样简单的行李，搭乘一艘普通的客轮，沿长江逆水而上，直抵武汉。

在汉口码头，他们发现敌人的岗哨林立，盘查很严。许多稍有疏忽的男女乘客，有的因为身分证件不全，或因为盘查中露出破绽，就被当作嫌疑分子强行搜查，接连抓了好几个无辜者。石健民常来常往于汉口码头，对付敌人的盘查从容自若，也有一套随机应变的方式，没费多少口舌即被放行；程子华在武汉读过书，对这些城市很熟悉，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盘问。这样，他们才找到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小客栈，暂且住了下来。

临时决定搭乘北去的火车时，他们考虑到二人的年龄相同，口音却不一样，走在一起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容易惹起麻烦事儿。于是，石健民又改装成老百姓，程子华仍是地道的有钱人打扮，二人一前一后相跟着，表面上装作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实际上则以眼神、手势作为暗号，互相照应着步入汉口车站。

石健民凭着他那一套随机应变的巧妙方式，神情自若地走在前面，很快就通过了军警森严的检票口，慢步走向站台。可是，程子华却被宪兵拦住了去路。程子华回忆说：“我和交通员石健民要由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去柳林，那时，我是有钱人打扮，进站时，石在我前面顺利通过，我被宪兵留住，问我是到哪里去的。我说是到鸡公山去游览。宪兵搜完箱子，还要搜身看手。我左手指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63~64页。

因受过伤已伸不直，恰巧我手里有把扇子，就用左手握着扇，举起右手让那人查看手上有没有用过枪的硬皮。他没有看出什么，又看我的左手，我就握着扇子让他看，他没发现我枪伤的手指。但检查后还是叫我坐在候车室的凳子上不让走。石健民发觉我没有跟上，就下车到门口来找我，我用目光示意他不要进来。因为如被宪兵发现我们两人是一块走的，他就可能分别审问我俩，口供一定不能一致，就会被敌人逮捕。直到火车快开了，那家伙才放我走。上车后，我不知道石健民在哪一节车厢，就从前往后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过去。走了好几节车厢才看见石坐在那里，我没有和他打招呼，找一个位子坐下。开车后，我从行李里拿出一套衣服，走进厕所换下了身上原来的那身衣服，把它卷起来塞到便池洞里。”<sup>①</sup>

北去的火车上，倒也平安无事。两人像素不相识的乘客，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火车开到柳林车站，两人同时下了车。石健民找到一个秘密接头处，打听了周围的敌情动态，随后便把这位“卸了装”的“商人”程子华妥善安排在一户地下党的农民家里，暂时住了下来。

几天后，他们又踏着月色，一步不停地奔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准备赶往鄂东北道委。忽然，一支埋伏着的武装队伍冲了上来，把他们两人“活捉”。所幸的是他俩有惊无险、虚惊一场，原来都是自家人，是一支迎接他俩的便衣队。在他们的护送下，才算安然无恙地到达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

这时已是1934年9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北艰难地“飘忽游击”。程子华在鄂东北一等就等了40多天。

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被粉碎后，为继续加紧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月初改组并加强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64~65页。

“追剿”部队的力量，将总兵力由 11 个团增至 16 个团，编成了“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下辖 5 个“追剿”支队，上官云相为“追剿”支队的总指挥。10 月下旬，敌第二、第三“追剿”支队由英山、罗田出动，进攻我陶家河游击根据地，我军与敌激战两天，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 280 余人。这时，敌人第一“追剿”支队赶来增援，红二十五军撤出战斗，向南溪葛藤山一带转移。

11 月 4 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葛藤山时，恰好遇到了当时留在鄂东北养伤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奉鄂东北道委之命，扮装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及时送来了郑位三的来信。信的大意是：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北来找我们。<sup>①</sup>

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多少次的书面提议、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多么使人兴奋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眼下要奔赴鄂东北，必然要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东北军第一〇七师、一〇九师、一一一七师和 8 月间调来的一二九师，早已在沿途设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又指挥五支“追剿”支队，紧紧跟追在后……

明知征途有艰险，但为了迅速到达鄂东北，徐海东和吴焕先决心以出其不意之举，选择正面敌人的薄弱环节，突破敌人的封锁防线。

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把不能行动的伤病人员和比较笨重的行李挑担，暂时留了下来。11 月 6 日晚，全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

7 日，红军以突然奇袭的手段，将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池之敌第

---

<sup>①</sup> 徐海东：《回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党史资料》1954 年第 10 期。

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工兵营全部歼灭，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第一道防线。

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击溃敌第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两个团的堵击，歼其一部，接着又打垮了赶来增援的敌第一〇八师先头部队，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防线。

当夜，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防线，即自双柳树至新集的封锁线。

紧接着，部队边走边战，强行突破敌人经营已久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即第四道防线。8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到达光山县东南50里处的斛山寨。

一天两夜之间，部队急行军200余里，途中经过几次激战，部队已十分疲劳。军领导决定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后，再继续西进。谁知刚刚休息了约两个小时，敌第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各一部共4个团和第四“追剿”支队（第六十师3个团）、第五“追剿”支队（第六十五师3个团），总共10个团的兵力，都紧紧跟踪而来，分别从东面、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也乘飞机在战场上空亲自督战。几架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情势十分危急，红二十五军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是“走”还是“打”？红军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如果以“走”仓促转移，势必更加被动，不但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尾追，很有可能遭到覆灭的危险。到此地步，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以英勇顽强的生死搏斗，打垮或消灭一路进攻之敌，方能争到一线生存的希望，趁机夺路而“走”！

徐海东和吴焕先分析了“势在必打”的情势，定下了“以打取胜”的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于是，调整了部署：以七十四师扼守斛山寨制高点，从正面牵制和消耗敌人；以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协同二二三团向敌第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实施反击；尔后再集中兵力击敌第四、第五支队，力争将其全部击

溃，并歼其一部。

按照部署，徐海东亲自率领第二二四团沿寨北山坡隐蔽迂回到敌第一〇七师后，突然向敌侧翼猛攻；二二三团趁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溃退。两个团乘势猛攻敌第一一七师，该敌不支而溃；接着，红军两个团集中力量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第七十四师也乘机发起反击，将敌压至朱家坳一带。我军居高临下，勇猛冲击。敌人在我三面夹击下，纷纷溃散，仓皇逃窜……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终于以“打”赢得了“走”的可能，变被动为主战，扭转了危急局面。

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人约4 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红军也伤亡数百人。战斗中战士们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机动灵活、能攻善守的战斗作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红军第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负重伤后牺牲。当时已升任连指导员的刘震也回忆说：“这次战斗后，天气已经很冷，全连好赖都穿上了棉衣，我还是个光膀子，实在冷得不行，才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件红花棉袄紧巴巴地穿在身上，外罩一件灰布长衫，有些同志曾以此作为笑料，但我觉得在艰苦的环境中只要战士们能穿好就行了。”

朴素无华中见真情。人们说红二十五军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其实并不尽然。广大干部常常是这样表现自己的：“军首长与战士同甘共苦，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饭食送给伤病员吃，有的还亲自用南瓜瓤子为伤员敷伤治疗。行军中，干部帮助战士扛枪、背背包；宿营时，干部给战士烧水洗脚。……”<sup>①</sup>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作风，全军上下的关系能不紧密吗？

进入鄂东北境内，接连又奔了一天一夜，到达光山县以西的花山寨，这才与鄂东北道委相遇。同时，省委还收到中共中央 1934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03页。



年7月26日《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至此，终于完成了奔赴鄂东北的紧急任务。

11月11日，省委在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讨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说来也巧，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这时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唯独高敬亭留在皖西北，接替了郭述申的领导工作，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有半年之久的酝酿过程。3月中旬，吴焕先在三里城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革军委文件，就曾提出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于4月间召开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暂时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向中央作了报告；7月1日，省委又收到中央1934年2月12日的指示信和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指示信中，针对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红军主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并说“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如果“再固执‘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关于新区的选择，指示信中原则性地提出了下列条件：“（1）敌人力量比较薄弱；（2）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争取者；（3）地形有利于我们的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指示信还要求鄂豫皖省委“依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里，虽然对省委

的“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的提议原则上同意，但同时也提到“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7月5日给中央的报告里，一方面提出了继续留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新区的理由和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中央命令河南省委“把豫南及平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以便根据敌情的变化规定红军临时的动作”。

得到中央及军委的同意后，省委即领导红二十五军转入开创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半年来，从鄂东北到皖西北，每天总是飘忽来飘忽去的，在一个地方也待不了多久。虽说开辟出了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根据地，但在这两块小地方住得时间久了，势必招致敌人的围攻。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地又屡遭敌人烧杀抢劫，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摧残，这种局面短时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继续留在鄂豫皖斗争，还是实行新的战略转移，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程子华回忆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小的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仍是：在老苏区边沿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四千，能不能打败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对？省委举棋不定。”<sup>①</sup>

就在程子华等待红二十五军奔赴鄂东北的40多天里，已和郑位三及在鄂东北道委机关工作的程坦、刘华清等充分交换了意见，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

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and 周恩来的指示，在花山寨会议上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的斗争形势，郑重讨论了今后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70页。

的行动方针。大家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够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因此，省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二十五军跳出困境，摆脱强兵，走上了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从此以后，红二十五军就开始了长征的历程。

对这次决定红二十五军历史命运的花山寨会议，程子华有过详细的回忆：“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郑位三同志向我传达了常委会讨论情况和决定，会议上常委会一致同意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向东、南、北都不合适，向西比较容易发展。西面鄂豫陕边是三个省的边缘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里不是山区。会议还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發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豫西的伏牛山为初步目标。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诉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吴焕先为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等三个团和一个手枪团，全军2 980多人。”<sup>①</sup>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71～72页。

出发前夕，鄂豫皖省委曾给远在皖西北的高敬亭发出指示，决定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为争取迅速、突然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即西移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全军指战员大部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对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妥善作了安置。

部队出发前的政治动员中，提出了两个鲜明而又巧妙、同时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

别了，巍然耸立的大别山！别了，鄂豫皖的父老乡亲！别了，这患难与共的鲜血染红的土地，红二十五军的摇篮。

红二十五军走了，红二十八军于1935年2月3日在太湖凉亭坳再次成立，高敬亭为军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摧残、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独立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用鲜血染红的旗帜，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 二 初上征途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

红二十五军长征从此开始。

其实“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无论是中央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那时对于这次转移，内部的说法或者叫“西征”，或者叫“打远游

击”等等。对外公开的说法则是“北上抗日”，这一点是共同的。

在红军长征史上，有“三支先遣队”之说<sup>①</sup>。指的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决定派遣三支部队突围远征。这三支部队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

1934年7月6日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式出发。这支由红军第七军团组成的队伍，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曾洪易等率领下，前后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多次重要战斗，吸引了国民党近20万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但这支部队最后被敌人围困在方圆15里左右的怀玉山区，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伤亡散失。

继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师一个月之后，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奉党中央的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的率领下，担负着为中央红军侦察突围西进的道路上道路的重任出发了。这次西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起到了先遣队的探路作用。

3个月后，第三支先遣队出发了。这便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的红二十五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说红军长征有“两支”先遣队也不算错。因为原始的档案是最有力的证据。

根据省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出发前，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起草了一份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群众们！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

<sup>①</sup>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已经几年了。今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伸张强盗的血手，进占我整个华北和内蒙，并从南方进攻我福建。卖国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出一个兵、花一文钱去抗日，并且法西斯蒂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已经与“满洲国”通了邮，通了车，减低了日货的进口税，使整个中国成为日本的市场，把北方几个主要铁路的权利交给日本去了。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把北方军队统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

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日本帝国走狗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军队，阻拦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北上。本军现在开始出发，卖国的国民党一定是要调动他的队伍阻拦我们的，本军当然要沿途扫除国民党的阻拦。

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反日工作：

(一) 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队、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二) 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言论结社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

(三) 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屠杀压迫本国群众和

进攻苏区。

(四)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以及正在制造和从外国买来之武器，来武装全体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五)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

1.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和商品。
2. 停付日债一切本息。
3. 没收一切卖国者的财产。
4. 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

5. 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苦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活动。

(六)动员广大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

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华北失地！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学良！

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

拥护中国共产党！

《宣言》义正辞严，既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新的进攻形势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又鲜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和政策。

这份出发前的《宣言》所注日期是11月16日。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红二十五军的《宣言》书既是一种宣传，又是一种播种，它已宣告了红二十五军要开创一件从

未有过的大业。

长征，已经过去60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显示出它灿烂的光辉，永不消逝的魅力。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中，称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1984年10月15日，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纪念中国红军长征50周年，热情称赞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奇异诗篇”。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把长征盛赞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举世无双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虽然没有雪山草地，但同样也是艰难的、坎坷的、漫长的，……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作为一支单独行动的孤军，自然又有一段与众不同的远征……

1936年在《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上刊登了一篇《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的文章，开头这样写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文章中特别强调“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这支“儿童军”早在童稚时代就接受了深刻的“政治教育”，正如《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所描述的：“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到18岁。”



从这支队伍的组成和年龄结构上看，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儿童军”。就其领导成员来说，军长程子华当时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年岁稍长一些，也不过34岁。那时的团营干部多是20岁出头。韩先楚、刘震、陈先瑞，曾经是一个班里的战友，长征时都是20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一大批连排基层干部，年龄大都不到20岁。在军部机关工作的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栻、何光宇、廖辉等，也都是十七八岁。长征中担任过军的共青团委书记的尹昌尧，1944年随三五九旅南下时改名为黎光，在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才只有17岁，当时有不少人张口就喊他的外号——“汤圆子”。

黎光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长征路上的年轻人》，对这支“儿童军”作了认真的沉思和回忆。他深情地说：“以青少年居多的红二十五军，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八九岁的小娃娃，为数也不少。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经历了不平凡的长征历程，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有个人称‘可爱的小兄弟’、名叫匡书华的儿童团员，长征时只有十一二岁。他是河南光山县匡家湾人，听说他有个红军的堂兄，名叫匡占华，在连队担任炊事班长。长征出发前，匡占华有一次回到村里，看到村子被敌人烧光了，就领了六七个走投无路的青少年，跟上他当了红军。其中就有匡书华。可是，别的青少年当上了红军，补入战斗连队，唯独匡书华的年纪小，个子也矮，没有被批准。可他就是跟着队伍，一步也不离开。长征路上，他跟在哥哥的炊事班，经过千里转战，到达陕南。他的哥哥匡占华，到陕南后牺牲了，失去了唯一的亲人。炊事班的同志对他更加体贴照顾，都喊他‘可爱的小兄弟’，全班都是他的亲哥哥。西征北上途中，全班都帮助他随军行动，从陕南到陕北，始终没有掉队。到陕北以后，领导上考虑他跟着部队走了几千里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尽管年龄很小，还是批准他成

为一名红军战士，当了红军的小宣传员。”<sup>①</sup>

黎光还回忆了另外一件感人的事。第二十二团的供给处，有相依为命的父子俩。父亲名叫熊发龙，六安县人，当过乡苏维埃主席，是个剃头匠出身。他就是背着个八九岁的儿子参加红军的。长征出发时，部队虽然精兵简政留下不少老弱病残，但他还是把儿子背在身上，随军出发长征。按说当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如果被上级领导发现，非留下来不可，因此，父亲只好偷偷地领着儿子，白天装在布袋里面，跟着部队行走，以防被别人发现“目标”。好在熊发龙编在供给处，不是战斗连队，能够“掩护”过去。正如人们所说，“纸里包不住火”。这句话用在老熊的身上，则成了“布袋里包不住儿子”。后来还是被领导发现了，但生米已煮成熟饭，背着走也就是罗。老熊的儿子叫熊开先，大家都很喜欢他，没有人叫他“小熊”，而是喊他“小开子”。“小开子”也很懂事，挺逗人喜爱，问他长大了干什么，他眨巴眨巴眼睛，挺起小肚子说：“要当红军！”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大家开怀大笑。一路上同志们轮流背着抱着，从大别山奔走到陕南，又从陕南转战到陕北。可是，这个随着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娃娃”，仍不够参加红军的年龄，未能正式当上红军。抗战开始后，他才当了一名“小八路”，后来还当上了连长。

这支神奇的“儿童军”，扛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大旗。

长征出发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寨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察，乘敌人部署的间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于当晚由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继以两天的急行军，经由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闪电般地进入桐柏山区。至此，终于迈出了战略转移的

①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15页。

第一步。

这次大转移，尽管注意了保密，从上到下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国民党的最高指挥机关，仍然发觉了这支红军的动向。

据说，蒋介石一听红二十五军过了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惊呼：“我们太大意了！”

蒋介石料定红二十五军有“西窜入川”的企图，急令“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并命令驻河南省南阳、泌阳、方城等地第四十军庞炳勋部、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的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阻我西进。敌人妄图以30多个团的兵力乘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出之际，一举包围而歼灭之。红二十五军刚刚踏上新的征途，就面临一个严重局面。

桐柏山位于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红军进入桐柏山的第二天，中央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急匆匆来到红二十五军的军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一带的基本情况，鄂豫皖省委又派人作了实地考察，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立即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进，到伏牛山区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为了隐蔽向北行动的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50里之洪仪河、太白岭、界牌口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

敌人果然中计。红军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了枣阳，各路围追堵截之敌，纷纷向这一带靠拢集中，形成合围之势：

第四十军大部兵力推进到新野、唐河、赊旗镇（今社镇）之线；

“追剿纵队”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先后到达桐柏以西地区；  
第四十四师已进至枣阳城附近。

摆出了一口吞掉红二十五军的阵势。

敌人越聚越近。红二十五军在等待最佳时机。

22日，红二十五军突然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并在保安寨冲破敌人“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堵截，然后转向东北行动。

23日，红二十五军又在桐柏山以西的歇马岭、栗园一带击退“追剿纵队”第二支队的进攻。黄昏后，由张星江带路，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由马谷田、刘庄铺、贾楼等地，直奔象河关而去……

当时，敌四十军的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第五师，均已南下到桐柏以西地区，原来所驻守的泌阳、方城、叶县等地，防守兵力比较空虚。因此，军领导决定以紧急行军日夜兼程，乘虚北上，预定在两三天内，抢在敌第四十师主力之前，快速越过平原地带，继而穿过许（昌）南（阳）公路。

从泌阳以东向北，是另一种“天地”。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

围寨，是这一带的一大“景观”。许多较大的围寨，都是高墙耸立，栅垒重叠，为地主豪绅们所盘踞，封建势力雄厚。每一围寨之内，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多者有数百条枪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寨墙外围，还筑有几丈深的城壕，四周深水环绕；围寨的进出口处，架有一座座随时可以起落的吊桥。正如芦阵在回忆中所讲：“平原地带的村落围寨，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有的则以烽火报警，遥相呼应，形成几足鼎立之势。嗬，简直就像一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sup>①</sup>

部队一进入平原地带，就不时遭到围寨武装势力的骚扰阻拦，行动也十分缓慢。每路过一座围寨，总得有点伤亡。强攻又不易

①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35页。

攻破，过又不便通过，即使绕道而走，也难以摆脱地主武装冷枪冷炮的骚扰。同时，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常于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同其追堵部队联络，并借机造谣惑众，诋毁红军声誉。人为制造矛盾，加重了红军前进的困难。

习惯于山地作战的红二十五军不曾想到，这中原大地的村落围寨，竟然密如蛛网；每一座武装据守的围寨，竟成了不可随意逾越的“拦路虎”。

遇强智取。过“围寨”的方案终于形成了。

从马谷田附近路过时，吴焕先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亲自跑到各团召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每一次会上，他都拿着一张北上抗日的“出发宣言”，从头至尾念上一篇，当众讲道：“钟不敲不响，灯不拨不亮。现在，我们就是要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广泛散发我们的‘出发宣言’，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民族危急的深重，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把枪口一致对外！对于每个围寨的封建武装势力，全军上下都要开展政治攻势，晓以民族大义，好为我们让开一条通路。为的是争取一切时间，穿过围寨区域，迅速北上！各级领导一定要严格掌握部队，不要随便发动进攻围寨，即使受到火力阻拦，也不可多加纠缠。因为时间紧迫，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我们纠缠不得，也耽误不得！”<sup>①</sup>

吴焕先讲明了过“围寨”的政策后，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了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  
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35页。

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  
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

他还一再要求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群众纪律，要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总而言之，要想在两三天之内顺利地通过围寨区域，不能只是依靠枪杆子，必须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

在关键时刻，政治指导员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党的政策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概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人们把军政委吴焕先称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魂”。

吴焕先早年曾经担任过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原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搞“政治”算得上是自己的本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行后，他又临危受命，承担起军长的重任。自从豹子岩会师后，他又“重操旧业”，担任了军政治委员。

凭心而论，吴焕先担任军长一职期间，也有过出色的战绩。但他作为“政治指导员”的成就显得更耀眼、夺目。

他在最初担任箭场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的时候，党代表在那时的一举一动，都是无声的命令，包含着不可抗拒的政治威力！1928年秋天，他带领农民自卫军在箭场河以北地区开辟工作时，被一营敌人包围在山上，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吃过一顿饱饭，饿得难以忍受。山坡上，恰好有一块红薯地，被他看地形时发现了。30多个饥肠辘辘的自卫军队员，这时也眼巴巴瞅着那块红薯地，想着已经成熟的红薯。但是，没有党代表一句话，谁也不敢动手去挖。他一再安慰和鼓励大家：

“我们是农民自卫军，就得想到农民群众的利益，挖一颗红薯事小，破坏我们的名声事大！”

同志们听了，谁也没有一句怨言，仍以野菜野果充饥。等到第三天夜里突围时，为了给每个战士增加点气力，他才批准了每人挖几块红薯，填了下肚皮。但他却把身上的一件衣衫脱了下来，紧紧包着几块银元，埋在红薯秧子底下。红薯地里埋银元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中传为佳话。也在当地广为流传，后来又进入了正式的教科书，被当作遵守群众纪律的典范。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为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过那场鲜血淋漓的“肃反”之后，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这些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总是跟“肃反”两个字扭在一起，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以至后来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宁愿做个军事指挥人员去冲锋陷阵，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而招入讨嫌。由于这个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在一段时间内很不健全，谁也不愿意补这个空缺。

豹子岩会师后开辟朱堂店根据地的过程中，吴焕先为了健全各级的政治委员制度，增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他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首先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五清、陈先瑞、田守尧、陈锦秀、刘幼安（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成了一批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另外，他一再强调各级政治委员要深入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改变政治工作者的形象。

各级政治委员的威信又慢慢树立起来。

现在，面对林立的“围寨”，该是发挥“政治”优势的时候了。

其实，“围寨”也不是铁板一块。芦阵回忆说，从马谷田附近路过的这天晚上，“军部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寨子，据说是地下党的同志，事先与寨主头目取得联系，双方商谈妥当，当时也没有引起什么冲突。地下党的同志还及时发动群众，为红军筹备了一些粮草；村里的老百姓也帮助烧水做饭，亲如家人一般。

夜已很深了。一轮圆而又缺的月亮，缩去指头宽的半边牙儿，高高地悬在中天，仍是那么丰盈而又多情，仿佛有意捉着迷藏似的在云彩里面游来游去。忽而露出一张明亮的脸，忽而眨着一弯神秘的眼……

那位擅长写个“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的郑位三正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摊着几叠信封信笺，聚精会神地挥动着一支狼豪。军政治部秘书长也没闲着，忙着整理油印传单，连同写好的信笺折在一起，装入信封。郑位三正在亲自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进保持中立，沿途勿加阻拦。用他的话说就是：“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何乐而不为呢？”<sup>①</sup>

郑位三捋了下两撇八字黑胡，得意地一笑，解释说：“这叫‘兵马未动，政策先行’。”<sup>②</sup>

第二天的行军路上，因为事先派人打前站联系，给沿途的寨主头目送了书信，散发了一些油印传单，部队过往时也没有发生什么周折，一切都很妥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甚至有的围寨的头面人物，还在围寨外面摆上桌椅，放了一些香烟、茶水、食品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一些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亮着嗓门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sup>①②</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37页。



这是郑位三的几句杰作。据说，他把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政策纪律，都编成四字一句的顺口溜，一路上广为宣传。可惜后面的几段内容，大都回忆不起，难以完整地记载下来。

人们常把郑位三和吴焕先说成是红二十五军的“秀才”。这种说法也颇有道理。郑位三善于“吟诗作赋”，吴焕先也常常“以诗明志”。

1925年夏天，吴焕先和戴克敏、戴继伦两位志同道合的姑表兄弟，暑假期间以歇伏为名，来到天台山上秘密筹划革命大计，畅谈远大理想，那会儿，他身临其境，登高远眺，面对奇峰突起、层峦叠翠的天台山，即兴吟诗一首：

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  
白云分左右，惟尔与天齐。

这里既抒发了满怀的革命豪情，又不失一首值得评点的上乘之作。

或许是吴焕先和郑位三都有“写诗”的才能，所以有时人们能回忆起当年过“围寨”时的“四言诗”，但又记不准到底是吴焕先所作还是出自郑位三的手笔。

有这样几句“四言诗”便是这样情况。诗中讲到：

奉军奉军，丧失人心；  
不抗日本，只打红军。  
丢了东北，无家可奔；  
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

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这两首“四言诗”虽然人们说不准是郑位三还是吴焕先所作，但当时的背景记忆犹新。

当部队从王家大庄路过时，城楼上扯起了各种形状的龙凤大旗，两旁刀矛剑戟林立，并有鼓乐壮威。四周的寨墙垛口，都配以荷枪实弹的团丁乡勇，老远就朝着红军“嘣嘣”。这是个相当可观的强大围寨，约有好几百户人家，武装力量也很雄厚。

部队只好就地在寨子外面休息了一会，有那么多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人物，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评头品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

“你们不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指战员听了，也以真情相告：

“我们不是奉军，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就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先遣队！……”

对方仍不肯相信，七嘴八舌地说：“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都是奉军的捷克式！我们都是见过奉军的，别再胡弄人了，……”

把红军当作“奉军”，说来有趣。前文已述，红二十五军的“奉天式”武器装备的来历，那是在长岭岗等战斗中从东北军中缴获来的，像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关枪，确也威武壮观。“围寨”内的人真有“识货”的，一眼就能断定来的是“奉军”。

对于武装的来源，三言两语也难以解释清楚，讲个明白。于是，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当场就喊起了那两首“四言诗”……

其实，到底是吴焕先还是郑位三所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支年轻的“儿童军”顺利地穿过一个个围寨，向预定目标前进。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一文中，当描述到长征路上尤其是转战到了陇东高原一带时，称这支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

确实如此。初上征程，这支“雄鹰”就展开了翅膀……

### 三 恶战独树镇

燃烧的中原大地。

流血的中原战场。

战争是残酷的，红二十五军一动手，敌人便扑过来；往往是刚打完一个仗，还来不及吃饭，第二个仗又开始了。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上百次的战斗中，有生死存亡的激战，也有巧妙的奔袭，还有布阵设伏的歼灭战，等等。但要说到“生死存亡”的战斗，当首推恶战独树镇。

战斗发生在红二十五军刚刚踏上远征的路不久。

红二十五军以声东击西之法躲过了敌人的合围，于23日乘虚北上。原定由象河关转向西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向伏牛山前进。

敌人发觉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即断定红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窜企图”，遂急忙调整部署：

第四十军一五旅由赊旗镇北返方城之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迎头堵击红二十五军；驻叶县之第四十军骑兵团也南下保安寨配合堵击；

第一一六旅则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

“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均随后紧追。

蒋介石有他的侦察飞机和庞大的特务机关，而红军的军事情报则主要靠捉“舌头”，甚至连本军用地图也没有，程子华回忆说：靠一本袖珍地图行动。<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刚冲出敌人的合围，但当时的“情报”处无法告诉他们：敌人又形成了新的合围，且在前方，设下了口袋。

形势对红二十五军十分不利。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急行军两天，战士们相当疲劳，应该休息一下，但当天晚上，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跟踪而至，向土风园发动进攻。

驻土风园的是红二十五军直属队和第二二五团。战斗打响后，他们不敢恋战，在给敌人以打击后，立即集合队伍，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

连日来，徐海东带领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关隘。他白天少睡，夜晚不眠，仅几天的工夫两眼就熬得又红又肿。新任军长程子华和军政委吴焕先见此情景，坚持着把徐海东改成后卫，以便路上能轻松一下。

其实，行军途中，前与后，谁都不比谁少走路。可是，紧急情况下的战斗行军，走在后边的指挥员，要比走在前边的指挥员精神上轻松许多。他可以不必多分心去了解敌情，不必担心走错了路线，不必过于担心那意外的遭遇战……

徐海东坚持不过，只好接受了“后卫”任务。这时的他，也觉得实在是疲劳，队伍一出发，就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徐海东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已养成了马背上睡觉的习惯，这对他来说要比睡在床上都安心。但这次却是例外，他只睡了多半小时，就马上跳了下来。一是由于天气太冷，两只套着草鞋的脚冻得发木，二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73页。

来是，队伍中拄棍子的伤病员很多，路途泥泞，不住地有人摔倒。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忍心骑在马上。他把一个跌倒的病号扶上马背，自己拄着那病号的棍子，飞快地向前走去。

这一夜的路程，似乎在进一步考验这支“会行军”的队伍。天上浇雨水，地上是泥水，在经过一段鱼背似的路面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摔倒过，一个个成了泥人。走到后半夜，雨更大了，路过一个村庄，前边传口令：“原地休息。”口令一下，战士们便本能地跑到路旁老乡的房前、屋后和草棚里躲雨去了，有的钻进空房里倒头便睡。警卫员也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此机会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也盛满了水，就在这时，外面传出口令，要继续前进。徐海东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定有敌情，部队不能久停。他要警卫员快快督促同志们上路。但这一停下休息，有不少战士已睡过去，他只好派人挨家挨户查看，徐海东听说后卫团的团长和政委还睡在屋里，便气呼呼冲进屋里，先把团长打醒，后把政委把醒，边打边骂……从一个村里，就被这位“徐老虎”赶出了200多人。

许多年以后，一个挨过徐海东棍子的干部感激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sup>①</sup>

当然，毕竟是用棍子打了自家人。徐海东在自己的《生平自述》中谈到这件事时，非常客观地说：“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200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sup>②</sup>

第二天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情势十分紧迫。

<sup>①</sup>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sup>②</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35页。

这时，红军距离许（昌）南（阳）公路只有50余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麓。为了防止敌人追堵，保持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

以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二二三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和赵庄等地，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队前进。

然而，当前梯队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又突遭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伏兵袭击。

庞炳勋算得上是国民党的“知名”人物。他是直隶（今河北）新河人，1879年出生。此时甲午风云已过，中国的战败使得社会救亡分子发生了“尚武”的呼号。在这种时局下，庞炳勋选择了“行伍”的路子。早年曾入北洋军第三镇当兵，后入随营学堂及东三省测量学堂。1921年任孙岳所属的第十五混成旅少校副官，后任该旅骑兵营营长、旅参谋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次年任天津镇守使，暂编第五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随冯玉祥出师陕西、河南，成为西北军的重要将领。1928年秋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十四师师长，后跟随冯玉祥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失败后率部退出山西，被蒋介石收编。不久，蒋介石提升他为陆军炮兵第一师师长、第四十军军长……

这张简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庞炳勋的军事生涯可谓平步青云，连连升级。并非黄埔出身的他争得了这种荣耀当然要有一番非凡的表现。可是他后来投错了主子。先投蒋介石，后随汪精卫。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确定后，庞炳勋为此立下过“汗马功劳”。1933年7月，正当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将所率领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乘胜围攻多伦之时，庞炳勋被委任进攻察哈尔省的总指挥。庞氏在就任总指挥之时，还曾公开发表通电，叫嚷：“本军入察，即为剿除赤化。……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威震长城内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军和蒋介石20多万重

兵的夹击之下，最终遭到失败。冯玉祥重入泰山，方振武辗转流亡国外，吉鸿昌则潜入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就在红二十五军转战中原大地时，吉鸿昌这个出生于中原大地的骄子，在1934年11月24日被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刑场上，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正气浩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抗日将士鲜血的刽子手，现在又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的急先锋。

就在红二十五军由桐柏山转而北上后，庞炳勋查看了一下军用地图，冷冷一笑，断定了红军的行动方位和意图，急忙调兵遣将，调整部署，狂言要把红军“消灭在伏牛山以东地区！”

庞炳勋没有猜错，红军正向伏牛山游动。

26日这天，恰遇寒流降临，本已地冻河冰的天气陡然间又冷了许多。昏暗阴沉的中原大地，朔风在吼，雨雪交加，四下里无遮无挡，一片混沌迷茫。突如其来的寒流天气，简直就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罗网，严密笼罩着一支挣扎于风雪之中的红军队伍。

由于补给困难，在这严冬岁月，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仍穿着单衣。风雪打在脸上都有一股刺骨的疼痛，战士们的衣角都冻得硬梆梆的，鞋袜也被烂泥粘掉，有许多战士赤脚行军……这支年轻的队伍迎着凛冽的寒风，冒着无情的雨雪，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挺进，一步、两步……

沃土中原，素有“居天下之中，咽喉九州”之说，自古以来为兵家逐鹿之地。转战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敌人岂能容你随意飘忽，纵横驰骋？鹿死谁手，情势难定。

午时，红军先头部队二二四团抵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

由七里岗穿过公路。但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两个小时前到达，并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线阵地，突然向行进中的红军先头部队发起进攻。当时任二二四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的李国厚详细介绍了这样遭遇战的情况，他回忆说：“那时，我在二二四团一营二连任指导员。我和连长带着二连走在前面。当我们快到独树镇时，突然，那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你听！’连长一听到枪声忙叫住我。接着又是‘砰砰’两声。

“‘有情况，赶快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一边说一边在小坟堆那边站了下来。

“一会儿，前面的尖兵也气喘喘地跑了回来，说前面确已发现敌人，但它是什么样的部队，一共多少，因为雾大一时还摸不清。

“枪声又零落地响了几分钟，以此判断：不像是敌人的大部队。这时连长回过头来对我说：‘准是民团。也好，咱们快动手，先收拾他们。’我听了点点头。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迅速埋伏起来，准备发起一次猛烈的袭击。

“真像蒙着纱布捉迷藏，敌人也摸不清我们，一股劲地组织火力向我们这里射来。顿时静静的公路上枪声大作，里面还夹杂着尖尖的机枪声。

“‘同志们，跟我来，收拾这些乌七八糟的家伙！’打了一仗，连长沉不住气了，猛地从坟边跳起身来，握着驳壳枪冲了出去；但当刚迈过第二个小坟堆时，阵地上却响起了迫击炮弹猛烈的轰鸣。

“‘连长，回来！’我窜出坟堆，赶上去抓住他：‘听，打炮，不像民团！’话未落音，接着前面又送来几发炮弹。

“‘是啊，迫击炮！’连长一边抬起头来，一边用左手拍去身上被炮弹溅上的泥土。

“‘不能冲了，继续观察！’我建议说。他点点头，然后命令通讯员把情况立即报告军首长。于是我们两个又伏在前方一个小



坟包那里。

“敌人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了：既有机枪，又有小炮；伏在地上还能听到‘的的笃笃’的响声，经验告诉我们，敌人还有骑兵。现在我们才知道进了敌人的埋伏圈，看来一场恶战即将在这里进行。”

因为雨雪交加，能见度差，我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与敌突然遭遇时，一时陷于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力，以致被迫后撤。敌人则来势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包围过来，情况十分险恶。在这个旷郊野外，地形平坦，先头部队无所依托，难以抗击敌人的进攻，完全置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

就在这时，有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外号叫“大金牙”。他被敌人的攻势吓怕了，骑着一头大黑骡子，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伙儿……各自逃命吧！”刹那间，先头部队又一次乱了阵脚，就地抗击敌人的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情绪，惊慌失措地掉转头来，纷纷向后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就在面临覆灭命运的危机关头，只见一位雄姿英发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如同离弦之箭，飞也似地奔腾过来，向指战员们大喝几声。

他就是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此紧急时刻，由于他及时赶到先头部队，坚决而果断地稳定濒于溃散的队伍，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部队得以转危为安。这时，他遂又指挥身边的二二五团，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战士们大多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作为依托的田埂、壕沟和坟墓堆儿，终于抵抗住两翼敌人的进攻。

那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当场被捆绑起来，听候发落。

“张连长！”吴焕先朝离他不远的张海文大声喊道。

张海文浑身滚得像个泥人儿似的，闻声奔到吴焕先面前，大口喘着气儿：

“政委！你下命令吧，……”

吴焕先身边原来有两位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人物。一是警卫员姚小川，二是勤务员张海文。张海文是战斗中喜欢打冲锋，多抓俘虏多缴枪。在他的多次请求下，终于被批准下了连队，并在二二五团二连担任连长。自从当上连长后，似乎也神气起来。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战场上，身边也少不了两员小将：一个号兵和一个旗手。此时他们也紧紧跟在连长后边，期待着军政委的命令。

吴焕先指着附近不远的一座砖瓦窑，果断地下命令说：“你们二连，赶快占领住那个土窑，利用那里的沟沟坎坎，坚决抵挡住右翼的骑兵，……”

“是！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两手往上一拱，做了个坚决执行命令的手势。紧接着便吩咐身边的两员小将：

“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

红二十五军的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鲜红的连旗，配有一名掌旗兵，也叫旗手。行军路上，掌旗兵走在全连队伍的最前头，风展红旗，以壮军威。战斗中，掌旗兵总是紧紧跟在连长身边，摇旗呐喊，冲锋在前。连旗举到哪里，全连就跟到哪里。只要把连旗插上阵地，就如同钉子一般楔了下去，人在连旗在，旗在阵地在！敌人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休想把连旗和阵地夺去，除非全连都壮烈牺牲。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路线、纲领。同样，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徐向前曾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5个字：狠，硬，快，猛，活。当然，红二十五军从本源上就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

.....

不多一会儿，就见一杆紧紧卷着的连旗在风雪中招展，高高插在土窑顶端。鲜红的连旗上，绣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英勇上前杀敌”6个鼓舞斗志的大字，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围着这面战斗的红旗，利用土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敌骑兵展开射击。

在打退敌人骑兵的冲击之后，吴焕先马上又指挥两个团的兵力，乘机向敌人发起反击。他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的，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

对于这次遭遇战的紧张程度，当时担任二二五团一营一连指导员的刘震回忆说：“此时，我和连长带领全连在敌人占领段庄、马庄的正面抢占了一个小山头，就地抗击。敌人连续向我阵地冲击五次，均被打退。在第五次反冲击时，连长英勇牺牲，上级命令我代理连长指挥。我向全连同志动员说：‘同志们！这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打击伏牛山并继续西进，也就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吴政委的命令，打退敌人的继续进攻。’经过反复冲击，我连已伤亡30多人，只剩下40多个同志了，但我们始终坚守阵地。”<sup>①</sup>

战斗正在激烈厮杀之时，徐海东带领的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苦战，终将敌人打退。接着，第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试图打开一道缺口，乘机穿过公路。由于敌人的疯狂阻击，一连三次冲锋，都没有成功，于

<sup>①</sup> 《刘震回忆录》，第51页。

是，军领导当即命令部队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天很快黑下来，全军踏着夜色转移到杨楼一带，作短暂休息。因为敌情严重，“追剿队”主力随后也紧追而来，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出重围。天黑夜暗，风雨不止。连续几天的急行军，加上独树镇的一场激战，指战员大都疲惫不堪，几乎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他号召全连指战员在此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儿，突出敌人的包围。当晚，全军以极其迅速的紧急行动，由地下党的同志帮助带路，从敌人封锁防线的间隙中穿插而过，绕道叶县保安寨以东的沈庄附近，穿越过许（昌）南（阳）公路，于27日拂晓直抵伏牛山东麓。

红二十五军穿越公路以后，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步兵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又很快尾随追来，沿途实行追堵夹击。28日，红军又在拐河镇东北的澧河两岸以及古木庄、交界岭等地多次击退敌人的追堵进攻，终于打通了人山要道，进入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恶战之一，天时地利都不利，敌几万步骑兵前堵后追，终于把敌人甩掉，胜利进入伏牛山。这是什么原因呢？程子华总结道：“一是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奋勇当先，二是全军指战员上至军领导，下至每一个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三是我军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四是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例如张星江同志的帮助。他一直到卢氏才离开我军。”<sup>①</sup>

程子华念念不忘的张星江是河南省唐河县毕店乡张心一村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曾历任中共唐河县委委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75页。

记、鄂豫边特委和临时省委委员、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指导员，是鄂豫边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曾代表鄂豫边省委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红二十五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转移，由他亲自带路，为红军的胜利进入伏牛山区起了重要作用。

张星江后来情况怎样？事隔52年，即1986年3月，河南省唐河县委的同志来到北京找程子华，要他为张星江烈士纪念碑、唐河革命烈士展览馆和星河小学题词，并带去了有关张星江的材料。程子华这才知道这位一度是红二十五军的“向导”于1936年3月27日领导孤峰山夺枪斗争、为掩护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此时的红二十五军早已到达陕北。

刘震在谈到独树镇战斗时称，这是“我军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其中他特别强调：“在突围和转战途中，伤员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行动。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组织好行军转移，不让一个战士掉队，不让一个伤员丢下，其意义并不亚于组织指挥好一次战斗。如果这些在枪林弹雨中幸存的战友，因为跟不上队伍而长眠在深山老林，那就是我们干部的严重过错。这时连里有的重伤员担心地对我说：‘指导员，你不能把我丢下啊！’我坚定地回答：‘同志们放心！轻伤的同志能走的就自己走，重伤员，我们一定要抬！’我抬了十几个日日夜夜，一直到陕南。在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我们连只剩的40多个同志都自觉争着抬担架，没有丢下一个伤员。”<sup>①</sup>

领导给伤病员洗脚、抬担架已成为红二十五军的优良传统。就在恶战独树镇的艰苦日子，徐海东和他的警卫员同抬一副担架，艰难地突围、转移……

<sup>①</sup> 《刘震回忆录》，第52页。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的作风。

习惯于打山地游击战的红军，爱山林、靠山林、离不开山林。伏牛山的几座山峰朦胧地映入眼帘。这时，徐海东忽然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援兵到了，三个团。”大家又惊又喜地问：“在哪里？”徐海东微笑着指着前面说：“你们看，那三座山不就等于三个团吗！”同志们都大笑起来，精神百倍地加快了步伐……

独树镇战斗后，远在南阳城内的庞炳勋，一时身价百倍，红极一时。当时任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在11月28日特为庞炳勋请功嘉奖，电文如下：“特急。武昌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张（学良）：顷据南阳罗专员感（27日）巳（9时至11时）电报称：此次赤匪窜至方城之砚山铺、七里岗一带，经我庞军长刘世荣旅痛剿，毙匪200余名，俘匪50余名，得枪甚多，请予嘉勉等情，查该军长庞炳勋此次督剿，颇有新获，不无可嘉，可否予以嘉奖之处，谨电呈核示。”<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终于离开了。作为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也总算去了块心病，可以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了，真该谢谢这位庞军长。想到这里，他有点激动，除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嘉奖庞炳勋外，还在同一天晚上，专门复电庞炳勋：“贵军连日围剿该匪，大获全胜，非吾兄胜算在握，指挥灵活，不克臻此，拜读佳报，不禁起舞！……”<sup>②</sup>

人送绰号“猪将军”的刘峙如何“起舞”不得而知。但第二天他便得到了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消息，一下又慌了手脚，急电沿途各地的专员、县长们：“选择要险，努力堵截”，“务必实行夜袭，万勿失此机会”，“倘因循误事，即唯该县长是问！”“如擒获匪首吴焕先、徐海东，即当转请重赏；倘仍敷衍，任匪免脱，决予严惩！”

<sup>①②</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44~145页。

29日午时，再次电复他的庞炳勋兄：“残匪西窜，已电各县严堵。……如各县防堵不力，请即电示，以便核办！”

然而，虎入山林，蛟龙入水，靠什么办法“擒拿”？

#### 四 伏牛山中

山山有洞洞有屋，  
共产党的游击队就在这里住。  
山山有路路又高，  
蒋介石的匪军来不了。  
山山有树树有果，  
游击队员肚不饿。  
山山有泉泉水多，  
游击队员口不渴。

这首流传在红二十五军中的《游击队队歌》，既反映了红军在艰苦条件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现实主义地道出了“山”的意义和重要。

徐海东把伏牛山区的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要把它视为玩笑或幽默，其实，对于每一个善于打山地游击战的红军战士，都会品味这个比喻所包括的丰富内涵和哲理。

伏牛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疑虑、担心随即消失，脚下顿时生风，扑向山的怀抱。

气势磅礴的秦岭山脉自陕西东来，进入河南境内后，呈扇形向东北和东南方展开，构成面积广大的豫西山地。其北为崤山及其余脉邙山；中为熊耳山及外方山，著名的中岳嵩山位于外方山的东北端；南面便是伏牛山。

崤山、外方山与熊耳山均系西南至东北走向，伏牛山则为西

北至东南走向，这些山脉纵横交错，丛集成雄伟的豫西山区。

在豫西山地中，以伏牛山面积为最大。它西北接熊耳山，东南接桐柏山，环绕于南阳盆地的两侧及北缘，全长 800 余里。伏牛山群峰耸峙，绵亘不绝，气势雄伟，其南，延至南阳市郊的卧龙岗。

人们总喜欢为名山编织美妙的故事。桐柏山又名大复山、云梦山，传说这里曾长过一棵大树，树身为桐树，而树心中却又长出一棵柏树，两树合二为一，人们于是称此山为桐柏山。熊耳山在卢氏县西南。因其山双峰竞峙，状如熊耳，故名。据民间传说，伏牛山因天上的神牛下凡后隐藏于山中而得名。这里山峰奇秀，形态各异，世人给它们取下各种奇妙的名字。山中有珍奇的动物、名贵的药材和各种奇花异草，而山间的飞云幽谷，溪泉流瀑，都给人以神奇美丽的联想：这一切都是神牛下凡造就的还是由于这里天生的奇迹才把神牛引来？

在历史上，伏牛山也是著名的战略要地。著名的“三鸦路”便在伏牛山的东部，是古都洛阳的南大门。其道南起自南阳盆地，循白河支流的口子河谷，越伏牛山分水岭，经瀼河谷北抵鲁山，直达汝、洛。沿途需经三鸦：第一鸦在南阳市北 60 里的百重山；第二鸦在分水岭北麓，与第一鸦相距 70 里；第三鸦即鲁阳关，位于今南召、鲁山二县界上，距第二鸦 80 里。由于三鸦路为宛、洛间捷径，因此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历代均设重兵屯守。这里山道异常险峻，古诗有“朝登鲁阳关，峡路峭且深”之句，生动地描绘出这里的地理特征。前秦、北魏等南取宛城以入荆襄，都曾派奇兵由三鸦路南下，因此三鸦路被称为“出奇之道”。

自古以来，绵延 800 里的伏牛山就被称作“盗匪的渊藪”。当地的群众又把土匪称为“刀客”。刘镇华、樊钟秀、张钫等人，当初都是在伏牛山拉杆子起家的，一跃而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人物。在这里发迹的现代上匪还有豫西的有“内乡王”之称的别廷芳，时



已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以北的南召、嵩县、卢氏境内，这个土皇帝被蒋介石封为南阳13县联防司令，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冲出数万敌军追堵的红二十五军，经由叶县、鲁山、嵩县，极其神速地进入伏牛山的腹地。

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第二个目标，终于得以实现。

程子华回忆说，他刚到鄂豫皖，面临的难题是：“在老苏区边沿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4000，能不能打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好？省委举棋不定。”<sup>①</sup>

但，红军必须转移，到哪里去呢？程子华想到了伏牛山。他说：“可以到伏牛山去，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听说过土匪头子樊钟秀拉了支队伍，打进山西，被赶出山西后，回伏牛山盘踞了多年。土匪能在那里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呢！这样，我、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的看法一致了。”<sup>②</sup>

进入伏牛山以后，程子华迫不及待地当着吴焕先讲道：“桐柏山立足不住，伏牛山可以立得住的。樊钟秀能够在这里发展势力，我们就不能在此站住脚跟？现在看来，就得在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立足点！”<sup>③</sup>

吴焕先也看中了这一处风水宝地。就地理条件来说，防御可以据险而守，进攻也有出路可图，纵横交错的重峦叠嶂，有利于红军游击作战，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这种优越的条件使吴焕先下定了决心：抓紧时机，依托这里大山，尽快实现省委的战略意图，创建一块新的苏区。

英勇善战的红二十五军，这两年能够在鄂豫边坚持斗争，纵

---

①② 《程子华回忆录》，第70、71页。

③ 转引《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380页。

横驰骋，所依托的就是大别山。现在从大别山撤离出来，打了1 000多里的游击，终于又有了新的依托——伏牛山。红二十五军准备在这里演一场威武雄壮的战斗活剧！

部队一进入伏牛山区，军领导就忙于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根据在鄂豫皖创建苏区的经验，红军想要立足以图发展，在根据地的选择方面，无论是地势、群众、粮食、敌情等条件，都应具有一定的基础。

伏牛山的地势没得说，在群众方面倒成了军领导的难题。这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不曾受过革命影响，群众对红军都怀有恐惧疑虑之心。他们对外来的军队一般都称之为“刀客”。在那兵慌马乱的年代，兵匪难分，五花八门的成股“刀客”出没无常，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因此不管你什么红军白军，一般都成了他们憎恶的对象。加之当地封建武装势力的反动宣传，所以红军每路过一地，老百姓显得情绪紧张，提心吊胆，不是聚众藏身于地主围寨之内，以防红军“打劫骚扰”，就是扶老携幼，赶着牲口，成群结队地逃往深山密林……红军所到乡村，老百姓都逃之夭夭。因此，部队也只能就地面宿，很难接近群众，从事发动工作。

面对这种状况，“以民为天”的吴焕先眼下也无可奈何。但他坚信只要把党的土地革命斗争的旗帜亮出来，群众也是可以发动和争取的，不愁燃不起革命烈火。因此，他还是一如既往，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切实做好“见不着群众”的群众工作。他再三强调：“即使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也要以红军的模范行动，给人留下一种良好影响。当地的老百姓，不了解什么是红军，我们就以红军的一举一动，使老百姓了解红军。雁过留声，入过留名。红军从此路过一回，决不可给老百姓留下把柄，落下什么骂名！”<sup>①</sup>

<sup>①</sup> 转引《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382页。

吴焕先严于治军的所作所为，全军指战员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进山以后，他为了严肃军纪，整顿部队的战斗作风，当时就把那个在独树镇战斗中贪生怕死、仓皇逃命的参谋主任“大金牙”，押在全体指战员面前，严加痛斥了一通，宣判处以死刑。这一严正判决，使红军战士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战场纪律教育。

除此之外，吴焕先对于有损于红军声誉的行为，毫不留情地给予严厉处罚。说来有趣，部队进山后到达中汤时，红军第二二四团五连司务长，当时用两块银元买得一头大肥猪，准备给连队改善伙食。谁知，炊事班把猪按在地上，刚好刺了一攘子，还没来得及烫皮刮毛，敌“追剿队”第二支队从鲁山县城直追而来，全连马上紧急集合，继续向前赶路。司务长守着一头放了血的死猪，心里急得不成，舍又不忍心舍弃，抬又抬它不动。出于好心，为了减轻行军负担，这才把一头肥猪连皮剥掉，剁下猪头，破了肠肚，几斧头劈成两扇子，最后由炊事班抬着，忙去追赶队伍。一路上，十分招人显眼。

就在这时，吴焕先骑着一头栗色骡子，急急忙忙赶了过来，当下就把五连炊事班拦在路边，当着连指导员的面声色俱厉地批评起来：“你这指导员怎么当的，哪像个工农红军的样子？抬着扒了皮的猪肉，招摇过市，一点都不顾及群众影响！你们的这种行动表现，正好给老百姓留下话把，充当了敌人的义务宣传员。敌人说我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看你们这个样子，跟‘刀客’有什么两样！别以为见不到几个老百姓，就可以不顾红军的声誉，……红军是劳苦群众的队伍，吃的却是扒了皮的猪，老百姓会怎么说？……”

指导员当下就被撤销职务。司务长也被罚做苦工，到军医院去抬担架。

在红二十五军军纪中，犯了错误去做苦工——抬担架，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处罚。

这里，值得一提的韩先楚将军。在朱堂店开辟新区之际，恰恰是韩先楚“倒霉”的时候，与他同一个班的陈先瑞、刘幼安先后都当上了连指导员，唯独他还是个战士，而且被下掉了枪！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罗田县城，抄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的老窝。据说郝梦麟刚由汉口回来不久，正在休息养病，所带之数万银元的军饷尚未来得及发放，被红军破城后缴获了7 000多块。韩先楚也背了一袋子银元，谁知在部队撤退时偏又遇到激烈的巷战，他的银元袋子被子弹所撕破，成百块白花花的银元，全部撒落在地。他正趴在地上摸着银元，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还不快走！敌人来了……”他于是就跟着撤出县城。因为丢失了一袋银元，就被下掉枪弹，罚做苦工——抬担架。比起送到政治保卫处当做“案子”看押起来，要好得多了。但领导发话，少说要抬上两年的担架。即抬一个星期，抵偿一块银元……韩先楚又算得上“走运”，因为恰在这时碰上了吴焕先。

吴焕先很了解这个出身贫苦的孤儿，张口就能叫出他的名字。这个3岁丧母、十几岁丧父、幼时只念过两年私塾的孤儿，17岁就参加了红军。因为他在手枪团当过战士，单独完成任务很有心计，具有一种敢打敢拼的劲头，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吴焕先对他很赏识。

“韩先楚，你给我过来！你的枪呢？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又黑又瘦、个头也比较矮小的韩先楚，羞容满面地站在军政委面前，把丢失银元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吴焕先听后，点点头：“难怪罚你的苦工！”可他接着又说，“丢了银元，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从战场上缴获！现在最需要的是人，坚决革命的分子，英勇杀敌的战士！你——还是要打起武器，参加战斗！”

吴焕先一席话，为韩先楚解了围，使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

终于又端起了钢枪，并在战场上充分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两年，在人生历程上是短暂的，但在韩先楚的履历表上，这两年却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两年之间，他跟随红二十五军这支劲旅的脚步前进，由一个被下掉武器的红军战士，逐渐提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赶到红军西征的时候，即1936年5月，他已成为红一方面军的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这时，他才刚满23岁。

吴焕先治军严厉，赏罚分明，又极富有人情味，关心同志，体贴他人。那个因扒了猪皮而被罚的指导员，到了商洛山中以后，由于作战勇敢，表现很好，很快由班长逐步升为连长。无巧不成书，这位被人们忘却了名字的指导员，人送绰号“三起三落”。第一次被撤职是为了给病中的沈泽民补养身体，实在没办法，就抄了土豪家里的鸡窝，抓了两只老母鸡，偷偷装在口袋里背了回来。这一下子可闯了大祸！差点没有被沈胡子枪毙！还是吴焕先根据指导员的表现——偷偷把鸡送还——给予撤职检讨的处罚。第二次又因为一头猪的事被撤职。总是因鸡、犬、猪之类的事情犯错误。历史好像跟他开玩笑似的，本已是连长的他，谁知被吴焕先发现后，马上又以“加强连队政治工作”为由，说是从哪个职务栽了跟头，还是从哪个职务上爬起来，可以增长一些见识。这样，这个谁也记不起其姓名的“无名氏”又“官复原职”，成为连指导员。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进入洛南县城以后，偏又碰到“鸡”的纠缠事儿！两位笑逐颜开的商店掌柜，居然提着一个鸡笼子，里面装着几只活鸡，特意来到连队慰问红军。这位指导员看到这种情景，就像见到蛇蝎一般，怕得要死，连连说道：“我可不能再受鸡的害了，落下个两起三落的名声！”

只有“两起两落”的他，却赢得了个“三起三落”的雅号。这段小插曲背后，人们一定能体会出红二十五军铁的纪律。这支军队目前的使命是如何在伏牛山扎根。

初离老根据地的红军，一般都会遇到这种尴尬的局面。陈再道回忆当年追随四方面军转移时感慨地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就像鱼儿离开水一样，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帮助。我们想停下来发动群众，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敌人却不给这个时间，逼迫我们继续朝前赶路。这样一来，我军不仅供给没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得不到情报，不知道敌人的动向，等到我们发现敌人时，敌人已经来到了眼前，感到时时处处被动，没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将敌人击退，摆脱敌人的追堵。”<sup>①</sup>

远离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目前面临着“惊人相似”的局面。

巍巍耸立的伏牛山，山高林密，峰峦逶迤，纵横 800 余里，确实是一处难得的立足之处。然而，谁也不曾想到，部队一进入伏牛山区，在摆脱尾追之敌后仅仅赢得两天的行军时间，敌“豫鄂皖三省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此时已由信阳到达许昌，统率一、二、三支队，总计为 5 个旅 10 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到鲁山县城。

敌人黑云般地压到伏牛山，红军又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帮助，别说与敌作战，饿都饿垮了！因此，省委预定在伏牛山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这时又不得不及时改变。

独树镇战斗那天，徐宝珊因为受了风寒，病倒在担架上。到了伏牛山区，病情更加严重。身为省委书记，只好躺在担架上与省委成员交谈情况，作出了新的决策——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立新的根据地。

11 月 30 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告：“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贫苦群众弄吃

<sup>①</sup> 《陈再道回忆录》，第 235 页。

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布告还就红军对于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的自由，以及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团丁的优待等作了明确规定。甚至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布告最后宣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sup>①</sup>

布告颁发后，红二十五军即星夜兼程，向陕西南部前进。

12月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当时归属卢氏县的栾川地区。

这里盘踞着号称“十大连”的匪首李腾蛟，纠集地主武装势力，防守在庙子东南的十八盘，堵击红军队伍过境。军领导得知情报后，立即派手枪团连夜摸上十八盘，探明敌情后，采取出奇制胜的奇袭手段，从侧翼插入敌人的心脏……这股地主武装以为自己凭借有利的地势怎么还阻挡不了一阵子，也好讨功行赏。但做梦没想到红军似乎从天而降，纷纷逃命，如鸟兽散。第二天早上，手枪团押着百余名俘虏，胜利而归。李腾蛟精心设下的堵击防线一触即溃。

当天，红二十五军进入栾川镇（今为栾川县城）。昔日比较热闹的街面，现在已变得十分冷清。十有八九的商户、居民百姓，都逃亡一空，剩下的是寥寥无几的老弱病残。军直机关和作战部队只好在街头及周围的村庄驻扎宿营。

天黑以后，“内乡王”别廷芳的一杆人马，由匪团长张中奇率领而来，与李腾蛟残部勾结一起，四处进行骚扰活动。栾川附近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27～128页。

的罗庄、北沟口、九里胡同等地，全部布下匪兵，乘隙袭击红军。红军初到栾川，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地形又生疏，不便出动反击。整个夜里，从军直机关到作战部队，都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就连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的徐宝珊，这时也是枕戈待旦，期望着早一点天亮，部队好继续西行……

红军离开栾川的第二天，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也率部进入栾川。

12月4日，红二十五军经由石庙、陶湾等地，抵达卢氏县的叫河一带宿营。

这时，军领导已经探明了入陕路线，准备直插西南方向的朱阳关，进入陕西商南县境内。这是一条入陕大道，从叫河经朱阳关到商南地界，也不过七八十里山路，一天就可以进入陕南。这样，就可以摆脱尾追之敌。在豫陕边站住脚跟。

但是，入陕大道已早被敌人控制。

蒋介石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红二十五军的行踪。发觉红二十五军向陕西进军的意图，“急调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率领全师开赴卢氏县一带堵截红军西进，企图消灭红军于卢氏之线”<sup>①</sup>。

陈沛得令后，“率第六十师由河南开封、郑州两处，用火车输送到灵宝县火车站下车，步行两天，抵达卢氏县城”<sup>②</sup>。

第六十师原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旧部，蒋、蔡曾因率部发起过“淞沪抗战”、发动过“福建事变”而闻名于世。在那复杂的历史时期，第十九路军也曾两次进攻过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较量过。后来逐渐感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又同红军成立反蒋协定，向蒋介石开起火来。但最终还是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遭到失败，余部亦被瓦解收编。收编后的这支当时驻防开封的广东部队，在关键的时候被派上了用场。

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由何键、薛岳、周

<sup>①②</sup>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浑元部 15 个师的“追剿”大军跟踪追击，并调动粤敌陈济棠、桂敌白崇禧部进行层层截击，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手下的另外各路兵马也都按既定的部署围堵其他红军。一时又不好调动多余的部队截击红二十五军。蒋介石得到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西行之后，便预感到会有“入陕”的可能，便于 11 月 20 日电令刘峙，调第六十师“前往朱阳关堵剿，毋任该匪窜陕”<sup>①</sup>。

而这时的红二十五军还刚刚“窜入”桐柏山地区。

蒋介石这步棋倒是看准了。第六十师无疑是他布下的一支“奇兵”。

刘沛已抢先了一步。12 月 1 日即抵达朱阳关。

第六十师进抵朱阳关后，即进行实地侦察，选择要险，配备兵力，构筑工事。紧张了两天，一切部署完毕。

12 月 3 日，一个题为“陆军第六十师在朱阳关一带堵截豫南残匪窜陕计划”及时地制定出来。该计划极为详细周密，有关方针、部署、要领、联络通信、补给等等，都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其中有这样一段：“豫南赤匪伪二十五军之残部，……企图西窜入陕，以图苟延残喘。本师以截击歼灭该匪之目的，第一步严密阵线，使匪不得越堵剿雷池半步；第二步，侦匪所在，出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以期一鼓荡平，永除匪根。”<sup>②</sup>

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前有第六十师迎头截击，后有“追剿队”5 个旅的兵力，前后吃紧，一刻也不能耽误。

到此地步，只好改变预定的入陕路线，若不另择出路，尽快摆脱困境，等于束手待毙。然而，在纵横盘结的伏牛山中，人生地不熟的，另外选择一条入陕之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恰在

① 引自蒋介石、张学良 1934 年 11 月“加（20）日午（时）”电文。见《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 388 页。

② 《陆军第六十师在朱阳关一带堵截豫南残匪窜陕计划》。

此时，手枪团找到一个货郎小贩，簇拥着来到军部驻地。经过交谈，得知这个货郎小贩名叫陈廷献，年纪不过20岁出头，原籍为河北省人氏，从小就来到卢氏地界，给一家店铺打过杂役。这个外来的年轻人，每日挑着一副货郎小担，摇着个拨浪鼓儿，四乡奔走叫卖。因此，对豫陕交界处的乡镇村寨，大路小道，都了如指掌。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很快查明了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路。

这真叫“天无绝人之路”！

12月5日，部队整装待发。军领导先派手枪团到达朱阳关以东5公里处的“号房子”，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从叫河到朱阳关，也不过三十五六里地，稍有风吹草动，敌人准有所闻。这一出奇不意的行动，等于给朱阳关的第六十师吃了个“定心丸”，将其稳在原地。

根据第六十师“作战详报”记载，其中就有这样两笔：“5日上午11时，本师长官坐探回称：昨晚，残匪之一部到达叫河宿营。

“5日上午11时，第三六〇团报称：魏王坪前面小河街之民众，向我阵地逃避，皆云匪向朱阳关前进。”<sup>①</sup>

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主力则掉头北上，从朱阳关东北20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奔卢氏县城。部队到达文峪后，距县城只有10多里地，根据手枪团的侦察报告，城内敌军兵力空虚，只有地方民团防守……军领导担心的就是怕卢氏县城有重兵把守，那时再要探明一条行军路线可就难罗！

蒋介石料想不到红二十五军会绝处逢生，走出这样一步“活棋”。

军领导决定乘夜穿过卢氏县城。

---

<sup>①</sup> 转引《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当夜，红二十五军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迅速西进。守城民团闻得红军过往，早已惊恐万状，把城门封得死紧。城头团丁乡勇，只以灯笼火把壮胆，不敢轻举妄动。

至此，第六十师在朱阳关一带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即付诸东流，化为泡影；敌“追剿队”5个旅的兵力，先后都追到卢氏县城，但也是望尘莫及。

红二十五军经过两天的长途行军，途经仓房、官坡、兰草等地，直抵豫陕交界的铁锁关。

铁锁关，又叫箭杆岭。传说杨八姐当年在此射箭，把一根箭杆落在岭上，箭杆岭一名由此得来。

铁锁关向来有民团把守，过往的人要交过路钱，所以陕西那边的人都说：

出了铁锁关，陕西到河南；  
管你出与进，都要过路钱。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攻击箭杆岭，一举击溃民团百余人。这样，红军一分钱没交，就顺利地通过了箭杆岭，进入洛阳县境。

8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这时，由潼关、华阴仓促调来的陕军冯钦哉部第四十二师二四八、二五二团，已进至雒南（今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堵截红二十五军。这样，敌我双方便在三要司展开了激战。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红二十五军以第二二五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实施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则迂回至高地西侧向敌人攻击。第二二五团三营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萧邦与的带领下，首先登上山头，与敌展开肉搏。战斗至黑夜，守敌一个营全部被歼。刘震回忆说：“在此次战斗中，我二二五团一营担任一梯队，政委

英勇牺牲，上级令我任营政委。”<sup>①</sup> 战斗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也算得上长征入陕的第一个胜利。它和随后发生的庾家河战斗，标志着红二十五军打垮了敌人对红二十五军的连续追堵，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战略转移。

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至雒南之庾家河（今属丹阳）宿营，在这里又发生了一次我们刚刚提到的庾家河战斗……

红二十五军入陕后，敌“豫鄂皖三省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于12月16日抵达省城西安，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告诉了人们他的这段“长征路”以及他的“远征业绩”：“奉命五队兵力追剿豫鄂皖边区残匪，共经40余日，转战2200余里。豫鄂皖边区匪众，初有五六千人之多，经我军紧跟追击，现只余残匪五六百人，……窜入陕境商洛一带。现十七路刘云龙团、柳彦彪旅正向商洛截击该匪。大军在山中给养运输困难，兼之冰雪在地，行军不易，故第一、二两队在灵（宝）陕（县）暂住补充，第三队在洛南一带进击，其他两队另调他处截击。……”<sup>②</sup>

这算是上官云相两个月“追剿”的战果总结，即使再为自己涂抹光彩，聪明的记者也会疑问：

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为什么还会在20余倍于自己的兵力的围追堵截下长征入陕呢？

红二十五军在“紧跟追击”之下，真的就只余“五六百人”吗？

……

① 《刘震回忆录》，第54页。

② 摘自《西北文化日报》1935年12月17日，转引《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395页。

---

## 第五章 立足一个“边”

### 一 火种撒下了

伏牛山中没能站稳脚跟！

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改变初衷，到陕南去谋出路。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经箭杆岭进入陕南境内。第二天，即翻越蟒岭，来到了山中小镇——庾家河。

庾家河，这个地图上难得一见的小地方，在红二十五军的战史上，在鄂豫陕苏区的名籍上，却具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它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的第一个立足点。也就是在这里，红二十五军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开始了边、角、线的绘描，开始了“香炉脚”建筑工程。

庾家河的流水，翻滚着银白色的浪花，“哗哗”地向东流去，经由石门流入武关河，而后汇入丹江。这个地处高山峡谷中的乡镇，当时也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都是庄稼人在此兼开店铺。自古以来，这里就形成了一条南北通商的必经之路，南通商县之龙驹寨（今为丹凤县城），以至湖北郧阳、郧西境内；北可到潼关、华阴、西安等地。南来北往的商客山民，也多在此歇脚住宿。每到逢集之日，方圆几十里的山民们大都聚集此处赶集，熙熙攘攘，别有一番山乡情味。

红二十五军在此宿营。省委和红军的几位领导就住在一个名为“春永茂”的中药铺子里。12月10日，也就是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第三天，鄂豫皖省委在“春永茂”召开会议，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形成

的。“春永茂”这个中药铺子，从此也跟革命沾上了边儿，连同庾家河这个地名一起载入史册。

12月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南庾家河会议。

会议主持人是省委书记徐宝珊。参加者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和郭述申等军政领导，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苏区问题。会议对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杨虎城短期内不能布置好对付我军，我可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

会议决定立足于鄂豫陕边界这个“边”。会议决议草案指出：“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在同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

程子华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来到红二十五军，带来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这个已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去建立新根据地。庾家河会议显然把第二个目标纳入了红二十五军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什么选择鄂豫陕三省交界这条“边”？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的洛南、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旬阳等县；湖北省西北部的郧西、郧阳等县；河南省西部的卢氏、浙川等县。这个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悬崖峻叠，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便于红军活动。我军到来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传播过革命影响：1928年5月渭（南）华（县）起义部队，曾在此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11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由鄂豫边进入陕南，经由漫川关、竹林关、杨家斜北出终南山，继经长安、户县、周至、佛坪、城固等地，涉汉水翻巴山进入四川；同年同月，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从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进入卢氏县境，继经陕南武关

等地，取道旬阳，涉过汉水，沿川鄂边境南下湘鄂边区；1933年5月，陕北红二十六军南下也到这里，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有一定认识。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极为残酷的压迫剥削下，苦难深重，反抗强烈。尽管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粮抗捐斗争仍然此伏彼起。

选择鄂豫陕这条“边”，也是依据以往的实践经验。最为壮观的中央苏区红军立足于井冈山，同时也依托几个“边”；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同样也是立足于大别山，而又依托鄂豫边、豫皖边、皖鄂边，后来统一为鄂豫皖“边”。当时的斗争形势，迫使红军必须依托一座“山”，占据一个“边”，方能立住脚跟以图发展。

事实上，选择鄂豫陕这条“边”正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好时机。红二十五军入陕时，陕军杨虎城部正处于南北两头防务吃紧的局面。北面忙着围攻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南边则致力于防堵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真有点首尾难顾的味道。再加上，蒋介石阴谋借进攻红军之名，削弱、剪除异己，杨虎城对蒋的嫡系部队也不无戒心。因此，杨虎城一时也腾不出手来顾及陕南。对红二十五军开辟根据地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会议还决定：“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sup>①</sup>鄂豫皖省委与鄂豫陕省委，名称虽仅有一字之差，领导也是原班成员，但无论地理位置、面临的形势以及担负的任务，都有了实质性的不同。

的确，庾家河会议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它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创建新苏区的序幕刚刚拉开，就发生了一件似乎在意料之外

---

<sup>①</sup>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决议草案》1934年12月10日。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会议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所中断。

原来，得蒋介石密令，埋伏在卢氏县朱阳关一带堵截红二十五军入陕的陈沛第六十师，发现等待多日的红军竟在眼皮底下溜了过去。于是便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尾随过来。

红军战士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长驱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庾家河东南的排哨，大部分也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近前这才发现。敌人占领了制高点东山坳口，向红军发起猛攻。会议停止了，全军从军长到炊事员都一齐投入了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当时战斗之激烈，正如战史中记载着的：一挺机枪，接连牺牲了3名射手，仍然不停地射击；军部的司号长程玉琳，下颏被敌人子弹打穿，不能吹号了，就利用小土地庙作掩护，坚持向敌人投掷了数十颗手榴弹，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炮弹炸断，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作战。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程子华两只手掌被打穿，左腕动脉血管破裂。

是役，敌人伤亡800余名，我亦伤亡200余人。

庾家河反击战，结束了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500余公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河南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有效地打击了气焰嚣张、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的敌人，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站稳了脚跟，为打开陕南革命局面奠定了军事的和政治的基础。省委庾家河会议，则为这个转变确定了方针。从此，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庾家河反击战与庾家河会议的碰撞，也已初步显示出根据地创建工作的艰苦和复杂。

天黑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转眼之间，世界便银装素裹起来。战斗刚刚结束，周围显得格外平静。红二十



五军指战员冒着风雪，带着疲劳和伤痛又出发了。连夜翻过几座大山，转向庾家河以西的洛南县蔡家川。

12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洛南蔡家川进行整编。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总共2500余人。这支队伍，立足于鄂豫陕这个“边”充分发挥红军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优良传统，一边作战消灭敌人，一边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部队初到一地，人生地不熟的，现在必须抓紧时机，趁着敌人兵力空虚，沿着三省边界飘忽上两个来回，实地考察一下地势环境、群众情形，还有各地的粮食出产情况，不然，敌人一旦发动进攻，我们也站不住脚跟！”徐宝珊一直是抱病随军，而程子华、徐海东又都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因此，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的意见，就显得特别重要。

红二十五军主力以飘忽式的游击策略，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红军不顾疲劳，不顾饥饿寒冷，克服人地生疏、给养不济、衣服单薄等困难，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分得了衣物。广大穷苦群众从苦难中觉醒。他们看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首长根据这一阶段行动的实地调查，对鄂豫陕边的实际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立足于这条“边”的决心更加坚定，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展开了。

12月底，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在镇安县九甲湾（今属山阳县）接受了军领导的命令，带领一个连就地留

下，在郧西、山阳镇安一带打游击，配合主力开辟根据地。吴焕先布置了三条任务：第一是了解边界地区的民情地形，尽快熟悉和掌握地方情况；第二要以“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为斗争口号，广泛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摧毁地方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乡村政权；第三要与红军主力保持联系，将单独活动情况和敌情动态，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

陈先瑞，时年20岁，安徽金寨县（今属河南商城）人。15岁就当上红军。这位王明（陈绍禹）的同乡，日后成为著名的红军将领。在商洛山中，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陈先瑞带领的六七十人，对外号称“鄂陕游击师”，他担任师长。

这种派支部队从事创建新区的做法，被吴焕先称之为“就地种”。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红二十五军不失时机地撒下了革命的火种，调查研究已经表明，鄂豫陕边区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革命的墒情很好，极利于播种。

12月28日，吴焕先再次派出一批“播种队”。他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带领该团40余人，与刘实通、岳新明召之而来的“红枪会”农民武装300余人，联合组成“陕南抗捐第一军”，并在陕西景村车塬召开成立大会，亮出武装斗争的旗帜。刘实通为司令、岳新明为副司令，宋兴国为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吴焕先还抽调军政治部干事张勤、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等人，组成中共商洛特委，宋兴国为特委书记。商洛特委领导下的“陕南抗捐第一军”，同样是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壮大武装力量，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陕边革命根据地。

12月底，鄂陕、豫陕两个“边”的新区工作，先后都已部署就绪。按照吴焕先的想法，就是首先占住鄂陕、豫陕两个“边”，争取很快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两个“边”连成一片。

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极复杂的。一方面，他积极反共，竭力“围剿”，妄图消灭红军。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损兵折将，才在第五次“围剿”中，利用共产党内部的失误，将红军逼上“梁山”，踏上了长征之路。在他看来，红军已成残部，在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被消灭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的堵截大军却形同虚设，各路红军始终在向前行进；他的尾追部队经常被甩掉，好不容易撵了上来，却又挨上几个耳光，狼狈撤退。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在制造了一个“不抵抗将军”以后，虽一让再让，但日本却得寸进尺，丝毫不领他的情。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政府内部也多有指责。就此罢手，则意味着前功尽弃，违背初衷；继续追围，则将成为千夫所指，为国人唾骂，后果难测。于是，他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对策，表明他不是不抗日，而是想消灭了红军，在安定了内部之后，再全力对外，以此来欺骗全国人民，来鼓舞士气。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开入陕西南部，驻湖北均县的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三个团推进到湖北陕西交界的上津、白河，统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1935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大批“抗捐犯”，并缴获许多棉花、布匹，解放了全军的冬服问题。同时，还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来的粮食、油盐、衣物当场分给贫苦群众。此时，还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

镇安，地处商洛山区，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这时候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民国二十三，红军到镇安；

老财必胆颤，穷人都喜欢。”

从此，红二十五军在镇安、旬阳、郧西、山阳等4县边界地区，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于镇安县的白塔、茅坪、店垭子、大小米粮川，郧西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这时，部队抓紧时间休整，扩大400多名新兵，并乘机加强根据地建设，组织群众为部队筹粮备款，做衣做鞋，训练地方武装，培训苏维埃干部。这样，红二十五军很快就在南部四县边区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的消息，使敌人大为不安。西安绥署急忙从陕北方面抽调兵力，由陕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率领，南下蓝田“督剿”。

1月下旬，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三个团、警二旅两个团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分兵逼来。红军主力则由鄂陕边界乘虚北上，以极其神速的飘忽行动，转到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敌人急忙掉头尾追，红军已进至柞水县蔡玉窑。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红军以一部于1月31日袭击柞水县城，吸引警二旅西进，分散了尾追之敌。2月1日，红军主力以逸待劳，在蔡玉窑打垮追赶过来的第一二六旅二五二团，歼敌一个多营。

战后，吴焕先又率部经由曹家坪、九间房等地，翻越九华山，向北转移到蓝田县境内。2月3日，乘机攻占了蓝田县葛牌镇。葛牌镇是个大镇，由此向北走上十几里，就出了秦岭，进入辽阔的关中平原。2月3日这天，正巧是农历腊月三十，街面上张灯结彩，气象一新。在这中国传统的节日里，在合家欢聚团圆的时候，红军广大指战员却背乡离井，在敌人的“护送”之下，来到了这里。

吴焕先所以率部进驻葛牌镇，也是准备休整一下，让指战员过个春节。入陕将近两个月了，部队一直在疲于奔走，飘忽不定，也急需进行休整。

除夕之夜，飘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村庄、山谷便被洁白覆盖住了。瑞雪兆丰年，雪给葛牌镇以宁静，增添了新年的祥和气氛。

大年初一早晨，风停了，雪也住了。街头巷尾，积雪盈门。红红的新春对联、五颜六色的威武门神，与冰雪世界相映生辉。爆竹除旧，万象更新，葛牌镇一派拥军爱民的感人景象。

2月5日（正月初二），陕军第一二六旅二五一团、二四八团，前来葛牌镇，给红军“拜年”。红二十五军事先得到群众的报告，冒着大雪进行战斗准备，抢先占领了葛牌镇以南文公岭一带高地，迎接前来“拜年”的陕军。下午2时，敌二五一团首先进攻，被阻于阵地前沿。接着，增援之敌二四八团到达。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攻击，阻止了增援之敌。与此同时，红军分别由正面和左翼发起猛烈反击。经过奋勇冲杀，歼敌两个多营，其余敌人慌忙向南溃退。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敌第一二六旅受到重创，一时不敢继续进攻。红二十五军则乘胜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5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先后在蓝田葛牌镇、柞水红岩寺、曹家坪、山阳小河口、袁家沟口、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创建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陕东南5县根据地的开辟，对敌人造成了新的威胁。2月中旬，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在进驻商县、山阳的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配合下，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为了掌握主动，又南下郧西地区。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召开常委会，总结了入陕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分析了形势，坚持庾家河会议决定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

会后，红二十五军由郧西地区西进，扩大斗争的地域，打到富足地方去，解决红军的衣食问题。西进途中，连克宁陕、佛坪

2座县城。3月8日，吴焕先率部到达洋县华阳镇。这时，陕军警备二旅张飞生部，也由郿西跟踪尾追过来。红军为解除后顾之忧，打开华阳地区的局面，决心消灭该敌。

3月10日拂晓前，红二十五军从华阳镇向东南返回近10公里，在石塔寺附近埋伏。当日上午，敌警备二旅两个团进入了红军伏击区域。红军突然出击，向敌猛冲，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打垮敌人5个多营，毙伤敌200余名，伤敌旅长张飞生，俘敌团长以下400余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张飞生以手血涂面，藏在尸堆里装死，然后在夜幕掩护下逃脱。

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在华阳地区建立了第三块革命根据地。两三天之内，就建立了华阳镇、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7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当时，群众兴奋地唱道：

二月初六炮声响<sup>①</sup>  
警备二旅垮个光  
华阳建起苏维埃  
土豪恶霸一扫光  
分田分地又分粮  
穷人开始把家当  
吃饭莫忘红廿五  
翻身全靠共产党

华阳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扩大了红军在鄂豫陕的回旋区域，在西部有了立足之地，而且有利于发展汉中以北、太白山以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吴焕先考虑到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于是决定

<sup>①</sup> 公历为3月10日。

建立一支游击队，在西部撒下一粒革命的火种。他说：“这一区域很重要，可以作为联结川陕苏区的桥梁！”担任这个“桥梁”使命的就是华阳游击队。

华阳地区并不富裕，加上华阳附近的汉中地区敌人兵力较大，大部队行动不便，于是红二十五军主力东返。

4月初到达蓝田葛牌镇。陕军警三旅跟踪追击。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一举将警三旅两个团打垮，并消灭其1个团又1个营，俘虏旅长张汉民以下官兵1000余名。

张汉民，山西稷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为党和红军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不明真相，在九间房战斗中被红二十五军俘虏，不幸被处决，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七大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更加坚定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改选了省委，省委常委是：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委员是：程于华、戴季英、陈先瑞；后来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在东进途中一举攻克洛南县城。接着，在洛南、商县、商南、卢氏等4县边区，大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在孙家山、北宽坪、桃坪、峦庄、庾家河、留仙坪、灰池子、七盘磨、刘家花屋、梨园岔、腰庄等地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地方武装，并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创建了第四块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红军主力也进一步得到壮大。仅在攻克洛南后的半个月之内，就扩大新战士600余名。洛南县城附近几座小煤窑的“煤黑子”，也有不少人报告参加红军，为红二十五军补充了新

鲜血液。这时，全军总兵力扩大到3 700余人。

至此，红二十五军已在鄂陕、豫陕和华阳地区，先后建立了四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初步建成了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独立支撑起一个“香炉脚”。

“香炉脚”出自吴焕先之口。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初步建成了，但鄂豫陕省委曾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过一场重要的思想斗争。红二十五军战史上记载：“早在庾家河战斗后，省委就有少数同志认为，经过庾家河战斗，领导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单独创建根据地似有困难，因而提出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见；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加之春荒到来，给部队的行动和补给都增添了新的困难，更助长了这一思想。”

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等人的思想认识比较一致，他们对于提出入川的军事行动，都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实践，证明红二十五军还是能够站住脚的，完全可以创建新的根据地。

吴焕先在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明了鄂豫陕省委关于反对入川的观点：“我们认为在这三省边区，对配合川陕与陕北两个苏区及红军行动，仍是能够实现的，仍是有意义的。在发展前途上可打通两个苏区与联系红军。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州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收复鄂西及豫鄂边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迫切。”

吴焕先在向部队作动员时，曾打过一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他把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比作一个“香炉脚”，首先可以与川陕和陕北两个苏区联结起来，共同撑起一座革命的“香炉”！



他说：“同志们都见过铜香炉，它有几个脚呀？香炉么，圆的有3个脚，方的有4个脚，无论是几个脚，都是为着撑起一座香炉！我说商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香炉脚，它正好与川陕苏区、陕北苏区形成3个脚儿，我们拥有这三块苏区——三足鼎立的香炉脚儿，完全可以撑起一座革命的香炉！我们立足这个地方，把革命的香火烧得旺旺的，将来与川陕和陕北打成一片，照红中国的半边天哩！可是，我们要是进入四川的话，就没得这个香炉脚了，三个脚儿少了一个，同志们说说，我们要想撑起一座革命的香炉，是少一个脚儿好呢，还是多一个脚儿保险、牢靠！”<sup>①</sup>

无论是以华阳革命根据地（包括华阳游击队），架起一座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联系的“桥梁”，还是以鄂豫陕三省边区（包括红二十五军），作为一个与川陕和陕北联系配合的“香炉脚”，都是吴焕先战略思想的基本点。

为了支撑起一座中国革命的香炉，鄂豫陕省委下定决心，带领红二十五军修建、巩固鄂豫陕边区这条“香炉脚”。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大多参与领导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因此，他们有着丰富的根据地创建和建设的经验。这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十分重视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工作，是宣传者的自我包装，是宣传者的自我推销。包装得体，推销得当，宣传者的产品，甚至宣传者本身，才能为人们接受。

红二十五军宿营庾家河的当天，“春永茂”店里发生了一桩饶有情趣的事。郭述申这样回忆道：“‘春永茂’药铺掌柜杨春荣，在红军进入小镇之前，听信了一些谣言，以为红军都是些‘血脸

<sup>①</sup> 《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450页。

红头发的怪物’，就躲到附近山林里去了，压根儿就没敢露面。当晚，偏又被红军抓住。此人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穿棉袍，战士们都认定是个‘大土豪’，马上就扣押起来。过后经过一番了解，街坊们都说：‘药铺的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好得很！’这才弄清此人自小在药店当过学徒，懂得一点医道，因为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在此地开了个中药小铺，为人老实厚道，也没啥政治嫌疑。军政委吴焕先听说这事以后，忍不住呵呵笑道：‘开上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我们就住在人家铺子，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罗。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成大土豪！’马上就叫人为之松绑，并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杨春荣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当时还从家里拿出好几斗包谷，资助远道面来的红军。听说杨春荣随后还掩护红军伤员，配制专治红伤的药物，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能把好坏分清，没有冤枉‘杨掌柜’！可是，吴焕先心里却感到是个事儿，当晚就跟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进行商量，决定由郑位三起草一份张贴传单，借以安定民心，使群众真正了解红军队伍。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sup>①</sup>

郑位三，1902年10月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原突围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这时，虽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

郑位三在随军西征中，主要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226、227页。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群众工作方面，他并不陌生。部队每到一地住下后，他就找来当地老百姓，和他们促膝相谈，了解情况。他不仅广泛地接触贫苦农民，而且特别注意同乡绅、教书先生和小商小贩联系，以便掌握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向。由于他懂得一点医道，所以常以看病为名，接近群众。一般常见病患者，他能及时予以诊断，解除群众的痛苦。因此，群众都很敬重他，称他为“先生”。一路上，看到一些老百姓因为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见了红军就像躲瘟疫一样。他看到眼里，急在心里。

《什么是红军》就是针对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阐明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有关政策。

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名义发布的油印布告：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的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

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

中国有红军已经8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八九十万人<sup>①</sup>，行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的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sup>②</sup>

这张闪烁着光辉的油印传单，在红二十五军开创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在湖北郧西县仍保留着《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这是郑位三留在鄂豫陕边区的一份珍贵杰作。

红二十五军的宣传工作，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军部领导亲自带头，在群众集会上进行演讲。军部还派出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入贫苦群众中，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开展抗捐、抗粮、抗税、抗丁、抗债斗争。军政治部的少年宣传队，军医院看护班的7名女护士，还深入各地书写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广大群众演出文艺节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支援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根据省委关于创建根据地的有关经济政策，制定了商业管理暂行条例和起草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为苏维埃政府规定了“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的商业政策，提出了只没收

① 这个数字有误，当时全国红军只有30余万人，也可能是扩大宣传，以壮军威。

② 《郑位三传》，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128页。

反革命分子的商业资产、保证正当经商、保护行商、对小商免税等主张。他还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  
政治部 布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

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以执行苏维埃政纲为自己的任务。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本军遵照这种原则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具体法令，参照当时当地特殊情形，特颁布如下之暂时条例：

一、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

二、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

三、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

四、资本在300元以上的商店、行商必须缴纳商业累进税，资本在300元以下者免税。

五、红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中，为战费之需要，得向资本在300元以上并雇用劳动之商人酌量捐款。

六、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

七、一切奸商（破坏物价的、造假货的），由红军政治部依照苏维埃法律惩办。

本军是坚持这个条例的，务望各商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国民党豪绅反动派骂红军为匪，命令商户逃避我们，以致我们所过之地，往往商户成为十室九空，这样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买柴买盐都不便，这完全是国民党的罪恶。本军特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破坏商业的国民党。

特此布告

军 长：程子华  
政治委员：吴焕先  
副 军 长：徐海东  
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这个布告，不仅有利于稳定商品市场，保证红军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商品的供应，而且孤立了奸商和其他反动分子，争取了中小商人，使我们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它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省委和军部的规定，以铁的纪律，言信行果的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和支持。红军在攻克洛南县城后，就没收了地主豪绅所开的“顺兴恒”、“广开堂”等商店的财产，而对正当经商的“致中和”、“宥盛昌”、“瑞义合”等10余家店铺予以保护。有些店铺主人由于对红军政策不了解而弃店外逃，部队则派人妥善看管，待主人返回后原封交还。这些店铺的主人深深感动了，争先恐后地拿着各种食品，有的还提着活鸡，来慰劳红军，并成为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庾家河“春永茂”掌柜杨春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他在创建鄂豫皖苏区时的成功经

验，认真地做国民党士兵的工作，争取他们哗变过来当红军。1935年3月10日，他起草了《告国民党士兵书》，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和污蔑工农红军的阴谋，正确地说明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的性质，明确地宣传了我党对待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指明了光明出路。这些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久就有陕军警一旅的一个连起义参加了红军。

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是红二十五军创建新区的突出特点；而在主力部队集中打仗的同时，派出部队干部和部队到地方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则是红二十五军巩固扩大新区的典型方法。前者是耕地，后者是播种。

前面提到的陈先瑞及其领导的“鄂陕游击师”、中共商洛特委及其领导下的“陕南抗捐第一军”，就是红二十五军在鄂陕边、豫陕边撒下的两粒革命的种子。

1935年2月，在郟西会议之后，鄂豫陕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来统一领导鄂陕边南部4县和陕东南5县边区根据地工作。特委书记是郭述申（郭述申在一个月后调军部工作，书记由戴季英兼任，6月又由郑位三接替）；游击司令是陈先瑞。鄂陕游击司令部下辖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共有2300多人，这些游击师都是地方武装，由贫苦群众自发组织的“大刀会”、“红枪枪”改编而成，或者是各地分散的游击队合编起来。

5月初，鄂豫陕省委鉴于豫陕边区的革命形势，决定建立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以巩固和发展豫陕边根据地。特委书记是郑位三（后为李隆贵）；师长是方升普，政治委员是曾焜。豫陕游击师下辖4个游击大队，共约600余人。

在鄂陕、豫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豫陕游击师的领导下，

各游击武装积极开展活动，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巩固扩大了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和游击战争蓬勃发展。鄂陕游击总部战斗营和第六路师，袭击关防铺等据点，捣毁了“郧西铲共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第五路游击师摧毁旬阳县的潘家河乡公所，没收 12 家恶霸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潘家河人民唱道：

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  
洪水滚滚掀波浪，潘家河来了共产党。  
共产党像太阳，它的恩情赛爹娘。  
潘家河水哗啦啦响，要翻身得靠共产党。

华阳游击队在青龙山地区予敌洋县保安队以打击，在汉中附近的公路上截获敌军用物资 30 多担，还两次打下佛坪旧城。

各游击部队还组织人民群众为主力部队送情报、当向导，积极运送粮食，转移伤员病员；派出小股游击队割电线、断交通，侦察敌情；动员农协会、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站岗、放哨、做军鞋、备干粮，救护伤病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 二 战地情话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众所周知的警句，似乎成了战争的规则。

红军长征，跋山涉水，不断地战胜敌人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历尽艰难险阻。这是一个为全世界人所惊叹的奇迹。但，奇迹中的奇迹，莫过于长征途中的女红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就有 30 多位女红军，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李坚真、刘英等，她们每个人都有着一部动人的史诗。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只有很少的女共产党员在前线中和军队一起，她们本人都是苏维埃的职员，或者是嫁给苏维埃的官吏的。”

红二十五军中就有7位女红军战士，虽然她们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但在那艰苦而又坎坷的长征路上，她们同样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们所付出的汗水比男性红军要多，她们所忍受的痛苦比男性红军要深。她们在长征路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的青春之歌。

“七仙女”，人们这样称呼红二十五军中的女红军。

在这支将近3000人的长征队伍里面，只有7名女护士随军，“七仙女”之说由此而来。她们是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后改名余光）、张桂香，大部分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其中，周少兰、曹宗凯、田喜兰都是安徽人，其余的大都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七仙女”的缘起还要追溯到1934年。

1934年11月16日夜晩，经过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心情十分复杂，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这座革命的熔炉，这块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战士们不明白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苦性，情绪高昂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可是，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们知道，这次转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被迫进行的。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大别山整个苏区已经是民穷财尽，特别是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外线去以后，敌人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清剿”，疯狂进攻，野蛮屠杀，鄂豫皖根据地在日益缩小，红二十五军的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央派程子华来要红二十五军转移，实在是适得其时。中央虽然没有

指明转移的具体方位，却有着4条原则性规定：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的地区；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在过去，要找到这样的一块地方是很容易的，可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转移，红四方面军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而周围都有敌人，到底到什么地方去，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军政委吴焕先在动员会上，向指战员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也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全军指战员大都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把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尽可能地做妥善安置。军医院的女护士们还不知道，女同志也在精简对象之列。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击退了敌人的“追剿队”后，来到了平汉铁路旁，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就给每人发了8块大洋做路费，或是返回老家，或是就近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都无不可。总而言之，既不能拖累了部队，同时也得给以生存的出路。军医院政委苏焕清传达了上级的决定。7名女护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她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里一片茫然，感到无路可走，坐在路边抱头痛哭。当她们听说这是军参谋长戴季英的命令时，便决定退回银洋，一起去戴季英那里请求留在部队。

戴季英，这位红二十五军的参谋长、鄂豫皖省委的常委，在党史军史上也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在红二十五军时期的所作所为，似乎说好话的不多，数落短处的倒不少。有人说他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向来不拘小节，也不顾及什么影响。全军上下数千人马，独他一人留着十分显眼的“偏分头”，穿着也很讲究，深灰色

的制服，样式也别样新颖，是供给部的缝纫工特意制作的。因此，在最高权威的领导阶层中，他向有“漂亮阶级”的美称。许多老同志都毫不避讳地说：“戴季英嘛，他的毛病是不少，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老子天下第一。他谁也不怕，就怕吴焕先。只有吴焕先能够降住他，徐海东都不成。”戴季英是湖北红安人，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戴季英被找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请求，戴季英就是不答应。其他女护士都无可奈何了，但一向大胆泼辣的周少兰，却有一股韧劲，死缠着戴季英不走。周少兰对戴季英说：“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周少兰一带头，其他人的胆子也大了，她们说：“红军就是我们的家，离开这里，我们就再也没有家了。”戴季英虽然不同意，但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是气得直跺脚。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一方在坚持原则，另一方则是背水一战。离开红军队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路，没有了希望之路。她们大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走也不成，留也不能，女护士们正面临着—场严峻的抉择……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过来了。于是，女护士们的“状”就告了上来。

“红军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女护士们乘机表明了决心。

文静的戴觉敏，这时被推出来“走关系”。吴焕先对她太熟悉了。原来，戴觉敏是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





饭扳着手指也能数得清，而挨饿的次数却难以数计。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哪个不略施粉黛，哪个不想美丽，可是，长征中的女护士们却始终穿着从大别山出来的衣服。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中，鞋子磨烂了，没有了鞋子，就用布缠着脚走，但走不了多远又磨破了，只好重新缠。长征路就是这样走走缠缠、缠缠走走走过来的。

酸甜苦辣也好，喜怒哀乐也罢，都是人生的体验，长征中的“七仙女”们的人生体验无疑是更为丰富的。苦，对于这些女护士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七仙女”中间，出身生活最底层的占大多数，而且多半还有着童养媳的经历，她们投身于红军队伍中，多有着逃难的倾向。红军的政治宣传，尤其是红军的行为准则，无疑对她们的逃难起了启发作用，对她们的逃难去向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她们认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红军，红军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她们就把红军当成了“家”。

“家”中的气氛是和谐的，生活在“家”中的女护士们是幸福的。在长征途中，“七仙女”们都被安排在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里，7个女护士组成了1个班。班长是曾纪兰，副班长是余国清。军医院共有30多人，曹宗凯是军医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

说到红二十五军军医院，就不能不提一下军医院的院长钱信忠。

钱信忠，1911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当校工，参加工人运动，并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入上海宝隆医院学习。1931年在国民党军第十师当军医。1932年6月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重新组建后，出任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解放后，曾担任过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医疗技术精湛，对战士和蔼可亲，很受大家的尊敬。在他

的领导之下，军医院的战友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忠诚地担负起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红二十五军军医院工作的日子里，最令这位院长紧张不安的，要数庾家河战斗中受伤的正、副军长的伤势。军长程子华的伤势很重，两只手都被子弹打穿，伤着了骨头，左手腕的动脉血管破裂，流血不止；副军长徐海东的伤也不轻，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脸颊，虽然没伤着骨头，可也是昏迷不醒。

其实，这时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谁的心情也不轻松！自长征以来，军长同党中央、中央红军的联系就中断了，红二十五军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现在，正、副军长都受了重伤，随军行动的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又是一个病身子，军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全军的目光聚焦到钱信忠身上。

钱信忠最担心的，莫过于程子华的左手腕子。他知道，程军长的左腕曾受过伤，而手术恰恰是他做的！原来，在程子华来红二十五军之前，他俩就已有了一面之缘。

那是1930年，程子华所领导的“大冶兵暴”部队与何长工等领导的红军第五纵队合编后，程子华因在一次战斗中左腕负伤到上海宝隆医院就医休养。为他操刀动手术的就是钱信忠。那时，钱信忠还不到20岁，他在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学习，精通德语和外科医术。钱信忠只知道他的病人是陕军“杨虎城部的一位小排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彼此之间熟悉了，临别时互道“珍重”。

没想到，4年后两人又见面了，原来陕军的“小排长”，这时居然成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原来上海宝隆医院的小伙计，这时已是红二十五军军医院的院长。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白白胖胖的“钱医官”，参加红军已经两年多了，入了党，当上了领导。因为他精通德语，当时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就送他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本闪烁着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他的革命人生观，砥砺着他的斗争意志。大别山的战火硝烟、风霜雪雨，把个又白又胖的“钱医官”完全磨炼成红军战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精神气质。拥有红二十五军最高医术权威的钱信忠，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以他敦厚善良的性格待人处世，赢得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的敬佩，同时，也赢得了“七仙女”之一的田喜兰的爱情。

“七仙女”小时候都缠过脚，走起路来格外困难。军医院领导经常把马让给她们骑；军政委吴焕先还让供给部分给她们一匹小马，一路上驮驮行李，病时换着骑骑。这在当时，也是莫大的关怀照顾。她们感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935年8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北关成功之后，来到了渭河岸边。军领导决定北渡渭河，去陕北会合刘志丹。

渭河，像一条狂怒的巨蟒，在陇山峡谷中奔突着，咆哮着，由西向东而去。初秋时节，渭河水流湍急，虽是晴朗天气，却透着丝丝凉意。河面上没有桥梁，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船，但人多船小，后面又有追兵，一船一船地将全军运渡过去是来不及了。军领导决定，全军的伤员、幼童，还有女护士们，来享受这条小渡船。

在抢渡泾河时，连一条船也没有，军领导就让几个女护士排在队伍中间，拉着绳子，扶着她们过河。正是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大家庭间情同手足的友谊，给了这些女护士无私的友爱和战胜困难的力量，使她们顺利地走完了长征路。

到达陕北时，“七仙女”却成了“五仙女”。神话般的美丽，毕竟是人们对美好的想象和向往，而现实无论多么残酷，却也是一



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是女看护班的班长，也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其实也只是20岁出头的年龄。她性格比较内向，言语不多，而内心里却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她以大姐的身分，理解照顾其他姐妹，有困难自己先上；对伤病员，她耐心仔细，竭力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她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得到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广泛赞誉。艰苦的环境、繁重的看护工作，严重地损害了曾纪兰的健康。积劳成疾，她终于病倒在商洛山中，再也没有起来。病中的曾纪兰，没有忧伤痛苦的神情，却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能重新站起来，与姐妹们同甘苦共患难；临终前的曾纪兰，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却有着一种深深的遗憾，不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曹宗凯，安徽省霍丘县叶家集人，1916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四五岁的时候，被卖给一个40多岁的老财主，做续弦夫人。因为不满意这门婚事，她才跑出家门，参加了红军。她的性格活泼开朗，长征路上撒下了她的欢歌笑语。又谁知，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她却悄悄地离开了人世！50年过去了，黎光还念念不忘曹宗凯这位长征路上的同行者，这位活泼多情的姑娘。

黎光，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共青团委书记，与曹宗凯都是霍丘老乡，比曹宗凯小1岁。长征时，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汤圆子”，叫习惯了，时间长了，他的原名尹昌尧反而不为人们熟悉了。在被称为“儿童军”的红二十五军中，共青团委书记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位置。

黎光回忆道：“我们都是霍丘老乡，她是叶家集人，比我年长一岁，从小就共饮一乡水，长大又同时当红军。长征途中，我们也常在一起参加团的会议，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并兼做过群众工

作，相互比较了解，还曾默默地建立过一段美好感情。”<sup>①</sup>那还是在商洛山中的时候，曹宗凯注意到汤圆子还穿着麻草鞋子，就笑着说：“汤圆子，当心点儿！数九寒天的，你还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当心把生姜冻坏了、鸭蛋裂缝了！”汤圆子晓得她指的是光脚丫子，当时也不曾在意，只是傻呼呼地笑笑。过后不久，当她把一双棉布袜子送给他时，汤圆子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出曹宗凯的幽幽情思。但在艰难的长征中，急行军、游击战是红军的家常便饭，这种爱情的幼芽，当时也只能悄悄埋在心里，不敢声张开来，更何况他们俩都才十七八岁。

天有不测风云。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路过双石铺（今陕西凤县县城）时，军领导派汤圆子带领一个班去打土豪，有个战士点油捻子照明，不小心燃起一场大火，烧了土豪的几间房子。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饶恕的过失，国民党侮骂红军“杀人放火”，我们正好留下话柄，造成不良影响。汤圆子是带队的，负有领导责任，领导上要追究下来，即使不枪毙也要罚做苦工。当时红军的纪律就是如此严明！汤圆子愁得吃不下饭，眼睛也哭红了。最后，还是军政委吴焕先出面过问，及时给以批评教育，汤圆子得到了宽大处理。从此，汤圆子便经常到连队去挂职锻炼。

这事却急坏了曹宗凯，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真是祸不单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军医院副院长吴子南又向她求婚。可怜的姑娘，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追求自由幸福，参加了红军。红军中兄弟姐妹般的团结友爱，使她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火一般的军旅生活，虽然苦点却很充实；对汤圆子的芳心暗许，她在编织一个美满的梦。而今她却又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她选择了死亡，在红军渡过渭河之后，便服毒自杀了。坎坷的征途上，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无时无刻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曹宗凯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25页。

虽然改变了作妾的命运，却最终在爱神面前倒下了。

这悲剧色彩的事件，曾经使多少人痛苦，曾引起多少人的遗憾！文韬武略的红二十五军领导虽然率领军队所向披靡，但战争与生存毕竟限制并忽视了人们情感的需要，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51年5月中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来到大连老虎滩海滨。在附近的文化街75号住宅里，周恩来握着周东屏的手，说：“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感谢你！海东同志有你精心照顾，我和小超就放心了。”

周东屏，就是红二十五军“七仙女”中的周少兰。徐海东遍体弹痕，卧病在床30余年，妻子周东屏含辛茹苦，一直守护在床边。他们被誉为为后世楷模的一对革命伴侣。

周少兰，安徽六安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7岁时死了娘，13岁时被人贩子拐走，以50块大洋价格卖给他人。1931年3月，14岁的周少兰不堪虐待，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成为“七仙女”中的一员，是最年轻的女护士。

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满头是血，被抬下了战场。周少兰奉命赶来救护。当她第一眼见到满脸是血、昏迷不醒的老军长时，不知什么原因，眼泪便一下子流了出来。

钱信忠院长擦去徐海东脸上的血迹，这才发现子弹打穿了他的脸颊，流血过多。钱信忠边冲洗伤口，边向周少兰介绍伤情：“徐副军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虎将，打起仗来不要命。他的双腿、胳膊、膀头、胸口、屁股上下留有17处伤疤。这一回，子弹从他的左边颊穿过去，又从右耳朵背后穿出来了，失血太多，伤比前几次都重，你要精心照顾他！”

周少兰，这位18岁不到的姑娘，长脸尖下颏，虽个头不高，却聪明伶俐，泼辣能干。她仔细地听着院长的嘱咐，坚决地说：

“院长，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就保证首长不会出差错。”她协助院长给徐海东上药包扎伤口。

这时，钱信忠发现徐海东的喉头好像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困难，若不及时排除，极有可能造成窒息。医生急得团团转。

周少兰突然说：“让我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自己充满少女温情的嘴唇贴在徐海东那胡子拉碴的嘴上，然后开始一口一口地吮吸着血和痰。

不一会儿，徐海东急促的呼吸便变得均匀了。

军政委吴焕先匆忙赶来了。他先询问了徐海东、程子华的伤情，然后对钱信忠吩咐道：“今晚我军要离开庾家河，你们用担架抬着程军长、徐副军长随军出发，我派1个营的兵力担任掩护任务！”

吴焕先走后，周少兰和医生、护士们把程子华、徐海东抬上担架，用被子把他俩盖得严严实实，以防冻伤。

深夜，天气奇寒，战士们抬着两位军首长冒着风雪出发了。一路翻山越岭，周少兰和她的姐妹们不停地为程子华、徐海东盖好被子。

到达蔡川时，周少兰他们的双腿沉重，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分别把两位首长安排在老百姓家中的炕上，找来柴禾为他们生火取暖，盼着他们早日痊愈。

当时，医院条件很差，药品严重匮乏，再加上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进行静养，因此，伤病员的治疗护理受到了很大限制。徐海东昏迷了4个昼夜，周少兰也守护在他身边4个昼夜，她当时真是着急，担心首长一睡不醒。

到了第五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了。

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自己身边，细细端详之后，似乎记起了她就是军医院叫周少兰的护士，就问她：

“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首长可醒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周少兰竟高兴地流下了流泪，也忘记了自己是在答非所问。

徐海东这时已把周少兰当做老熟人了，便开玩笑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周少兰怕徐海东刚醒来太劳累，不让他多讲话。她知道他已是四天四夜水米未沾牙，就去搞来碗面条，细心地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

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又向周少兰问这问那。

周少兰说：“吴政委、戴参谋长和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首长都很好。就是程军长在你负伤之后，他两只手都被手弹打穿了，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现在正在治疗中。连以上的干部伤了10多人。现在部队的情绪很好。你就不要担心了，安心养伤吧！”

徐海东受伤后一直昏迷，醒来听周少兰这么一说，心里直发急，嚷着要去看望受伤的战友，要见吴政委！

周少兰正着急时，吴焕先、徐宝珊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了。

吴焕先、徐宝珊介绍了敌人双方的情况，言谈举止之间，流露出乐观的情绪，表达了领导核心对前途的信心。徐海东很高兴，他拉着政委说：“焕先，眼下，部队的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了，你可不能垮啊！”

“放宽心，我不会垮的！你就静下心来，尽快养好伤吧！”吴焕先说。

徐海东又拉着省委书记徐宝珊的手说：

“宝珊，你身体不好，要多多保重啊！”

“我是老毛病了，不要紧的，请放心！”

大家往门外走，看见周少兰送到门口，又嘱咐她：好好看护徐海东。少兰点点头，又有点为难地说：

“徐首长脾气犟，整天躺着，忍不住。他不听医生护士的话，

反过来，医生护士都得听他的！”

“那怎么行！”徐宝珊说，“伤病员哪能不服从医生护士！”

“就是嘛！”吴焕先也笑着对周少兰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地管着他，以后我还要给你做媒呢！”

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周少兰不好意思低下了头。政委平时很少和女同志说笑，今天说出开玩笑的话，使得少兰脸发红，心猛跳。她小时候家穷命苦，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她不情愿，投奔了红军。那年她才13岁，心想当了红军，就解放了，其他的事她还想不到。后来，她看到红军队伍里也能结婚，才想起自己也有个终身大事。政委的这一席话，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心中泛起波澜。

革命者最大的烦恼，莫过于不能为革命工作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徐海东的伤口却总不能完全愈合，而且，不知从哪天开始，他左耳也有些失灵。加之部队在飘忽游击，又时逢寒冬，稍一着凉，他就发烧、咳嗽，伤口也跟着发炎。

因此，他心情极为不快，动不动就发脾气，甚至有时还摔杯子。尤其是听到红军处境不利的消息，他更是叫天骂娘，暴跳如雷。

每当这时，医生和警卫员都吓得不敢吱声，只好悄悄躲到门外；而唯独周少兰敢走过去，微笑着站在他的床前，眼睁睁看着他摔，听着他骂。等他摔够了骂完了，这才不慌不忙地细声细气地对他耐心开导着，反复劝慰着，声声入情，句句在理。

说也奇怪，雄狮般发怒的徐海东，在这柳叶般瘦弱的小姑娘面前，渐渐就变得没了一点脾气。到后来，还会不好意思地冲周少兰一笑，憨厚的脸上便露出一对圆圆的小酒窝。

渐渐地，徐海东觉得这位小护士挺有能耐。

他们渐渐地成了知心的同志。

1935年2月5日，在葛牌镇文公岭战斗前，正值天降大雪，吴

焕先向周少兰、警卫员交代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担架要去前沿指挥所。周少兰和警卫员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徐海东大怒，硬让两名警卫人员搀扶着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协同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指挥作战，这一仗打胜了，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驻地，看见周少兰为他生好了火炉，做好了饭，高兴地笑了。他感到浑身像是着了火似的，火烧火燎的，他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女护士。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自己受伤的日子里，徐海东真正了解了周少兰。她的苦难经历激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同时，他觉得小周诚实可靠，考虑问题既周到又仔细，脑子也很灵活，因而他对这个年轻的护士产生了美好的感情。

是啊，角色的转换，的确能够变化人们的心理；正是由于这种角色的转换，人们之间才能找到合谐点。在战场上，徐海东是“老虎”，是一员指挥千军万马的骁将，而周少兰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战士；但在病床上，徐海东却成了“小猫”，周少兰成了指挥官，她的话就是命令！

在护理徐海东的日日夜夜，徐海东的一言一行，周少兰都看在眼里。他与伤痛作斗争的顽强意志，他对战友、对同志的真挚情谊，他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都使她深受感动。徐海东对自己家庭遭遇以及坎坷经历的叙述，更是深深地激动着她。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着他对徐海东的采访：

“‘你家属现在什么地方？’

‘我的家人，除了剩一个兄长，他现在第四方面军以外，其余的多被杀死了。’

‘你说他们是战死的吗？’

‘不，不，我只有3个兄长是红军，其余的家人都是被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和夏斗寅杀死的。国民党的将领，一起杀了我们66个

姓徐的族人。’

‘66个人!’我不甚相信地重复地说。

‘是的，他们中间27个人是我的近族，39个人是我的远族。黄陂县徐姓的是大族。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甚至于婴孩，都被杀死了。姓徐的一族，几乎完全消灭。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兄长，及我自己现在红军中，算逃出了以外，当红军的3个兄长，有两个后来是阵亡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在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的时候，被白军俘去的，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地方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些都是我逃出来的兄长告诉我的。’”

参加红军以后，徐海东很少有机会接触女同志。说来也是缘分，这次头部负伤后，周少兰专职护理他。在养伤过程中，他们熟悉了，了解了。

同时贫苦的出身，共同的革命理想，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爱情的种子悄悄地播下了。

两个月过去了。徐海东在周少兰的精心照顾下，伤口基本痊愈了。

周少兰就要离开了，她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着依恋之情。

“少兰，我这点小毛病用不着再照顾了，还是先去照顾程军长他们为好。”徐海东亲切地说：“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你有时间就来我这里看看，我不会忘记你。”

周少兰答应着，又羞涩地低下了头：“首长，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下次我如果再负伤，还是请你来!”徐海东笑着说。

“净说不吉利的话。”周少兰撇着嘴说：“你可不能再负伤了呀!”

“那也难说，军人随时随地准备着流血嘛!”徐海东又忽然说，



“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提一条，你的名字不好听。什么花呀兰的，不像革命战士的名字。以后能不能改一改？”

周少兰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去。

后来，周少兰便改名为周东屏了。

冬去春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桃花刚谢去残红，大地已披上绿装，龙驹寨，这座美丽的山城，曾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情话。

一天傍晚，吴焕先约徐海东去散步。吴焕先说：“海东同志，我先给你招呼一声。部队到了龙驹寨，你可要当心点儿，不要胡来！”

徐海东冷不防吃了一惊，神色不悦地说：“我当心什么？说了句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成的话，你又抓我的骄傲自满情绪！”

“不是这事。是有人在背后说你哪！”

“说我！政委，你说说，人家怎么说我的。”

“有人说‘徐副军长4条腿’。”

“他妈的，这不是骂人吗？我又不是牲口！”

“看来，我不揭发，你是不会承认了。”吴焕先笑着说，“有人反映你和周少兰在外边谈情说爱，还拉拉扯扯的，两个人披了一件大衣，这不是4条腿吗？”

徐海东顿时松了口气，笑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天天冷，我把大衣给她披上了。”

“我也常想，你身体不好，年龄在我军中是大的，需要人来照顾。听说你爱上周少兰，我是高兴的，她聪明能干，又受过苦，我看将来你娶她做老婆，肯定是美满的。不过，我提醒你，现在可不能结婚！”

“大敌当前，你徐大哥知道应该怎么做。”

“一言为定！等到举行婚礼那天，我给你们当司仪，让大家热闹热闹！”

说着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35年9月15日，陕北永坪镇的一孔窑洞里挤满了欢乐的人们，窑洞前贴着一个大红喜字。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婚礼！

新郎，就是斯诺笔下那个大名鼎鼎的神秘人物，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新娘，则是红二十五军军医院的护士，“七仙女”之一的周东屏。

爱情之花终于盛开在黄土高原上。新郎新娘无疑是幸福的。他俩想起不久前牺牲的军政委吴焕先，却掩饰不住内心那淡淡的哀痛。如果他在人世间，肯定要来参加婚礼的，司仪是非他莫属的！

周东屏，这位昔日的童养媳，在革命的熔炉里，经过了长征的锤炼，终于成熟了。到达永坪镇后，她由团员转为党员，并出任红二十五军军医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又任红十五军团医院护士长。

1940年2月，因徐海东患重病休养，党决定由她专门照顾徐海东。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在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下，病逝于河南郑州。周东屏自始至终守护在他的病床前。

1960年，周东屏被授予上校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三枚勋章。

1978年，她被选为五届政协委员。1980年，又出任总参管理局顾问。

1985年，离职休养。

周东屏，这位红军女战士，以自己无言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奉献之歌。

### 三 奔袭荆紫关

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 000人的兵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左冲右突，不断取得胜利，并初步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商洛山中站稳了脚跟。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没有料到局面会是这个样子！

他的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始向西转移。蒋介石在南昌得意地说：

“不问红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围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上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他在反共问题上一向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收获也是很丰厚的：不料在“进剿匪共”战事中，却屡受挫败。因此，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使他有种“苦心人天不负”的喜悦。

他实在太看重反共的结果了。1934年10月31日，他说：“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无视之。即就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乎此。望切告各将军努力截追，期获最后之胜利。”<sup>①</sup>

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川黔，在重庆、贵阳、昆明之间奔走“督剿”中央红军。他的行营同前线的函电频繁交驰，但方方面面传过来的消息都叫他坐卧不安！

<sup>①</sup> 杨树标：《蒋介石传》，第242～243页。

的确，此时此刻，蒋介石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在“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支配下，对日寇没有抵抗的准备。现在，日寇在步步进逼，占了东北，又覬覦华北，国民政府一忍再忍，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协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分歧此伏彼起，对共产党的内战却越打越大，内战的范围蔓延得越来越广，内战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真是内外交困。

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蒋介石于1935年4月20日下了一道命令，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即第一〇七、第一一〇、第一二九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协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等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中共鄂豫陕省委已经预料到敌人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粉碎敌人的“围剿”，省委狠抓了红二十五军的建设。

这并不是说，红军是神仙，能掐会算。战争是最严肃的老师，进攻与防御、阵地战与游击战、“围剿”与反“围剿”，等等，这许多课题都是老师布置下的作业，谁完成得圆满，谁就是好学生，就能得高分，就会得奖赏，否则，就会遭老师无情训斥，甚至还会被赶出师门。

5月4日，红二十五军一举攻占了龙驹寨。

龙驹寨，地处商县与商南之间，今为丹凤县城，当时为商县所管辖的一座重镇。

历史悠久的龙驹寨，北靠鸡冠山，南临丹江水，东接“秦楚分界”之武关要塞，西连“四皓古陵”之地商洛镇。自古就是“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的水陆交通要道。一条号称10里之长的东西街道，昔日也是百舸联檣林立，千蹄接踵而至。南国的船只

檣帆，北国的骡马骆驼，都在此聚集相会。“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在龙驹寨，红二十五军利用敌人第二次“围剿”尚未到来的间隙，抓紧战备整训。

整训内容有：

1. 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
2. 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步兵基础课目训练；
3. 开展从单兵到排进攻的战术训练，以及连进攻的示范演习；
4. 结合总结工作整顿支部，检查领导和改进作风，进一步加强连队和机关的建设。

整训是紧张的，但比起日夜不停的急行军，却又是安适的。其间不乏一些逸闻趣事。

一天早晨，徐宝珊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到江边去散步，见到个小号兵在江边练号，便上前问道：“小同志，你起得早啊！是哪个连的，连长是谁，指导员是谁，打骂过士兵没有？”小号兵说他们连长、指导员样样都好，不打人不骂人，就是好给人取外号，喊起来怪臊人的！仔细一问，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小号兵，早晨老是贪睡，不能准时起来，常常耽误吹号，影响了连队的考评成绩，连长就给他取了个外号——“瞌睡虫”。到了龙驹寨以后，他知道早晨要准时进行操练，不可耽误了吹号，就在睡觉前喝上一大碗开水，等到一泡尿憋醒了，天也快亮了，正好赶上吹起床号。谁知接连两个早晨，他都把号吹早了，指导员又给他取了个“小公鸡”的外号，还当众说：“小公鸡，吹了号，谁也别想睡大觉！”谁知，第三天早晨，连长可不依了，没好气地说：“你这个小公鸡，再要提前吹号，我就拔你几根毛！”小号兵受了委曲，哭了鼻子。见到省委书记，还撅着嘴巴诉起冤苦来：“俺宁愿叫个瞌睡虫，也不落个小公鸡名！小公鸡有啥好的，除了伸着脖子打鸣，就是杀了脖子炒辣子，没有瞌睡虫自在！”徐宝珊不由地笑了，“依我看

来，小公鸡比起瞌睡虫要好！连队正在加紧练兵，就是要闻鸡起舞，刻苦练武。你是河南人吧，今年多大了？”小号兵嗯了一声，说他虚岁15了。徐宝珊呵呵笑道：“虚岁15，不是属鸡的吗？这事可就巧了，属相为鸡，又叫小公鸡，日日夜夜忠于职守，平时为连队司晨报晓，战时给连队呐喊助威，很光荣嘛！”说完，两人都笑了。

小号兵没有想到，这位和蔼的省委书记这么快就离开了他，离开了红二十五军。

5月9日，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

徐宝珊，湖北汉川人，1903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和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4年11月，随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改任鄂豫陕省委书记。

徐宝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在领导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善于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关心党员的教育，注意纠正党内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他长期带病工作，随军转战。他的逝世，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了一位好的领导人。

吴焕先亲自为徐宝珊料理了丧事。为了保密，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有一纸祭文，没有鼓乐送葬，也没有花圈挽联，装在一口普通棺材里，在夜间悄悄地掩埋了。

1985年5月，中共丹凤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这位长眠于龙驹寨的革命先烈建造了一座纪念碑。郭述申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他的毕生精力，功勋卓著，永垂不朽！

对于徐宝珊之死，吴焕先心里极为悲痛。短短的一年半之内，先后有两位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徐宝珊，都在他的面前倒了下去。徐宝珊活着时，即使每天躺在担架上，随时随地动动嘴巴，经常提醒上几句，他心里也感到踏实。而现在，徐宝珊去了，他就像失掉主心骨似的，深感不安。

鄂豫陕省委书记由军政委吴焕先代理。军长、副军长都有伤病在身，吴焕先身上的担子是沉重的！

5月上旬，敌人的“围剿”开始。第六十七军9个团和第九十五师3个团在洛南县城以东、以北展开，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4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5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4个团、警备第一旅2个团、警备第二旅2个团、特务第一旅2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

军事上的“围剿”并辅之以经济上的封锁，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完全绞杀在商洛山中。第六十七军5月的“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写道：“据报，奸商愚民与不肖之徒，有图利私运米粮油盐济匪情事，除令所属部队严行查禁外，并于5月20日分令洛南、商县、山阳各县长转饬各团队长、各区保甲长，对米粮油盐等物资，务须切实封锁，以绝匪食。”

红二十五军觉察敌人的企图后，于5月11日提前结束整训，迅速投入到反“围剿”的作战行动。

5月14日，红二十五军攻山阳县城，未克。遂迅速南下郧西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5月19日，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

《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

正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地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

和红军的紧急时候，红二十五军西征入陕的伟大胜利，大大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的兵力，动摇了敌人进攻的后方，配合了南北红军的胜利。因此，敌人在睡梦中也不忘记的也不放松对红二十五军的进攻，来成就他整个进攻的计划。现在敌人的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的布置，与进攻红二十五军是一致的，是整个布置里不能分开的……

敌人这次进攻兵力是加大了，布置是周密了。敌人这次进攻不简单地“追剿”红军，而是企图最后消灭红军的，同样要来摧残我们初将开创的新苏区与新起的群众斗争。因此，二次战争比一次战争是残酷些，长久些。二次战争就是决定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能否完成的战斗，不完全消灭二次进攻的敌人，即不能开创新苏区伟大的政治任务，而红军成了无根据地的游击集团，这是每个同志要认识清楚的。

《决议》还就粉碎敌人第二次进攻，提出下列具体工作任务：（1）集中一切力量来扩大红军主力，使红军成为粉碎敌人第二次进攻中的主要力量。（2）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配合红军作战。（3）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与战术技术，特别是新兵教育工作要切实具体。同时就组建新的地方武装、粮食的储备、广泛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防止地主豪绅和民团的造谣破坏等，做了具体的安排。<sup>①</sup>

5月下旬，省委再次在郧西地区举行会议，研究在敌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根据鄂豫皖时期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程子华介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3次反“围剿”胜利的做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47页。



法和徐海东的建议，针对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一定困难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二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sup>①</sup>

6月初，红二十五军由郧西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寻找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是老相识了。

1934年2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在高山寨、长岭岗等战斗中，红二十五军多次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缴获了很多的枪支弹药，大大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竟被当作了“奉军”，因为红二十五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从东北军那里缴获来的，大都是长短筒捷克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这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一桩趣事。

正因为曾经打过交道，吴焕先、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很藐视东北军，战士们也都笑着说，我们的运输队又来了。

4日夜、5日晨，红二十五军先后在商县夜村及商洛镇附近，与东北军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九师遭遇，经激战，毙伤敌团长赵绍宗（伤）以下200余人，缴轻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战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插到敌六十七军的背后。

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吸引着敌人跟踪而来。敌人原来指向东南的进攻矛头，不得不改而向北。敌一〇七师由商县迂回到洛南县城东南，迎面堵击；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跟踪尾追；四十四师则由山阳继续北上。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48页。

鉴于敌六十七军3个师兵力密集，难以捕捉到有利战机，红军决心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向东南方向，大踏步前进，继续在外线活动，以便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

6月10日，红二十五军从庾家河出发，向东南疾进。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攻占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170多人。红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北顾商县、洛南之敌又被牵向东南，纷纷尾追而来。

为了达到进一步调动敌人的目的，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继续南下，远程奔袭荆紫关。据俘虏交代，荆紫关有敌四十四师的后方临时补给站，并有民团1个营驻守。

荆紫关，地处河南省淅川县境内，丹江从这里奔流而下，乃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是出入商洛山区的东南门户。

红二十五军领导仔细考察了荆紫关及周围地区的地形，分析敌情，决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术，奇袭荆紫关。首先派第二二五团在荆紫关西北之马蹄扼守隘路，阻击尾追之敌。为出敌不意，以手枪团化装成敌四十四师的部队，于15日16时先行出发，经130里的急行军，于16日午前逼近荆紫关。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还受到敌警戒部队的“列队迎接”，红军未费一枪一弹，便将其缴械，并迅速进到荆紫关城下。守敌发觉后，急闭城门，仓促应战。第二二三团已跑步赶到，搭起人梯强行登上城头。守敌不战而溃，抱头鼠窜，仅用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战斗。

奔袭荆紫关，是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大胜利。红军出奇制胜，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就抄了敌四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站，歼灭敌四十四师1个连和民团1个营，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从而补充了红军，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张希才，安徽霍丘县人。1984年他72岁。这位红二十五军军供部的政委回忆了这次奇袭的收获：“打下荆紫关，我们可发了一

次大财！缴获了几百匹棉布，因为没有法驮运带走，全部剪成八尺一幅的衣料，丈六一幅的被单，分给全体指战员背着，每人一两幅、两三幅不等，完全带走了事。整袋整袋的大米、面粉、白糖，牲口驮不完，人也背不了多少，许多同志脱下长裤，把两只裤腿一扎，装成个硬叉叉，搭在肩头上行走。记得到了南化塘一带，军供给部摸了个底儿，看看到底缴得多少口粮，能吃多少日子？这一摸才可笑呢，少说也有一半的硬叉叉，全都装的是白糖！”<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攻占荆紫关后，敌六十七师、四十四师和陕军警一旅等部，均向荆紫关蜂拥而来。这时，敌人的部署全被拖乱了，部队也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因逃亡和疾病，敌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1/3以上。

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查明敌情之后，决定甩开密集之敌，挥师西进，以继续分散和疲劳敌人，诱敌深入根据地内，择有利战场歼敌。

6月17日，红二十五军主动撤离荆紫关，经郧西南化塘、商南赵家川等地向西挺进，连续4天行军，行程560多里，于22日到达山阳县桃家湾，25日到达商县黑山街。这时，各路敌人都被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一旅，也有4天路程。

多日来，为调动和拖垮敌人，红二十五军连续行军，十分艰苦。此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指战员每日爬山越岭，跨沟过河，行程百余里，体力消耗很大。有时暴雨倾盆，部队也因军情急不得休息，踏着泥泞，冒雨行动。甚至有的战士双脚打了许多血泡，血糊糊的成了一片，仍然咬着牙拄着树枝坚持行军。

徐海东大将回忆说：“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我军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80里，明天走100里，

① 《吴焕先》，第481页。

高兴了来个120里。敌人像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我们的战士，行军80里驻下后，又跳又唱：敌人走80里就累熊了。

“开始，战士们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有的同志就讲怪话，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拼！’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这时，军、团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有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1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处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打的时候。当夜，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140里，第二天又走了140里，翻山涉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到达黑山街后，军领导决心采取伏击战术对付疲惫又松懈的敌人，初步选定山阳小河口地区为战场，提出：“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后经实地勘察，发现小河口地形比较开阔，不便伏击，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

袁家沟口，地处山阳、商县、镇安、柞水之间，位于鄂豫陕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0～151页。

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徐海东大将在《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写道：“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阮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阮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sup>①</sup>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5公里的狭长山沟，两侧山上林木葱茂，便于部队隐蔽，沟底的一条小径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是伏击敌人的良好阵地。

吴焕先和徐海东商定之后，当即决定以这里为战场，消灭来犯之敌。6月30日，陕军警备第一旅追到小河口，红二十五军为诱敌进入预设战场，遂向西北红岩寺转移。第二天，警一旅2个团跟踪追至袁家沟口。就在这时，红军连夜又原路返回桃园岭。军领导随即命令：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二二五团2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1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月2日拂晓，天空中晨雾弥漫，四野一片迷茫。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师已进入指定位置，静静地等待着攻击的命令。

晨雾还未散去，敌人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整队，准备向红岩寺追击。正在红军广大指战员焦急之时，冲锋号打破了宁静的天空，军领导发出了攻击令。红军各种轻重火器如同雷鸣闪电一般，突然向密集敌人猛烈射击。刹那间，枪炮轰鸣，山摇地动，硝烟腾空而起，战火四处纷飞。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高地发起冲击，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勇猛扑向敌群。敌人遭此突然打击，乱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没跑多远，又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二二五团迎头截击。这时，各个连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群，其势如铁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5页。

流倾泻而下，似狂飙猛卷而至，满山遍谷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刀光闪闪，白刃相搏。一番激战之后，敌大部被歼。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却遭二二五团1个营和第三路游击师的阻击，敌被迫进了一个小寨子，负隅顽抗。经红军多次猛攻，到午后全部被歼灭。

“歪嘴子政委”只身追顽敌的事迹，战后被广为传扬，成为战士们们的口头文学。

“歪嘴子政委”，当时名为刘幼安，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了团政委、师政委，总感到那个“幼”字不是个味儿，才改名为刘震（湖北孝感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年入党，参加红二十五军长征。全国解放后，曾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并新疆自治区委第三书记等职）。在九间房战斗中，他的嘴巴上挨了一粒子弹，虽然没有危及要害，却给他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痕，落下个“歪嘴子”。他的性情比较开朗，活泼乐观，说话也很风趣，大家都喜欢跟他开玩笑，见面就喊他“歪嘴子政委”！

红二十五军的共青团委书记黎光，原名尹昌尧，外号“汤圆子”。1985年撰写了一篇题为《长征路上的年轻人》的回忆文章，叙述了刘震的一段有趣的经历：“长征出发前，他在当连指导员，全连同志好赖都穿上了棉衣，唯独他还是个光膀子，实在冻得不成，这才把一件谁也不愿挨身的财主娘们的红花缎子棉袄，紧巴巴地穿在身上。别看他平时挺爱逗个趣儿，也怕同志们看到以后，拿他取笑哩！当时，就找来一件灰布长衫，严严实实地罩在外面，以防同志们取笑。然而，这个难以遮掩的秘密还是被人所识破，大家都挤眉弄眼，当作活跃情绪的笑料。长征入陕的路上，连里就有那么几个调皮家伙，每看到军领导走了过来，猛不防就把他的那件灰布长衫往起一撩，露出红艳艳的花棉袄，当着军领导引起一阵哄笑。弄得他面红耳赤的，急不得也恼不得，有心脱去又怕挨冻，实在无可奈何。到了商洛山中，他索性脱给一家穷得难以

出门的农家大嫂，换得一块纳着补丁的口袋片儿，披在肩头御寒。从此以后，也才结束了那么一种开之不尽的玩笑。可他又在战斗中落下个‘歪嘴子’，这个饶有情趣的绰号，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我们有时喊上几声，他也满口答应，笑笑而已。”<sup>①</sup>

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刘幼安所在的二二五团一营在桃园岭一带阻击敌人。正当敌警一旅残部突围时，他率三连直冲山沟，偶遇100多个敌人，全部是驳壳枪，企图夺路逃命。刘幼安果断迎敌，一阵手榴弹将敌打散，并乘胜追捕俘虏，夺取枪支。从俘虏的口供得知，这支短枪队是敌旅长的卫队连。这时，一个肥头大耳的敌军官正拼命逃跑。刘幼安奋起追赶，直追到沟底小河边。那家伙凭借河边一块巨石作掩护，企图顽抗。刘幼安围着这块巨石追击，驳壳枪里只剩1发子弹了，他机警地观察动静，待那家伙打完一梭正换另一梭子弹时，猛然扑上去，将其摔倒在地。2人厮打在一起，经过一番拼搏，刘幼安在夺敌手枪时左臂被子弹射伤。正在这时，营部掌旗兵赶到，挥动旗杆，用铁杆脚照准那个家伙的脑门猛力击去，那个家伙连嚎叫都没来得及就完蛋了。事后得知，被打死的就是卫队连连长。

1985年，刘震将军70岁。他在9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老同志要有点乐退精神》的短文，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做到乐退，首先要正确地估量自己。我们这些从战火闯过来，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人，谁不想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出把力呢？然而，岁月不饶人，廉颇老矣！谁也不愿老，但谁也不能不老。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不服老，不行啊！不少同志喜欢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言。而照我看来，暮年浩气，固然可嘉，但要冲锋陷阵，终归还是靠年富力强的骁将。……过去，南征北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今为着党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27页。

的事业让位、让贤、让能，让继往开来的一代新人走上领导岗位，搞好新老交替与合作，同样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当初出来干革命，不过是赤条条一个穷当。何名之有？何位之有？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一无所有。如果说名誉地位应当珍惜，那么真正的珍惜乃在于忘我，不忘我，即无乐。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将军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将军少年英雄的经历和同战友们一起从事的开天辟地的事业，使他抚今追昔，有感而发。将军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是有益的启迪。

袁家沟口大捷，毙伤敌人 300 余名，俘敌旅长以下 1 400 余名，缴获轻重机枪 40 挺，长短枪 1 600 余支；而红军伤亡仅 100 余人。

敌旅长唐嗣桐，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围剿”红二十五军以来，傲气十足，他发誓与红军誓不两立。红军的“拖疲”战略，他不知是计，反认为红军软弱胆怯，孤军深入，企图创建奇功。终于，满脸胡子的唐嗣桐被从俘虏群里找了出来，但见他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蓬头垢面，神情沮丧，活像一个老伙夫。

袁家沟口之战，是一次极为出色的歼灭战，创造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它是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 2 个大胜利。

在战斗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当时已跟踪追到山阳县城以西的洞峪口，距离袁家沟口战场不过 20 公里，却按兵不动，始终未敢前进一步。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虽然对“围剿”红军并不十分尽心，但当听说他的警备第一旅与红军已有“联系”的时候，他终于坐不住了。两天之内，他连续发出 4 道电令，督促一一〇师“立往增援”、“务祈解围”、“设法相救”、“就近收容该旅撤出部队”等等。谁知，这个何立中根本没有理他这个茬，就是拥兵不前，见死不救。也许因为在苍龙岭险些中过一次埋伏，何立中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行动；



或许是他的同僚们在鄂豫皖时的命运给了他前车之鉴，他不愿重蹈覆辙；或许是他的气数未尽，不该在陕南见先人于地下。但，逃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90天之后，何立中毙命于陕北的劳山战斗中，对手还是徐海东！

#### 四 威逼西安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陕西蓝田县的焦岱、长安县的引驾回一带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也是民间对历史的转载。

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大捷之后，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慑于红二十五军的军威，各路参加“围剿”追踪的敌人都不敢贸然行动。

鉴于根据地人力物力损耗较大，为了解决红军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队伍，扩大红军的影响，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次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位于西安城南秦岭山脉的中段，取其在天之中、城之南的意思而名之。这段秦岭，山峰环列，山势嶙峋，松柏葱郁，许多峰顶建有寺庙，主要名山有翠华山、南五台，它们虽赶不上华山之奇险，不如太白山之耸峙，却也风景秀丽，玲珑雅致，别有洞天。更因它们距离西安较近，又不像华山、太白山那样难于登攀，因此，吸引着众多的香客、游人。

秦岭，是我国东西走向的大山脉，它起自甘肃，没于河南，贯穿陕西南部，横亘于关中盆地与汉江谷地之间。陕西的河流，大致以秦岭为界，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秦岭以北属暖温带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以南则属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秦岭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阻塞着昔日陕西南北的交通。

1935年7月13日，恰是农历乙亥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天，红二十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

更子等地，迅速飞越秦岭，向北冲出终南山。

红二十五军出山之后，如秋扫落叶一般，全歼蓝田焦岱、长安引驾回等地鱼肉乡里的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10余里的韦曲、杜曲。与此同时，还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位于关中平原中部，背靠秦岭，面临渭水。城坚险阻，形胜利便。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曾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1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因此，古迹遗址甚多，著名的有大雁塔、小雁塔、碑林、明代城墙，以及城东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等。这座历史古城，如今却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北“围剿”堵截红军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的军队，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西进、北上、南下，同红军为敌；蒋介石对红军赶尽灭绝的指令，也从这里辐射出去。

7月的西安，正值炎热的盛夏，闷热的天气压得市民们喘不过气来。盘踞在省城内外的敌人，正在按上峰的旨意，频繁地调动着。他们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行动起来总是疲疲沓沓，无精打采。

在这个时候，红二十五军突然北出终南山，逼近西安，实在出乎敌人的意料。顿时，沉闷的西安，如同滚油锅浇了一瓢水，沸腾起来。南门戒严，人心慌乱。城内的许多资本家，更是闻风丧胆，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关闭店门，准备东逃，有的甚至已奔出潼关，逃往上海等地。西安城内外，笼罩着一团恐怖的战云。

7月13日这一天，恰是焦岱、引驾回两地逢集之日，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夫山民，提篮儿的，挑担子的，推着“地老鼠”小车的，一路上络绎不绝，流水般涌向集镇。红二十五军从商洛山中，越过终南山，奔了下来，早晨到达焦岱，午时赶到引驾回，当地群众都说：“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

开了眼了!”

热闹的引驾回，又简称为引镇。地处灃、灃两河之间的少陵原上，是长安县东南沿山的一座大镇，又是经大峪与库峪，通往商洛地区的交通要道，距西安只有50里路。这天，镇上的店铺门面，大都照常开张。那些卖蜂蜜凉粽子的，养面饴饴的、凉皮子面的、羊肉泡馍的、炸油糕油饼的，高喉咙大嗓门地吆喝着，把个小面杖敲得当当响，四下里招引顾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他们在朝拜过南五台庙会之后，也从集市上过往歇脚，喝茶吃饭，混杂在赶集的人群里，越发显得拥挤。这些远路而来的朝拜者，手里大都拎着几样用新麦秸杆儿编成的幼儿玩物，有小花提篮、蚂蚱笼子、响把捶儿、花边小帽，还有佛手、烙花篦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在街面上晃来晃去。别有一番乡土风味。

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引镇时，集市还没散去。徐海东副军长率领手枪团100多人，先头化装成五花八门的“赶集人”，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悄悄地把区公所、厘金局、烟赏局以及民团驻地，包围起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数十名民团武装收拾得干干净净。民团头子倪性初，被手枪团当场捉住。大部队赶过来后，把烟赏局头子姬福堂的家产，以及“永顺成”等几户地主豪绅所经营的商号，全都予以查封没收。而对资产较为雄厚的“天佑生货店”，因其掌柜李玉智安分守己，名扬乡里，则妥善加以保护。对那做小生意的店铺，实行公买公卖，秋毫无犯。

军政治部在这个时候是最忙碌的。他们担负着的任务主要有：开展群众工作，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情报，扩大红军队伍，检查群众纪律。

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在布置完任务之后，便和宣传科长刘华清、文印科长陈鹤桥一起，直奔镇邮政所。

郭述申，原名郭树勋，1904年生于湖北孝感。在红二十五军

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资历的。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6月任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1932年担任中共皖西道委书记，参与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9月任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同年11月参加红军，任第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1935年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在陕南期间曾担任中共鄂陕工委书记兼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刘华清、陈鹤桥这两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20年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到了90年代，刘华清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引镇邮政所门前冷落，里面更是寂静、冷清。郭述申一行3人，都在这里翻阅敌伪报纸，查找有关敌军围攻各地红军的战事消息。由于长期困守在商洛山中，对于当前的时局变化、敌情动态和外界的各种新闻，都知之甚少。因此，部队还没到引驾回，军政委吴焕先就吩咐政治部的“秀才”们，注意收集各种报纸，以便了解和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的艰难岁月里，也只有采取这种搜集报纸的手段，从那里带有“匪”字的战事消息里面，认真加以查找琢磨，方能悟出一点真实情况。

恰在这时，吴焕先也来到了邮政所。这个书生一般模样的最高领导者，白皙的面孔，深邃的眼睛，两道粗黑的浓眉，总是那么一耸一耸的，显得十分英俊、聪明而又庄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不是这儿走走，就是那儿看看，好像串门子似地到处奔忙。他进得门来，笑着说道：

“唉呀，想不到这个引驾回，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呢！”

郭述申、刘华清、陈鹤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注视

着他们的军政委。

吴焕先接着讲道：“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很有意思咧！听老百姓说，早年从汤峪到户县的沿山一带，山青水秀，风景很美，是唐代帝王将相夏天游览避暑的好去处。有一年，因为唐明皇来到这一带射猎，途中遇到大雨，在密林中迷了路，被当地老百姓引驾回到京城，才取名叫‘引驾回’，也有的叫‘接驾回’。”

“嘻，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刘华清感到挺有趣的，笑着插了这么一句。

“我们到了引驾回，敌人会不会前来‘引回’？”陈鹤桥眯着眼睛一笑，把大家都给逗乐了。

吴焕先又说：“海东同志正在审问那个区长，让他给西安打个电话，巴不得敌人能够出得城来‘引驾’，半路上打它个埋伏！”

原来，徐海东随着先头部队，率先来到引镇，占领了镇中敌人的区公所。不一会儿，手枪排排长跑来向他报告说，捉到了一个区长。

“押进来，我问问，”徐海东在区公所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才发现墙上还挂着部电话机。他拿起话筒听听，里面传出嗡嗡的声音，想是还畅通哩。这时手枪排排长把那个区长押进来了。那个区长手里捏着一顶礼帽，进门就手撩长袍，躬身向徐海东施礼。

徐海东问了他几句，看掏不出什么军情来，便指着电话机，说：“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

“不敢，不敢！”那个区长连连躬身。

手枪排排长理解首长的用意，就说：“让你打电话，你就快打，别罗嗦！”

那个区长腰弓得更低了，还拿眼角瞅着徐海东。只见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

那个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不料对方回答说：于学忠、

毛炳文的队伍都向西开了，城内无兵可派。

却说吴焕先看到郭述申他们没有找到有新内容的报纸，忙对郭述申说道：“你们再到区公所、厘金局、各大商店找找，看有没有别的报纸？要多了解有关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二十六军的消息。发现有什么新的动向，及时给我报告。”说着，便又急急忙忙地转过身来，直奔菜市场而去。

菜市场上，聚集着好几百农民群众。被红军没收的粮食面粉、棉布绸缎、衣物家具，全都搬到了现场。被俘的陕军旅长唐嗣桐，这时也被押到会场。前后都是明晃晃的刺刀。这家伙个头挺高，也很壮实，络腮胡更长了，被俘时就穿着一件灰军上衣，下身只穿了一条米黄色的半截短裤，现在依然如故。所不同的是，红军战士在他背后插了一块白纸招牌，上面写道“白军旅长唐嗣桐”。

刚愎自用的唐嗣桐，思想极为反动，也特别骄横。他在陕军警二旅、警三旅接连受到重创之后，仍想冒险“立功”，说什么他“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据说在蓝田县葛牌镇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的反动气焰最盛，张牙舞爪地大吹大擂：“红军是从南方流窜过来的一股残匪，已经溃不成军，不堪一击。我是不畏强敌，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敢追徐海东，我追！”现在，他反倒成了徐海东的手下败将，被押着来游街示众。

在他率部出征时，杨虎城曾一再叮嘱他，要小心谨慎，而他却不以为然，还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杨虎城暗自担心，没想到他的旅长如今落到今天这般模样。

吴焕先一走进菜市场，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忠寿（程坦）就向他报告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待政委讲话了……”

“海东同志呢，他们走了没有？”吴焕先随口问道。

程忠寿回答说：“已经出发了，他叫我们开过群众大会，连夜赶到子午镇。”

“我知道。”吴焕先应了一声，随后就站在一座断墙头上，习惯地把手卡在腰间，当众讲道：

“老乡们，各位父老弟兄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人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打天下的军队！中国有红军已经8年了。全国红军的总司令，就是朱德！老乡们都还记得吧，两年半以前，徐向前带领的一支红军队伍，足有两万人马，就从这终南山下走过一回呢，……”

讲到这里，就像一把干柴烧开了一锅粥似的，会场上顿时也嚷嚷开来，七嘴八舌地说：

“徐向前的队伍，那年是从汤峪出来的……”

“记得，记得！就顺着山边开了过来，一路上也打富济贫。”

“还在王曲、子午镇打过仗呢！”

吴焕先看到会场上十分活跃，便又高声讲道：“我们这个队伍里面，也有个姓徐的指挥官，他叫徐海东。徐海东还有个外号，叫‘徐老虎’！但是，这个‘徐老虎’不伤害老百姓，他专吃那帮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地主大老财！徐海东指挥的红军队伍，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人1800人左右。这个旅长唐嗣桐，就是在袁家沟口活捉的，大伙都仔细看看，这就是与红军作战的下场！……”

话音一落，红军战士就押着唐嗣桐绕场而过，游街示众。红军宣传队也紧紧跟在后边，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红军是工人农人的队伍！”“欢迎穷苦人都来当红军！”……

这一天，当地的贫苦农民群众，大都分到丈把棉布、几尺绸缎或一袋面粉，两斗新麦，有的也分到几样衣物家具。就连在街头卖油糕的李永发老汉，也分到20多斤食盐。那些从此过往的男女香客也都开了眼界，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过后，便把在

引驾回的所见所闻，添枝加叶地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传播到了灞桥、临潼、华山一带。

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全部人马都沿着终南山下，向终南山以西的子午镇开去。

子午镇，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这个峪口大镇，也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那些奔走于西安、汉中、安康以至四川境内的商客脚夫，大都取道于此，多在镇上歇脚住宿。南来北往的奇闻趣事，在此处不胫而走。倒是个信息灵通的地方！

红军出山已经3天了。到达子午镇以后，无非是镇压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押着陕军旅长唐嗣桐游乡示众。而这一切，对于敌军老巢西安，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终归不是长久之策。

作为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吴焕先，此时的心情很沉重。是啊，数千人的队伍，衣食住行都需要统筹安排，哪一步想不到，做得不周密，就会影响全局！如目前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是不行的！

吴焕先拿着郭述申送来的一卷报纸，急急忙忙地奔到程子华的住处，满面笑容地大声说：“军长，最大的好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看情况有北上动向！”

“真的？快让我看看。”程子华从担架上坐了起来。然而，他那一双被枪弹打穿的手掌，夏日里又感染化脓，用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像两个弹花槌子似的吊在脖子上。眼下，就连翻一张报纸，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吴焕先摊开两张报纸，他才眨着一双兴奋而又充满希望的目光，从那密密的字里行间探索着，认真地琢磨着。多么难得而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程子华略有所思地说：“怪呀，敌人的兵力调动，看来也十分频繁。薛岳的两个军到了成都附近，胡宗南的部队全部开到了川北地区，王均的第三军也进入甘肃，还有毛炳文……这十几万人



马，不是围攻堵截红军，又是在做什么？”

“是啊，看来，蒋介石的神经很紧张，到处在调兵遣将！”吴焕先分析说：“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就是从江西调过来的，已经从西安开往甘肃。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3个师从河北撤到了西安，却又按兵不动，已经3天了，全不顾及我们的威逼行动。看样子是在等待时机，早晚也要向西开。我考虑，川陕甘边境的战事可能更紧，对敌人更具有危险性！”

程子华不由问道：“你在哪儿看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看来绝对可靠。刚才，我又听到一点马路消息，完全可以证实。……”吴焕先笑着说。

原来，吴焕先刚才碰到一位来自四川万源县的商人，互相间闲扯了一阵。他听那商人念叨了这样一首歌谣：“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看你又如何？”咋一听，还有点莫名其妙。吴焕先仔细盘问了几句，也才晓得：这羊子（杨森，敌二十军军长）、冬瓜（田颂尧，敌二十九军军长）、猴子（邓锡侯，敌二十八军军长）、矮子（李家钰，敌新编第六师师长）、刘湘（敌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剿总”司令）等人，原来都是“围剿”川陕苏区的一群丑类，人民群众以辛辣的嘲讽，将其惨败丑态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因为嘉陵江防线被红四方面军突破，蒋介石把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予以撤职查办，杀鸡给猴看！

所以，吴焕先也就以此为据，结合各路敌军的调动情况，判断两大主力红军有北上动向，跑来跟程子华说说。

程子华忙说：“你的这种猜测估计，我看完全可靠。中央红军转战到了四川，川陕苏区红军岂能按兵不动？看来，红四方面军是渡过了嘉陵江，正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前，敌人的几十万大军，全都集中在川陕甘边界，进行布防堵截，就表明主力红军

确有北上意图!”

“呵呵，没错吧!”吴焕先笑了，有点得意。

程子华笑了笑说：“我们出山已经3天了，此处不可久留，得赶快作出决定。”

吴焕先立刻止住笑声，神色忧郁地说：“情况总是若明若暗，实在难办！自从撤离鄂豫皖以后，已经七八个月了，我们一次也没有接到过中央的指示，……”沉思了一会，他又不无感慨地说：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简直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满天空中飘动着，唉，稍有不慎，就会栽个跟头……”

程子华默默无语，内心里却像潮水般翻腾着：是啊，作为一军之长，他又躺在了担架上，现在，就是叫他做个参谋长，也只能动动嘴巴，而不能亲自动手了！

“子华同志，你是中央苏区来的，现在该体会到远离中央的难处了吧！”吴焕先边思边说，“宝珊同志病逝以后，决定我代理省委书记，可我……对于省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也管不了多少。我们这个省委，已经两年多了，因为缺少干部，一直都没有建立起军委会。从鄂豫皖到鄂豫陕，就这么一个状况，因为没有军委会，一切军事方面的行动都得由省委作出决定。省委又无专人主持工作，我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目前，省委必须首先担负起军委会的领导职能，考虑红军的战略行动！可在眼下，我们的党中央又在哪里？怎么才能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这个时候，吴焕先禁不住思念起徐宝珊来，要是他在该多好！

徐宝珊做事谨慎，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而且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还是入陕到了蔡川之后，省委书记不仅在思考着“如何立足以图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也在琢磨“万一立足不住”的去路问题。他认为，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全力以赴，抓紧开辟新的苏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好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相比之下，吴焕先一心一意创建根据地，似乎缺乏省

委书记这种全面的考虑。他有句口头语：“过多地瞻前顾后，就没法子带兵，什么事也做不成。”

事实上，带兵打仗，固然需要“勇”，但“谋”却也是时刻不能丢掉的，有勇有谋，进退自如，方能保证取胜。

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代理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感到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他又想起德高望重的郑位三，这位并肩革命多年的战友，心中又泛起丝丝歉意。

郑位三曾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认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所处的地域位置孤悬而又困苦，如不及时改变这种困境，早晚也是存不住的！陕南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好是很好，但无地方党的配合，又比较贫穷，困难确实不少。即使能够成点儿气候，创造几个小块根据地，等到敌人发动围攻时，连半年也坚持不住！

因此，在1935年2月19日召开的鄂豫陕省委常委会议，以及3月省委华阳镇常委会议上，郑位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结果，吴焕先以近乎粗暴武断地将“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向困难屈服”、“右倾思想情绪”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帽子，扣到了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头上。

在4月葛牌镇会议上，彻底解决了入川问题，统一了领导思想。会议还改选了省委，郑位三被清出了省委。因为他“坚持入川错误，反对省委的路线，取消其省执委，并要他承认错误与转变”<sup>①</sup>。会后不久，郑位三就被派往豫陕边从事开创新区工作。

这次红军出山，郑位三没有得到消息，当然也不能跟来了。

实事求是地讲，郑位三的主张并非全无道理，扣在他头上的

<sup>①</sup> 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帽子的确多了些、重了点。

程子华在1983年1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是让我作参谋长的。可是，省委在开会研究时，又决定让我担任军长。我当时向位三同志提了意见，还是没有改变。我这个军长么，到职还不到一个月，就躺在了担架上，……省委在华阳开会，我也是赞成入川的一个！”<sup>①</sup>

程子华那里整天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自个连身子也翻不过来。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他都离不开担架。平时穿衣吃饭，小解大便，根本无法自理，全靠警卫人员的照料。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因此，他也是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愧疚之感，斗争环境如此艰难困苦，他当军长的躺在担架上，实在也不是滋味。他认为，郑位三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孤军悬于一隅之地，跟中央也无法取得联系，但他的意见和态度，当然没有郑位三那么激烈、坚决而又固执。

吴焕先集代理省委书记与军政治委员于一身，感到了责任的繁重。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由于没有电台联络，也没有建立起交通关系，吴焕先随时都在盼望着党中央的指示，急于听到党中央的召唤！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他们也是一无所知，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所关心的整个时局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当时也只能从几张零散的过了时的报纸上，凤毛麟角地知道一点。当时，他们已得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华北形势岌岌可危。而国民政府竟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如既往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在这终南山下，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人，都

<sup>①</sup> 卢振国：《吴焕先传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

在为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后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方向，承担着历史的重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一书高度评价了威逼西安的影响：“红二十五军这一行动，使西北反革命势力中心和敌军在西北地区进攻红军的总后方——西安，大受震动。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之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了行动，城内的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这一行动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红二十五军得到了物资补充，并吸收三百多名新战士。

“威逼西安，是红二十五军继奔袭紫荆关、袁家沟口大捷之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所取得的第三个胜利。这个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围剿’计划至此遭到破产。”

---

---

## 第六章 见面礼

### 一 神秘的“石先生”

7月15日，也就是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第三天，有一位近似朝山看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子，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跟着，从西安西关出城而来。

但见，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黑里透红的脸盘，下巴特尖；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把两只眼睛遮得严严的，无法看到那双闪烁的眼神。他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的白绸大褂，银灰色的制服裤子，一双不大可脚的黑布鞋，底儿还不曾被泥土完全沾污。随身背着一把半新不旧的油纸伞，还有个黄布卷成的小包袱，斜挎在肩膀头上，里面也不晓得包着什么玩艺。

毛驴子“得嗒得嗒”地奔走着，颠动着，松散的蹚土路上，弹起一朵朵烟尘。那个赶脚的老汉紧紧追随在后，一路上气喘吁吁，热得满头大汗。

日当正午时，他们来到了郭杜镇。一条狭窄的南北小街，除了几个荷锄而归的农人以外，街面上很少见到赶集的人。光天白日的，大小店铺几乎都关闭了门窗，气氛有点异常。那些平时横行街头的团丁乡勇，此时也溜之大吉，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也许是红军出了终南山，这一带也很吃紧，街面上才变得如此冷落。按说，他们应当在小镇上吃顿午饭，稍事休息一会儿。谁知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只是就近买了五六个香脆甜瓜，俩人一搭儿吃着，很快又从南头的小巷里拐了出来。他们抄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继续向南走去。

赶脚的老汉，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嘟嘟囔囔地说：

“这大热天，也不歇个晌！你这先生，就知道赶路，也不知道心疼我的牲口，……”

被称为“先生”的微微笑道：“你老也为看那镇子，死气沉沉的，连个卖饴饬的担子也没有，没个下处哩！呵呵，早点赶路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

“你这先生，也是个贼的胆！”赶脚老汉紧接着说，“南山底下正闹着红军咧，你去朝的啥山、逛的啥会？嘿嘿，南五台庙会，前两天就收场了，不信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骑驴人连忙应道。沉了一会，他才掩饰地说：“前面就是香积寺，我想在此处歇上一晚。听说，香积寺也是唐代的一座古寺，……”

“你不去南五台啰？”老汉愣着两眼。

骑驴人随口讲道：“你没听那卖瓜的说，南山底下，到处都扎满了红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汉连声念叨起来，“挣你两半脚钱，难保我的牲口咧！”

“到了香积寺，我好进庙去烧上一柱高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好说，好说。”老汉喜形于色。可他随后又说：“甭怪我老汉多嘴。你这蛮声呱啦的外路人，就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我老汉常在城边头拉驴赶脚，前些日子也送了个居士老婆，朝过五台山咧！嘿嘿，你当我看不出来……”

陌生人猛地一怔，随口说道：“你不见我的包袱里面，包有香蜡黄裱？”

“再甭哄人咧！”老汉呵呵笑道，“瞅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走不得长路……”

骑驴人不由得看了看脚上的鞋子，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这

个嘛，阿呵呵呵，说来……”沉了一会儿才说，“你老汉也是满省城转过的，都说那城里的端履门，是个‘抬脚割掌’之地，小偷多得怕人。我昨天从那端履门走过一回，只怕被割去鞋掌，一步都没敢抬脚。等到更新出街头，掌子倒是没有被贼割去，鞋后跟全都磨出两个大窟窿……阿呵呵呵！”

老汉也不由笑了起来，戏谑地说：“你这先生，就会逗个笑话！”

陌生人继续讲道：“今早晨出城时，跑遍了南院门和西大街，好几家鞋店都没有开张，害怕红军攻城哩！多亏在西门外面，碰到个摆纸烟摊子的老婆婆，买下这双鞋……”

“说是说，笑是笑，……”老汉似乎有所觉察地嘟哝着。但猛不防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你可别是个红军的探子！给我老汉背上个黑锅，没法子说呢……”

“哪里的话哟，”陌生人神色自若地笑了笑。随后又在毛驴背上“哼哼唧唧”地念诵着：“长安城嘛，乃是周、秦、汉、唐之古都。泾、渭、泾、灞、沣、镐、潏、滈，八水绕城而过。听说香积寺附近的一条潏河……”

赶驴老汉听得直愣神儿，逗趣地说：“你这先生，真格是红萝卜丝丝调辣子，吃出看不出。嘿嘿，学问大着咧！”

陌生人紧接着说：“不瞒你讲，我这从南到北的外乡人，行医到了长安地面，凡是有名胜古迹的地方，都想看个明白。听说南山的几处古庙里面，都有和尚道士居住，可不能两手空空的，总得进点香火才是……”

“嘿嘿，你还是个大善人！”老汉赞许地说。

从郭杜镇到香积寺，只有十来里路程，不多会儿也就到了。

香积寺，在西安城西南18公里，潏河与浣河交汇处的长安县境内神禾原的最西端。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过香积寺》，诗云：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可见当年香积寺是一个极为幽静的地方。

赶驴老汉指着地势突兀的神禾原上耸立着的一座孤塔，说：“快到了。”

还没走进香积寺内，陌生人就跳下驴来，给老汉付了脚钱，好言谢了几句，拱手相别。赶脚老汉一路上被他弄得一愣一愣的，巴不得及早摆脱这个奇人，就势往驴后腰上一趴，“驾”的一声，扭头就走了。

然而，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不速之客，当时并没有去香积寺朝拜，而是急急忙忙地过了漓河，朝着南面不远的子午镇方向，飞也似地直奔而去……

子午镇，这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峪口乡镇，又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在此住宿。现在，镇上以及附近的不少村子，全都住满了红军队伍。

吴焕先正在军部驻地，翻看着眼前的几张旧报纸，还不时抬起头来，与程子华聊上几句。这位主要的决策者的脸上，略微显出焦虑的神情！

《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

而红二十五军却是孤军悬于一隅之地，对全国的斗争形势知之甚少。关于中央红军的消息、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及陕北红军的情况，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他们只能从几张过时的国民党报纸上，了解个一星半点，但由于材料过于简单，来源又不可靠，很难作出决策！

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毕竟只是一种策略，终

南山下并非是久留之地。但部队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奔向何处？又必须当机立断！

情况的变化，往往又出乎预料。偶然碰巧的事件，却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近似香客又像郎中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子午镇的街头，径直找到军部驻地。

多么神秘的先生啊！

“政委，你看是谁来了？”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忠寿（即程坦）、宣传科长刘华清，领着那个不速之客走进屋来。

吴焕先不由啊了一声，猛一下扑上前去，扒着对方的膀头直摇晃，惊喜地喊道：“石健民！看你这么一副先生打扮，是哪一门子‘先生’啊！快说快说，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呀！……”

“热风，盛夏时节的热风！”石健民见到了老相识，咧着嘴巴直笑。

程子华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健民同志，我们又在这里见面罗！”

石健民正要跟程子华握手时，不由吃了一惊：“子华同志，你……负伤了？”

“打仗负伤，也是兵家常事。”程子华笑着回答。

“呵呵，你们早就认识？”吴焕先随口问道。

“可不是嘛！我到鄂豫皖苏区来，就是健民同志送的呢！”程子华笑着说。

“呵呵，你怎么也认识？”吴焕先又问刘华清。

十七八岁的刘华清，一张圆乎乎的脸盘儿，还带着几分儿童时代的稚气、腼腆。他满面绯红地回答：“早就认识哩！两年前，我们都在鄂东游击司令部工作，他那会儿是参谋主任。”

“唔，是位三同志的军事顾问哪！呵呵，都是老相识了，难得难得。赶快坐下，坐下……”吴焕先忙在一旁张罗起来。

对吴焕先来说，石健民的到来如同久旱的禾苗碰到及时雨一

般，心里感到特别高兴、激动。已经七八个月了，没有得到过中央指示，在商洛山区转战，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简直成了聋子、瞎子。现在，见到了党的交通员，似乎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了，简直像在做梦！

程子华受伤后，生活不能自理，一直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心情比较郁闷，身体也很虚弱。他虽然言语不多，但对石健民的到来，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急着想听听来自中央的消息。

石健民刚一坐下，就脱掉那双不大可脚的黑布鞋，诡秘地笑着说：“我带来的两样货物就缝在鞋子里面。呵呵，切莫见笑……”说着又从肩头取下那把半新不旧的油纸伞，递给吴焕先，说：“伞把子里面，还有两份密码！”

吴焕先喜出望外地笑道：“此地农民有句俗语，‘人到着急时，总会有个出奇处。’你呀，这一回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就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似的，这回可有了盼头！”

“天气炎热，就怕远水解不了近渴！”石健民风趣地笑着，讲起了他寻找红二十五军的一番经过……

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石健民，湖北黄安（即红安县）箭场河乡石岗村（今属河南新县）人，1905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幼时只读了几年私塾，随后在七里坪一家中药铺当过几年学徒，多少懂得一点医道。他与吴焕先来自同一个乡，也是一对老搭档。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一起参加过鄂东特委在七里坪召开的党的活动会议，并一起参加了著名的黄麻农民暴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之后，他们一起在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工作。同年11月29日，吴焕先主持重建红二十五军，石健民还留在鄂东北游击司令部，任参谋主任，协助郑位三（鄂豫皖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工作。不久，石健民卸去参谋主任之职，专任鄂豫皖

省委的交通员。

从此之后，他就脱去了红军的灰布军装，像个飘忽不定而又变幻莫测的魔术师似的，奔走于武汉、上海、郑州等地，执行党的特殊任务，秘密传送党的文件。这一时期，他和红二十五军之间，总是像一条红色的纽带，随时随地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党的地下交通员，由于平时刻苦好学，曾读过不少的医药、历史、地理书籍，各方面的知识都比较丰富，而且写得一笔好字。他担任党的交通联络工作，也很有心计，十分灵活机智，着装变化多端，行动出没无常。一举一动都是极其神秘的。在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时期，他往返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时而火车，时而轮船，时而汽车，时而毛驴，时而徒步奔走在大别山的腹地，谁也说不清有多少次数。经他转送的党的文件、书信和刊物，都及时准确地送达目的地，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

有时候，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他事先就将某些“绝对机密”的文件，逐字逐句地死记在脑子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即使把原件毁灭干净，只要人活着，见到上级领导时，他照样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他从斗争实践中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成为一名极其出色的红色交通员。

石健民，虽然没有随同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但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英名录中，却又成了一名必不可少的英雄人物。

那个千里迢迢把程子华带到鄂豫皖的就是他。

时隔八九月之后，这个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员，又一次追随着红二十五军的转战路线，及时而又准确地来到了终南山下。

这一次，他更是几经周折，历尽艰险，从上海赶到西安，试图进入商洛山中，与红二十五军联系。恰在这个时候，红二十五军又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城。机不可失！他马上采取果断行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极大危险从敌军老巢里奔了出来，不

失时机地找到红二十五军。

石健民的到来，对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后的战略，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带来的两份中央文件，全是4月间发出的，为时已经很晚。虽说还有“甲乙两组密码呼号”，但因为电讯器材残缺不全，也无法使用联络，根本无法与中央联系。对于红二十五军当前的军事行动，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唉，活捉了一个唐嗣桐，却没有缴获一部好电台！”吴焕先苦于没有电台联络，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他曾多次讲过，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弄个“无线电”。眼下，果然又一次应了他的预言。

然而，石健民的到来，完全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胜利会师的消息，并从种种迹象证明，确有继续北上动向。这对于吴焕先来说，更是如获至宝，十分难得。他对程子华说：

“好呀好呀，两支主力红军已经会合，我们陕南陕北两支红军队伍，完全可以携起手来，集成一个力量，打开新的斗争局面……”

此时此地，两领导人都是那么高兴，那么振奋，那么迫不及待，又那么跃跃欲试！

吴焕先坚定地说：“海东同志带领的先头部队，今晚驻扎在洋峪口。咱们马上也赶到洋峪口去，召集省委成员开个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

“好，说走就走！”程子华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吴焕先不由一笑：“你呀，还是坐上担架。”

“今晚上月亮很亮，走走也好……”

当天晚上，石健民也随同两位领导一起，带领着军直机关和后卫部队，开向洋峪口。

7月15日晚，吴焕先在长安县洋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

议。

省委根据石健民带来的确切消息，通观全局地分析了形势，遂决定向中共中央建议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sup>①</sup>。同时认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是红二十五军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

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后来曾经讲过：“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这偶然作成之“向导”，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革命形势急骤变化的棋盘上，红二十五军这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确实走得相当及时而又高明，十分果断而又坚定！

从此，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艰难而又壮丽的一页！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即从洋峪口出发，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这支由大别山转战而来的劲旅，开始了更加光辉的长征历程。

“健民同志，你也得随军行动，辛苦上一程。走，一块儿出发！”吴焕先与石健民一起迈步向前走去。

这一对来自大别山下、倒水河边、相距只有六七里地的同乡，曾经如影之随形的革命同志，而今又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吴焕先不无感慨地对石健民说：

“已经七八个月了，我们一次也没有接到中央的文件，得到中央的指示！不瞒你讲，……”停顿了一下，他才接着讲了下去：

“有一次，部队从商洛山里的竹林关路过，那地方是个花鼓戏窝子，早年间从湖北流传过去的。当时，有不少的湖北战士，都

<sup>①</sup> 引自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想听听家乡的花鼓戏，就请了两个老艺人，唱了那么几段。记得有这样两句：‘流浪的孩儿想爹娘，阴处的野草盼阳光。’我不知战士们当时有何感想，可我听了以后，心里实在不是个味儿。想起我们这支远离家乡的红军队伍，简直就像没爹没娘的孩子，我就想补充上这样两句：‘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渴望着引路的党中央！’可是，——”他突然顿了一下，随后才说：

“可是，我这个军政治委员，党的代表，只能把这两句词儿，深深地埋在心头。如果把这四句词儿连在一起，在部队中唱了起来，军心早就散了、乱了！我想，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会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再把这几句词儿从心里掏出来，唱给党中央……”

“焕先同志，你就放心好了。我是党的交通，有责任把红二十五军的艰难处境，向中央作出报告！”石健民比吴焕先年长两岁，带着一种兄长的语气安慰对方。吴焕先则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应当给中央写出书面报告，请求中央审查我们的一切做法，给以明确指示！”

停了一会，吴焕先不禁又说：“唉，眼下有许多工作要做，实在顾不上。你得跟随部队走上两天，……”

7月17日，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周至县境。

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但在军部驻地——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面，依然亮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吴焕先正伏在一张破旧的香案上，奋笔疾书。

盛夏之夜，没有一丝风。天气出奇地闷热，蚊虫也叮咬得厉害。为了赶时间，不能不挑灯夜战！他正在给中央起草一份报告，好让石健民及早转报中央。

题为《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写成了！报告长达8000余字，按时间顺序，概括了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和创建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的全过程，直到威逼西安为止，可以说是一篇艰苦卓绝的斗争简史！他正写到省委的工作时，采取了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提纲式的写出了六个方面的进步及一般情况，同时又列举出五个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问题。

从吴焕先所写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已明确意识到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没有上级指示及各兄弟党组织的关系，当地亦无党的组织，红军之一切行动都得不到应有的配合帮助”；

二是“红军本身扩大了三分之一，但没有完全实现扩大3 000名新红军的计划，成立起新的师团”；

三是“在红军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是狭小的，物资也不能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一个很好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

对于红军威逼西安的行动，他认为只是“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防线，动摇了敌人进攻的整个后方，使敌人在疲惫之下鞭长莫及”，“我们的胜利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得到最后的全部胜利”。

这种面对现实的深思熟虑，似乎也意识到“孤军悬于一隅之地”的艰难困境。换言之，既是对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切入实际的反思，又是对红二十五军的战略出路的考虑。

鉴于这种新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出于新的战略考虑，吴焕先在写信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我们只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但不知党对全国红军之对付敌人国内战争，现在时期的战争策略如何？想一定有新的计划对付敌人。我们红二十五军如何行动，现在是否改变我们的任务，我们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

“是否可以同红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



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请指示我们！”

吴焕先把一切料理妥当之后，天也亮了。他把连夜赶出来的报告，连同省委关于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都交由石健民呈报中央，请中央全面予以审查、指示。临别之前，吴焕先依依不舍地嘱咐说：

“健民同志，敌情已很严重，我也不能把你老拖在我的身边。现在就打发你上路……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保重！”

石健民望着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含着泪花道别：“焕先同志，只要我姓石的活着，就一定能够把你们的心愿准时报给中央！”

“好好。但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平安无事！”吴焕先微笑着回答。可那充满血丝的眼眶里面，不禁又滚出几滴晶莹的泪珠儿。又谁知，这次分离，竟是他俩的永别！

石健民在手枪团的护送下，沿着一条坎坷的小路，匆匆向北走去……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去都肩负着历史使命。至于这些党内文件，到底是怎么送到中央的，似乎已无人知道了。然而，这些闪烁着历史光辉的历史文献，都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抗日战争初期，石健民曾两次到过陕北。1939年，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曾护送张云逸的爱人及其儿子去安徽庐县，途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不久，在立煌县（今金寨县）英勇就义。

党的交通“石先生”，这个鲜为人知的地下交通员，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与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不仅是党中央联结红二十五军的一条纽带，而且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中，即先后两次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都起到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至今，在中共鄂豫皖、鄂豫陕省委写

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历史文献中，仍可看到“石健民”、“石同志”、“石先生”之类的称呼记载。这是历史留下的真迹！

## 二 血沃原上草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红二十五军从洋峪口地区出发，经郿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县境，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挺进。敌人都认为，徐海东是想横渡渭水会合刘志丹。因此，敌人的主要兵力部署在西安至宝鸡的渭河两岸，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严阵以待！

7月22日，红二十五军由辛口子突然南折，进入秦岭山中。于是乎，西安的许多报纸又纷纷猜测起来，都以为这支与红四方面军有着渊源关系的红军队伍，“有进入四川的企图”。

红二十五军沿着当年红四方面军人川曾经走过的一条老路，经由辛口子、青岗砭、老君岭等地，翻越高耸入云的太白山。沿途，部队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扬言进攻汉中，进一步迷惑敌人。

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人，企盼的正是敌人判断的错误。这对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太白山，海拔3767米，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位于眉县、周至县和太白县的交界地带。盛夏时节，其背阴处仍有斑斑残雪，当地有“太白积雪六月天”的说法。唐代诗人李白《登太白山》诗云：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见还？

红军指战员虽然不能尽情游览周围的奇光异景，却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从而给行军增添了几份惬意。三年前，红四方面军也从这里走过，南下入了川。他们可没这么幸运！那时正值寒冬，风搅大雪，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战士们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几副标语，禁不住私下里嘀咕：该不是到四川去吧？！

翻越太白山以后，红二十五军经过了佛坪旧城、二郎坝，于7月27日到达留坝县的江口镇，击溃了当地民团武装。由于连续10多天的行军作战，部队相当疲劳。为了完成西征任务，省委决定在此休整，并进行西征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在部队休整期间，省委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动员大家为争取同党中央会合而努力奋斗。

与此同时，部队还在江口镇进行了整编。将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280余人，分别编入各团。原来在华阳地区坚持斗争的华阳游击队在遭受挫折之后，剩下的20多人此时也补入连队。华阳游击队副队长魏文建回忆道：“7月下旬，正是最困难的时刻，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恰好从华阳以北地区路过，我和其他几个伤员都一起归回部队。军政治部的朱良兴同志，当时给我留了一匹马，骑着随军行走。

“到了江口镇，钱信忠院长才给我动了手术，把子弹头夹了出来。这时，我们华阳游击队的同志，恰好也都追赶上主力部队。原来，他们听说红二十五军过来了，整整追赶了几天几夜，一步不停地追上部队。军政委当着我们讲道：‘现在，我们要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你们都不要回华阳去了，就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动，去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sup>①</sup>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53～54页。

整编后，红二十五军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连同机关和直属分队，全军共4 000余人。广大指战员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深入敌后，努力作战，牵制敌人，以实际行动迎接主力红军北上。

也就是在江口镇，吴焕先以省委的名义，亲自写了两封指示信，送给留在陕南的郑位三、陈先瑞。信中除了叙述当前斗争形势和红二十五军西进陕甘的战略任务，着重就坚持和发展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巩固这块新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作为代理省委书记、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既能依据时势，果断地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又十分重视鄂豫陕这块经营了半年之久的革命根据地，反映了他的革命全局观。他的这种作法，与当初撤离鄂豫皖苏区之时，决定留下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都已被历史加以证实和肯定。

红二十五军大胆、主动的西进行动，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给其后方造成了严重威胁。正在成都督战的蒋介石，心急如焚，他于7月21日电令西安绥靖公署：“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8月15日以前肃清，如届时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西安绥靖公署于7月31日向所属军、师、旅、团发出这样一份密电：“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之间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当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

“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匪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于最短期间先将徐海东股匪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倘匪万一向东回窜或北窜时则派队穷追，不灭不止；并派有力部队于陕甘边境及汉水流域各地严防固守；对于商洛一带则划区搜剿，以

清散匪，……”

很明显，敌人东自商洛山中，西至陕甘边境，南到汉江两岸，北抵渭河沿线，实行围追堵截，企图从四面八方，布下天罗地网，置红二十五军于死地！

然而，敌人的行动却慢了半拍！就在7月31日这天，红二十五军担任前卫的二二三团一营，轻装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一举歼灭守敌胡宗南部4个连。当天，红二十五军进驻双石铺。

当天傍晚，二二三团一营三连设在双石铺东北的警戒排哨，发现了一顶滑杆，上面坐着一个气宇不凡的胖乎乎的家伙，但见他身穿白绸大褂，手执蒲扇，悠哉游哉地走了过来。三连排长张天云见此人行迹可疑，就上前拦截盘问，没想到竟是敌军的一位少将参议。

20年之后，张天云被授予中将军衔。说起中将当年捉少将的故事，也是红二十五军战史上的一件趣事。

这位高级俘虏带来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大公报》7月16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22日又报道：“朱、毛部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也证实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阻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水天。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无论是主力红军北上动向，还是敌军的截堵部署，现在基本上清楚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红二十五军的决策者们当即作出决定：迅速行动，西进甘肃，袭击天水，威胁敌后，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打下双石铺的第二天，就是八一。为了过好节，军部发出通知，要改善一下伙食，准备开一个纪念会。同时补充粮饷，休养

生息、为出击甘肃做准备工作。

傍晚，徐海东听说这一带是古战场，便走出镇口，拿起望远镜，很有兴致地向四周山峰观望。一个参谋说，这双石镇正是三国马谡失街亭的地方。

徐海东回忆说：“望着附近的群山峻岭，有的同志说：

‘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想必真地像戏中所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有的同志取笑说：‘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sup>①</sup>

说归说，笑归笑。胡宗南的确也没有预料到红军的神速行动，同时胡宗南也不同于马谡，他对蒋介石倒是言听计从，被调动得晕头转向了！

两当，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军领导事先派手枪团化装潜入两当城内，于8月3日配合先头部队攻占该城，俘获20余人。两当城头飘起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旗，这是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攻取的第一座县城。

当晚8时，红军离开两当县城，向天水进发。8月7日到达两当以北的利桥镇，接着经党川翻越麦积山，9日晚兵临陇南重镇天水。

天水，是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周代称戍邑，秦置上邽县，之后有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名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徐海东亲率二二三团二营，由天水北面向城内猛突，消灭守敌100多人，一举攻克天水北关。守城之敌一面报警告急，一面凭借城防工事顽抗。红军几经突击，终未克城。这时，驻守在甘谷、武山一带的敌军已开始沿天靖山一线回援，驻守在清水的敌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3页。

军也迅速地向天水进发。红二十五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便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撤至凤凰山、沿河镇（今天水市北道区新阳镇）一带，打垮了当地民团武装。8月11日，红二十五军从新阳镇北渡渭河。

奔腾的河水卷着浪花，仿佛在向红军将士挑战。当时，全军只找到一条小木船，难以渡过浩浩荡荡的队伍。好在当时天气晴朗，没有遇到狂风暴雨。军领导派人试了水情，最深处只没到人的肩头，完全可以涉水过去。除了伤员病号、幼小儿童和女护理乘船渡河以外，全军指战员大都是徒涉过河的。有的骑着牲口，有的拽着牲口的尾巴，有的手牵手从河水中漂淌而过。另外还在河面上拉了几根绳索，战士们大都把枪支弹药顶在头上，手攀绳索过了河。弹药、粮草也或运或驮，没到半天时间就到了渭河北岸。

过了河的红二十五军，成功地插到了敌人的背后，完全把自己置于主动地位：既可以乘胜转入陕北，实现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目的；又可以扼住西（安）兰（州）公路，扰乱敌人后方，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红二十五军北过渭河的情景，还曾留一幅历史图片，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说起来有些偶然，却又很有意义：部队到达双石铺时，有两位找上门来的照像师傅，因为生意不怎么景气，很想与红军做点生意。军参谋长戴季英决定将他俩留下来，随同军部一起行动，吃饭不要饭钱，照像却开给工钱。这样，就将他俩带到了陕北，沿途拍下了几幅极为珍贵的历史画面。

长征路上，吴焕先所留下的三幅肖像，就是这样偶然作成的永久性留念。否则，他的戎马倥偬的短暂一生，也难以留下一张照片。照片是在两当县城拍照的，一幅是吴焕先的半身留影，一幅是他与徐海东的合影，另一幅是他与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以及詹大南等警卫人员的合影留念。而这最后的一张合影

照片，郭述申将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这张照片经由杨尚昆转到斯诺手里，现仍见诸《斯诺眼里的中国》画册。这本画册上的图片文字说明为：“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其实并不确切。这是红二十五军几位领导同志以及他们的警卫人员，并肩团结战斗，情同手足的真实写照！

吴焕先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形容过了渭河的红二十五军，他说：“现在，我们就像一个过河的卒子，只能朝前进攻，而不能向后退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威逼西安以来，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以高度的大局观，以犀利的观察力，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的动向，果断地决定着自己的战略策略。过了河的红二十五军，孤军深入敌后，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纵横驰骋，勇往直前。

红二十五军过了渭河，马不停蹄，一举攻占敌守备薄弱的秦安县城。这是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占领的第二座县城。

红二十五军雷鸣闪电般的行动，强烈刺激了蒋介石。红二十五军战史这样写道：“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敌人极为震惊。蒋介石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日，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初时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督饬陕军各部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最后在八月十日的电报中指出，‘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一部分兵力，‘统由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据此，敌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箝制和吸引敌人，



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sup>①</sup>

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主力，红军继续北上，向通渭、静宁前进，把交通动脉西兰公路拦腰斩断。8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地。

兴隆镇一带是回民聚居的地区。红二十五军领导对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直很重视。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军领导都根据当地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照执行。这次进入单家集、兴隆镇之前，军政委吴焕先就了解到反动政府大汉族主义统治及军阀部队在这一带造成的恶劣影响，民族之隔阂严重，于是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一面打仗，一面做好回族地区的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反对大汉族主义。为此，他专门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水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按照省委和军领导的要求与规定，许多连队在进入回民地区之前，均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军领导还派手枪团和少数回民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镇，把事先写好印好的标语、传单、布告广为张贴，进行宣传。

部队进入兴隆镇后，指战员们露宿于街头村外，秩序井然。军领导决定在此休息3天，恢复体力，以便继续行动。

兴隆镇，位于静宁以北大约三四十里处，古时有“陇中苦，甲天下”的说法。这里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再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统治剥削，以及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当地回族人民生活处于极度的贫苦之中，因此，兴隆镇并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61页。

不像字面含义那样兴隆，倒是给人一种萧条的印象。也许是红军队伍第一次光临此地，回族群众对红军不大了解，甚至还怀有戒备和恐惧心理。

针对这种情况，部队一面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吴焕先派出几名政工干部，把清真寺的阿訇（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及当地有名望的绅士，邀请到部队驻地做客。吴焕先按照当地回族的礼俗，特意让供给部购买了一些名为“三炮台”的盖碗茶具，亲自在每个茶碗里泡上冰糖，表示红军怀有冰糖一般洁白透明的心，真心诚意地接待他们。吴焕先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开门见山地讲道：“我军进驻兴隆镇，一不向你们催粮草，二不向你们派捐款，三不拉你们的民夫壮丁。大家都不要担心害怕，红军是工农群众的队伍，决不会骚乱老百姓。我们也不会在此地停留久驻，稍作休整之后，很快就走！”随后又讲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特别提到“三大禁令、四大注意”，说红军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并请他们监督执行。客人们听了政委的一番话，脸上露出了笑容。

8月16日早晨，兴隆镇的大小店铺，全都照常营业开张。街头巷尾，人来人往，恢复往日的景象。红军的到来，似乎又给偏僻闭塞的兴隆镇，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兴隆、繁荣。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在一片欢腾的军号、锣鼓、鞭炮声中，热情而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并送了绣有“德高望重”四个大字的锦缎匾和一些银锭、肥羊等礼品。仪仗队人人精神抖擞，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表现出红军的军容军貌，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男女群众。清真寺的阿訇看到红军如此敬重回民，心情十分激动，他们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并且赶了一群染着红色的肥羊，喜气洋洋地来到军部作了回拜，并赠送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劳苦功高”四个大字。

在此期间，全军还开展了为回民兄弟做好事的活动。指战员

们清早即起，把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洁一新；还主动为群众挑水扫院干杂活，并用粮食、衣物救济贫苦农民。军医院的医生和看护，热情为群众送医送药，诊治疾病，院长钱信忠还亲自为一位腹胀病患者扎针疗病，使久治不愈的患者解除了痛苦，因此，被回民群众视为“神医”。

17日中午，当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的群众热情为红军送行。清真寺的阿訇和村中的长者，头顶礼品来到军部，赠送给红军指战员，并向红军指战员深深鞠躬敬礼，表达了全镇人民对红军的无限敬意，衷心祝愿红军这支仁义之师多打胜仗。马胜利等回族青年还参加了红军。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的红军陕甘支队<sup>①</sup>也到达了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受到了当地回族群众亲人般的欢迎。一位红军战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回民对红军如此热烈，使最富阶级友爱的红军战士们，分外兴高采烈，喜耀欢呼，连一个聋古（即聋子）的运输员，都发笑不已，挑起担子走跑步。观众莫不称赞红军之和葛友爱。”

毛泽东到了陕北，在接见徐海东、程子华时，还曾夸奖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所做的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在兴隆期间，红二十五军派人多方侦察，了解中央红军的消息，但一直没有获得结果。徐海东在《会师陕北》中这样记载着：“在兴隆一带休整了三天；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消息，省委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们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

---

<sup>①</sup>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会合刘志丹同志的陕北红军。”<sup>①</sup>

根据这一精神，红二十五军转而东进，在西兰公路沿线回旋，时刻准备与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合。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大部，活捉敌县长、保安团长，并将所缴获的部分衣物被服救济贫苦百姓。

当天晚上，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

两个月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也翻越了六盘山，写下了光辉诗词《清平乐·六盘山》。

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瓦亭附近，与由固原（今属宁夏）南下之敌第三十五师一部突然遭遇。敌军虽有骑兵，装备优良，但缺乏紧急应变能力，被红军一举击溃，狼狈逃窜。接着红军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一带，19日，逼近平凉县城。

平凉县城，位于六盘山以东，是甘肃境内西兰公路上的重镇之一。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就盘踞在这里。

马鸿宾，回族军阀，美国记者斯诺笔下的西北“四匹大马”之一，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宁夏省政府主席。抗战期间，他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先生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1949年9月19日，在我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终于接受解放军关于和平起义的主张，并为瓦解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和迅速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76岁的马鸿宾病逝于兰州。

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还没有同红二十五军交战，就背上了“败军之将”的黑锅！

第三十五师原属他的堂兄弟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参加过对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4页。

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结果被红二十五军狠狠地揍了一顿，其中有两个团全军覆没。惨败的第三十五师后来被调往开封整补时，被刘峙吞并，落得个名存实亡的下场！蒋介石便将这个番号赐给了马鸿宾。

马鸿宾将其暂编第七师改为第三十五师，下辖3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师直配有炮兵、工兵、辎重、特务4个营，名目虽多，总共却不过八九千人马。

吴焕先、徐海东等当年郭家河战斗的指挥员，只知三十五师是败军之师，却不知其番号的变化始末。蒋介石赐给马鸿宾一个“败军之师”，马鸿宾也为他堂兄弟背起了败军之将的名声。

红二十五军斩断交通要道西兰公路，挥兵东进的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

蒋介石急忙向驻防宁夏金积、灵武等地的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发出通知：“豫鄂陕边境赤匪，由徐海东率领西窜，企图与陕甘边区赤匪合股，为害西北。

“命令：

“该师移驻陇东后，以一部对陕甘宁边区取包围封锁形势，勿任流窜，以主力集结于平凉、西峰镇之间，相继堵截徐匪。”<sup>①</sup>

据此，马鸿宾率部南下陇东，在瓦亭、三关口、平凉、泾川、西峰等地设立封锁线，妄图阻挡红军东进。马鸿宾还亲自坐镇平凉，指挥作战。

红二十五军兵临城下，城内守敌十分惊慌。

前天六盘西，昨日六盘东，今天临平凉，神速似天兵。马鸿宾没料到红军这么快地来到他家门口，急忙调一〇五旅之一部增防平凉，同时，令师属骑兵团及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分由庆阳县

<sup>①</sup> 马培清：《国民党陆军三十五师在陇东截击红军纪实》，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西峰镇、宁县早胜镇，向泾川县城集中，妄图卡住西兰公路，拦住红二十五军的东去路线，将红军逐出陇东地区。

红二十五军不断袭扰并牵制敌人，并不以攻城掠地为目的。因此，在马鸿宾的眼皮底下只休息了一个晚上，8月20日凌晨，由泾河北岸绕过平凉城，在城东的四十里铺南渡泾河，沿公路到达白水镇。

这时，马部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3个步兵营尾追过来，师长马鸿宾乘一辆“万国牌”大汽车，亲自随军督战。红二十五军当即决定给敌一点颜色看看，在马莲铺一带，设下埋伏，出其不意地将追敌全部打垮，歼敌一个多营，马鸿宾本人也险些被生俘。

这时，因连日暴雨，西兰公路北侧的泾河水猛涨，北渡困难！而在公路南面，又被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原所阻，回旋余地很小！东边泾川之敌已经到位，挡我去路，西南尾追之敌毛炳文、马鸿宾部又渐渐逼近，红军已处于被敌前后夹击的不利境地！于是，军领导决定部队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支流 汭河，佯作进攻灵台，夺路入陕之模样，迷惑和调动敌人，继续切断西兰公路，以探听中央红军的信息。

8月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经由白水镇，冒雨东进，到达了泾川县以西约20多里的王村，接着南折，登上王母宫塬。

刘赞州，这位当年红二十五军的副班长回忆当时的行军：“从白水镇出发，正下着雨。没走多远，大家的雨伞被大风吹坏，全身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陇东高原一下雨，道路又粘又滑，一脚踩下去，泥就没过脚背，像陷进了面糊里，拔不动腿，当大家听说渡过泾河（实为泾河支流 汭河——编者注）很快就会和陕北红军会合时，都异常高兴。几十里路，很快就走完了。

“泾河是甘肃的一条大河，河两岸都是百公尺以上的高原。河水平时很浅，可以徒步涉过。近来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水有4尺多深。河窄、水急、漩涡多，人到水里稍不留神就会被冲

倒、卷走。”<sup>①</sup>

王母宫塬，得名于这里的一座建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它北临泾河，南靠汭河，向东不远处就是两河交汇处的泾川县城。

军政委吴焕先率部队过河，副军长徐海东断后，同担任后卫的二二三团一起，负责掩护。

吴焕先亲自在岸边指挥。他浑身衣服全都被雨水湿透，紧紧贴在身上，满脸都滚着水珠，面孔变得铁青。他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实行警戒，防止敌人突袭。等到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了河时，山洪突然暴发，有几个战士不幸被洪峰卷走。吴焕先一看情况严重，马上命令停止渡河，抢救落水的战士。

这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行李挑担、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随医院行动的伤病员，全部拥挤在汭河以北狭窄的岸边。

突然，王母宫塬上响起了枪声！敌人上来了！红军领导担心的事偏偏就在节骨眼上发生了！

敌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1 000余人，在一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乘机向我突袭。他们利用我哨兵雨中观察的困难，冲散了我们的排哨，趁机攻了上来。

在塬上四坡村内的二二三团三营，首先与敌接上了火，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分班分排地与敌展开激战。为配合三营抗击敌人，二二三团重机枪连连长戴德归，奋不顾身地将一挺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红军受到突然攻击，阵势一时显得忙乱，而先头部队已渡河难以回援，许多人马被阻在塬下河边，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状态。如顶不住敌人的进攻，让敌人占领塬上制高点，后果将不堪设想。

<sup>①</sup> 《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徐海东带领二二三团一营、二营，立刻投入战斗，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

正在河边的吴焕先，听到枪声，便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150多人，迅速增援。他一马当先，一鼓作气奔上塬顶，恰好插入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迅速占领几座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吴焕先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与此同时，二二三团3个营，在徐海东的指挥下，在几挺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

只顾向四坡村发动围攻的敌人，没想到忽然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

就在这时，军政委吴焕先却中了弹！吴政委的警卫员廖辉至今记忆犹新：“战士们看到吴政委来了，士气大振，不顾敌众我寡，泥泞路滑，迅速抢占塬头制高点，把敌人打下去。这时，我跟随吴政委冲在前面。突然，我发现沟那边100多米处就是敌人。‘吴政委，卧倒！前边有敌人！’我大声呼喊着，正当他向土堆跃进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吴政委仰身倒在泥泞之中。”<sup>①</sup>

吴焕先附近的警卫员急忙扑上前去，把政委抱到一处隐蔽的地方，进行急救包扎。政委双目微睁，面色苍白，鲜血染红了他的灰布军装，滴落在地上，溅到了塬上的野草上！

指战员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更加激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人人怒火万丈，个个锐不可挡。大家都急红了眼，怒目圆睁，杀气腾腾，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与敌拼刺刀肉搏。最后，终于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予以歼灭。二营通信班长周世忠，发现一名骑着白马的敌人军官，企图夺路逃走，他抬手就是两枪，敌军官连人带马入倒在泥沟中。战后经查证，这个敌军官就是团长

<sup>①</sup> 《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47页。



马开基。

到达陕北后，十七八岁的周世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

巍巍耸立的王母宫塬上，阴云低垂，风雨声咽。吴焕先倒下的野草丛中，一摊摊被雨水溶过的紫血，渗透了一簇簇野草。此时此刻，那一簇簇被鲜血染过的地丁草，盛开着黄的、白的、紫的小花瓣，滚动着一滴滴带血的泪珠，仿佛也在为烈士垂首致哀……

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就这样战死在王母宫塬上，年仅28岁。

当天晚上，部队全部过了河。长征路上从来没躺过担架的军政委，这时也在担架上到了汭河南岸。

当天晚上，部队在汭河南岸的村落里驻扎宿营。

在军部宿营地郑家沟的一户农家院内，军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给军政委整理遗容。

徐海东亲手将吴焕先生前最喜欢的一件青呢大氅，覆盖在他的“熟睡”的战友身上。

在入棺之前，军部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参加人员有：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参谋主任查国桢、秘书长程忠寿、秘书科长张池明、政务科长朱仰兴、组织科长夏云廷、宣传科长刘华清、文印科长陈鹤桥、管理科长何光宇、军供给部政委张希才、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政委苏焕清，还有詹大南等警卫人员。几十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都默默地凝视着，向军政治委员垂首致哀。

当天夜里，少数几个战友悄悄地将吴焕先掩埋在郑家沟的山根底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廖辉，吴焕先的警卫人员，满怀深情地说：“当晚过河，住在

大村庄，我们把吴政委的遗体安葬在汴河南岸山坡的凹地上。吴政委在红二十五军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稳定部队情绪，他牺牲的消息只传达到营以上干部。几天不见政委，战士们问开了，‘吴政委呢？’在行军中，走在前面的战士回答说：‘吴政委可能在后面。’走在后边的战士说：‘吴政委可能在前边。’一天一个战士问我：‘怎么不见吴政委呀？’我哽噎着说：‘吴政委在我们的前面。’是啊，他永远在我们前面。”<sup>①</sup>

是啊，吴焕先政委永远活在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的心中。

1985年10月27日，中央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吴焕先烈士的家乡新县，召开纪念大会，隆重纪念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50周年。

在新立的吴焕先烈士纪念碑上，铭刻着由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撰写的，经由胡乔木、胡绳亲自修改审定的《吴焕先烈士纪念碑文》：

吴焕先同志，1907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省新县）。童年读私塾，16岁进麻城蚕业学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参加领导著名的黄麻起义，坚持鄂豫边武装斗争。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历任黄安县农民自卫队党代表、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土地委员会主席、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焕先同志留任东北游击总司令。他根据省委决定主持重建红二十五军，先

<sup>①</sup> 《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后任军长、军政治委员。在面对数十万敌军“围剿”、物资又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军民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4年，根据党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他率领红二十五军冲破敌20余倍兵力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他代理鄂陕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正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为粉碎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二十五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在获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北上动向后，省委毅然作出西进甘肃、迎接党中央，北上会合陕甘红军的决定。红二十五军挥师猛进，占两当、攻天水，连克秦安、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截断西兰公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8月21日，焕先同志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吴焕先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热爱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胸怀全局，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百折不挠。他严于治军，与战士同甘共苦，英勇机智，指挥若定。在多次恶战中使所率部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他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坚强的斗争意志，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深为全体指战员爱戴和崇敬，是全军公认的杰出领导者。他的牺牲，全军万分悲痛。

为缅怀先烈业绩，继承革命精神，特立此碑，以志永念。

吴焕先同志永垂不朽！

红二十五军先烈纪念委员会

1985年8月21日

### 三 永坪会师

门外雨不停，屋里泪长流。

“徐老虎”悲痛欲绝。

徐海东，这位钢铁般的汉子，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却止不住泪水！

他9次负伤，从没流过泪；家中几十口人被敌人杀害，他也只是暗里伤心。军政委吴焕先的牺牲，使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他和吴焕先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三年多来，他们两人率领着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西征到陕甘。一个文、一个武，同心协力地带着这支红军。军事上，吴焕先信赖徐海东的指挥才能；政治上，徐海东信赖吴焕先成熟、老练，不仅靠得住，而且能够掌好舵！他们共同忍受过失败的痛苦，又共同分享过一次次胜利的欢乐。为工作的事，两人争吵过，甚至还拍过桌子，可彼此都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吴焕先政委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精神，给徐海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委的父亲、哥哥、嫂子、弟弟，都被敌人杀害了，母亲讨饭，妻子饿死，这些都未能动摇他革命到底的决心。红二十五军由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发展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拖不垮、打不烂，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这与吴焕先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庾家河战斗之后，程子华、徐海东均负重伤，徐宝珊一直抱病（不久又不幸病逝），吴焕先主持全面工作，在与中央失去联络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追堵，建军建政，指挥若定，充分表现出他的智慧和才能，

表现出他的全局襟怀和远见卓识。

徐海东在解放后回忆道：“在鄂豫皖苏区，我和他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又一同转战万里。他是最亲密的战友，最敬爱的同志。前些天，他还向我说：‘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现在，他倒下了，再也见不到党中央，见不到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sup>①</sup>

骁将兼具文武才，一朝身殒天地哀。

红二十五军军魂、生龙活虎的吴焕先，突然倒下了！对徐海东、乃至对整个红二十五军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

自北出秦岭、威逼西安以来，徐海东一直作为先锋，带领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攻城陷地。吴焕先的牺牲，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徐海东痛惜他失去了一位好战友，痛惜红二十五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同时，他更为红二十五军的前程焦虑！

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在商洛山中病逝了，代理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如今又倒在了汭河边，这中间才隔了短短的100多天！

军长程子华的伤口虽然好些了，却落下了一双残疾的手，生活行动还十分困难！

副军长徐海东，这位红二十五军前任军长，肩负的担子更重了。红二十五军战史这样记载着：“吴焕先牺牲后，省委常委临时商定，由于程子华负伤未愈，军政委和省委书记均由徐海东兼任，待以后有机会再开省委扩大会议选举。在此关键时刻，徐海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革命重担，这对于当时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继续执行北上的战略任务起了重要作用。徐海东在领导和指挥红二十五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4～155页。

军的行动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原则性强，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勇于负责；他多谋善断，指挥果敢，运用战略战术灵活；他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多次负伤，战功卓著；他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爱护战士，深受指战员的崇敬和爱戴。后来，毛泽东等曾多次对徐海东作过很高的评价。”

四坡村战斗的胜利，使敌人暂时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为了继续牵制和迷惑敌人，红二十五军直逼灵台方向，佯作“夺路入陕”之状。

8月23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灵台什字镇。时值阴雨天气，道路泥泞不堪，给部队行军带来很大困难。于是，军部决定在此休息几天，同时派出部队宣传群众，筹集粮食，做好继续行军的准备。

像过去一样，红二十五军一面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一面派出医务人员为当地群众疗伤治病，还处决了一个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外号叫“狼牙”的伪保长，打土豪分浮财。群众认识了红军，消除了疑虑，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局面。贫苦群众有的为红军提供情报，有的给红军送菜送饭，许多青年人加入了红军，成为红军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戴季英、韩先楚、刘震回忆道：“敌人原以为这支‘疲惫之师’，在到泾河两岸时，必然要夺路进入陕北，没想到却掉头南下，进入灵台县境。我军的这一行动，敌人曾错误地认为：扰乱之师，飘忽不定；北去不成，而又‘被迫流窜入陕’。于是，西安绥靖公署8月30日又发出电令：‘严堵该匪窜陕。’尾追到达陇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这时也摆出一副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的架势。

“其实，红二十五军这除以少数部队在灵台附近虚张声势之外，主力则在灵台、崇信、陇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积极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部队所到之地，军领导都派出手枪团，四出搜集报

纸，访问客商，打探消息，极力寻觅有关主力红军的北上动向。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又没有电台通讯，对主力红军正在过草地的行动消息，一无所获。”<sup>①</sup>

这时，敌情却不断传了过来：毛炳文第六师十七旅已乘汽车由隆德赶到泾川县城；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继续向泾川附近调动；陕甘边界之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则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到陇县、马鹿镇一带；王均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等地，朝华亭方向追来。数路敌军的频繁移动，一个对红二十五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而且正在逐渐缩小。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鄂豫陕省委、军领导，交换了意见，认为，既然难以迎接到中央红军，敌人日益迫近，部队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很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继续作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已十分不利，便按照泮峪口、佛坪两次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决定立即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师。

徐海东回忆道：“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 72 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sup>②</sup>

敌人搞不清虚实，以为红二十五军是“被迫流窜入陕”，有“东窜麟游（陕西境内、渭水北岸附近地名）模样”，于是慌忙在宝鸡、虢镇渭水一线布防，集中兵力于渭水北的陕甘边界。

红二十五军突然掉头西进，转向华亭境内，经安口镇回师北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 99～100 页。

<sup>②</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第 41 页。

上，8月31日晚，由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向东北前进。至此，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活动18天之久的西兰公路线。

红二十五军切断陕甘两省间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并在西兰公路沿线行动，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扰乱了敌人的西北防御体系，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红二十五军渡过泾河以后，经由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于9月3日渡过马莲河，到达合水县板桥镇一带宿营。但在这时，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马培清骑兵团和马奋英步兵团共6个营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没有察觉。

板桥镇，位于马莲河与合水川的汇流处，川原相连，沟壑纵横，地形比较复杂。

9月4日晨，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因军参谋长戴季英集合部队讲话时间过长，耽误了预定的时间，加之警戒疏忽，以致后卫二二五团三营遭到三十五师骑兵团的突然袭击。在此紧急时刻，为掩护三营突围，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尾，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

马家军大多为回民，兵强马壮，打起仗来十分凶猛剽悍，又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加上他们都是当地人，善于山地作战，步兵与骑兵配合默契，比起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很不好对付的。

马家军自恃人多势众，且有骑兵便于机动，便发起疯狂进攻，红军陷入不利境地。在这危急关头，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营政委刘幼安（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掩护军长徐海东和二、三营冲出重围，撤至板桥以东曹家原一带。但敌人紧追不舍，双方于此再战。红军指战员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英勇作战，歼敌40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战斗中，红军牺牲200多人，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



韩先楚，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8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史上，他算得上是一员猛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又黑又瘦、个头矮小、年仅22岁的红军营长，在抗美援朝时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三枚勋章，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军过泾河后，兼程前进，经多次战斗和艰难行军。其中，在合水县板桥镇，我军继续北上，军直属队和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因负责同志讲话过长，使掩护部队出发晚，敌骑兵队袭来，我掩护部队打退敌骑兵进攻后，接着去追击敌人。敌骑兵从两翼包围上来，我追击部队被冲散，海东同志骑马撤退，敌骑兵紧追海东同志，并说，要捉活的，所幸我出发部队闻知敌人进攻后，部分部队回援，打退了敌人，救出了海东和一些同志。”<sup>①</sup>

战后，红二十五军经东华池、太白镇之间渡过葫芦河。沿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从地图上看，这里是子午岭山区。

子午岭，横跨陕甘两省，这里重峦叠嶂，追山梢林，野兽出没，方圆几百里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当地群众称为“梢山”。

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后，连续行军三天没有见到一户人家，无粮可筹，加上道路崎岖难行，部队体力消耗很大。最后，全军断粮，饥不可支，有的指战员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不少营以上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的乘马杀掉，为指战员充饥，却也是杯水车薪，不能应付整个局面。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99~100页。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饥饿，像一条毒蛇，威胁着全军3 000多条生命；饥饿，成了红二十五军最怕的敌人！

先头部队正在缓慢地行进中，突然从后边跑来四匹马，一匹白马，三匹红马。白马上坐的就是徐海东，他带着一名警卫员、一名号官和一名侦察参谋，急急往前赶去，想找个大村庄，快些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西北高原上的秋风，扫着荒山，吹着野岭，这时，秋日的太阳正悬挂西天，重重山脉被染得一片血红。远处，山连着山，梁挽着梁，重重叠叠；条条小道，弯弯曲曲，伸向高原，甩向天边。对画家来说，天疑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题材；但徐海东对此却全无心思，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两个字：粮食！

确实，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他在红二十五军中是极有威望的；军长程子华重伤未愈，作为副军长的徐海东，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如今，指战员们都饿着肚子行军，他这当指挥官的心情能好受吗！

日薄西山。徐海东骑着马刚刚翻过一道山梁，就看见走在前面的侦察参谋回未报告：前面发现羊群！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徐海东兴奋了，将马鞭在空中“叭”地一甩，快马加鞭，同侦察参谋一起来到了羊群前。

原来这是一个羊贩子赶的一群羊，足有400多只。

徐海东看见军经理处经理部长从队伍后跑过来了。这个放羊娃出身的干部，平日里买东西，盐多少钱一斤，油多少钱一两，脑子里非常清楚。经理部长与羊贩子，你一言我一语，只一袋烟的工夫，便将买卖谈妥：大羊每只一块大洋，小羊两只一块大洋。

“杀！”徐海东一声令下，沸腾了整个山谷。战士们的欢呼声，小白羊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徐海东在《回师陕北》中回忆道：“我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

的行军，便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一个羊群，有500多只羊。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烤。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sup>①</sup>

严重的饥饿威胁解除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前进，9月7日，到达庆阳县豹子川（今属华池县）。

鄂豫陕省委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等。

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还对部队作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军领导一再要求部队整顿军容，遵守纪律，注意团结，讲究礼节；尊重地方政府，虚心向兄弟的陕甘红军学习，向根据地人民学习。

全军指战员得知将要进入苏区，人人兴高采烈，欣喜万分。

会后，徐海东和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沿豹子川向陕北开进。9月9日到达保安（今志丹）县永宁山，同陕甘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历经艰难曲折而发展起来的，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和1928年5月“渭华起义”失败

<sup>①</sup> 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5页。

后，谢子长、刘志丹等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逐步创立了以南梁（甘肃华池县境内）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组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又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5月，陕甘游击队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于当年12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5年1月，陕北武装力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1935年夏，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相互配合，粉碎了敌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五千，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在陕甘两省的20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约90余万。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开以后，给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中央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军委得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立即写信报告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

习仲勋，时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是陕西富平县人，1913年生，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省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刘景范，时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胞弟。

西北工委宣传部当即印发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指出：“这一胜利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的一致行动。为苏维埃在整个西北及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这个伟大胜利消息，使我们西北劳苦群众听见了，没有一个不手舞足蹈、鼓掌欢迎与庆祝的。我们党应该抓住这一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

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上陕甘〔同〕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sup>①</sup>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刻动员起来，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欢迎红二十五军，发动群众自动地捐助各种食品与鞋袜，派代表慰问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

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正在安定县王家湾一带进行休整。接到通知后，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又在王家湾召开了西北红军干部会议，讨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有关事项。

刘志丹对红二十五军到陕北，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红二十五军到陕甘根据地是一件大喜事，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红二十五军是老红军，他们带了建设红军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不要放过。两军会合后，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忠诚老实，密切联系群众的老传统，有好饭，要让给老大哥吃；有好房，要让给老大哥住；调什么就给什么，不能讲价钱；打仗要配合，缴获战利品要互相推让。总之，要照顾大局，不能有本位主义。

大家讨论了刘志丹的讲话，一致表示拥护。会后，各团连夜进行传达动员，并做好南下与红二十五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

红二十五军在水宁山稍事休息后，即在陕甘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声中，向延川县水坪镇开进。

一路上，红二十五军受到根据地群众亲人般的接待，腾房让窑，磨面碾米，杀猪宰羊，捐献鞋袜，送水送饭，热情慰劳，并贴标语、散传单和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到处洋溢着喜迎亲人的热烈气氛。一首陕北民歌这样唱道：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sup>①</sup>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69页。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陕北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长途跋涉，受尽磨难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在这里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温暖。

在陕北党组织的关怀下，红二十五军得到充足的粮食，大部分战士穿上了新鞋袜，战士们喜气洋洋，一路上欢歌笑语，行军速度大大加快。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

永坪镇，位于陕北延川县境内，是当时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

红二十五军受到了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的夹道欢迎。

陕北红军战士霍春华对当时的热闹场面记忆犹新：“1935年9月的一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是，永坪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永坪镇的河道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就要和我们陕北红军会师了。

“一会儿，太阳渐渐升起来，晨雾消散，我站在高坡上一望，十多里长的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员、少共团、政府、学校和当地的老乡。三四道大彩门，五彩缤纷地矗立在道路中间。山沟和大路两旁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配合老大哥扩大苏区！’‘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等等。河沟草地上，许多孩子们，在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

子唱着：

“打倒豪绅地主哟，杀光反动派，

“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

“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

“歌声、调声，合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天空……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河道里响起了一片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青色军装。八角形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好。紧跟在首长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去。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接着是80来个人组成的司号连，洋号鼓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员，没有化装就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这些我们从来没见过，感到特别新奇。

“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三团，嘿！一个连就有5挺机枪，每个营还有6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亮亮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一个人一副竹扁担，颤悠悠的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

至此，红二十五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4 000余里，沿途攻克三座县城，进行大大小小战斗十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追堵，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胜利完成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红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

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赶到永坪镇，三

个军胜利会师。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在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央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永坪镇召开。

为了统一党的领导和集中兵力，统一指挥作战，会议决定：

1. 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王大成任组织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长，戴季英任政治保卫局长；

2. 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聂鸿钧任主席，戴季英兼任参谋长，张秀山任供给部长；

3. 将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十五军团还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经理部、卫生部等机构，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及军交通队、手枪团等。全军共7 000余人。其中，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编成，师长张绍东<sup>①</sup>、政委由赵凌波<sup>②</sup>；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编成，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后脱离革命）；八十二师由红二十七军编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4. 号召军民行动起来，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9月18日，在永坪红军干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召开了庆祝三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4周年。陕甘晋省委的领导和红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及上万名根据地群众参加了大会。

郭述申，这位会议的参加者回忆说：“会场上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洋溢

<sup>①</sup> 张绍东后于1938年叛逃。

<sup>②</sup> 赵凌波于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



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根据地对子弟兵的炽热感情。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鸿钧、朱理治先后讲话，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西北工委，祝贺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当时，海东同志非让我代表红二十五军讲话不可。他说，他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讲，子华同志因伤不能讲，硬把我逼上了台。可是，在刘志丹等同志的要求下，海东还是讲了话。他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道出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的心声。”<sup>①</sup>

霍春华，陕北红军战士，是这样叙述联欢大会情景的：“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两旁挂着对联，一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是‘天下红军是一家！’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两边的部队都有着出色的啦啦队，歌声和着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

“会议开始了，徐海东军长首先讲了话。他对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他们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只是个先遣队，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上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是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根皮带，插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苏区还很年青，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我们消灭了金松山（敌师长），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04页。

后来了个高桂滋，他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现在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他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苏区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许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年青的小伙子们，他们大声的嚷道：“我愿背！”“我愿背！”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的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

永坪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

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四 活捉高福源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哒。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长征来到了陕北。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平镇，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五军装备精良，能征善战；

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陕北土生土长，同当地群众联系密切。

合编之后，指战员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红十五军团马上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队伍。

与红军会师的喜悦心情完全相反，蒋介石的心情却颇不平静。

蒋介石为了消灭陕甘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7月中旬就开始部署三次“围剿”（1934年3月到1935年6月间，国民党军队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二次“围剿”，都被陕甘红军粉碎）。他调集东北军之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等4个军11个师，晋绥军孙楚部5个旅以及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等部，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9月26日，蒋介石鉴于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中央红军）正向陕甘地区开进的情况，决定将其战略重心北移。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

“西北剿总”的辖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故当时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兰州绥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宁夏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及甘南马鸿宾、青海马步芳部，均受“西北剿总”的节制。山西虽不包括在内，但阎锡山派进陕北的孙楚部，也在被指挥之列。加上开到陕甘的东北军，张学良指挥的兵力约在30多万人。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下的本钱是够大的！

张学良受命后，即乘飞机到达西安。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到场迎接。

张学良还是很卖力气的。

他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西北

站稳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确实，不抵抗将军的名声是不大好听！

同时，张学良也有信心取得胜利。

在他看来，陕北原有的红军是“土共”，没有多少战斗力，红二十五军虽然剽悍骁勇，却因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他以八师精锐，加上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部队，共约10万人的优势兵力进“剿”，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所以，在他就任新职之前，就已调动其部队分两路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动了：一路是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由关中北上；另一路是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和何柱国骑兵的1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推进。

王以哲、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第六十七军军长。他在5、6月间，曾指挥所部去陕南追击红二十五军，但未能得逞。

这一次“围剿”陕北，他感到是“立功领赏”的好时机，因此首先由陕南山阳、商县一带经关中向陕北进兵。这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刘翰东一〇七师已进驻洛川，并派一〇七师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镇，何立中一一〇师、周福成一二九师（欠六八五团）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六八五团进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

敌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尚在甘肃兰州、庆阳；孙楚部在晋尚未入陕。

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领导认真研究分析了，并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

刘志丹认为，先从米脂、横山一带下手，把高桂滋的一个师和井岳秀的一个师吃掉，因为这两股军队是陕北土顽，战斗力不强，把他们消灭后，红军就可以打出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发展革命根据地。

徐海东认为，这样做虽然比较稳当，但是目前大敌当前，消灭这两股土顽，不能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而发展苏区也不是当

前最急切的任务；如果先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则整个陕北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他提出了打蛇打头、先打东北军的计划。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军是敌人进攻陕北的主力，但因日本占领东北，政治情绪低沉。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和鄂豫陕两个革命根据地时，曾打过交道，缴获了东北军许多武器。东北军武器好，战斗胜利收获多，影响大。

最后决定：围攻甘泉之敌，调动延安之敌出笼，拦路进行伏击，坚决打好出师后的第一仗。这样，一个“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即制定出来了。

关于伏击地点，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回忆道：“副军团长刘志丹，被称为陕北的‘活地图’，他根据这一作战方案，提出在劳山设伏的想法。我和志丹同志初次见面时，是在会师大会上，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年轻指挥员。对他善于指挥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事迹听到不少。这次研究作战计划，使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他盘腿坐在土炕上，认真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冷静地思考着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以在劳山设伏的建议。”<sup>①</sup>

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绕过延安，南下甘泉以西的王家坪、关家沟等地休息待命。

9月的陕北，天高云淡，日朗气爽。徐海东、刘志丹带着团以上干部，来到甘泉以北15公里的劳山附近，察看地形。

真是个好打伏击的好地方！洛（川）延（安）公路在这里通过，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把公路夹在中间，很像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杂革丛生，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像是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06页。

9月28日，我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第二天拂晓，伏击部队进入阵地。军团指挥部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正在延安的敌一一〇师长何立中和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听到甘泉被围、洛川到延安的公路中断的消息，慌忙发电报，向张学良和王以哲告急。

张学良正在担心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孤军深入，势单力薄，粮草补给困难。突闻运输线被截断，急出一身冷汗，马上回电命令：为缩短防线，先将一一〇师撤回郃县（今富县），一二九师听命后撤。

10月1日拂晓，何立中率其一—〇师沿洛延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留六三〇团在四十里铺策应。六二八团、六二九团沿公路两侧山头搜索前进。据后来的俘虏说，敌人从山势险要的九沿山路过时，何立中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对他的参谋长范驭洲讲道：“都说徐海东厉害，我还以为他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于是，命令部队由两路纵队改成四路纵队，快速向甘泉开进。

说起这个何立中，也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7月初，红二十五军在陕南袁家沟歼灭陕军警一旅时，何立中的一一〇师就距离战场40里，但，何立中却拥兵不前，见死不救，担心遭到跟唐嗣桐（警一旅旅长）一起覆灭的命运。时隔三个月，红二十五军从陕南转到陕北，偏又在此碰到何立中。战局的发展变化，就是这样出乎意料而难以琢磨。

当日下午二时，敌先头部队进至甘泉北6公里处的白土坡时，位于该地的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突然开火，堵住敌人前进的去路。同时，位于阳台（劳山北3公里）的红七十八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后路，猛收袋口。

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

此时，设伏的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从公路两侧山上同时向敌行军队形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激战5个多小时，敌一一〇师六二八团、六二九团及师直属部队被歼灭。何立中负重伤，逃入甘泉后毙命。

这次战役，共毙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馥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 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 7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75山炮4门、82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 000余支、50瓦电台一部。

劳山大捷，动摇了敌人的军心，鼓舞了我军士气，振奋了根据地的人民。

10月5日，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从永坪镇移驻瓦窑堡。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压力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根据地内部！

在劳山战役还在紧张地进行、红军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继续执行王明路线，对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实行了错误的肃反。戴季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时又被任命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按照张国焘的《肃反》手册，开始了在陕甘的错误肃反。许多跟随刘志丹多年的干部被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杀头甚至活埋。刘志丹被诬为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被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劳山战役后在瓦窑堡被捕。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及5岁的幼女也被同时禁闭起来。肃反越来越扩大化。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到刘志丹被扣押及肃反的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传达中央

1  
2  
4  
乙

指示，接管保卫局。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到了瓦窑堡，听取了王首道的审查汇报，立即释放刘志丹及其他受到迫害的同志，恢复他们的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周恩来对似有满腹委屈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这次“左”的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

刘志丹，陕甘根据地群众的“老刘”，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党的利益、红军的团结、根据地的存亡，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永坪联席会议，被排斥在新的省委的军委领导之外。他没有计较，而是全力和徐海东、程子华等一起，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而运筹着；劳山战役后，他得知要逮捕他的消息，却毅然前往瓦窑堡就捕，临行前还吩咐部队注意团结，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名景桂。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随军东征。1926年冬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8年与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192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组建西北反帝同盟会，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1932年创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军长。他受了不少挫折，却保住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为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生存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战役中，英勇牺牲。

毛泽东非常悲痛，无限深情地写道：“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党的



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罕见的！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新建了刘志丹陵园。

毛泽东又挥笔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题道：“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朱德题道：“红军模范”。

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也为志丹陵题了词。

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他说：“在这里，我们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沉静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他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会到他，真是高兴万分。他也像我们一样，正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可是也不知道中央确实的消息。”<sup>①</sup>

在劳山战役中，红军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

红十五军团领导得到这一消息，都很兴奋，建议红十五军团西出庆阳，迎接党中央，并报告陕甘晋省委。当时，程子华正在永坪手术创伤。他在回忆录中谈了当时红十五军团为什么没有前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3~154页。

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运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人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年，彭德怀、马明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前后方负责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议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sup>①</sup>

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根据地，最后消灭红军。10月20日，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并加强六二〇团一个营进驻榆林桥镇。

榆林桥镇，位于甘泉县城与郃县（今富县）之间的洛延公路上。它南临洛河，在冬季枯水期可以徒涉，河的南岸紧靠着一排陡峭的小山，不便攀登；镇北背倚高原，高原上有新建的碉堡，内驻有少数警戒部队，作为榆林桥驻军的掩护。

榆林桥驻军团长是高福源，东北讲武堂毕业，性格刚强豪放，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102~103页。

正直诚实，张学良很喜欢他，他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该团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主力团之一。

红十五军团领导探明了敌情，决定乘敌设防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于是，仍以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困甘泉，军团主力逼近榆林桥，军团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前移至道佐铺。

10月25日拂晓，红七十五师与红七十八师，乘晨雾分别由东、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红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的外围防御，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镇内溃退。此时，红七十八师消灭洛河西峭子山之敌后，其二三二团由西向东涉水向榆林桥头发起进攻。双方相持不下。

正在这时，担任预备队的红八十一师趁机拿下榆林桥镇北城门楼。红七十五师、红七十八师趁势冲进镇子。敌人在高福源的组织下，凭借房屋和窑洞顽抗。红军指战员与敌人逐窑逐屋的争夺，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将敌全歼。

榆林桥战役，共毙敌3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缴获82迫击炮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8挺、长短枪1300余支。红军伤亡200余人，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期献民壮烈牺牲。

徐海东在《会师陕北》中回忆了清点俘虏时的有趣场面：“开始，从俘虏中就是查不出这个团长。后来有个同志看见俘虏中有一个穿得满漂亮，便故意诈他说：‘你就是高福源！’这个俘虏连忙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说着嘴向旁边一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旁边。”<sup>①</sup>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谈了高福源的情况：“高福源是个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是东北军的一个优秀团长，和王以哲军长的关系很好。我同他谈话，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杀了我！我说：不杀你，再

①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59页。

说第二个办法。他说：放了我！我说：也不放，说第三个办法。他说：没有了。我说：到我们军事学校去教书。他说：我一定教好。这样，我们把他送到后方军事学校任教员。中央到陕北后，对他进行了教育，把他释放。他回东北军后，经过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促进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过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犹如声声霹雳，惊天动地，使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军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整师、整团地被消灭，师长、参谋长、团长不是被俘就是被毙，这在东北军的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江西的红军又来到了陕北，红军的力量更强大，“剿共”前途黯淡，而国难又日甚一日，张学良“围剿”红军的信心受到严重挫折。高福源的回归，的确加速了张学良的思想转变。

西安事变后，高福源在东北军中担任旅长。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被关押起来，由此引发了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营救张学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开战，并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结果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愤怒。高福源被怀疑参与了二二事件，而被诱杀。

劳山、榆林桥两战，共歼敌六十七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甘泉城守敌也陷入红八十一师的地方武装的严密围困之中，使北到延安，南至鄜县、洛川之敌六十七军余部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至此，敌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战宣告失败。

红二十五军战史总结了劳山、榆林桥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1. 准确掌握敌情，巧妙调动敌人；
2. 作战方针正确，战场选择适当，兵力部署严密，作战指挥统一；
3. 部队团结一致，英勇善战；

<sup>①</sup> 《程子华回忆录》，第103～104页。

#### 4. 人民群众积极支援。

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战役中的大量缴获，使红十五军团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参军的战士和东北解放战士，为了用革命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依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经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批准，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这首歌很快在各部队传唱开来，对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解放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红军歌曲唱遍了中华大地，那高亢嘹亮而又富有节奏感的旋律激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红军歌曲，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先后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组织专人对歌词进行修改，并两次正式公布。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写者署名是：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榆林桥战斗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派贾拓夫送来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

贾拓夫，陕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特派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等职。解放后，担任过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计委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厅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等。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二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党所给我们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地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就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及）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能）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

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

1935年10月29日<sup>①</sup>

徐海东回忆道：“打完这一仗，我们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实消息，知道毛主席离我们不远了。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起镇。我们一面派人去迎接，同时对指挥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一一〇师搞掉了，一〇七师搞垮了它五个营，米脂方面高桂滋、井岳秀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我们讨论了一番，决定把后方留下，部队立刻南下。

“我们决定攻打张村驿。”<sup>②</sup>

张村驿一带，有几个民团的据点，虽然兵力不多，但都是当地土顽。他们储藏了大量粮食和物资，凭借深沟壁垒，不时出动骚扰，并经常给敌军通风报信，对我军行动妨碍极大。红十五军团决定拿下这几个据点，肃清顽匪，解决部队物资供应问题，迎接中央红军。

11月初，徐海东率七十八师南下，包围了张村驿、羊泉塬、东村、套通（今北道德）等民团据点。

战斗刚开始，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7匹快马。军团政治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26页。

②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委员程子华派人给徐海东送来了信：毛主席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

徐海东见信，马上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骑马赶回军团驻地道佐铺。

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郭申叙述了当时会见的情景：“11月初，海东同志带七十八师包围了张村驿、杨泉原、东村、套通等据点。就在这时，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要来道佐铺看望我们。我和程子华接到通知，一面着手准备，一面派人去告诉海东。海东同志骑马赶回驻地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贾拓夫同志就来到了军团部。见到我们天天盼、夜夜想的中央领导同志，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和我们一一握手，并给我们以亲切的问候和鼓励。

“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及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胜利的情况。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先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打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苏区连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毛主席让海东同志指挥拿下张村驿。”<sup>①</sup>

徐海东回到前线，立刻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已到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泽东对广大指战员的问候，部队沸腾起来。

刘震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消息一传达，指战员兴高采烈，高呼口号：

“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

“打开张村驿，迎接毛主席！”

“七十八师二三二团一举攻克了张村驿等上述各据点，歼灭民

<sup>①</sup> 《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09页。



团数百人，缴获了大批粮食。这一仗，打掉了敌人在黄陵、洛川、富县、甘泉以西地区的耳目，为直罗镇战役做了战场准备。”<sup>①</sup>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他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此时此刻，徐海东站发报机前，想起吴焕先政委，禁不住感慨万千！吴焕先生前曾多次讲过，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弄个“无线电”。他终于没能如愿，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张村驿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北返郿县（今富县）以北地区。这时，中央已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从此，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西安事变发生后，奉命南下商县地区，执行制止国民党亲日派军事进攻的任务。抗战爆发后，部队奉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长征结束了。

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

<sup>①</sup> 《刘震回忆录》，第74页。

---

---

## 主要参考文献

-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 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 《陈再道回忆录》（上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卢振国：《血沃中原——吴焕先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 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海燕出版社 1987 年版。
- 刘光明：《郑位三传记》，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 何东、杨光才、王顺生主编：《中国革命史人物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 卷、第 14 卷、22 卷、28 卷、31 卷、35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解放军烈士传编委会编：《解放军烈士传》第 1、2 集，长征出版社出版。
- 银笙：《谢子长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建彤：《刘志丹》，工人出版社 1979 年版。
- 《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米哲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卢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 2 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红旗飘飘》选编本第 2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年版。

刘秉荣：《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党史研究资料》第 3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河南风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湖北风物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戎马春秋——革命回忆录》，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 8、9 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6、7、14、15 册。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红军长征全史 第四卷 转战千里——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战史

作者 =

页数 = 3 5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